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丛书

主编：陈闽厦 张 云

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

齐卫平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丛书

主编：陈闽厦 张 云

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

齐卫平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齐卫平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丛书/陈闽厦,张云主编)

ISBN 7-227-03137-3

I. 中... II. 齐...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研究②文化—现代化—研究—中国 IV. ①D26②C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0272 号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丛书

陈闽厦 张云 主编

责任编辑 王晓莺 李秀琴

装帧设计 葛怀亚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申光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5.5

字 数 1655 千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 册

书 号 ISBN 7-227-03137-3

定 价 1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丛书

中国共产党与工业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与农业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与科技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与国防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自身现代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化丛书

编委会主任 唐培吉 朱敏彦 马汉文

编	委	陈闽厦	张云	陈挥
		毛黎娟	唐莲英	齐卫平
		方开淇	孙道同	贺世友
		廖慧贞	丁如冰	李剑明
		桂晋鹏		

主 编 陈闽厦 张云

策 划 高伟

前言

放眼当今，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满怀信心地踏着坚定有力的步伐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令世界瞩目。

追溯过去，中国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一再遭到挫折与失败，历尽艰难困苦的历史过程，令人感慨万分。

抚今追昔，我们应该认真、深入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与认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规律，从而少走弯路、少付学费，比较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正是史学工作者肩负的神圣使命，亦是全国人民的衷心愿望。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可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走向近代化，是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第二时期是走向现代化，从新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到现在。这两个时期的路程都是极其坎坷的。

走向近代化一波三折，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

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具体来说，前80年是一再遭到失败，后30年才逐步探索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近代化的正确道路。从社会革命角度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一再失败，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历挫折后终于取得成功。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也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前80年，也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80年为什么在走向近代化的进程中一再失败呢？

外因主要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强

国都对中国进行侵略,从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到英法美俄德意日奥八国联军对华战争,使中国沦陷成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社会。西方列强并不想让中国发展成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愿使之成为今后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如美国对英国那样,而要中国一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任他们剥夺与宰割,从而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和权益。因此,它们不仅不支持,反而一再反对与绞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如西方列强不承认辛亥革命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支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政府,反而承认袁世凯建立的北洋政府,贷款给袁世凯,这是最典型的例子。

内因最主要的是中国封建主义的根深蒂固。中国封建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落后,长期停滞不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优势,重农抑商政策千年不变,重“文”轻“(科)技”的科举制度始终坚持,封建儒家文化一统天下,资本主义因素怎能得到发展?所以当资本主义浪潮随着帝国主义入侵而涌向中国时,中国的统治阶级甚至一些先进人士、爱国志士不是抱着封建主义不放,就是舍不得彻底推翻,或者是有意识无意识地沿袭了封建的东西。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而建立的“太平天国王朝”,到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扶持光绪帝进行“变法”都没有想把封建主义彻底抛弃,这种不彻底性导致其起义、改革、变法一一失败。反观日本,提出“脱亚入欧”论,即脱离亚洲封建主义、融入欧洲资本主义的理论,明治维新后全面推行资本主义,不久就成为亚洲强国。中国走向近代化失败了,而日本走向近代化成功了。这种强烈的反差说明:一个民族如果夜郎自大,墨守成规,闭关自守,思想僵化,那就会落后、挨打;只有改革开放,求实创新,与世俱进,不断发展,才能自强昌盛。这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历史借鉴!其次,从革命成败来分析,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原因是缺少一个先进阶级的领导,缺少一个先进思想的指导。纵观旧民主主义所有起义与革命的实践,中国的农民阶

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要有一个比他们先进的阶级来领导革命。这一历史使命就落在无产阶级肩上。再次，中国近代化的失败，还在于观察世界的观点和方法的错误。中国统治阶级长期坚持形而上学，鼓吹“道不变，天亦不变”的“不变”史观。当年一些先进人士为了采纳西方学说，乃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历史易变观”来代替形而上学的不变论。到了维新变法时，康有为将历史易变论改造成为历史进化论，严复把西方进化论系统介绍宣传，中国人就以进化论来观察世界和改造世界，虽仍未掌握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但比形而上学的不变论已有了不小的进步。这时，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反思，即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造成了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先进的知识分子将西方各种思潮与学说进行比较与实践后，选择了马列主义并进行传播，并且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样，一个以马列主义理论作指导的、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可见，这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个别人或个别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句话，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社会与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1922年，共产党即提出了革命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指出了反帝反封建正确的方向。很快，共产党同国民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发动了北伐战争。革命风暴从珠江流域席卷到长江流域，北洋军阀三大主力被歼其二。上海工人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人民的政权。这个国民革命之所以比辛亥革命进步，首先是共产党参与了领导；其次有广大工农群众参加，它的群众性与民主性不仅大大超过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且也超越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再者就是有了自己的军队。可见，中国向近代化跨进了一大步。正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之时，由于帝国主

义联合干涉和革命阵营内部发生反革命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反革命势力的强大，革命力量的弱小。可以从主观上反思，一方面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在中国社会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政党，潜存着领导人民推动社会前进，走向近代化的基本能力；另一方面亦表明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是个幼年的党，是按照马列主义的原理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来进行中国近代化的，还没有探索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走向近代化的理论、道路、路线和策略。试想：马列主义主要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在此环境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并没有注意研究过封建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在中国共产党照搬马列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的近代化问题，那就不适合了，就有矛盾了。这个矛盾要求马列主义中国化，即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同样，中国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亦是不符合中国实情的。正是这些革命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致使国民革命没有顺利发展下去，共产党内多次犯“左”倾错误，走向近代化的步履维艰。当事物的内在矛盾充分暴露出来时，即酝酿着解决这个矛盾的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正确地解决了在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基本问题。毛泽东论述：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革命的第一步论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是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这种革命又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阔的道路。这样，新民主主义革命继承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未完成的事业，但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集中体现了新旧民主革命的递变与不同；而资产阶级性质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又赋予社会主义的前途,这既承认了不可超越的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又限制了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由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给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以新的内涵,一方面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另一方面又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导,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路线、道路、方针、策略。沿着毛泽东思想指引的这条道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走向近代化的正确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进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综上所述,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是多么复杂曲折!整整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我们从中得出一条真理: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要走向近代化,亦即走向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不可能用一种理论和方法来解决,所以,各国的先进人物和革命政党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经验,创造性地制定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近代化问题是如此,现代化问题何尝不是如此!

现代化从空想到科学,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当今,整个世界向现代化发展,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实现现代化了,而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向现代化迈进,中国亦在此行列之中。如果说近代化往往与资本主义相联系,那现代化则不同,既有资本主义现代化,亦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就是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过,中国今天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亦是来之不易,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收拾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不到3年的时间就使国民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并积极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实现现代化创造条件。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不能

离开当前的实际条件。”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大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规定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当时有些政协委员和民主人士提出,怎么没有提出社会主义的前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先后都作了解释,他们说:纲领中只说现阶段的任务,如果再说得远一点就变得空洞了;共同纲领是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包括了共产党的全部最低纲领,共产党的当前政策,就是要实现自己的全部最低纲领;不写入社会主义的前途,是因为今天的条件还不成熟,今天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有它的历史任务。可见,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导思想是要以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这是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

到了1953年,财政经济快速好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主科学的决策。毛泽东过早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立即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批判所谓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写的要经过“相当一个时间”来实现,当时领导人口头解释是大约要10年到15年时间,实际情况是仅仅以3年的时间于1956年即宣告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完全超越了当时中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实际水平,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主观脱离了客观,事物走向其反面。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它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两类矛盾学说;在经济建设上把苏联的重工业、轻工

业、农业的排列程序颠倒过来为农、轻、重。这些理论和方针,对推进社会向现代化发展都是有利的。然而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三面红旗”却不符合中国生产力实际水平,反而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共产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提议改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从而使党的工作重心由经济建设转为阶级斗争,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我们虽然初步摆脱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却陷入了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

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既受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亦有其思想渊源。从中国第一部《诗经》中提出“乐土”到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等的理想社会的观念,从士大夫的《列子》中的华胥国到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李汝珍的君子国,从农民的太平经、太平道、太平天国到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从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到五四时期王光祈的工读主义,都有着浓厚的空想主义色彩。

在50年代中到70年代中的20多年,我们虽然进行着经济建设,亦是向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努力,却因为是按照超越中国社会生产力实际水平的空想社会主义模式在进行,结果进展迟缓,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出现了大倒退。可就是在这20年,美国、西欧、日本等都向着现代化飞速发展,成为发达国家。这是多么值得反思的历史经验教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当矛盾的各个方面充分暴露后,解决矛盾的条件亦基本成熟。中国共产党内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机,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结束了“文化大革命”。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中国共产党人痛定思痛,认真总结中国和世界各国建

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再次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1980年,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首先是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第一次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5年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前世界的两大问题,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作了一个正确的分析判断。1987年邓小平提出了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的论断,要大家认清一穷二白、生产力低的国情,不要再犯十几年就能赶超英美脱离实际的错误。1988年邓小平根据当时世界科技迅速发展的形势,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时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全面、深刻地论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一系列根本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至此,邓小平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形成,亦就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基本形成。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继承与发展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在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明确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提出了内涵更丰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路线,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他在经济纲领中创造性地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他在政治纲领中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了共产党能更好地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现代化,他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14年中,中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地发展,达到社会经济翻两番、基本实现小康的目标,朝着现代

化迅速发展。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又继承与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即以人为本,从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更好地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提出了共产党要加强执政能力的建设。他总结了55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向着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

综上所述,中国近现代160年的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现代化中国。所以,上海市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学会组织了很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代化》丛书,从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文化、党建等方面进行研究与探讨,以冀达到以史为鉴、资政育人的目的。我的这一短文就作为这部丛书的抛砖引玉的前言吧。

唐培吉

写于2005年1月15日

目 录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功能和价值定位	(16)
现代化理论中文化功能问题的一般评述	(16)
近代中国文化转换的历史环境和特殊性	(26)
文化价值取向的选择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43)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	(58)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扬弃	(58)
外来文化的批判与汲取	(71)
文化建设与创新	(87)
 第三章 五四时期文化变革与现代化价值取向	(100)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社会变革的新途径	(100)
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论战	(109)
五四时期文化变革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122)
 第四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左翼革命文化运动	(136)
文化斗争的动向与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缘起	(136)
中国共产党对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	(146)
左翼革命文化运动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161)

第五章 抗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事业 ·····	(173)
文化发展与民族战争的关系·····	(173)
抗战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	(181)
抗战文化的成就及其经验·····	(193)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旧文化的改造和新文化的建设 ·····	
·····	(209)
社会转型与文化事业的改造·····	(209)
意识形态的斗争对文化建设的影响·····	(220)
文化现代化实践的印记·····	(231)
 第七章 十年“文革”对文化现代化的破坏 ·····	(239)
“文革”浩劫发生的文化透视·····	(239)
“文革”在文化问题上的思想扭曲·····	(250)
文化现代化受阻的原因·····	(261)
 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文化现代化 ·····	(273)
改革开放的实践与现代化进程的重新启动·····	(273)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with 邓小平的文化思想·····	(285)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文化现代化的新导向·····	(304)
 结束语：艰难的跋涉和庄严的使命 ·····	(320)
 后 记 ·····	(333)

绪 论

中国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现代化的转型就成为一项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代表着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一支新生力量出现于历史舞台。现代化转型包括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文化建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何谓“文化”?这是个看起来非常简单却十分复杂,说起来都懂但又解释不清的问题。在中国文字里,“文化”一词很早就出现了。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象传》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相通的,观察天文现象可以认识自然变化的规律,观察人类现象可以教化社会生活。易传中的这段表述,还没有把“文”与“化”连成一个词,但其中包含“文治教化”意思已经接近后人使用的文化一词。“文化”作为一个整词最早出现在西汉的文献中。如“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等等^①。十六、十七世纪,欧洲文字中出现“Culture”一词,最先的含义指耕种,后引申为培养禾苗树木,进而引申为人类心灵、知识、情操和风尚的培育。

^① 转引自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同),第13~14页。

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产业革命的掀起和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也日趋发展,文化被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得到各种各样的阐述^①。经过 200 多年,专家学者关于文化的认识不仅没有达成共识,反而定义越来越多。有人统计,专家们有关文化定义的解释多达近 400 个。以至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含义纷繁复杂,在众多的概念术语中,其共识度之低莫此为甚”^②。文化定义的不统一并不影响人们认识和实践文化。

学者们关于文化认识的不统一中还是存在某些共识的。例如,大多数学者认为,文化可以作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的理解。广义上的文化包括了人类社会实践中的的一切创造性的成果,诸如认知的(语言、哲学、科学思想、教育)、规范的(道德、信仰、法律)、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戏剧、建筑的美学部分)、器用的(生产工具、衣食住行的器具以及制造这些工具和器具的技术)、社会的(制度、机构、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狭义上的文化一般限于精神领域范围,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它作为信息的传播及保存系统,具有知识性特征,是对广义文化的记载^③。广义文化的含义十分宽泛,研究的主体对象包罗万千,不易将文化研究的特征与其他学科加以区分。大都文化思想、文化史、文化构造的研究侧重于狭义文化的范围。但这是相对而言的,上述广义文化所包含的很多内容需要通过精神领域表现出来,广义文化包含的一些方面也成为观念形态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研究中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的交叉现象大量存在。

① 关于近代西方有关文化概念的阐述可参阅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第 15~25 页,张广智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一书的“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② 张广智主编:《世界文化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 页。

③ 参见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第 28~29 页。

文化现代化是一个价值判断的概念。这里所说的“现代”，不是指历史的一个阶段，与通常说的“近代”、“当代”不是一个概念。近代文化、现代文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文化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反映的是文化的一种形态转型，它当然与社会形态的转型有内在的联系。从世界历史实际看，这个“现代”的概念首先是以工业革命为基础，一直到现在以科技革命为先导而形成的，其含义是对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超越。与此对应，文化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的文化形态向现代社会的文化形态转型。就中国而言，鸦片战争以后就进入了近代社会，经过多次社会变革，当代的中国也跨进了现代社会。但这仅仅是历史阶段意义上的划分，现代化尤其是文化现代化还远未成为现实。

文化现代化的特征当然是与整个现代化的特点密切相关。研究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工作者一般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国家类型，划分为先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种基本模式。中国属于后一种模式。后发是个时间顺序的概念，外生是个发育形态的概念。合在一起形成的现代化模式，具有居后追赶和被动受制的特征。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运行深深刻上了这两大特征。就文化而言，现代化的进程表现更为复杂，特殊的社会环境严重制约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模式看，中国的文化现代化面临着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价值判断之间的激烈冲突。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是追赶型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可以替换，可以在社会变革中模仿、搬用外国的现代成规，但文化则不可能割断、抛弃本土的历史传统，简单地将外来文化作为追赶的目标。无论是在近代中国，还是在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所面临的困惑和难点，都要比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发展要多得多。

二

近代中国的很长时间里,用以反映社会现代转型的概念表述是“西方化”或“近代化”。据哈佛大学中国历史与哲学教授杜维明的研究,“现代化”这个概念在西方正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由北美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最先提出。而中国在20世纪30年代却已经出现“现代化”这个词^①。概念的提出当然反映认识的深入,有助于问题的探讨。但相对于实践而言,中国现代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更具有实质性。近代中国的历史起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从此开始,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切变化都不再是传统社会惯常性的重复,而表现为农业社会结构的瓦解和工业社会新因素的增长。

对中国现代化形成精确和清晰的认识不容易,要认识怎样实现现代化更不容易。从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从鸦片战争至今的160多年里,中国所经历的认识困惑和实践曲折,深刻反映着其艰难的程度。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中国文化发生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传统封建文化早已经随着旧时代的终结而成为历史的遗物。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指出:“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②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因为新中国所复兴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③。伴随社会主义制度的新生和发展,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已经

① 杜维明:《多种现代化: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载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程克维译:《文化的重要性——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的进步》,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151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

初步形成发展的轮廓。尤其是到 20 世纪末,改革开放的实践推动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成就必须充分肯定。然而,还应该看到另外一面。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任务十分艰巨。首先,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呈跳跃式的发展轨迹,封建传统文化是在没有实现资本主义文化转型的情况下被社会主义文化取代,中间衔接的环节缺乏认真的弥补。其次,在紧张而激烈的革命环境下,清理和批判封建传统文化的斗争进行得不彻底、不充分。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环境下,对封建传统文化遗毒影响的危害性又长时期未予以高度重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带来较大妨碍。第三,中国文化总体水平落后,“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①。中国是在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国民文化水平、文化机制、文化环境、文化创新能力以及文化功能的发挥,都因承袭着历史遗留的薄弱底子而呈现较低的程度,与现代化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第四,受国力的限制,文化的投资建设比重长期偏低,生产力落后的现状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国家的财力极大部分用于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的发展缺乏物质上的支撑。第五,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造成文化建设的严重迷失,文化现代化的思想认识一度陷入混乱状态。第六,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总体滞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后,生产关系的变革只注重所有制的形式,没有注重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广大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增强和固定化,实际上限制了社会结构向现代化的转型。在全国人口比重中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依然以一种新的形式束缚于土地,农村地域占全国绝大部分的范围,从而为封建传统文化遗毒的继续散发保留了广阔的市场。所有这些,构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实际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82 页。

情。只有充分认清国情,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有效地推进中国的文化现代化。

三

任何政治力量的产生和作用发挥,都有文化的背景。作为阶级联合的组织,任何政党也需要有相应的文化资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突出表现在,它是在近代文化变革中形成的先进政治力量,是适应革命转型和社会转型的需要而出现在中国社会舞台上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化形态取代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文化形态。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了新的方向和新面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是相统一的。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扮演的社会角色、执行的具体任务和采用的工作方式完全不同,但努力实现现代化则是同一的目标。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阶级战争和民族战争的同时,也在文化战线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斗争。建党初期的文化工作主要是创建党的文化机关,出版发行各种书刊杂志,翻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扩大社会主义的思想宣传。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文化运动推进了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发展,革命文化工作者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下举起文化革命的旗帜,在社会科学和文学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反侵略的伟大斗争,不仅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场军事较量,更是一次民族精神的比拼。文化成为抗战的重要武器,在动员民族抗战、凝聚人民力量、鼓舞军民斗志、树立抗战信心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抗战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绘画的绚丽篇

章。抗日战争胜利后,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在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指引下蓬勃发展,为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文化建设制定的纲领、方针、政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化斗争的历史总结,又是对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深刻揭示。这个纲领涉及先进文化发展的形式和内容等关键问题,为文化现代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推动封建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有力思想武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现代化进程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民主革命的胜利扫除了现代化发展的障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保证了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新文化建设对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重大意义,从树立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需要出发,成功地进行了清理旧文化的工作。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利于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党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滋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也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而滑入错误的轨道,“文革”十年里,虽然以“破旧立新”为号召,但在文化上却表现出建设的失控和无序。在极左思潮的掩盖下,封建主义思想遗毒却在“破旧”名义下复活甚至泛滥,“文革”留下了文化现代化的沉痛历史教训。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形成了现代化建设回归正确轨道的契机。伴随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国在发生巨大变化中实现了又一次社会转型。这次社会转型,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的社会转型相比,具有更为突出和鲜明的现代意义。它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方面,也表现在文化变革上。文化的价值理念、传播形式、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变化之

大、范围之广、发展之速、创新之多,为历史所空前。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文化建设以崭新的姿态向前跃进。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被广泛地调动起来,文艺创作十分活跃繁荣,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各种文化作品大批问世;文化理论研究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文化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挖掘,外国文化思想得到理性的介绍和资鉴;现代技术手段被广泛运用于文化展示和传播,先进管理方法使文化机制日益现代化,文化的市场特征日益明显。这些新现象伴随改革开放而生长,适应飞速的发展而成熟,为中国共产党推进文化现代化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资源。从中共十二大明确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命题,到世纪之交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文化现代化呈现的格局构成了崭新的时代篇章。

四

文化问题的争论贯穿于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一百多年里,争论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突出的焦点是文化价值取向上的东西之争。从19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中体西用”口号,到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优劣之辩以及能否调和之争,到20世纪30年代的“本位文化”讨论,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所谓“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的论争,视线都集中在文化价值取向的选择问题。综观这些争论,涉及到各种文化的属性、特征、优缺点等方面的比较,但这不是主要的,争论涉及的实质问题是:什么样的文化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怎样对待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怎样对待外来的异质文化?在处置中外文化冲突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文化如何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从它诞生之时就已经显现出来的。早期建党过程中,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代表的具有

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介入文化革命的热情以及改造传统文化的态度,体现了他们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对先进文化的追求。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也因为中国共产党新生力量的产生而迈上了新的征程。在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实践中,文化现代化的探索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党为此付出的努力、经历的曲折和积累的经验,成为不断提升文化现代化认识的深厚基础。

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对文化现代化进行了精心探索,他们的文化思想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脉相承,表现为延续、发展、创新的关系。毛泽东为创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毛泽东关于文化是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关于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关于吸收外国先进文化成果、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关于文化创作的源流诸多观点以及提出的“双百方针”,都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起过积极的作用。邓小平在新时期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他强调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他把文化建设视为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智力因素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标志;他立足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揭示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他主张打破封闭的狭隘偏见,解放思想,“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②;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的指导地位,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③;他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发扬文化民主,要求文化工作者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下同),第20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第37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4页。

“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①；他提出必须尊重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鼓励文化工作者“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②；他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化建设必须体现人民性、时代性和多样性等等。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具有鲜明的文化现代化特征。江泽民将文化建设提高到战略的高度加以认识，号召“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③他提出反对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倾向，“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④；他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文化建设方针；他提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⑤；他提出重视“文化方面的竞争”问题，认为“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⑥；他提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⑦；他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始终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这些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文化现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2000年初江泽民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概括来揭示新世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3页。

③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④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下同），第384页。

⑤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89页。

⑥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91页。

⑦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纪中国共产党建设的要旨,既是对历史的准确提炼,又是对现实的深刻把握。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依据,更是继续前进的准则。它的现实价值是赋予党的建设重要思想以现代化的新内涵。其中,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要从现代化的深刻认识上推进中国的文化建设。它的提出,可以说是对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关系的新概括。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蕴涵着中国社会发展新路向,即寻求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胡锦涛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就是从指导思想上对这个新路向的概括。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主题,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五种执政能力之一,显示了党对文化建设在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中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2005年2月,胡锦涛又向全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他在阐述文化建设问题时指出:“要积极推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大力提高基层特别是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服务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①

以上叙述粗略勾勒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现代化的认识逐渐加深的轮廓。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现代化的本质规定。这一概括,超越了百年来文化论争中各种形而上学的机械思维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定位上指明了文化现代化的方向。对于文化而言,“先进”是一个状态的界定,是与“落后”相对的。这里说的“先进文化”,突出的显然是它在世界文化整体中的位置规定,只有占据领先地位才称得上是先进的。

^①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05年2月19日。

它不直接反映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的地域概念,也不直接反映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阶级属性。因此,“先进文化”在文化现代化意义上更具概括性,也在普遍意义上更具通用性。但是,文化总是具体地体现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区域范围,文化建设也总是有相应的指导思想和发展路径。先进文化是历史的,具体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想目标决定了其现代化建设的行进路径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离不开“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个限定的前提。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内涵的一致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这个概括,体现了文化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定位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探索经验的积累和共同智慧的结晶。它在宏观上回答了如何科学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如何使中国文化建设能够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如何使文化建设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步调一致等等重大问题。

五

本书力求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探讨在文化领域所发生的一些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变化。侧重点不在于历史过程的描述,而在于研究和揭示文化变革中中国共产党所起到的作用。进行这样的梳理是件困难的事情,既没有现成的研究思路可供参考,又难以回避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我们作了努力,在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从历史资料的分析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我们的研究,以下一些问题值得在这里提出来进一步研究。

第一,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线问题。学术界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不少阐述。比较多

的学者采取阶段划分的研究方法,按历史发展顺序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演变。虽然对各阶段的上下限划分和阶段的名称概括上有所不同,但区别不大。我国现代化研究的著名学者罗荣渠从现代化模式角度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他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经历了“三次模式大转换”,即“国家结构模式转换”、“混合发展模式转换”和“体制内模式转换”。罗先生围绕这三次模式转换研究了鸦片战争后 150 多年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曲折变化。他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表现着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又缺乏历史连续性,不断打破又不断重新做起”^①。我们同意罗先生的论断,在构思本书写作框架时,体现了这个思路。但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就文化现代化而言,在缺乏连续性的历史过程中,有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本书中突出的是封建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这一主线,是否妥当,还值得研究。同时,这一主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如何展开的?有哪些特征?这些相关的问题都还需要展开研究。

第二,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现代化思想的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具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历史上,党中央领导人中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核心外,瞿秋白、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对文化问题都有很多的论述。同时,党内还有一大批文化工作者,在文化建设中提出不少真知灼见。但是,学术界目前还缺乏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的专门研究。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联程度如何,两者是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20 世纪 60 年代初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文化现代化并未列入其中。那么,是不是没有认识到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性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来认识问题。当时之所以没有明确提出文化现代化的问题,

^①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续篇——东亚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108~113 页。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紧迫任务尚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国际上帝国主义施加的压力和国内生产力落后的现实,使党中央将现代化建设的重点落在国防、工业、农业和科技方面。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共产党没有文化现代化的思想。事实上,在此前后,毛泽东和党中央都提出了文化建设的问题,并号召全党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周恩来对科技和文化工作也予以高度重视。如何联系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客观进程,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现代化思想,还有待努力。

第三,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曲折问题。这与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误是同一个问题,但也有特殊性。比如,经济建设中的失误带有明显的“左”倾错误的特征,长期的急躁情绪致使欲速而不达。但文化建设中的失误既有“左”倾错误的表现,也有封建传统文化遗毒的危害。文化建设中“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地搬用,封建传统文化遗毒的主要表现则是在极端情绪下封建意识的复活。从某种角度看,文化建设中遭遇的曲折,与其说是由急躁情绪造成的,不如说是落后保守心态的作用。还有,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怎样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曲折?弄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深刻总结经验教训,避免重复以往文化建设中的失误。

第四,社会主义文化与文化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实现文化现代化也当然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说,两者并不矛盾。但是,社会主义文化这个概念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限定性,而文化现代化这个概念反映的则是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普遍趋势。两者在什么样的契合点上是一致的?又有哪些方面是需要识别的?在文化现代化的普遍趋势下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根本区别是什么?此外,中国共产党提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目标,与社会主

义文化、文化现代化在涵义上如何理解？这些问题上如果没有清楚的认识，必然影响文化现代化的正确发展。

以上这些问题，本书中有的进行了阐述，有的则浅尝辄止。有的超出本书的范围，未及述论。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有限，很多地方的阐述疏漏和观点上的不成熟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帮助我们进一步开展研究。

第一章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功能和价值定位

世界现代化的历程表明,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现代化理论也逐渐深刻而成系统。经典的原生现代化理论、后发现代化理论和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构成现代化理论发展循序渐进的思想链。在理论的演变中,研究者越来越重视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功能和价值定位的问题。近代中国在社会变动中产生了文化变革的要求,文化价值取向的选择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作为崭新的文化价值取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体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由此而步步向前推进。

现代化理论中文化功能问题的一般评述

1. 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对文化功能的一般界定

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历史的演进与理论发展的逻辑紧密相连。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发展与现代化实践的历史进程相伴相生,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与典型的西方现代化历史相适应,产生了经典的原生现代化理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出现了后发现代化理论;与20世纪后期全球化、后工业化、后现代化的发展实践相适应,形成了形式多样的当代社会发展理论。

这里所说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方思想家以20世纪以前的西方,现代化为对象,所作的历史研究和

理论概括。这一理论虽然没有以“现代化”冠名,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对现代化问题的理论思考,是现代化理论的经典形态。开创现代化理论研究先河的有托克维尔、韦伯、桑巴特等著名思想家。

托克维尔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他曾赴美国进行了9个月的考察,亲身体验和了解美国民主制度的实际运用,出版了《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一书。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论述民主制度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涉及现代化理论研究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以研究美国现代化为范本,揭示现代民主制度实现的过程,从而解释了美国现代化得以完成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条件。托克维尔认为,地理、民情、法制三位一体,共同构建了美国的民主制度,在美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重大作用。该书侧重于制度层面上的现代化研究,但在研究中也包含对文化角度的观察和阐述。如在对“民情”的分析中,托克维尔对文化及文化功能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所谓“民情”,托克维尔把它定义为:“人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拥有的理智资质和道德资质的总和”,“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社会风貌……它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①他特别考察了民情中有助于维护政治制度的几项,如宗教信仰、教育、习俗和实践经验等。在美国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宗教信仰最为注目。英属美洲的天主教是最主张身份平等的教派,美国天主教徒既是最驯服的教徒,又是最独立的公民,他们对民主共和制度天生没有敌意。美国社会全体公民信奉宗教,宗教则间接地引导着民情,并通过约束家庭进而对国家发生约束作用。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民情表现的极端严肃

^①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下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51、332页。

性,首先来自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并不抑制人们发财致富的热情,但它把美国人的想像力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并节制他们的激情,对人民起着教化作用。“法律虽然允许美国人自行决定一切,但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为。”^①此外,他认为,美国人的教育和传统习惯也对维护民主制度起了作用,并着重分析指出了自由传统对于美国民主的意义。由此可见,托克维尔在研究现代化起源问题时,关注并强调了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具体化的宗教信仰、教育、传统习惯等对其功能作了一般性的界定,并认为它们是构成美国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马克斯·韦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西方社会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和主要奠基人,他的学说对众多学术领域具有广泛的影响。在1904~1905年发表的长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他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文明,即现代西方世界的文明,由此把资本主义归结为它的精神。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乃是在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和文化环境出现的一种宏伟的历史运动,是一群具有共同精神的人创造的,这种精神产生了创造利润的各种合理性的复合体,即人们所说的“资本主义”。这一看法不失为原生现代化形态的一种原创性研究,开现代化理论中“文化起源论”之先河。韦伯指出,资本主义是西方文明的特殊产物,是一种基于自由劳动的理性主义的组织方式而诞生的,只有在此环境下才能产生具有普遍价值和普遍意义的文化现象;资本主义的起源与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精神”有密切关系,资本主义作为西方资产者的一种精神、一种性格,在西方社会有源远流长的渊源,与16世纪基督教改革紧密相联。在韦伯看来,欧洲近代企业家和中产阶级的文化精神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扎根于新教这种特有的宗教。从“新教伦理”与“企业家精

^①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第339页。

神”的联系中,韦伯揭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起源,“如果旧日的新教精神和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有什么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在所谓多少带点唯物主义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声色享乐中寻找,而应在其纯粹的宗教品性中寻找。”^①这里韦伯强调资本主义文化与宗教精神之间的联系,当然具有其片面性,但他试图从文化层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寻找一种内在的关系,仍然不失为一种解读路径。

韦尔纳·桑巴特,是19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史研究者,研究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史成果卓著的欧洲学者,其代表作《现代资本主义》也是旨在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并先于韦伯提出了“资本主义起源于精神”的理念。“资本主义是由欧洲精神的深处发生出来的。产生新国家、新宗教、新科学和新技术的同一精神,又产生新的经济生活。”^②他把“资本主义精神”看作“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的总和,从“资本主义精神”的高度对现代资本主义活动的本质作了深刻而独到的分析,强调了文化观念和经济活动同等重要。

总体而言,上述经典现代化理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世界现代史上现代化的原生形态,共同之处是,他们在研究西方现代化起源时,无论持何种观点,都非常注重西方社会深刻的文化背景,强调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并从具体的、特定的文化结构和文化形态的阐释中对文化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历史参照性。就现代化历史而言,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初显雏形尚在资本主义起步阶段,关于现代化的研究也不

① (德) 马克思·韦伯著,于晓、陈维纲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0页。

② (德) 韦·桑巴特著,姚曾虞译:《现代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212页。

缺乏集中的关注。此外,在一般的解释中,现代化往往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而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首先是起源于工业化的经济起源,因此,能以文化的视角关注现代化的发展,不失为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卓越之处。

2. 后发现代化理论及其对文化功能的认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世界,现代化进程开始了新一轮的启动。尤其是东亚地区一些原落后国家在现代化浪潮中的迅速崛起,更是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这个大的背景引发了一批理论家研究现代化的冲动,诞生了许多新的理论成果。

被称为美国“现代化理论”奠基人的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特·帕森斯。他在大量的著作中,描述了表现整体的系统性模式,分析了现代化的过程,即现代化的一种“制度”与“价值”的综合体系。帕森斯认为,如同组织的演变一样,应当根据社会从原来的简单形式演变到后来更加复杂的形式的变异来分析社会文化的演变。他提出了关于社会文化体系的生物学假设,并假设社会文化体系处于均衡状态,其功能是“维持模式”、“适应”、“达到目标”和“一体化”。“维持模式”是指社会方面的问题,包括保持制度和文化上的模式;“适应”主要指经济方面的问题,指资源的分配对环境的适应;“达到目标”是指提出目标并为之而努力,主要目标是国家的政体;“一体化”是指社会制度与社会准则的全面协调,即在整体上的一致。他还进一步抽象描述了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向更高水平的演化。帕森斯的理论分析框架表明,现代化已经成为一个成系统的研究客体。

帕森斯还从广义文化层面抽象地指出了文化在“综合体系”演变中的作用,并指出这种演变所遵循的原则是:从分化、专门化到更高级的一体化。他举例指出,在发展中的社会里,劳动从家庭转移到了企业或工厂,通过企业或工厂的一体化结构而不是原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结构产生了一体化的经济作用。他说,现代化的过

程是在西方开始的,并通过移民或扩散而传播到世界各地。他称古以色列和古希腊为“策源地”,从而酿成了“先验论”、“普遍条理性”和“实践性”这些向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性因素。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是其制度上和观念上的落后所造成的。因此,后发的现代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完成现代化,必须首先在制度上和观念上实现“西化”,即全面向西方国家学习。根据帕森斯的理论,凡处在“模式变项”一极的是“传统”的各项特征,而处在另一极的则构成了“现代”的各项特征,即所谓“现代性”。“现代性”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出来的新的特性,是社会的全面变革中形成的新属性,是对社会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认识。同样,他认为只有秉承、确认这种文化,才能改造落后国家的国民心理、文化传统和制度结构。事实上,这正是后现代化理论对文化功能的深刻洞察。

然而,这种过于强调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共同性”,忽视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或者说民族特色,难免会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帕森斯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现代化是西方化,是美国化,现代化应仿效甚至全盘接受西方的现代化经验及所谓的“现代性”。这套理论虽然在西方风靡一时,但在实践中从一开始就遭到许多批评,甚至是遭到体系内理论同行们的反对。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家布莱克根据对日本、俄国和东亚现代化新发展的研究,提出了“比较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把现代化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布莱克倡导的“比较现代化”研究在理论上不赞成把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方化,认为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在方法上反对上述的两分法,认为现代性和传统性并不是相互对立与排斥的极端状态。在他们看来,现代化存在“内生型”(即“原生的”现代化)和应激型(即“后发的”现代化)两种不同类型。无论何种类型,关键都在于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互动。在文化功能上,“比较现代

化”理论强调文化系统和价值观念体系的变化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即文化功能的转型与重塑是适应和体现现代性、进而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前提。而实现这个前提则需要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来改造传统文化,使文化功能得到不断更新和完善,使现代性与传统性相互促进。

“比较现代化”理论是对帕森斯现代化理论的深化。约瑟夫·古斯菲尔德、埃森斯塔特等理论家都对后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作出了贡献。与经典现代化理论相比,后现代化理论具有更全面的研究视角。20世纪比19世纪进步的体现之一就是源自西方的工业文明的价值被整个世界视为楷模,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近代价值理念广泛散播,科学技术对推动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被大多数国家和民族所认识,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延续,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形成更强劲的推进势头,甚至带动了一些贫瘠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开展。这就为从全方位多视角的现代化研究提供了巨大理论空间。其中,对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功能的价值认同比较普遍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之中。

3. 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对文化功能的强调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由于新的信息产业革命和全球范围经济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西方社会开始进入“后现代化”的新历史阶段。在20世纪末动荡的30年中,西方思想文化界抛弃了现代主义的时尚,在后现代主义的旗帜下提出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发展理论,对传统现代化理论发出质疑,对“后现代化”的现实作出新的解说。比较有影响的有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的新发展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以及90年代美国的发展主义、东方主义,等等。

佩鲁是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他的《新发展观》一书,成为近20年来新发展理论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佩鲁对经典发展观

与工业化观念提出强烈批判,认为在增长—发展—进步三者中,文化价值起决定作用,强调文化的发展对于加速或减缓增长的必要性。佩鲁指出,在19世纪50年代,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这种传统分析方法支配下产生了一系列旧的发展理念。比如所谓“增长”只是生产规模的扩大,它不包括结构的变化和均质的增长;只考虑市场的要求,不考虑个人的发展价值、社会的发展和整体的发展;不考虑创新所需要的制度条件以及新旧文化价值的冲突;不体现社会的凝聚力;等等。佩鲁认为:“只有在下层社会的人民意识到他们一直受人愚弄、被动地接受不仅从未根据自身经验所达到、而且一直是西方人出于一己私利为其布置的思想、观念和战略时,这种方法才能有所突破。”^①佩鲁把文化现代化的问题提到极其重要的位置来认识。他强调发展的整体性,就是要突出文化价值在新发展中的地位,说明新发展应当是基于文化价值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利益与文化价值的统一,而不是只盯着GNP的单纯的、片面的经济发展。他同时强调,“内生的”发展,就是基于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强调人力资源的开发,即社会经济发展中动态的、主体力量的发动,而不仅仅是物质的发展、客观经济体系的发展。人的因素是发展中的动态因素,新型的发展将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人的发展和健康人格的形成过程。它要有助于加强社会各层次的沟通,减少发展的社会阻力,建立社会信任的基础,营造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从而加速发展的进程。

与佩鲁的思想相似,罗马俱乐部前主席奥尔利欧·佩奇在80年代初也明确指出:“任何进步(不论是科学进步还是其他),如果

^① (法)弗朗索瓦·佩鲁著,张宁等译:《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不同时使道德,社会或政治也取得进步,那就毫无价值可言”^①。这种把人的发展作为核心、引入新的价值参照系的新发展观,凸现了原来隐藏在物质文明背后的精神文化价值在发展中的重要性。而这种将发展视为文化价值的多元化过程,必然要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在世界总体的发展中,各种文化、文明的相互关系如何?这一关系又在当代全球的发展中居于何等地位?亨延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作了阐释。

塞缪尔·亨延顿,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其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并在全球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说佩鲁的新发展观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亨氏的观点则是立足于西方主流社会70年代末以后启动的后现代化进程本身。1989年以后,冷战形成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②。他认为,未来全球发展的基本模式,不再是“西方中心论”或任何单一主体论,而是多极主体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政治未来走向的核心方面是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当然也主宰全球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亨延顿认为,文明的差异性 & 稳定性、交往扩大使世界变小、现实世界发展的推动等是文明冲突的原因所在。文明的断裂带目前正取代冷战中的政治及形态边界,

① (意)奥尔利欧·佩奇著,王肖萍、蔡荣生译:《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问》,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5年版,第84页。

② (美)塞缪尔·亨延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成为危机和流血的冲突地点。文化的“丝绒幕”已取代了意识形态的“铁幕”，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分界线。亨延顿将文化的因素引入对社会发展的诠释之中，显示了当代发展观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政治层面向更隐性层次的深化和拓展。但是，亨延顿在文化观上仍然摆脱不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尽管他勇敢地向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传统认识发起挑战，但突出文明冲突的理论背后，显露的还是“西方文明优越论”的影子。

对文化深切关注的还有美国哈佛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丹尼尔·贝尔。贝尔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现代主义的喧嚣声中就发出了异样的声音。他透过大工业生产的高效高能，看到一个以信息为工艺对象、以科技产业为主要职业的崭新的时代正在到来，并命名为“后工业社会”，提出了“后工业社会文化矛盾论”。1973 年，贝尔推出自己的研究成果《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率先从“后工业社会”理论入手，直观后现代主义文化，1978 年他又推出《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更进一步地展开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贝尔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反文化，这缘于现代主义付出的深重代价：失掉了文化的一致性，颠覆传统文化秩序的同时，也影响了文化标准本身；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模糊以至消融。这些，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整个社会向享乐文化偏航。贝尔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进一步推进，按照这种逻辑，后现代主义达到了现代主义的巅峰状态，因而是一种反文化。其目的是通过对人们感觉方式的革命，从而达到对社会结构本身加以改革。

总之，当代西方发展理论都以新的视角突出了文化的功能及其特征，目的不仅是为发展中国家寻找和设计现代化道路，也是为处于现代化困境的西方开列药方。从研究方法上看，更多的是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强调文化在“现代化”、“现代性”上的基础性作用，为“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等观念的普及提供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从理论趋势上看，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对文化问题的关注

越来越突出。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国家和民族遇到的瓶颈性障碍,许多来自非经济的因素、文化以及其他因素的整合作用逐渐强化起来。文化的发展如果不与现代化的进程同步,任何国家和民族都难以迈出现代化的坚实步伐。

近代中国文化转换的历史环境和特殊性

1. 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及其结构特征

近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换所面临的重大难题是沉重的历史负荷。毫无疑问,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是遏制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大因素。各资本主义国家既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凭借享有的各种特权,占有了现代化发展所需的主要资源,又竭力巩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秩序,对旧制度和旧传统加以支持和维护,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因此,西方列强一方面以暴力迫使中国向现代文明打开大门,另一方面又不希望中国在现代文明的道路上顺畅地前进。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艰难程度和蹒跚挪步的历史事实,与西方列强在近代中国扮演的这种双重角色不无关系。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在看到外国侵略对中国现代化的阻碍因素的同时,更要看到中国社会内部的因素。事实上,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现代化基因的植入受到的障碍性排斥更多地来自中国社会自身。几千年封建制度的传统枷锁,限制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

众所周知,在世界上,像中国这样经历了二千多年封建社会发展历史的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在超长态并持续稳定的社会发展中,封建制度在经济结构、政治形态、道德规范、社会心理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形成的价值系统不断延伸和凝固,并在中华民族的性格、思维方式、生活习俗上留下深深的烙印。由此而铸造的东方文明养育了中华民族许多世人羡慕的优秀品行,但也在潜移默化中滋长了反对变革、不思进取的历史惰性。这个特征对于近代中国带

来的影响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东方文明铸造的优秀民族品行,保存了中国人民在强敌压迫下英勇抗争的巨大能量,以致在最严重和最危急的历史关头展现了罕见的民族生存力;另一方面,传统的历史惰性则成为近代中国向前发展的拖累,以致总是习惯性地用静滞的思维和固有的规制去扼杀任何革新的要求和举动。因此,近代中国能够避免东方文明绝灭的厄运,但却不能交上与近代文明尽快接轨的好运。历史表明,文明越悠久,民族的生命力越强;传统越强势,现代的转向越难。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运行轨迹看,封闭性和保守性是两个明显的特征。就封闭性而言,二千多年里中国文化始终是在内生圈中自我扩展,缺乏外力压迫的革新动力。孔孟儒学思想始终都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经典所确定的伦理纲常,成为万古不变的“圣道”和不可违背、不可逾越的规范。这种封建传统文化的结构和层次以儒道经学为核心,统帅其他各个文化领域和文化形态。封建社会的变迁中,传统文化虽然曾发生过的一些枝节变化,却从来没有危及其自身脉络。外来的佛教文化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威胁,即使在元朝、清朝等汉族不掌握朝廷大权的情况下,传统文化还是得到完整的保留和延续。封建传统文化之所以能有如此顽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建立在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上并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相适应的。它有利于封建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封建阶级对人民的政治统治和精神统治,只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封建的文化结构和层次也不可能根本的变化。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始终在自身循环中运行。危机场景和危机意识的缺乏,使中国传统文化不需要外生的参照摹本就能满足自身的发展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特征是与封建社会的持续性特征紧密相联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

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中国传统物质生产方式一直是以农业为本,农业生产影响着传统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同时决定了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传统社会经济结构有许多显著的特色,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其一,自然经济的持续性是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显著特征。世界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古国,有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了,有的历尽沧桑,面目全非,而只有中国一直延续下来,并保持着自己本来的面目。这主要在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具有持续性,虽历经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未出现难以克服的困境,循环式的复苏和进步使自然经济得以长期延续。马克思曾指出,最坚韧和延续得时间最长久的,必然是那种亚细亚形态。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在那种前提下,个人对社会不是独立的;生产只是局限于自给自足的范围内;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等等。这些经济因素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伸展空间被框定在被土地牢牢束缚的农业文明中。只要农业文明不打破,中国传统文化就无需寻找另外的发展空间。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越持续和稳定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筑起的自我封闭围墙就越牢固。

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特征又与其封闭性相关。从词义上说,保守的反义词是革新,封闭的反义词是开放。保守是由封闭造成的,不开放的文化也就不可能革新。传统自然经济的守恒不变,要求持续稳定的政治制度和静态的文化系统作为支撑。从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社会起,中国的政治制度就只有量的添加,而没有质的变更。专制主义在历代皇朝的轮回传承下日趋严密和完备。不仅汉朝沿袭秦朝的制度,甚至像满洲贵族统治的清朝也搬用了明朝的制度。因此,中国近代的思想家谭嗣同揭露说:“几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32页。

年来中国之政，皆秦政也。”朝代不断变换，秦始皇式的政治不变，朝朝沿袭，代代相传。变更祖宗的规制就是“犯上作乱”，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先帝定下的一切具有绝对的神圣性。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几位不甘循规蹈矩的改革家，如战国的商鞅和北宋的王安石，最后都以失败的悲剧而结局。虽然他们的改革客观上对历史的进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这样的革新举动始终不能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范围。鲁迅的眼光十分犀利，他揭露说：“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①固定重复的经济形态，千古不变的政治模式，铸造了传统文化的保守性特征。这种守旧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便蜕变成成为顽固不化，并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顽症。

马克思曾指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②中国政治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使中华民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同时，一脉相承的封建专制制度与带有某种血缘关系的宗法制度、家庭制度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在文化上表现为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并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组成了一个严密体系。其一，表现在家天下与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国奴隶社会的国家政治是一种宗族政治，进入封建社会，宗法制度虽然瓦解，但是代之而起的家族制度却仍然深深地打上宗法的烙印，它带有家天下的性质，形成了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通性，并由对家长的“孝”，推广到臣对君的“忠”。这样，宗法关系不仅是维系血缘集团的组织力量，也成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成为道德伦理规范和政治原则。

①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1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7页。

其二,宗法原则与中国封建政治的结合,产生出一个显著特点即亲贵合一和裙带作风,并形成了封建政治的反智与神秘色彩。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才能并不重要,与统治者的血缘亲情高于一切,“宗以族得民”,“官以亲得势”,进而孵化出政治裙带关系和作风,谓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汉朝的“著姓”、“族姓”、“豪族”到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直至近代社会国民党集团内部的派系,无不具有宗法裙带色彩。这些最终导致了封建政治中的反智主义,即选贤任能的用人尺度以及人类的智慧和理性原则被排斥在封建传统政治的门外。宗法政治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臣民对统治者盲目性、习惯性遵从的基础上。这适应并强化了儒家文化中“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仁、义、礼、智、信”等一整套的纲常伦理,对习惯和传统的任何超越或变革都被视为离经叛道。这种封建政治,抑制了智慧和理性的发展,而人民的愚昧无知、迷信和盲从又反过来助长了封建政治的合理合法,并成为非一般人所能视听参与的“神秘政治”。总之,受宗法性社会政治结构影响的伦理型文化既强化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也导致了中国文化的僵化、保守、落后和盲目排外。

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得到举世公认。它以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湛的理论观点,打造了古代社会人类文明的文化宝殿,是与中华民族在人类古代世界的领先地位相匹配的。此外,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以及内含的许多合乎人性的思想,使中华民族的文化脉系绵延不绝,虽经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但依然为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片面和笼统地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否定和批判的态度是极端错误的。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暴露的缺陷则必须加以深刻地反省。近代中国以来的历史实践多次证明,中国现代化背负的历史包袱是十分沉重的。最严重的表现倒不是物质资源上的落后和贫乏,而是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国民素质上的保

守和陈旧。对于这个特点,后发追赶型的现代化国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无论是在近代中国,还是现代世界,完全可能而且事实上也做到了在短时期里将现代化的先进生产力学到手,如近代中国进行的洋务运动、现代世界迅速崛起的亚洲“四小龙”,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取得经济上追赶现代化的绩效,但距离真正的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距离。后发追赶型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瓶颈不仅来自于经济因素的制约,而且也来自历史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和国民素质等方面的现代化转换比起物质资源的现代化武装,任务更艰难,时间更漫长,情况也更复杂。因此,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文化现代化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不能实现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事实发生。

2. 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与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

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东方古老的帝国开始了社会瓦解的过程。西方列强国家在用军舰枪炮向中国显示淫威的同时,也促使西方的近代文明逐渐散播。帝国主义给中国留下的是野蛮侵略和文明感化的两重作用。野蛮侵略是帝国主义主观意志的体现,文明感化则是客观影响的结果。世界殖民史表明,西方列强充满血腥味的暴力征服,给所有遭侵略的落后国家带来的决不是文明的福音,他们以野蛮屠杀和疯狂掠夺的罪恶行径上演了一幕黑暗的历史悲剧。但西方列强在实施侵略的同时,也把先进的生产力和近代的观念带到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前进的工具。这样的两重性作用造成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重矛盾和冲突,现代化与救亡图存紧密相联系,在矛盾和冲突的消解、再生、再消解的进程中朝完成使命的目标前进。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近代中国的主要任务之一,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项紧迫任务。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百多年中,民族危机始终十分严重。其中,最严重、最危急的

形势集中在两个时间段。一是从 1894 年甲午战争失败到 1900 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期;二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一直到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十多年时间。在这两个时间段里,中国社会从上层统治阶级到下层平民百姓,普遍处在“国之将倾,民之将亡”的生存恐慌之中。对于来自外国的侵略,中华民族义不容辞地表现出爱国的责任心和殊死抗争的顽强毅力。从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到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以誓死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决心,向一切外国侵略者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展示了国家不可欺,人民不可侮的爱国主义传统。

深重的民族危机使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围绕着这个主题,社会发展主要在以下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是战争层面上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有自觉进行组织的,也有自发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有局部范围的,也有全国范围的。第二是社会变革层面上近代中国追求进步的努力,包括经济上求强自富、政治上制度革新、思想上取法西学。战争层面上的反侵略斗争是救亡图存的基本形式,社会变革层面上追求进步的努力是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两者既紧密相联系,贯穿近代中国整个历史;又有各自的特点,在救亡图存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反侵略斗争一般都是被动的,即是在帝国主义妄图侵占或灭亡中国的情势下奋起抵抗,如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等等。反侵略斗争对于救亡图存的意义是即时性的,其胜利与失败将直接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延续和生存。社会变革往往是主动的,即必须经过人们的自醒和觉悟,进行内部的政策更换或制度创新来推动社会进步,如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等。社会变革对于救亡图存的意义是隐性的,其价值是通过增强国家的实力而求得救亡图存的条件。两者相互推动,互为支持。反侵略斗争的深入往往促进社会变革,每一次社会变革总是因民族危机的严重刺激而引发;社会变革的深入往往将

反侵略斗争提高到新的层次,每一次反侵略斗争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都与社会变革的成效有关。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历史主题的展开过程中,社会变革的意义虽然是隐性的,但含义更加深远,内容更加深刻,对救亡图存历史主题所产生的影响是持续长久的。

很显然,救亡是为了图存。救亡不是目的,图存才是最终的结果。因此,救亡是为图存服务的。但怎样图存?这是近代中国需要认真探索的重大问题。是继续沿着传统社会的发展轨迹延续中国的生存,还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在与世界先进制度接轨的变革中保障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两种选择始终摆在近代中国人民的面前。考察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必须从这两种选择的价值取向着眼。单纯的反侵略斗争虽然可以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暂时缓解一下亡国灭种的紧张程度,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怎样图存的问题。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气概,但“保清灭洋”的宗旨却无助于中国立足世界先进的民族之列。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抗日战争中,将全民族的抗战胜利与建立民主国家的新任务紧密相联系,在反侵略斗争胜利的同时,为中国的图存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可见,救亡与图存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只有努力于现代化的社会实践,才能切实地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国只有适应世界潮流和时代要求,不断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才从根本上获得了捍卫国家独立,延续民族生存的可能。

救亡图存需要现代化,而中国的现代化又是在救亡图存的历史氛围下展开。这是一个难题。救亡图存对于中国现代化产生了哪些影响呢?首先,情感接受和价值认同的障碍使中国社会容易产生对外来文明的排斥心理和抗拒行为。近代中国始终处于矛盾的价值认同之中。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野蛮的、非正义的,而

他们代表的却是先进的生产力、进步的社会制度和现代文明的思想理论。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是正当的、正义的,但中国社会代表的却是落后的生产力、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和古老文明的思想理论。既要反对民族的敌人,又要以他们为先进的榜样,情感上难以摆平秤砣,价值观上也难以认同。这个矛盾处理不好必然影响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其次,两种文明冲突激烈,优劣判断和力量对比的问题还一下子难以解决。毫无疑问,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历史逻辑上,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确实存在时代的落差,直觉上就可以作出优劣判断和强弱区分。但文明冲突涉及历史传统、国情民俗和社会机制等多方面的因素,决不是直觉上就能解决的。而且,西方文明作为外来的客体在进入中国社会的初期很难处于上风的位置,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时间方面和影响力的空间方面的强势不是短时间内就会消退的。第三,中华民族的顽强、坚韧的特质使近代中国始终在数十个帝国主义的窥视、争夺、侵占下保持着形式上的独立,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存在延续的主体条件。文明冲突的结果一般是两种模式:一是取代模式,二是兼容模式。人类历史表明,文明冲突出现以取代模式为结果的属于个别现象,大量的属于兼容模式。两种文明从激烈冲突,到消解融合,是新文明的诞生过程。近代中国虽然有过采用所谓“全盘西化”的取代模式的激进主张,但兼容模式更有基础。选择兼容模式必然有主客之分,即以何者为兼容的主体,以何者为被兼容的客体。近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经久不息,各种观点纷呈,构成文化现代化的一个焦点。以上这些因素说明,救亡图存不仅是一个对外抗争的问题,更是一个自我更新的问题。现代化是近代中国自我更新的必然选择,而要实现自我更新,又不得不面临救亡图存所遇到的一系列难题。

近代中国历史上,救亡与启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难题。有学者将救亡理解为政治,将启蒙理解为文化,得出两者分离的结

论,认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救亡排挤了启蒙,这是完全片面和错误的。从文化现代化的意义上说,两者不是截然对立的。救亡绝非政治的含义可以囊括,社会变革、制度更新、文化振兴都是救亡的题中应有之义。启蒙也绝非等同于文化,改良和革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都具有启蒙的意义。从近代中国历史实践看,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就是救亡,这一主张内含的启蒙价值和社会政治的影响都十分深刻。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虽是激烈程度不同的政治变革运动,但两者都体现出思想解放的启蒙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思想启蒙的旗帜,而它从一开始就是以救亡为宗旨。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坚持以革命文化作为动员民众的途径和资源,思想启蒙并未因为救亡而中断。因此,生硬地将救亡与启蒙割裂开来,难以对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其一。救亡与启蒙的关系不能割裂的第二个理由是,政治和文化本身就构成内在的统一,文化不可能脱离政治而孤立存在和发展。即使那种“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能够存立,也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然,政治不能替代文化,文化也不可能代表政治,混淆两者的边界会导致理论的混乱。但是,政治必然影响文化,文化也必然反映政治,这又是客观的事实,也是政治和文化发展中难以否认的规律。在近代中国,无论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或者是其他政治势力,在政治斗争中都拥有自己的文化资源,都需要以相应的文化作为政治斗争的支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革命文化运动、抗日根据地的文化事业,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等等,都是文化与政治结缘的史证。这是其二。再者,救亡图存是贯穿整个近代中国历史的始终。救亡和启蒙的目的都是作为手段为图存而展开,它们之间不是先后、主次、替代的关系。生硬地将救亡与启蒙对立和割裂开来,那么必然会将近代中国分割出救亡的时期、启蒙的时期,所谓“革命中断了启蒙”就是割裂论者得出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显然

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

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下,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停止过救亡,也没有停止过启蒙。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最重要的救亡,也是最重要的启蒙。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宗旨就是建立一个主权独立和民族统一的繁荣、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样一个宗旨所包含的内容是全方位的,所要完成的任务也是多方面的。把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斗争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的革命,是对其宗旨的肤浅理解。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整个过程就是救亡和启蒙的历史过程。虽然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统治,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政治斗争方式完成自己的使命,但这决非意味着放弃启蒙的努力。事实上,围绕着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根据地所从事的工作最具有意义的就是激活了几千年处于闭塞昏睡状态的农村,将思想长期束缚在僵滞保守中的农民带到现代革命的前沿,其中内涵的启蒙价值十分明显,意义十分重大。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决不能忽略文化现代化的考量视角。必须指出,在近代中国,没有哪一个政党、哪一个组织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把文化现代化的努力与救亡图存的历史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切合实际的革命方式,实现了对中国数量最大的社会群体的思想启蒙。尽管这一启蒙是初步的,程度上也比较浅显,但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迈出的步伐无疑超越了前人的努力。

3. 近代中国社会演变过程中对文化现代化要求的萌生

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要求是随着社会演变慢慢生长起来的。马克思指出:“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①传统中国在西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下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1页。

动地卷入近代文明的世界旋涡。但认同和接受近代文明,走上现代化的历史道路,则是中国社会内部运动的过程,帝国主义是无法用主观意志强加给中国的。从这个角度看,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既是历史演进的必然结果,又是中国近代文明意识觉醒的逻辑结论。

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封建社会的瓦解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的瓦解过程伴随有国家外在形式和内部结构两个层面。两个层面上,封建社会瓦解的过程并不是同步发生的。国家外在形式上的瓦解自鸦片战争后不久就明显地表现出来。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部分主权的丧失,租界的形成,封建大一统的统治事实上不复存在了,清朝统治阶级已经不能以旧有的方式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但是,国家权力的破损和外在形式上的瓦解并没有很快延伸到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鸦片战争后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仍然以惯性的力量,继续着传统的社会运作。

历史表明,虽然在多次战争的暴力征服中,西方各列强国家可以十分凶狠地用不长的时间使中国的封建统治者从抵抗到屈服和顺从,但使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很快发生重大变化却要困难得多。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一些列强国家欣喜若狂,以为东方中国大门的敞开将向他们提供商品倾销的广阔市场。英国商人甚至断言,只要每一个中国人需要一顶睡帽,那么,英国的织布机全部开动起来也来不及供应。但是,结果使他们非常失望,不平等的贸易特权并没有为外国商品输入中国打开一条畅通的渠道。当时棉织品大国的英殖民主义者很快发现,英国的棉布输入遭遇到中国牢固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抵抗。且不说中国从来没有戴着睡帽安寝的习俗,就是要想让当时的中国人撤下自纺自织的棉纱,去适应外国洋布都是极其困难和费力的事情。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开埠之初的一些英国商人甚至无奈地将他们运到中国倾销的

布匹,用作运回英国货物的外包装,毫不值钱地打道回府。有个英国人在写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再没有比这样的事情更能证明中国人之贱视我们的布匹了。用我们的洋布打包,就表示中国北部(江浙一带)最没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洋布。”可见,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远不是西方列强想象的那样脆弱。事实上,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真正开始发生变动还是在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掀起之后。当机器、工厂和雇佣劳动关系出现以后,中国的封建经济才真正受到严重的冲击,内部结构才开始发生变化。而政治结构的变化则更是迟至19世纪末。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宪呼吁,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共和革命,虽然专制主义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消灭,但制度构造毕竟在形式上从封建帝制转换到民主共和,从而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迈出了重要一步。

中国封建社会瓦解过程不仅表现出缓慢特征,而且还表现出顺序错落的特征。从经济到政治,再发展到文化,瓦解的过程也不是同步开始的。如上所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瓦解首先从经济结构开始,然后发展到政治结构的变化。文化变革来得更晚,与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相比,文化的变革节拍慢,难度也大。这个现象,一方面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相互辩证关系的论述,即文化变革总是经济、政治变革的结果,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文化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另一方面又说明了文化对社会影响的根深蒂固。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延绵不绝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意义就更加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鸦片战争后中国向现代化行进的历程中,传统文化成为封建制度受到冲击的最后一个堡垒,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于抵挡制度崩溃的最后一道防线。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变革虽然滞后于经济和政治的变革,但也不是突如其来地在某一天发生,而有其思想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传入中国后矛盾逐渐加深的过

程,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逐渐加深的过程。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魏源等人首先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国家“船坚炮利”。但这个先进主张没有被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认同和接纳。过了20年,封建统治阶级才觉悟到这个主张的价值。于是便搞起洋务运动。在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中,封建统治集团里热衷搞洋务的官僚始终坚守着一个信念:外国的技术比中国先进,但道德文化还是中国的好,决不能学外国的。洋务派极力主张吸取西方的“器数之学”,以殖财养民。人们已认识到,生产及其技术的发展,都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根本,求强求富不能只局限于军事技术,而是“皆导源于汽学、光学、电学、化学”。从着眼于军事技术和制器上升到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无疑是前进了。但它仍然没有摆脱经验科学的局限,事实上仍是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中国的纲常伦理结合起来。1861年具有改良倾向的冯桂芬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认为必须遵循“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张之洞在奏折中指出了“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的洋务运动宗旨和纲领。从其内容方面来看,洋务运动的内容包罗繁杂,其核心有二,一是建立了一批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二是创置了近代科技、文化教育方面的新设施。而其文化领域的基本特征是“器唯求新、道唯求旧”。尽管科学技术在冲击着传统文化,改变着其结构,但传统文化尚未有根本性的变化。“中体西用”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智慧和对国富民强的希冀。在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里,中国人眼中的西学内涵不断延伸,“中体西用”不断推进。特别是“中体西用”本身又在徐徐地冲击着其本来的宗旨,“体”、“用”终究还是矛盾的过程,难以人为地限制在既定的范围

内。然而,这些在客观上还是构成了“近代化的一小步”^①。

“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就是封建统治阶级设定的防线。一方面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又要固守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由于文化理念的严重保守而受到阻碍。“中体西用”也由于洋务运动的夭折而受到动摇。19世纪末的改良人士都对“中体西用”说进行了尖锐地批判,他们指责洋务派只学西方的先进技术是“遗其精义,袭其皮毛”,作了捡芝麻丢西瓜的事,并将西方近代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作为“西体”加以宣传,思想上冲破了“中体西用”的框架。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转折,也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甲午战败给近代中国社会以极大的动荡和刺激,诚如梁启超说的“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促使人们去思考、去探索。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西方文化不断升级的侵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沉沦的不断加深和中国传统文化滞后性的深层暴露。这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中国人的西方观念已向文化的深层发展,近代中国文化又在酝酿一次新的变化,并出现了新的特征:由“变器”转为“变法”,由个人觉醒转变为群体觉醒,由操办实业到有声势地宣传启蒙。在洋务运动中产生或由洋务派蜕化出来的一批早期维新思想家,已经把“洋务”从原来狭窄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和文化领域,走出国门的人日渐增多,传播文化的途径迅速拓展,人们对西方的文化科学诸如以议会制为代表的社会制度、以进化论为代表的科学理论、以民权为代表的政治学说等更为感兴趣。在这种背景下,到19世纪末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一批新的启蒙思想家、维新变法的政治活动家,推行新政摇旗呐喊。文化现代化的要求首先在他们的新政措施中体现出来。诸如开设新

^① 陈旭麓著:《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05页。

式学堂、兴办女子教育、派遣士子出洋留学等等主张,都不失为向传统文化发起的挑战。但无奈这代维新派的领袖旧学“根深蒂固”,新学“来源浅觥”,无法胜任文化转型的沉重历史任务。由他们首先表现出的文化现代化要求,随着百日维新的夭折而昙花一现。

现代化的进程在进入 20 世纪后揭开了新的一页。百日维新失败后,新的斗争和新的变革又接着开始。1900 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一步加深。救亡图存的斗争不仅通过建立共和制度的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而且也反映在文化领域里。“文学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主张,逐渐受到重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革命”、“戏剧革命”、“史界革命”、军国民教育思潮以及白话文运动等接踵而起,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成熟起来。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于康、梁一代人那“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半生不熟的理论。在英国受过西学熏陶的严复,深化了由康、梁开始而为当时革命派所无暇顾及的思想启蒙教育。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马克思语)的思想家,以风靡一时的《天演论》等译著和承载新理念的西方话语,将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契机展现在近代中国人的面前。严复虽然在政治上归属维新派的阵营,但他所做的工作以及在近代中国所留下的影响却是其同仁们所不能相比的。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严复的政治地位其实微不足道,但文化地位则时人难以相比。他对西学的传播,犹如在尚未受到过冲击的中国传统文化摇篮里点燃了火种。虽然大范围的文化变革并不是由严复启动的,但不久后涌现的一批新文化人士沐浴的正是严复送来的西风。20 世纪初,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在不断策动反清武装起义的同时,也涉及一些文化启蒙意义的工作。他们通过书刊杂志,宣扬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思想理念,用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近代价值观来颠覆帝王思想、唯上

是从、官贵民贱的传统价值观,同样为文化现代化的启动作出了贡献。当然,与他们掀动的武装起义风潮相比,民主派的文化启蒙工作激情不足,力度也有限,但不可因此而忽略其历史的意义。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民主派阵营的主体力量大多为中国留学生,他们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最为集中的代表,拥有更为丰富的西学文化资源,在西学话语系统的语言和文字移植上的功劳更多地应该记在这批有着留学背景的民主派人士身上。他们虽然不如严复那样名噪一时,但却为通向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铺下了基石。严复翻译西学著作的贡献毋庸置疑,但他使用的文字还保留着浓厚的传统情结,可以说,严复的思想理念要比他的语言文字现代化得多。而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派,无论是其领袖孙中山,还是像邹容、陈天华这样的留学青年,在思想理念和语言文字现代化的统一方面,比起严复来则又向前走了一步。

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要求在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之后进一步显示出来。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完成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替代,民主共和取得了战胜君主专制的胜利。但是,这场政治制度的变革缺乏相应的文化支撑。虽然民主派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思想宣传,但远远不能适应政治制度变革的要求。中华民国建立初期的情况表明,中国传统文化还没有真正经受过现代文化的洗礼,不仅政治制度转型所需要的新意识形态没有树立起来,而且传统文化主导的价值观念仍然左右着新政治制度的运作。文化变革的滞后很快就在现实社会生活里表现出来。特别是位居中华民国总统的袁世凯竟然倡导尊孔复古,大力张扬传统文化中违背现代化的保守陈旧思想,加深了新制度与旧文化的冲突。一批知识分子观察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思想上很难认同这样的共和制度。他们深感纳闷:为什么共和制度失灵?为什么现代政治构造成了传统势力寄存的躯壳?为什么翻天覆地的革命只是拂去皇冠之类表层上的东西?他们终于开始醒悟,缺乏文化变革,政治变革

只能是虎头蛇尾。因此文化变革在社会转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要真正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必须完成文化现代化的任务。于是,从19世纪末萌生起来的文化变革要求,在中华民国初年社会实践的矛盾和冲突中受到知识分子的热切关注。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聚集了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以《青年》杂志为阵地,将担负思想启蒙职责的新文化运动推向社会前台,揭开了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新的一页。

文化价值取向的选择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1. 文化价值取向与“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答案寻求

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如何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准确定位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在明末清初之际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在生长。但是,这个缓慢的过程还没有在中国内部取得实质性的结果,就被外部侵略的非正常因素打断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带着笨重的封建制度枷锁和耻辱的殖民压迫包袱,开始了谋生求存的挣扎。伴随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而带到中国的域外世界,使中国不得不面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

在几千年封建王朝兴衰起落的历史循环中,中国社会还从来没有为自身的出路问题伤过脑筋。经济的结构承袭和传统的制度惯性,促使一个个新朝代沿着旧王朝的轨迹被复制出来。“道不变天亦不变”的文化传统为这样一种沿袭复制式的社会发展作出了合法性的论证。在封建王朝的历史循环中,新王朝用以取代旧王朝的有效性武器只在于统治方略和治理政策的微调,而不是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的更新。新的统治阶级根本用不着动脑筋在理论系统方面为自己的权力实施作出重新的诠释,旧有的文化传统完全可以不作原则性的变化就能够与新王朝的社会运转相吻合。因此,当鸦片战争突然发生,中国社会面临一种异样的社会发展道路选择时,绝大多数人都处在茫然困惑之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

国社会对来自域外世界的东西保持着距离,甚至加以排斥。这既是历史惰力的惯性使然,也是主体适应客体的必然过程。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仅造成闭关自守的大门被撞破,而且也意味着运转了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轨道被打乱。近代中国人不仅对兵舰、枪炮、机器、电报等生产力的器物感觉陌生,而且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精神领域的观念反应迟钝。社会发生的变化超越了统治阶级习惯了的传统守则,他们已经无法靠以往的陈规旧章和经验来应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仅如此,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事实上也不可能再像传统社会那样延续王朝传承的发展套路,继续在“道不变天亦不变”的文化传统中寻求有效统治的法统。“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成为严峻的现实,摆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人面前。

在寻找中国社会出路的历史途程中,现代化带给中国人的感官刺激始终十分强烈。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嫉恨如仇,但侵略者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制度和思想则渐渐侵蚀了中国“唯我是大”的传统尊严。目睹西方输入中国的一切体现现代化的新鲜事物,中国人开始为自己的落后而汗颜。人们对现代化的认同和接纳经历了一个过程,将文化价值取向的选择与解决中国社会出路问题相联系是在遭遇了种种变革的努力失败之后。从现代化角度看,近代中国首先受到的感官刺激是西方先进的生产力。鸦片战争的失败其实就是近代工业化生产力与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较量的必然结果。因此,解决中国出路问题的着眼点一开始就落脚在器物的价值取向上。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军事武器上,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民族生存的希望所在。他们力主中国应从器物变革入手,将中国的出路寄托在取法船坚炮利之途。他们的主张终于影响了本不愿意进行变革的清朝统治阶级的决策,无奈地选择了器物变革的道路。但是,从19世纪60年代起进行的器物变革不仅没有使中国的民族生存状态有

明显的改善,反而继续恶化,半殖民地的程度越陷越深。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由此开始怀疑器物变革对解决中国出路问题的有效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变革思潮实现了从器物变革向制度变革的转换,召开议会、制定宪法、国会选举、组建内阁和权力制衡等制度形态的东西成为现代化刺激中国人感官的新内容,政治的价值取向成为解决中国出路问题的新选择。但是,政治的变革同样显示了它的局限性。近代中国在经过了百日维新和辛亥革命两次政治变革之后,仍然困惑于出路何在的迷茫之中。20世纪初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个病态十足的中国。外患内忧交织,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内改革举步维艰。作为政治变革换来的成果,新建的中华民国并没有使中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在制度层面上向现代化迈出的第一步,效果十分微弱。取法西方的共和政体难以将中国引上一条新生的道路。价值取向的选择再次成为人们重新考虑的问题。文化价值取向对于解决中国出路问题的意义由此凸现出来。

确立文化价值取向是社会变革中深层次的内容。相对而言,器物和制度的变革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而文化的变革则难度较大。这是由文化的特征决定的。第一,器物和制度均表现为社会外在形式上的东西,人们可以凭借意志的要求加以取舍。而文化则表现为社会内在形式上的东西,主观意志很难加以改变。第二,器物和制度均具有可以随时更新变化的特征,而文化则是民族精神的凝结,潜移默化地融化聚合在整个民族的言行举止之中,具有持久和稳固的特征。第三,器物和制度变革的客体都是物,而文化变革的客体是人。器物和制度变革可以通过具体的模式设计生产和制定出来,而文化变革则必须通过人的主观理念来实现。当然,文化变革也有具体模式的选择问题,但这样的选择与器物和制度的模式选择不同。一般而言,器物和制度变革的模式选择主动权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少数社会精英分子的思想也会对统治阶

级的决策产生影响。而选择文化变革的模式主动权就不是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它需要通过社会个体的价值认同来实现。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器物 and 制度的变革虽然也经历各种阻碍和曲折,但都一步步实现了。而文化的变革呼声强烈却始终难以实现,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涉及的是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蓝本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外生型和后发型两个特征是先天地连在一起的。这两个特征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长期处于一种模仿的状态。然而,器物可以模仿,制度可以模仿,文化则很难模仿。中华民国建立的初期,当一些知识分子试图从文化的路径探寻中国社会出路的时候,文化价值取向的选择就成为他们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还是鲁迅、胡适,五四时期那些以西方文化反对传统文化的分子都表现出激进的情绪,希冀能像器物 and 制度那样,使文化也朝着西方提供的蓝本发展。这个思路本身符合历史的逻辑,因为,器物 and 制度的仿效必然要求文化的仿效。但它却不符合现实的规律,因为器物 and 制度都可以更新换代,舍弃一个选择另外一个,文化则不可能另起炉灶,用一种来替代另外一种。因此,虽然五四时期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代表着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意识的觉醒,发起新文化运动的分子也毋庸置疑地处在先进之列,但他们却不可能为中国指明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从原则上说,当时先进分子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确实是传统中国严重缺失的思想元素,挥舞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开展新文化运动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但只是将民主和科学的理解局限于西方资本主义蓝本的框架之内,则难免得出一些片面的见解和机械的结论。事实上,如同简单模仿近代西方的器物 and 制度所引起的怀疑一样,经过民国初期不成功的实践检验,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对 18 世纪以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理念,多多少少也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文化仿效会不会重蹈器物 and 制度仿效失灵的覆辙,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肯定的把握。他们还在观望中期盼着更有价值的先进文化涌现。因此,新文化运动开展后不久就转入一种新的救国路径选择,先进知识分子也重新选择了一条变革中国社会的崭新道路。马克思主义作为新的选择方向进入他们的视野。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正是在‘五四’运动所产生的这种新的政治环境和思想环境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转向了俄国革命的模式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范围的革命性变革的理论……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既要否定中国过去的传统,又要否定西方对中国现在的统治,因而出路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①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大意义已经为历史的实践所证明。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带来的是超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成果,是现代革命的提升。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武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与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不矛盾的。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是以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制度作为现实目标,但它不是历史上单纯政治变革的重复。用政治革命的价值评定,否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极其错误的。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触动的是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根基,其实际内容是全方位的。以政治革命的单一评价来抹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丰富内涵,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其次,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不仅因为它是人类历史上一种科学而先进的思想体系,而且因为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可以更有效地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可以创造出一种社会主义的崭新文化,进而开创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在以价值观

^① (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李玉玲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下同),第23页。

为核心的不同文化体系中,哪怕体现的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信念,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现代化过程客观上有着本土化模式的选择过程,其实质在于,非西方国家从自身的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化的精神支点,并以此为依托,进而不断地吸收、消化西方的进步文化,从而使得现代化文明成为民族精神的体现。也就是说,本土化模式不同于西化模式,它不主张现代化就是西化的过程,而应是立足于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社会制度结构、文化行为模式去创设一条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它对传统文化不是一味否定,而是批判地继承,挖掘有利于现代化实践的文化资源,立足于本土文化,融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逐步完成对异域先进文化的本土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确立文化价值取向的思想武器。

2. 文化价值取向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展开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揭开了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新篇章。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从此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作为五四运动后诞生的一支新生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其他政治力量所不可比拟的革命姿态,活跃在社会舞台上,战斗在各个领域中。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文化反映并服务于革命,在崭新的形式下获得了发展,在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前进的足迹。

经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不仅视马克思主义为一种救国救民的新世界观,更视之为一种融合东西优秀思想的新文化观,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价值取向贯彻于思想文化的斗争,实现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与文化革命的辩证统一。综观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实践,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同时,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大发展。

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总是与不断深入的革命实践相伴而行,革命斗争越深入,文化斗争也越激烈。革命实践是文化发展的源泉,而每一次文化斗争又促进了革命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经历的多次激烈论争,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它们是五四新文化的深入,并在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实际运用。首先是1923年发生的关于“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争论。这场看似学理性的争论从实质上说仍然是与中国社会改造方案的选择相关联。张君勱、张东荪等人将科学与人生观对立起来,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他们认为:“方今国中竞言新文化,而文化转移之枢纽,不外乎人生观”,“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而决不能以他人之现成之人生观,作为我之人生观者也。”^①批驳张君勱观点的丁文江等人虽然主张科学与人生观的联系,但他们将科学推到“万能”的地步,在人生观的认识上往往陷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局限。丁文江将马克思与叔本华相并列,认为两者都突出人的主观意志,完全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人生观的科学价值。许多学者名流如胡适、梁启超等都加入了争论。围绕科学的评价问题,争论中也涉及到东西文化价值判断、对西方科学思潮的评估、中国文化的去向等方面的分歧,但与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之争相比,这些分歧已经被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所淹没。中国共产党人十分关注这场争论。陈独秀在分析批判张、丁两派的观点后指出:“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②彭康在

① 张君勱:《人生观》,《清华周刊》1923年第272期,引自《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2卷,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501~502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下同),第354页。

总结这场争论时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它表明了“中国思想界底一大进步”，虽然是在一些抽象的学术概念上争来争去，“可是这是当时社会底矛盾及其发展反映到意识形态底必然结果，不仅是‘学者搬他们学者的货色’，他们背后实有他们底实践的要求和阶级背景”^①。可见，关于科学与人生观争论的思想意义大于学术意义，实质仍然与意识形态有关。马克思主义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纷争中逐渐扩大影响，并显示其威力的。

20世纪30年代初期思想文化战线更是热闹非凡，各种纷争此起彼伏。这一时期，国内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的斗争进入极为残酷和殊死拼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不仅遭受着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威胁，而且也面临着思想文化的全面禁锢。任何进步文化都被封杀，革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逃匿藏身。但是，进步文化的生长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关于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性质和关于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论争中，文化的功能和价值意义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些争论大部分集中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上海，争论相对比较集中，论辩者的范围表面上看基本是大学教授和其他文人学者，争论的问题形式上也具有学理探讨性。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首先，这些争论涉及的许多问题直接与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相关。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名流学者或学术权威，在争论中竭力诋毁马克思主义，企图以主观或客观唯心论来压倒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其次，参与争论的成员中也不乏有政治背景者。上海地处南京国民党政权中心的旁边，又是经济文化的重镇。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式的统治，决不允许“红色文化”有立足之地。因此，意识形态的控制始终十分严厉，利用文人进行反对革命的舆论宣传是经常采取的手段。第三，中国共产党代表的革命力量在经历挫折和失败

^① 彭康：《科学与人生观》，《文化批判》第2期，1929年2月15日。

之后,利用多种形式进行抗争。军事上发动武装斗争对抗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组织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文化上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科学思想反抗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这些斗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处于劣势和面临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革命的壮观历史画面。因此,当时中国共产党介入文化斗争的程度很深,有很多争论就是在党的组织领导下,由一些共产党的文化工作者发起并成为主要的争论一方。第四,这些争论的由来和焦点问题的形成,实际正是推进中国革命斗争的客观需要,解决好这些重大问题,有助于摆脱革命实践中的许多困惑和迷茫。例如,通过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性质的争论,形成了分析中国社会的思想方法,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认识,判断了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地位,从而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科学结论,这无疑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不仅在军事战场上激烈地展开,而且也体现在文化斗争中。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根据地,还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区域,或是沦陷区,大力开展文化活动成为动员广大民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有效途径。这些不同的区域从抗战环境来看差别很大,文化活动的条件、组织程度和发展状况也完全不同,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文化发展紧紧地扣住了反帝的时代主题,从而突出了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价值功能。广大民众从抗战文化中汲取精神的能源,寻找力量的资本,发现胜利的希望,使文化的功能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反而显得更加突出。在捍卫民族利益的目标下,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发展具有如下几个最主要的特点。第一,文化成为铸造民族精神的武器,革命的文化工作者自觉地通过参与和发展文化活动,宣传和鼓动全民族的抗战,使文化成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民族战争的深入展开。第二,紧紧围绕全民族抗战的需要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形成文化活动

与广大民众的互动效果,激发了广大民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为开辟文化走向大众的现代化道路积累了经验。第三,爱国主义精神借助抗战文化的发展而得到大力宏扬,传统文化资源中爱国主义的历史素材被广泛利用和深入挖掘,使新文化的发展与民族形式的创建紧密结合,创造出许多优秀的文化成果,推动了文化现代化的进程。第四,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表现在:根据各种区域的具体情况,实施不同的组织和领导的方式,对文化工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指导;加强文化问题的研究,出版各种专门的刊物,形成重视文化问题的氛围;制定开展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针和政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建设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成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努力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同时,积极开展解放区的文化建设,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形式以及成果。

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具有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在对自身组织的认识上,始终从多方面进行价值定位。中国共产党强调它不单纯是一个武装集团,而且也是新型文明的创造者、传播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崭新的现代形态,因此,思想文化斗争的内容也完全不同于以往。马克思主义思想赋予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践以现代化的新涵义。

3. 文化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展开

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而告一个段落。民主革命的胜利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增添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这个不可动摇的文化价值取向,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全过程中不可改变的文化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上的主要

任务是从主流意识形态上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地位。如同经济建设的局面一样,文化建设也面临着繁重的工作任务。首先,旧社会遗留的文化思想需要清理,文化机构需要调整,文艺作品需要审查,文化工作者的队伍需要重新组织。从社会转型的需要出发,努力使文化建设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第二,改造旧文化的宗旨是使文化建设发挥凝聚民心,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培养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情感的功能,强化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认同感。第三,加紧新文化的建设,努力用有利于社会发展、思想健康和方向正确的文化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的生活,促进文化建设新高潮的到来。第四,引导人民群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逐步树立科学的世界观,营造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社会文化生活。完成这些任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的基础性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戏剧、小说等文学作品的清理和审查、有害人民身心健康和伤风败俗的文化机构、活动的取缔、旧知识分子人员的思想改造等实际工作中,中国共产党着眼于新文化的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为社会成功地实现历史性的转型提供了保障。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为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得到了统一。在此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在积极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充分重视文化的建设,以一系列正确的思想原则和方针政策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健康发展。例如,确立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和科学事业的方针;大力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革,积极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的文化工作者队伍;扶植歌颂社会主义、反映人民群众生活的文学作品;提出发展科学事业的号召,制定科学发展的规划。这些努力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引导者,也是实践先进文化的代表。整

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不容抹杀。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贯彻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必然结果。

从原先的革命型政党转变成为建设型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完成巨大飞跃的同时,也意味着自身观念的调整和转变。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号召全党要加强学习。他强调,以前很多熟悉的东西快要过去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大量不熟悉的陌生的东西。这个观点,他经常提出来以提醒全党去认识新的事物,解决新的问题,完成新的任务。当然,由于是不熟悉和陌生的东西,实践就难免会有曲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是如此。与政治、经济建设上党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失误相联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建设中,“左”的错误也开始滋长起来,并与政治、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形成交互影响,在60年代中期导致了一场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受阻,党的文化思想方针政策遭扭曲,教训十分深刻。从这一较长时期的失误和曲折来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肤浅,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指导思想认识的片面性和机械性,是主观原因。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以及长期以来对封建文化的斗争不力,是客观原因。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封建文化阻碍现代化发展的危害虽然早就为有识之士所洞察,并时有批判、改造的呼声响起,但却始终没有形成长期有效的冲击波,封建文化缺乏认真的批判和清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突出反对资产阶级的主导倾向,长期忽略了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和文化的斗争。这样的客观情况,由于党的“左”倾指导思想形成的主观因素,便不可避免地引导文化建设偏离现代化的正确轨道,滑到完全错误的道路上去。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以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开辟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文化建设也迈上了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在经济腾

飞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地位 and 意义。同时,改革开放的实施促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包括经济经营方式、分配方式、就业方式、思想观念、阶层结构以及生活方式。这些变化必然带来人们精神面貌的变化,产生新的文化需求。一方面,人们热切地关注从文化的深层结构来审视中华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理论界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一个热点接着一个热点;另一方面,多样化的社会生活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发展,电影、戏剧、小说、诗歌、音乐等文学艺术领域空前活跃起来。文化建设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形成而走上正轨。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上的文化变革和发展,必须抛弃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排除盲目的华夏优越感和崇洋媚外的狭隘感情因素,以改革开放的精神,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古今中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并将它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战略方针,明确了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对于中西文化的科学态度,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批判地吸收中外科学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①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列宁的这个思想,特别是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规定: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应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应精神文明建设。《决议》还强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第285页。

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确立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规定了以培养“四有”新人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这些阐述是近代以来对文化现代化建设认识的精辟提炼。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转换。在重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强有力的思想指导。党中央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曲折和失误,原因不是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没有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以创新为前提的,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只有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赋予社会主义建设以生命的活力。这一认识对中国文化现代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仍然是文化现代化建设中不可动摇的选择,必须始终将马克思主义思想融入文化建设之中。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必须与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相吻合,避免文化建设中任何理想化的偏激情绪。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理想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者矢志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但理想不等于空想,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一切不切实际思想和行动。文化建设必须遵循这个准则,根据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制定文化发展的战略和方针政策。199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张。1992年9月3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进宣传思想工作,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的意见》,强调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强调了“精神文明要着眼于建设”。“精神文明重在建设”说明了在主流思想文化的建构上,要将重点放在适应新情况、形成新思想上,这就使主流文化建设工作由被动走向了主动。1996年10月,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我们只有逐步扩大文化开放，并在开放中主动应付对外开放后出现的文化挑战，才能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从根本上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确保中国文化建设不偏离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一步作出了深刻阐述和完整概括。世纪之交，党中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作为新世纪党的建设的目标，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实现文化现代化的一种使命感。

现代化的追求是中国几代人的梦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人正为之奋斗的目标。在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一个健康的发展模式至关重要。现代化的健康发展模式是历经或正在推进现代化的国家都深刻思考的问题，从现代化的早期实践看，对不同的主体国家，其过程和结果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某种程度上经济发展欲求有同时也出现了社会的畸形发展，人文精神失落，并带来全球性的问题。中国作为全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案例，既有后发型的战略优势，又有障碍性的发展风险。如何发挥优势，如何规避风险，文化建设至关重要。在日新月异的世界形势下，一方面应积极吸取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拓展先进理论的新境界。在致力于先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切实关注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精神需求，保持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

文化是一个民族为适应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创造。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冲突的焦点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由传统的“天人古今”之辩转移和演变为“古今中西”之争,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在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交汇与融合,至今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文化心理和价值选择。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运动中经历的失败与成功、挫折与发展,焦点也聚集在如何认识和处理“古今中西”的关系问题上。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扬弃,外来文化的批判与汲取,中国文化的重构与创新,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核心问题。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扬弃

1. 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及其在近代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和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各个民族的世代繁衍的连续系列中形成下来,既包括汉族文化,也包括少数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多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文化传统。中国又因广袤的疆域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体多源的地域文化,河南的殷商文化、河北的燕赵文化、陕西的秦唐文化、山西的两周文化、山东的齐鲁文化、江浙的吴越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聚合、共生共存的独特而灿烂的文化传统。中国

传统文化还因学术思想的渊源与流变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呈现出流派纷呈的文化格局,形成了儒、墨、道、法、阴阳、名、兵、农等诸子百家争鸣与各家互补的文化传统。中国传统文化以汉族为主体,融合了多民族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又汇入了道法佛诸子百家之学,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萌生于原始的远古时代,至夏、商、周时代开始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发生期,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产生。伴随秦、汉、唐、宋时代封建制度的确立与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达到全面鼎盛,在明、清两代走向顶峰,从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发展至今的一种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东亚大陆性地域使中国处于一种相对封闭和高度稳定的状态,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封建宗法制度和专制王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想境界和“会通以求超胜”的创新精神,也使得中国文化在其自身发展历程中表现出一种非凡强健的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结构,既有封闭僵滞的特征,又有创新发展的特征,形成了稳态和动态两种机制的统一,从而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观。

传统文化的危机是逐渐显示出来的。由于中国社会是在外来暴力逼压下被迫走上近代化道路的特殊原因,文化的现代转型必定伴随着对于自身传统文化持续不断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在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一步步加深的过程中,传统文化面临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天朝帝国大厦的危在旦夕和中华民族的生存续灭的严重情况下,传统文化是否还能承担保国强民的责任?第二,外来思想理念的输入与中国社会原先固有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运行规则发生冲撞,传统文化是否还具有历史上儒学消融道法佛那样的能力来应对西学东输?第

三,西方近代先进生产力的移植和商品经济的扩散引起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传统文化在人生价值认同、道德伦理约束等方面是否还具有示范意义?第四,素以仁义说教傲视天下的礼仪之邦急剧衰落凋零,传统文化是否还具有足够的自信经得起西方近代文明的审视?其实,从鸦片战争开始,传统文化的危机已经潜在地埋伏在中国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的变迁之中,只不过紧迫的民族危机暂时掩盖了传统文化的危机冲击。清朝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巨大的耻辱促使统治阶级首先是从军事上去寻找原因,接着又力求通过经济的途径挽回失去的尊严。在所有的努力都落空以后,文化自省与文化批判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此外,传统文化的危机也随着中国社会继续沉沦而日益暴露。从19世纪末开始,经过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一些人士不同程度的文化觉醒,到20世纪初一批以知识文人为核心的新兴力量迅速崛起,将传统文化的危机表露无遗。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第一次宣布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上丧失了引领中国社会、中国政治、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作用,从而把近代以来的古今之争推向了高潮,也由此揭开了考量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新篇章。

2.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的古今之争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文化论战”到20世纪30年代的“本位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的争论,再到80年代的“文化热”和90年代的“国学热”,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论争几乎纵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坎坷的演进历程中,中国好几代试图从文化途径寻求民族振兴之路的仁人志士,都将思绪集中在获得解决这一关系的正确答案上。

从对传统文化评判的价值取向来说,最为引人注目和颇多争议的观点,就是激进主义的彻底反传统论和保守主义的回归传统论的两极对峙。激进主义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根本冲突或基本冲突,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静态的农业社会的文化,根本

无法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时代要求,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只会充当绊脚石的角色,而很难起到积极的作用,对传统文化力主彻底否定、彻底摧毁、彻底改造。由此形成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根本冲突论”和“彻底决裂论”。

与“根本冲突论”的文化取向相反,文化保守主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系统具有西方文化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原则和精神动力,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挖掘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价值,以克服和避免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要求弘扬传统文化,以儒学价值取向为指归,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使复兴的儒学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主导力量。由此形成了“回归传统论”和“儒学复兴论”。

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观点,从五四时期的东西方文化论争中就形成激烈的对峙。在此后多次论争以致当今的文化评判中,都不时地发生冲突,只不过程度深浅不同而已。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到中国后,尤其是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后,对于文化的态度始终保持了对激进主义的“彻底决裂论”和保守主义的“回归传统论”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方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进行价值评判的基本路径,即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扬弃,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定,任何时代的文化创造活动都不可能脱离传统。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与传统之间无法割舍的历史逻辑关系,使得“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

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①这不仅仅是因为传统文化蕴含着可供后人吸取与借鉴的思想因子,更因为人们总是根据现实的需要对传统文化作了诸多的改造和创新。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享誉于世的古文明陷于衰落和消失的厄运,并非意味着文化传统的绝灭。无论是古埃及、古罗马、古巴比伦,还是古印度,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文明走向衰落和消失,终结的只是沿袭承载这些文明的民族过往的一个时代,而不是割断文化传统的历史影响力。中国的文化传统更具特殊性,几千年历史延续性使它在近代中国的几次社会转型中避免了中断和消失的厄运。从辛亥革命的历史巨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社会转型,文化范式多次发生变化,社会主流文化也在不断更新,但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仍然在变化和更新中生衍着并发挥其影响。正确地说,人们总是在传统文化提供的社会舞台上创造、发展、推进文化的延续。任何文化都不会是传统的摹本复制,同样也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凭空创造。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程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彻底脱离传统文化的状态下走向现代化。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传统的破坏者,对传统的批判是基本的立场。传统在社会转型的变革时代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恩格斯认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它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②在这里,恩格斯从社会革命的视角揭示了传统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说明传统与现代虽有割不断的历史联系,但又存在巨大落差,在社会转型的变革进程中不摧毁传统的保守力量,就没有历史的前进。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摧毁”,决非彻底的抛弃,而是辩证的扬弃。现代社会主义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17页。

的经济的事实中。“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①列宁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基本态度,并把这一态度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高度。他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思想和文化传承与扬弃的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依据与理论基础。

从近代以来古今之争的发展逻辑与历史经验看,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扬弃,必须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第一,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文化的时代性,是指一种民族文化在其发展的进程中所蕴含的时代特征。文化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界阈,即是一个民族在一定时代为适应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创造,反映和凸显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活力、内容和审美情趣,由此构成了文化的时代性。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及其差异,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既有传统的内核,又有时代的特征。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文化的民族性固然反映着一定的时代性,但它反映的是民族文化的既往历史,凝聚了既往的时代性的扬弃,它并不等于现世的时代性。文化的时代性固然体现着一定的民族性,但它更多的是反映现时代的文化和现实样态,而不是传统的民族文化的特质。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时代落差,凸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矛盾。因而强调文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第299页。

的时代性,就必然要求批判文化的民族性阻碍现实社会发展的传统,以突破保守传统的民族性束缚。然而,这并不等于可以彻底摒弃民族文化的传统,因为民族文化作为特定民族精神力量的汇聚,又是伴随社会变迁而与时俱进。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又是相互依存的,时代性中寓有民族性,民族性中又蕴涵时代性。一个民族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那部分时代内容形成时代精神,一个时代代表民族生命力的那部分民族性内容形成民族精神。只有把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辩证结合,才能理性地审视、批判、传承、扬弃传统文化。

第二,文化的阶级性与共同性的关系。任何文化都属于一定的时代。列宁说过: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在俄国是如此,有普利什凯维奇、古契科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也有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乌克兰、德国、法国、英国、犹太人也是如此。在阶级社会中,处于统治地位的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也是这个社会中的主流文化。统治阶级的思想必然以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为基本价值准则,体现了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然而,一个民族的文化在阶级社会中既有其阶级性,又有其共同性。文化的阶级性决不是绝对的排它性,一个阶级越是处于进步的上升时期,它的阶级性中包含的文化社会共同性的因素就会越多。一个民族中的两种民族文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三个方面形成的共识,受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制约而成为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这也使传统文化在时代和阶级的更替中得到传承与扬弃。

第三,文化的继承性与变革性的关系。文化的发展主要通过文化的相对稳定的传承与变动不居的革新这两种基本形式来实现的,传承与变革的辩证运动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基本表现形态。文化传承作为对传统文化模式的肯定,指的是人们只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创造新的文化,使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在历史的延续

中传承、沉淀和积累。传承使文化传统得以形成,使文化的发展呈现出连续性。文化变革作为对传统文化模式的否定,乃是指一定民族文化的内容和结构按照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而进行的自我更新,这种更新是通过对原有文化的内容与结构的变化,使文化得到发展。传承与变革作为文化发展动态过程中的两个方面,生动地构成了文化发展过程中辩证否定的关系:立足于文化的传承,要求批判地继承,旨在肯定中的扬弃;立足于文化的变革,要求综合地创新,旨在否定中的超越。文化传承为文化变革提供了初始的前提和条件,没有继承就没有变革,变革之中包含着传承的因素;文化变革又是文化传承的继续,唯有以创新的精神对待以往文化的传承,才不致于使文化的传承成为对以往文化传统的简单重复,使文化永葆其发展和前进的内在活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变革、连续与间断,是一个扬弃的过程。

3.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反思、创新

20 世纪前半叶,革命是中国社会大变迁的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评判,首先是围绕着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探索而展开的。

为了解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共二大首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最低纲领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高纲领,为评判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历史坐标。依据唯物史观,共产党人从人类文化普遍具有的结构层次及其相互作用,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特征。瞿秋白认为,宗法社会的自然经济、封建制度的政治形式、畸形的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构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是“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①。毛泽东认为,在封建宗法社会经济基础上,地主政权构成一切权力的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同),第15~18页。

基干,传统文化根本上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①依据社会革命论,共产党人从人类文化变迁固有的社会矛盾运动及其时代特征,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瞿秋白指出:“东方文化的‘恶性’决非绝对的,宗法社会的伦理也曾一度为社会中维持生产秩序之用,但是他现在已不能适应经济的发达,所以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近代中国社会沦入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之后,封建宗法文化又成为帝国主义鱼肉中国劳动平民的武器。“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②瞿秋白认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东方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均已“魂游墟墓”。唯有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③依据阶级斗争学说,共产党人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审视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价值之争的阶级基础。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逐渐形成东方文化派、科学方法派、唯物史观派三大思潮和流派交互斗争的新格局。邓中夏指出:“东方文化派可说代表农业手工业的封建思想(或称宗法思想),科学方法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资产阶级思想,唯物史观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无产阶级思想,这些思想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都有他们的背景。”基于当时的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劳资两阶级尚有携手联合向封建阶级进攻的必要,换过来说,就是代表劳资两阶级思想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尚有携手联合向代表封建思想的东方文化派进攻的必要,”要求建立“扫荡封建宗法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页。

②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3页。

③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5页。

思想的革命战线。”^①这些认识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斗争中的基本判断。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围绕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政治实践,文化斗争的主要特点是对以孔子为偶像、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进行批判。这个时期中,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理论工作者仍然延续着对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论战的思路,更多地从政治层面揭示传统文化的弊端,表现出激进的倾向,因而尚缺乏辩证的观点,不可避免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封建宗法文化,从总体上采取否定和摒弃的态度。

中国革命从北伐战争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了以乡村为中心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自然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科学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1937年,毛泽东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过程时强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②毛泽东阐述的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反映论,第一次阐明了古人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也是真理,应当吸取古代一切科学反映客观事物的知识。这一基本立场和观点,标志着共产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观点上开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毛泽东不仅直接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而且批判地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

①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8页。

秀遗产。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结合中国农民的革命传统,提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新理论;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结合中国传统的兵法思想,构画了农村游击战争的新战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结合,丰富和发展了作为时代精华和世界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军事斗争之外,文化斗争也激烈地展开,毛泽东思想在多方面展开并达到成熟,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在全党确立了对传统文化传承与扬弃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明确概括了对传统文化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不能割断历史,“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二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①总之,对中国古代文化,“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②毛泽东提出的这两个基本原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待传统问题上的深刻认识程度。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文化思想,尤其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提出,为传统文化的扬弃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正确处理革命文化建设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上取得了成功。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辩证思维方法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7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83页。

渗入到解决这一关系之中,并以崭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践形态,克服了近代中国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的片面观点,为革命战争的开展和最终取得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个文化建设的成功及其经验不仅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而且在1949年执政以后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进一步推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认识文化功能以及文化建设的方针上,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采取了科学的态度。然而,随着党的“左”倾指导思想的滋长,文化建设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片面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文化建设走上极端错误的轨道。笼统的否定代替了科学的扬弃,简单的批判代替了理性的分析。所谓的“反传统”成为革命者的标记,在一些激进的口号下,传统文化被当作反动的东西全盘抛弃。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的扭曲,甚至也完全违背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精神。

1978年中国社会的历史性转折也迎来了文化建设的转机。创新总是与反思紧密相联,人们在尝试走一条崭新道路的过程中,必然伴随对以往历史的反思。反思越深刻,创新就越果敢。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在反思和创新中实现的。反思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的价值评判。“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也好,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也好,不只是特定环境的产物,更有深厚的社会根源。中共中央在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决议指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

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①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了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主义余毒的历史性任务。邓小平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②为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深刻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要从我们民族的现实和历史的前提出发,又应当根据新的时代和实践进行新的开拓、创造与超越,发展现代化应遵循“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既体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又凸现中华民族的鲜明特色。江泽民进一步论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他说: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基本价值观念,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些传统,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③我们选择和实践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各项基本的内外政策,既源于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也源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民族传统,因而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充分依据与牢固基础。江泽民从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进步性的特征,重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揭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既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合乎逻辑的演进,又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超越,体现了时代精神与民族精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第76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5页。

③ 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1997年11月2日。

神的辩证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

外来文化的批判与汲取

1. 中外交流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是近代中国的文化现代化不能回避的问题。长期以来,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交汇一直困扰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中国与外国交往的历史看,由于古代中国创造的东方文明具有领先世界的地位,本土文化在几千年中国的稳定发展中,从未受到挑战性的攻击。而国外进入的某些思想文化也远构不成动摇中国本土文化主导地位的威胁。传统中国始终保持着一种文化优越感,悠然走过了漫长的前现代社会,并且以一种文化霸气将外来文化毫不费力地纳入本土文化的系统之中。在接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事实之前,中国人承受的历史积淀主要是自我中心的文化传统。

对中国来说,自秦汉至唐宋的一千多年之间,便与中亚、西亚诸国以及印度阿拉伯各国建立了交往关系。中外文化的交流,主要是以贸易、传教、旅游、留学、书籍、外交的和平方式来实现的。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横贯东西方的“丝绸之路”,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促进了中西方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在此期间,佛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先后传入中国,形成了开放的“汉唐气象”。唐文化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外来文化,充满了兼容并蓄的宏大气派,唐都长安成为那个时代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英国学者威尔斯在比较欧洲中世纪与中国盛唐时代的差异时这样写道:“当西方人的心灵为神学所缠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中国人的思想却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①

^① 转引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1994年版,第98页。

印度佛教的传入,改变了秦汉以来中国封建文化的单一封闭格局,形成了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冲撞、会通与融合。自魏晋玄学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初次碰撞与会通。魏晋玄学杂糅儒佛道,以有无、本末、体用的范畴论证“以无为本”的本体论,佛教则依附玄学,用玄理阐发佛义,中国主流文化开始踏上了儒、释、道三教合流之路。唐代禅宗的问世,标志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撞与会通。唐代高僧玄奘、义净、深神、慧能等不同层次上对印度佛教进行钻研探讨、加工改造,使佛教教理逐渐中国化,以适应社会各阶层的信仰需求。禅宗作为中国大乘佛教内部改革的产物,打破了印度佛教既繁琐又不合中国风俗的教规、教戒以及修养的传统,从而成为一种充分中国化并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所乐于接受的中国式的佛教。至宋明理学,儒学吸收了佛教文化和道家文化,并加以消化和创新,形成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三次冲撞与会通。佛教富于思辩性的哲学和逻辑学,补充了中国传统哲学在理性思维上的不足,提高了民族的思维张力和认识论的发展,使传统儒学思想获得了更加精致的理论形态,最终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新的文化体系,即宋明理学。在外来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从思想、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各个领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印度梵文的传入,使中国产生了音韵学;佛教中禅的思想,丰富了中国文学的精神内涵,提升了中国文学的艺术境界。中国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碰撞与交汇时,既以包容会通的精神吸纳外来文化,又始终是以本土自创的文化为主体,本为外来文化后又充分中国化的佛学已消融于中国固有文化之中,融为中国民族文化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构成。

13世纪,蒙古骑兵席卷欧洲和西亚,并进犯中原,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元帝国,为真正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从13世纪中期到14世纪中期的一百年间,很

多西方人士来中国游历、经商、传教,向西方传递了具有独特风貌的中国文化。从16世纪发现海上航道,中西方关系以贸易为基础获得发展,关于中国的大量著述在西方出版,西方对中国的观念渐渐明晰,终而在18世纪形成中学西渐的局面。以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武器为代表的宋代科技文化最杰出的成就先后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成为西欧社会历史变革的有力杠杆,对于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马克思形象地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一书中认为,当时的中西文化关系是“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中国“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①。

中国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古老而悠久的文明,在世界历史上一度居于领先地位,这使中国的帝王和士大夫们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固持“华夏文化中心论”,称周边少数民族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视其为落后的野蛮民族。在鸦片战争之前,上至皇帝,下至庶民,世界概念的缺失和世界知识的无知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以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其亲身经历对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的心态作过如下的描述: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羨,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

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然而,恰恰就在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了盛极而衰的最后阶段。19世纪中叶的中英鸦片战争,标志着中西文化交流出现了历史的大逆转——中学西渐演变为西学东渐。

2. 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的中西之辨

历史资料表明,从清朝的乾隆、雍正、嘉庆,一直到鸦片战争吃了败仗的道光,历任皇帝都沉浸在太平盛世的幻象中,继续着夜郎的旧梦。他们无视西方船坚炮利所传递的现代化信息,他们还是用“蛮夷朝贡”的思维方式看待前来中国交涉的一切外国官员,他们习惯性地秉承着自我中心的历史传统作出应对决策,结果犯了一个时代性的错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时来自海上的“倭患”已经不是清朝可以轻易驾驭的“蛮夷”,船坚炮利掀动的是一次现代冲击波。他们也根本不了解,这时迎面东来的西方文化已经不是利玛窦传入的中世纪文化,而是扬弃了古典希腊、罗马时代和中世纪基督教时代精神的近代西方文化。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不得不被迫接受西方文化向中国本土文化挑战的事实。

西方文化的强势东舶,形成了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冲撞与交融。从发生学意义上说,现代化对中国文化并不具有内发性。中西文化之间在内容、本质上的时代落差,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然与向西方学习相伴随。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瓦解和传统政治制度的崩溃,使传统文化失去了功能示范的价值。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思考已离不开西方文化这个强大的参照系了,师法西方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理路。在西方现代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下,如何看待西方文化,怎样才能取西方文化之利而去其弊,中西文化能否结合,如何结合,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解读,在近代中国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论争。

1840年到1894年的甲午战争前夕,要不要学西方,能不能学西方,成为争论的焦点。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既给中国造

成了血与火的深创巨痛,也使中国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的现代化是出于防御西方列强入侵的目的,属于一种“防御型”的现代化。面对现代化的西方文明逐渐渗入到中国社会,传统开始走向式微的情景,许多士大夫固守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传统心态,以“华夷之辨”的传统思维定势,依然梦想“用夏变夷”。他们顽固地认为,历代之言天文者,中国为精;言数学者,中国为最;言方技艺术者,中国为备。如浑天仪、乾凿度、太玄、洞极、潜虚、星纪、九章、三率、周髀、皇极诸书,相继而起,恐西学之轮船机器未必有如此幽深微妙矣。根据这一种价值基准,他们认定,自古以来只有“以夏变夷”之理,绝无“以夷变夏”之说,断然拒绝向西方学习。也有人开始因战败而“开眼看世界”,着手了解世界大势,感到仅靠传统的礼义忠信已不足以维护其统治,承认西方也有值得学习的长处,开始引进西方实用技术和科学。林则徐、魏源作为其中突出的代表,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文化范式。1876年,薛福成在代李鸿章草拟的答彭孝廉的信中认为,中西文化在本源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别,即中国之洪荒,以圣人制度文物辟之;外国之洪荒,以火轮舟车、机器、电报辟之。这就是说,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圣人之道,西方文化的本质是器物技艺。他说: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3年后,薛福成提出: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中道西器”论成为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的基调。1898年张之洞又将其概括为“中体西用论”,即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中体西用论在当时的中国是“举国以为至言”。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而封建主义仍笼罩整个社会的情势下,中体西用论的出现,多少体现出当时朝野上下对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反思和对西方现代文化欲迎还拒的两难选择。

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向西方学什么又成

为新的争论焦点。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激发了维新变法思潮和共和革命思潮,转而引进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乃至文艺小说,西方文化在中国广泛传播,“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成为时尚。当时的志士仁人对中西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作出了“西学为体”的文化选择,要求在中国建立近代西方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史语境中,以康梁为代表的原维新派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围绕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论争,凸现出对西方现代文化作出了各自不同的选择路径。1915年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们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对西方现代文化又作出了新的历史选择。这时,民主已不仅仅是对具体政治模式的诉求,科学也不再限于专门的技术,而是被作为一种文化理念、一种思想方法凸现出来,进而确立了其在近代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新文化运动揭橥的科学民主的精神理念,为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确立了现代化的基本价值目标,标志着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解构深入到了文化观念的核心层面,从而把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的冲撞与交汇推向了高潮。从鸦片战争时期出现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戊戌变法中提出的“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再到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科学、民主的文化范式,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认识已完成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行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实现了从“外在冲击”到“内在转化”的转变过程。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时代区别于以往时代的两个标志:一是民族国家,一是世界市场。民族国家和世界市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转化和蕴涵了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从世界范围来看,农耕时代的文化属于自然文化,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不那么发达。进入工业时代以后,交通和通讯工具的迅速发展普及,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使各国的文化交流更为便利,形成了世界性的文化交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

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①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多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在各民族的多方面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的情况下,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又承认资本主义时代各民族的文化是平等的,充分肯定了各个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因此,必须坚决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所凸现出来的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文化的世界性交流和会通是现代化的必然走势,但决不会销蚀文化的民族性根基。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辩证思想,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汲取外来文化的科学依据与理论基础。

从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汇的发展逻辑与历史经验看,对外来文化的批判与汲取,必须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第一,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发展既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又有其相似和相互接受的特征及其共同和普遍的规律,即文化的世界性。文化的世界性是各个特定民族文化的总和,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文化中蕴涵着世界文化。文化的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基础,世界文化不能脱离各民族文化,文化的世界性包含着特定民族文化的思想内涵和民族特质。每个民族可以从本民族的特点出发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共同河流中去,在不断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的同时也使自己的优秀文化成为整个人类文明的有机构成。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关系构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既不能用文化的民族性去拒绝文化的世界性,也不能用文化的世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性去抹杀文化的民族性。脱离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去谈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陷入民族自我中心主义,产生封闭保守的狭隘心态。融入人类现代文明的河流,汲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也决不是用它来取代本民族的文化,彻底摒弃和摧毁本民族文化传统,而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本国的民族文化。反传统表现出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回归传统派表现出的民族文化自大主义,是文化现代化必须坚决避免的两个极端。

第二,文化的多样性与普适性的关系。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化的基本特征。文化的多样性,源自多样性的历史。人类的文明进程至少已有六千余年,众多的国家和民族走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自然环境、经济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延续着不同的生活方式,由此产生和形成不同类型的文化形态,使整个人类文化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正是由于人类文化的这种多样性,我们这个有着近 200 个国家、2500 多个民族的星球才如此丰富多彩。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的经济即使达到了相同的程度,各民族的文化也依然会存在差异,各个国家的经济模式和文化的类型不必也不可能完全整齐划一。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选择自己发展模式、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的权力。因此,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是文化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文化的普适性,指的是众多国家和民族文化虽然表现形式千差万别,但又存在一些共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人类文化的发展既有鲜明的民族特性和地域性、时代性,又有其共同的普遍的规律。文化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以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为基本内容,这是文化具有普适性的根本原因。由于人类交往的普遍性产生了不同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也使各民族文化的共通性、共识性、共同性日趋增多。正是基于文化普适性的客观规律,才生成了文化的世界性话语。世界文化的意义在于它整合

了特定民族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价值,是一种体现全人类利益和价值取向又包容各民族文化价值系统准则的世界文化。文化的多样性与普适性的关系,决定了我们吸取外来文化,必须有所选择,为我所用。我们要从中国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格局和大趋势出发,选择和吸取外来文化中适合世界发展大势和人类共同利益的文化成果,以及真正代表各民族先进文化的精粹。

第三,文化的独立性与融合性的关系。文化的民族性、多样性与差异性,反映了各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与个性。文化的世界性、普适性与共同性,反映了人类文化本质上的一致性与融合性。文化的交流是人类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内在机制,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基本途径。跨文化交流中,多种文化碰撞和融合的后果总是双重的:一是破坏它的特殊性,一是打破它的局限性。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经常出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碰撞,甚至导致一种民族文化面临丧失其独特性的危机。于是,不同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在交流中往往出现“抗拒”与“同化”的现象。“抗拒”是指本土文化为固守其独立性而对外来文化的冲击采取抵制与抗拒的态度,“同化”则是指本土文化被外来文化所摄取和融化而丧失其原有文化的独立性。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则是跨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另一种后果。当一种文化与异质文化碰撞时,可以由外部的冲击与挑战而引起本土文化的自我反省、更新与变革,以致有效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经过不断的消化、融会、重组和整合,冲破传统的束缚,促进新文化的诞生。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史来看,文化碰撞引起的文化抗拒或同化的现象并不构成各民族文化交流中的主流,相比之下,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则是各民族文化双向交流及其相互结合的自然结果,也是文化交流中正常和健康的发展途径。各民族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必须处理好文化的独立性与融合性、平等性与互补性的关系。各个民族的文化因其所处的时代差异,会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和各自的优长短缺,然

而,各个民族的文化是和一个民族独特的生存方式相适应的,在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决无优劣之分。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平等的,跨文化的交流必须遵循平等的原则。各民族又应在保持其文化的独特性的基础上提升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善于批判地汲取异质文化的优点和长处,不断地充实和发展自己,使多种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更加丰富多彩,更增添相互取长补短和兼容并蓄的优势,这是跨文化交流中的互补原则。

3. 中国共产党对外来文化的批判、选择、汲取

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认同上,比较早地表现出了对国外先进文化的关注,并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主张吸取人类文化的先进成果。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中,李大钊倾向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上,中西文化相互交融前进,以复兴中华民族文化。他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未来世界文化的发展,不是东西两种文明的冲突,也不是一种文明征服另一种文明,而是东西文明,“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①唯有如此,“世界新文明始有焕扬光彩、发育完成之一日”。^②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李大钊反思中西文化问题打开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对渴望重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救国救民的新世界观,同时是一种融合东西方优秀思想的先进文化。瞿秋白指出:“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辅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然而,现时这两种文化“都有危害的病状”,唯有马克思主义“开辟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

^① 《李大钊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第205页。

^② 《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15页。

即此足以光复四千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①

1921年建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西文化问题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为着完成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必须批判和否定东方封建宗法社会的文化思想;为着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任务,必须批判和否定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思想。瞿秋白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由于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就形成了先后错落的现象,即“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帝国主义沟通了全世界的经济脉络,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融铸为一,“就此而发生全人类的文化,——世界无产阶级得联合殖民地之受压迫的各民族,以同进于世界革命。”^②邓中夏也指出:“封建制度必被资本制打翻,资本制必被共产制打翻;那么我们可以断定,封建思想必被资产阶级思想征服,资产阶级思想必被无产阶级思想征服,这是社会进化与思想进化的铁则。”^③这一认识的正确方面是说明中国不能再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承认东西文化有共同的普遍规律。它的缺憾是关注了文化发展的世界性,忽略了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和特殊规律。这说明早期新文化运动推崇的“中不如西”的文化思维范式,这时又转化为对苏俄模式的教条化崇拜,即从“全盘西化”转化为“全盘苏化”。中国革命运动在二三十年代的兴起和挫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理论思维方式付出的代价。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提出和认识上的提高,对文化建设也产生了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在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第213页。

②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3页。

③ 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6期,1923年11月24日。

认识中西文化关系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范式。毛泽东提出了吸收外来先进文化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中国应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二是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一切外国的东西，要区分精华与糟粕，排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毛泽东阐述的这些思想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国外先进文化的基本方针，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中外文化关系的认识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包容的开放性和兼容性来阐述中西文化的关系。1953年，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良文化的。封建时代，在唐朝兴盛的时候，曾经与印度发生密切的关系，学了佛教。现在有人证明，我们现在的乐器大部分是西域传来的。1956年，毛泽东更以一种急迫的口吻说：我们要在十几年之内把外国的好东西统统拿过来。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都是这样做的，汉朝、唐朝就是这样。周恩来也认为：“我们的民族从来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我们吸收了印度文化和朝鲜、越南、蒙古、日本的文化，也吸收了西欧的文化。”^①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

① 《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同），第343页。

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①应该在中国的基础上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吸收外国的东西,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毛泽东说:“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②中西文化各成体系,又有其普遍适用的基本理论,从对普遍真理的接受性而言,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打破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文化样式,使中国共产党人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和升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1957年以后,毛泽东对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判断。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中国外交为世界革命服务,后来形成了由中国来推动世界革命、革命中心从莫斯科转到北京的论断。毛泽东从“实际需要”来认识和取舍中西文化的精华与糟粕的思想及其实践中,往往流露出从功利性的工具价值观来评判中西文化的偏向,它一旦与现实的政治目的对接,就会导致在文化问题上的失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和不断革命,在“兴无灭资”的口号中开始拒斥一切西方文化,在“反修防修”的口号中又拒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文化,形成一种封闭的和保守的态势,以致阻碍了中国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重新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与交汇变得更加突出和深刻,并具体渗透到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邓小平从马克思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的广阔视野,对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第4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2页。

界的两大战略问题,“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思想。他指出:我们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关注的首要问题。从文明和文化的特定视角观照和审视。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课题。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而经济全球化必然加速文化的世界性交融和渗透。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回避文化选择的时代难题。江泽民将世界上一些国家、民族、政党的兴衰存亡,放到古今人类文明发展变迁的进程中去审视,认为不看世界发展的大势,固步自封,作茧自缚,必然导致国家和民族的衰亡,提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全面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局。“中国人民为自己的古老文明而骄傲,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停止学习世界上所有的优秀文明成果,一天也不能停止。”^①在古今人类文明发展变迁的大时空中,以“世界眼光”瞄准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抓住新机遇,促进新发展,这是文化建设的光明之路。

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不是用它来取代本民族的文化,而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本国的民族文化。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坚持这个方针,首先,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对外来文化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必须以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为标准,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对人类文明成果进行分析鉴别,扬抑取舍,丰富和发展新文化。其次,要把经过鉴别的外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利用与中国

① 江泽民接见美国《科学》杂志专访时的谈话,《人民日报》2000年5月17日。

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学习西方文化,不是“按蔚蓝色文明建构中国文化”,而是要立足中国国情,根据促进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加以检验、考察、选择和改造,包括对外国先进文化的话语转换。第三,对外来文化的优秀内容使之具有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对外来文化的优秀内容,要使其与中国当代文化融为一体,还应对其进行一番自我消化和改造,使之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部分。总之,吸取外国文化“要采取分析的态度,区分先进和落后、科学和腐朽、有益和有害,积极吸收先进、科学、有益的东西,坚决抵制落后、腐朽、有害的东西。”^①如果盲目崇拜,照搬照抄,那就会丧失独立性,最终成为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的附庸。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外国文化艺术崇高的、优美的、粗鄙的、低俗的、怪异的,几乎没有不被输入中国的。不少喧嚣一时的东西,虽也博得一时的彩声,却很快烟消云散,只有那些真正代表各民族的先进文化精粹,才能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以至融为己有。

中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同样,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不能离开中国文化的发展。我们一面引进吸收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一面走出去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这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互促互动的两个方面。“在新千年和新世纪,中国更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更需要了解和认识中国”。^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面临的一个机遇是如何让世界更多更全面地了解中国。1997 年 11 月,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中说:“要了解中国,可以有很多视角。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中国是一个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从历史文化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是一个重要视角。”^③2002 年 5 月,李瑞环在英国英中贸易协会演

① 江泽民在中国文联六大、作协五大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 年 12 月 16 日。

② 江泽民会见美国新闻媒体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人民日报》2000 年 9 月 5 日。

③ 江泽民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1997 年 11 月 2 日。

讲中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为了促进双方的合作，必须加强彼此的了解。“了解包括对现状的了解也包括对历史的了解，包括对经济的了解也包括对政治的了解、文化的了解，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了解。”^①我们既要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成果介绍给世界人民，又要把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展示给世界人民，让世界了解中华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这是中国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从总体上来说，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中，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播仍处于劣势，与我国的综合国力水平相比，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工作很不相称。我们要以全球眼光和积极、进取、开放、创新的精神，抓住中外文化合作、沟通、对话的契机，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把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成就的工作由盲目变成高度自觉的行为，使它成为一项全社会普遍重视的战略举措。

中国在走出去向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最新文化成果的过程中，如何与各种文明和谐共处，认真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以文化建设的新形态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是一个新的课题。对全球化时代文明关系的争论，出现了两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文明冲突论。认为不同民族文明之间存在着根本利益冲突，未来的时代是文明冲突的时代，西方文明的最大对手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二是文明一体论。认为不同民族文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或一体化而产生融合，走向文化的全球化或趋同化，甚至形成一种全球一体化的文化模式。产生于上世纪末的这场争论，不仅涉及世界各国如何处理各民族文明的关系问题，而且关系到未来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进新世纪、新千年。江泽民提出：每个国家有远见的政治家都应从历

① 李瑞环在英国英中贸易协会的演讲，《光明日报》2002年5月30日。

史的高度思考:未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应该为实现这样一个世界作出什么样的贡献。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地提出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论述。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和发展的趋势。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追求只能通过不同的文明来表达,各国人民美好的生活理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发展道路来实现。各种文明应当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进步。这个论述,为把握中国文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位置和作用,为中国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的成果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

文化建设与创新

1. 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与创新的基本内涵

文化建设是指文化体系的构建,特别是价值系统的重新建构、文化模式的铸造、文化类型的规整。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就是要建设现代化的文化体系,重构现代中国新文化的价值系统,构建新的现代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

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文化问题的核心。一个民族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对该民族的文化起着巨大的整合作用和价值的导向作用。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文化模式与文化类型之所以相互区别,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系统。一个民族文化的价值系统,既是相对稳定的,又是历史地发展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说到底就是中国文化的价值重构,即从传统文化价值系统转向现代文化价值系统。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按其所面对的问题可分为三个方面。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表现为崇尚“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表现为褒扬“中庸致和”的整体和谐;在人的自身关系方面,表现为追求“内圣外王”的君子人格。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中心主题,就是以内敛的方式通过达致和谐来寻求人的价值。这种“天人和谐”的价值取向带有重“道”

轻“器”的形而上的特征,它使中国传统社会曾经发展出了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物质文化成就,却难以发展出独立的现代科学的学理体系,也没有形成科技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这种人际和谐的价值带有人本主义的道德至上的特征,它使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蕴涵了浓厚的民本意识,却又成为封建皇权对普通民众施以专制统治的一种政治依托。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文化的比照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自然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与民主。在中国文化现代价值重构的问题上,自由主义思潮将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归罪于儒学传统,以西方的现代科学与民主的价值标准,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则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着力开掘和阐发儒家文化中与科学、民主等现代精神相联系的传统精神资源,从而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开出能够涵容现代价值精神的思想架构,以现代价值取向来重塑儒学的现代形态。如何实现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化,重构富有时代精神又继承优秀传统,吸纳世界文化精华又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化的新型价值系统,显然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

1934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在《文化模式》一书中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犹如一个人的思想行为方式,多少具有一致性。每一种文化内部都具有其特殊的目标,这种目标则是其他文化所没有的,要考察、比较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的文化状况与文化水平,必须对其构成方式和稳定特征进行研究,从而提出了文化模式的问题,并把文化模式作为区别不同民族文化的基本标志。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的特定社会历史语境和作为文化主体的人的活动以及自然地理环境的产物,因而具有多样性。从文化的时代、文化的形态、文化的结构、文化的地域诸多视角出发,可以划分出各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如从文化的时代

特质出发,可以分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各种文化模式;从文化的形态出发,可以分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从文化的地域分,可以分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或根据人类居住生活的地域区分为没有河流灌溉的高地、河流灌注的地带以及碧波荡漾的沿海三大地带,进而分出以印度为代表的高地宗教文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大河平原哲学文化、以欧洲为代表的海洋科学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从物质、制度、观念三种文化形态来看,物质的层面是以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建立在封建国家、地主、自耕农所有制基础上的自然经济;制度的层面是以君权为核心的建立在宗法社会制度基础上的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观念的层面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又融合了佛道义理和诸子思想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模式,既是人们生活经验、知识技术、风俗信仰、宗教观念、思想传统长期积累的结果,又整合了不同地域、不同流派的文化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共识,增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并且强化了民族的心理特征和行为特征,从而区别于世界上别的民族文化的模式。这种生长于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模式,既蕴涵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又有其与现代化相逆向的成分。在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进程中,如何从中国现代化的实际和趋势出发,铸造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体现中国特色,又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和时代特征的新型文化模式,也就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又一课题。

除了文化模式外,还有个文化类型问题。1936年,美国民族心理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的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类型”这一术语。1955年,美国现代进化论者斯图尔维在《文化变异论》一书中把这一概念上升为理论并使之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学范畴。文化类型的内涵,大体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文化类型是该文化的成员在其特定的时(历史演化历程)和空(文化生态环境)系统中前承后续共同参与的结果。按时间分,则有前现代文化系统、

现代文化系统、后现代文化系统。按空间分,则有本土文化、外来文化、高地文化、大陆文化、海洋文化。其二,文化类型是各种文化内部的结构与功能相互整合为整体所显示的特征,这种特征是指这一文化内部的结构与功能体系中最本质、最能体现其特色的一部分,而不是指文化的全部特征的总和。按文化的层次进行分类,则有世界文化、民族文化、阶级文化;阶级文化又有统治阶级文化和被统治阶级文化;按文化在人群中的分布进行划分,又有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或雅文化、俗文化;按文化的内在结构进行分类,则有一元文化、多元文化,多元文化又有主文化、亚文化、反文化;按文化的内在功能进行分类,则有认识文化、审美文化、价值文化;按文化和一定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进行分类,则有农业文化、游牧文化、工商文化、信息文化。其三,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构成了人类文化总体中可以按形态特征分割的最小单位,它们的总和构成了人类文化的整体。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属于前现代型文化、大陆型文化、农业文化。中国文化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主题,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努力,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已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为中国文化面向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现代化的批评在西方逐渐酿成一场全面性的思想运动,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潮。面对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伴随而来的全球问题的深重困境,后现代主义对在西方文化主导下所成就的以启蒙理性为核心内容、以工业化为基础运作方式的“现代性”作出了全面的批判,进而提出了“走出现代性”的口号。中国文化的现代重构与西方文化发展之间出现的时差,使西方文化发展历程中以历时性的形态依次出现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现象,在中国则在相当程度上以共时性的形态被同时挤压在一个平台上,这又使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就文化类型的规整而言,则要处理好各种类型文化之间的相

互关系。如文化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关系,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关系,主流文化、亚文化、反文化的关系,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问题。

文化创新,指由连续的文化积累和对外来文化的借鉴汲取而导致的一种文化特质以及文化结构的更新与发展,特别是文化模式或文化类型局部的或根本的改变。文化的积累,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能动性,适于文化创造的特殊社会实践,构成了文化创造的基本要素。人们在一定的文化积累的基础上,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满足人的自身发展的要求,总是及时吸纳新的文化要素进行加工和创造,从而形成新的文化特质,新的文化模式和新的文化类型。人类文化正是在不断的更新与创造中延续、发展、前进。

文化创造,以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过程及结果的新颖度,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的层次或形式:文化的简单再创造和文化创新。文化的简单再创造是一种比较普遍和常见的文化创造活动,指人们对既有的文化特质进行改造、改进、完善、发展或更新换型,从而使之派生出新的同类文化特质的创造过程,它具有渐进性的特点。

文化创新,指人们创造前所未有的全新的文化特质的过程,即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抽象,把反映现实生活要求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变成新的文化特质,丰富文化的内涵,创造出符合时代特点和时代要求的新文化。创新是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最高形式,是人的创造能力和创造精神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是文化发展中最具革命性的要素。它既是对文化的简单再创造的超越,又是以这种文化创造形式为基础,并内在包含着这种创造形式。这两种形式在人类实践中相互联结,交相并用,从而共同描绘出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生动图景。

2. 中国现代文化建设与创新的主要论争

中国传统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体系的基本格局和特

质,从秦汉确立以后至鸦片战争之前曾经历了一系列的局部的更新与变化。在此期间,传统儒学也经历了二次大的转换:一是秦汉时代由原典儒学向封建国家大一统意识形态的转换,二是宋明时代援引佛道向新儒学的转换。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中国文化历经战争动乱、社会分裂、王朝更迭,但却未中断自己的传统,而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地获得发展更新的动力。各个时代的思想家的每一次创新既以传统为根基,每一次创新的思想文化成果又构成传统的新的有机部分。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历经二千余年的变动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切换,直至近代以降才发生了根本的质变。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与创新,无论在文化特质、文化结构还是文化模式、文化类型上,都有本质的区别。

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的发展历程及其历史经验来看,主要涉及以下一些关键性的理论问题。

第一,中国文化现代重建与创新的指导思想。现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创新,最重要的是指导思想问题。在近代中西文化撞击与交汇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影响,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震撼人心的历史事变。从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文化论战”到20年代初的“科学与玄学之争”,中国文化的变迁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思潮斗争交融的格局。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未来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使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思想界三大思潮的激荡、论争、互动、交流、融合中成为主导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文化,并且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要求以西方启蒙时期的“人文精神”来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保守主义则要求以“复兴儒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全盘西化”或以“复兴儒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显然已经超出了学术讨论的范围,涉及到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创新的指导原则,在文化

与学术的语境中蕴涵了显而易见的政治含量,凸现出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与较量。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派、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保守主义的新儒家派都是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基本理论出发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到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和 90 年代的“国学热”中,这三大思潮围绕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创新的指导思想的论争,始终没有停止。这一论争仍会延续到 21 世纪,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地位,乃是 21 世纪中国文化建设与创新的首要问题。

第二,中国文化现代重建与创新的道路方向。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证明:现代化作为一种体现时代前进方向的世界潮流,是有其客观内涵的普遍趋势;现代化作为一种具有民族性的特殊道路,又是有一定的选择空间、选择时间的。近代以来的中西矛盾和古今之争,最终都定格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并盛行于当代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派、中国马克思主义派都主张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应该而且也必须能够现代化,但是,三派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具体道路与方向的选择又截然不同。自由主义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视为一个以欧化取代传统的过程,倾向以西方文化为根底或主体的文化建设路向,以西方文化打破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以西方文化为目标模式建设现代中国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视为一个重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复兴的过程,倾向以传统文化为根底或主体的文化建设路向,以复兴的儒家文化统驭现代中国社会甚至拯救整个世界的危机。这都直接涉及到中国新文化建设与创新的道路方向问题。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出现,使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现代重构与创新开始拥有一种全新的角度并形成了科学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要求的科学理念出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表现出一种执

著的文化追求,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道路,科学地解决了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发展道路,也为中国文化面向 21 世纪的未来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第三,中国文化现代重建与创新的基本途径。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创新,既要解决好古与今的关系,也要解决好中与外的关系。前者着重解决的是中国文化如何自我更新的问题,后者主要是回答两种文化的综合创新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是分离的,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必然伴随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古今矛盾与中西碰撞,这是文化建设与文化创新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在现代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创新的具体途径上,自由主义的西化派、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派和中国马克思主义派三大思潮分别以“全盘西化”、“中体西用”、“综合创新”为基本文化主张。西化派是以对传统文化持彻底批判和解构的极端方式来重建中国文化,现代新儒家则以另一种同样极端的方式来重建中国文化,两者的并存表明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既“破”又“立”的基本价值取向。然而,两者在重建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途径与方式上的矛盾和论争,仍未超越古今中西之争、体用本末之辨的二元对峙的狭隘文化视野,这说明正确认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破”与“立”的关系问题,科学地阐明文化融合中的“古今中西”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文化建设和文化创新必须解决的关键性课题之一。

3. 中国共产党建设新文化的路向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新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上。这时,关于中国文化未来前路的争论并未结束。首先是以中国如何回应世界现代化浪潮挑战的东西文化论战,余波未消。1923年,以人生观为主题,发生了科玄之争。东西文化论战和科玄之争,通过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出路的进一步沉思,折射出中国思

想界对“中国向何处去”的世纪课题的探求和争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先进文化,怎样建设先进文明,这是摆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早期共产党人程度不同地关注并参与了对文化的论争,他们的文化研究试图系统而概略地阐发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这些对革命充满激情和憧憬的共产党人,对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认识和思索已拥有一种崭新的视角:社会主义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唯一前路。李大钊认为,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具体的制度,而是“生活的大观”。社会主义有三个特点:“(一)知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对于现存秩序的批评主义。(二)情的方面,社会主义是一我们能以较良的新秩序代替现存的秩序的情感。这新秩序,便是以对于资本制度的知的批评主义的结果自显于意象中者。(三)意的方面,社会主义是在客观的事实界创造吾人在知的和情的意象中所已经认识的东 西的努力,就是以工人的行政代替所有权统治的最后形体的资本主义的秩序的努力。”^①社会主义是濡染了很深的情感的一种气质,一种精神的风习,简言之,是一种新型的文化。瞿秋白进而认为,无产阶级一旦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就会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劳动“只能引起快感和美感”。社会主义文明乃是人类最理想的文明,它不但是自由的世界,而且还是正义的世界;不但是正义的世界,而且还是真美的世界!这一阶段,早期共产党人把理论兴趣主要集中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文化的层面还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对古今中外文化的辩证综合还显得粗疏、笼统,缺乏深入的分析论证。他们还只能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指示大致的方向,还不可能解决先进文化发展的具体道路和方针。

^① 《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144页。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经过革命的二次挫折,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抗战的怒涛巨浪冲击和震撼了中国人的心灵,也更容易将民族危机和中国文化的危机联系起来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前途。1940 年延安创办《中国文化》杂志,毛泽东在创刊号发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回答了人们关心的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系统阐明了共产党人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具体道路和基本方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成功地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建设中华民族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发展道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观的确立,为 3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对“古今中西”文化关系的审视和认识确立了一个科学的坐标,避免了形而上学的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错误。20 世纪 50 年代初,毛泽东又总结和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在中西古今文化冲撞交汇的大背景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成就,就是确立和应用了“古今中外法”的科学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赋予了民族的形式和内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也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型,开辟了从新民主主义文化到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发展道路。新中国成立后的 30 年间,在整理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和创造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进程中取得的成就,都是将这一文化主张付诸实践的结果。

当然,文化现代化的探索是一项非常复杂而且十分艰巨的事业。从中国的文化条件看,矛盾极其突出。一方面,积淀深厚的文化传统既是实现文化转型的丰富资源,又是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另一方面,农业经济尚占主要地位的国情既是文化落后的客观原因,又是难以向现代转型的制约因素。在众多矛盾的牵制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也遭遇了某些曲折。1956 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由于党的工作重心偏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

导思想导致社会发展的扭曲。毛泽东虽然想超越马克思,谱写出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篇章,却未能如愿,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也就无法确立起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观。

1978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当代中国发生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僵化转向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遇到的动力和阻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的与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有关。对外开放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产生的冲撞,难免引起人们传统心理结构的失衡现象,产生震荡与冲击,甚至引起痛苦的裂变。人们一面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改革,一面又注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一面执著地对西方文化的探讨,一面又注重于中西文化的比较。对中国文化出路的探讨与争论,最终落在如何构建和创造与时代同步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体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继往开来的创新精神,开辟了一条切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与发展、创新辩证地统一起来,提出了我们不但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将创造出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92年,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要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到新水平。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三个“历史性课题”:一、如何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二、如何在深化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形成有利于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理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三、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商品经济的勃兴，世俗化的社会环境，深刻地影响着文化转型过程。人们关注的中心从传统文化向当代文化过渡，并探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更好地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的方式和途径，以实现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模式的转换。江泽民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即中华民族形式与社会主义内容相结合的新文化，必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揭示了中国文化建设与创新的时代任务。

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创新，必须立足于“破”与“立”的辩证结合，从理论到实践形成一种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善于创新的文化选择机制。对古今中外文化予以恰当的定位和辩证的分析，以中华民族“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和“会通以求超胜”的胸怀、气度和智慧，在文化建设中兼重时代性、民族性、世界性，以一种综合古今中西文化之长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品格，沿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这种会通、融合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的文化建设和创新机制的效应，至少应当具有这样两个标志：一是在全球化和世界文化多元的语境中，体现出中国先进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换句话说，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取决于能否在世界各种文化思潮相互激荡、激烈竞争中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能否在跨文化的交流中形成与我国五千年灿烂文明相称的地位和世界性的影响力；二是在世界文化多元化带来文化消费选择多样性的趋势下，体现出中国先进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换句话说，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成

果,能否成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文化消费所选择的主体,能否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和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第三章 五四时期文化变革 与现代化价值取向

五四时期是近现代中 社会的转型期。辛亥革命的历史性巨变引出了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发展的新话题。但是,资产阶级并没有把胜利的进行曲演奏下去。中华民国初年的社会混乱推动了文化变革的发生。一代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启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序幕。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五四时期文化变革的历史氛围,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救国救民的一面思想旗帜,不仅为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指明了道路,而且也为中国社会的文化现代化奠定了基石。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社会变革的新途径

1. 新文化运动与社会变革的文化途径

“社会改造”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一个集中话题,也是进步青年立志寻求的事业。中国社会改造的道路在经历了艰辛探索的曲折之后,知识分子进入到更深层次的思考。“文化救国”成为军事救国、经济救国、政治救国之后的新途径。

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到深的认识提升过程。鸦片战争失败后,一些中国人首先是从器具层面上观察西方,从他们的先进武器上看到了中国的落后,提出通过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来强大中国。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洋务运动终于使中国人学会了造枪炮、造兵舰,并开始寻找发达经济之路,形成“自富求强”的救国思路。但是,19 世纪末甲午

战争的重创标志着军事救国和经济救国的失败。拥有相对先进装备和较强实力的清朝海军被日本打得溃不成军的结果,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只在军事和经济上,政治制度也要学习西方。日本明治维新确立的政权设置、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法国、美国的共和制度,先后成为先进的中国人学习的榜样。从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改造进入制度变革的政治层面。从最后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收获来说,政治层面的制度变革确实取得了成功,西方近代以三权分立为准则的国家制度形式上被移用到中国。然而,中华民国初年的共和实践再一次破灭了中国人的救国理想。当中国人不仅拥有了船坚炮利,而且又拥有了议会、颁布了宪章、实行了共和之后,国家、民族却还是命运依旧。“今理想中之光复佳运,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毫末无闻,政俗且愈趋愈下,日即卑污,伤心之士,安有不痛愤欲绝,万念俱灰,以求一瞑,绝闻睹于此万恶之世也。”^①恋旧的人便责难辛亥革命搞坏了,主新者抱怨辛亥革命不彻底。认真的反思成为历史的客观要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思想界的聚焦点逐渐汇拢定格在文化问题上。

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变革总是无效的结果找到了一种解释:中国虽然经历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变革,但是包括伦理道德和其他思想观念的文化堡垒还未经触动。1916年2月,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自西方文化输入以后,中国人学术、经济和政治的觉悟都不是最后的觉悟,“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倘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②陈独秀的这个认识在当时具有代表

① 《李大钊文集》,第1卷,第47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09页。

性,很多知识分子都意识到中国社会思想陈旧的严重性。鲁迅说:“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①因此,一时间,“伦理革命”、“道德革命”的口号不绝于耳,以思想启蒙为宗旨的新文化运动也循着这样的思路蓬勃掀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将革新文化提升到救国途径来认识。他们反思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历程,觉悟到先进文化对于改造中国的至关重要性,产生了“文化救国”意识。他们掀动文化变革的浪潮,提倡白话文、开展东西方文化讨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检讨西方文化等等,以期为中国社会的前进寻找先进文化的指导。瞿秋白说他抱着解决中国问题的目的,就是想“略尽一分引导中国社会新生路的责任”,“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②李大钊认识到:“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圣人既不足依,英雄亦莫可恃,昌学之责,匹夫而已。”^③这里所说的“昌学”就是宏扬文化的意思。毛泽东认为:“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他认为,要真正改造中国,不能枝枝节节地改良,要“以大本大源为号召”。什么是本源呢?毛泽东指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④就是将文化改造作为本源来认识。陈独秀更是夸张文化的作用,他甚至说:“新文化运动要影响到别的运动上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其次也要叫他做新文化运动底朋友不是敌

① 《鲁迅全集》,第1卷,第228页。

②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8、25页。

③ 《李大钊文集》,第1卷,第92页。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同),第85、86页。

人。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做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①在陈独秀的眼里,文化的作用几乎无所不能。它不仅教育工人和感化资本家,不仅能改造政治,而且还能起到制止战争的作用。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对文化的这些认识足以表明,文化变革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改造旧文化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提高到救国救民的意义上加以认识。

2. 文化现代化在实践层面的最初展开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一些先进知识分子酝酿和开展变法革新运动中,也涉及到文化方面的改造。例如清末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小说革命”,改良派谭嗣同对“三纲五常”封建伦理的抨击以及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对儒学的批判,等等,都具有向中国传统文化挑战的意义。但是,真正切入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轨道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这场新文化运动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将文化变革推到社会前台的同时,促进了文化与现代化的连接。

从实践层面说,新文化运动展开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当时还留学国外的胡适受陈独秀之约首先点燃了这一炮。虽然胡适倡导文言改革的最初意图还拘泥在语言文字的形式上,但由语言文字的改革而导向文学的革命则是势所必然。陈独秀是进行文学革命“最重要的急先锋。”^②他十分清楚地看到语言文字的形式改革与文学内容改革的内在关系。他指出: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这不是一个自由讨论的学术原则问题,“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516页。

② 《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正也”，^①语气非常坚决，态度非常鲜明。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在陈独秀看来，语言文字作为文化的载体，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个读者写信给陈独秀说：“文字之作用，外之可以代表一国之文化，内之可以改造社会，革新思想”，陈独秀十分赞同，并称之为名言。他答复说：如果一味地“模仿古人”，“以如是陈陈相因之文体，如何能代表文化？如何能改造社会、革新思想耶？”^②这就将原先胡适提倡白话文的举动从语言文字的工具性改革上升到思想文化的境界。就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新文化运动从提倡白话文开始，很快就发展为对旧文学的总体性批判，并引发一场激烈的新旧思潮论战。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走向具有重大意义。尽管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实践还很有限，但他们对推进文化现代化的作用不容抹杀。

掀起批判孔教斗争浪潮是新文化运动中文化现代化实践的另一个表现。反对孔教的斗争，起初是为了反对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将孔子思想定为“国教”写入宪法。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出于对自由、民主、平等的理念，对统治阶级将孔子和儒学抹上宗教色彩强烈不满，遂发起对孔子和儒学的批判。李大钊发表《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等文章，指出：把孔子的思想定为“国教”，“兹乃并民族之生命、民族之思想而亦杀之”^③，“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以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④陈独秀也发表了《宪法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08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79页。

③ 《李大钊文集》，第1卷，第232页。

④ 《李大钊文集》，第1卷，第245页。

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等一系列文章，阐明“盖孔教问题不独关系宪法，且为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思想之根本问题也”，宪法上如果规定要以孔教为“修身大本”，这是“挟堂堂国宪，强全国之从同，以阻思想信仰之自由，其无理取闹，宁非奇谈！”他号召国人“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①除了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骁将之外，钱玄同、刘半农、易白沙、吴虞等人“打倒孔家店”的讨伐檄文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易白沙、吴虞数落儒学的种种罪恶，发出儒学革命的号召：“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②这样来评判孔子思想显然就具有文化审视的意义。他们一方面竭力反对将孔子及其思想宗教化，另一方面更将儒学视为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孔子思想的根源和实质，并由此而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

与批判孔子和儒学的斗争相联系，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是文化现代化实践的又一个表现。在中国，传统的礼教是封建文化在伦理道德观上的凝结。近代中国社会缓慢的发展进程中，礼教的束缚和危害早已经显露并遭到质疑和批判。但是，礼教真正受到撼动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鲁迅“礼教吃人”的呐喊震动了整个思想界，他发表的《狂人日记》等作品，将封建礼教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尤其是从批判礼教出发，鲁迅进一步从国民性的角度，对中国国民严重的奴性道德作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引起强烈反响。他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③陈独秀也揭露了礼教的封建本质，他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48页。

② 《五四运动文选》，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97页。

③ 《鲁迅全集》，第1卷，第224页。

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①呼吁进行“道德革命”。以批判礼教为中心,先进知识分子揭露所谓“仁义”的虚伪,所谓“贞德”的黑暗,所谓“孝道”的残忍,冲击封建伦理道德的斗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并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直接的效果。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人们的独立意识开始觉醒。反对包办婚姻,主张自由恋爱成为新的追求。女子出逃抗婚事件层出不穷,有的新娘甚至以自杀抗议封建婚姻制度。男女平等的现代意识由于文化变革而逐渐树立起来,新文化运动也通过对礼教的批判,显示出与文化现代化的联系。

3. “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文化意义

陈独秀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首先是在1915年9月《青年》杂志(1916年后改名《新青年》)创刊号的《敬告青年》一文中。他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里说的“人权”是“民主”的最初表述,虽然后来更多的是以“民主”一词取代“人权”,与“科学”相并列,但它却体现了陈独秀倡导民主的旨意所在。

陈独秀认为:现在只有“民主”和“科学”这两样东西可以将中国从黑暗的政治、学术、道德中救出来。他把它们看作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认为对中国社会来说缺一不可。此后,《新青年》杂志接连刊出文章,传播科学理念和民主思想。“民主”和“科学”也就成为两个时髦的术语流行起来。当时很多文章中喜欢用这两个词的英文译名,“民主”译成“德谟克拉西”,“科学”译成“赛因斯”,所以又有“德先生”和“赛先生”之称。陈独秀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德、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这就将提倡“民主”和“科学”的文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55页。

化意蕴十分透彻地表达出来,即“民主”和“科学”是包括伦理道德艺术在内的一切旧文化的对立物,提倡民主和科学就是提倡新文化。

在近代中国提倡民主,陈独秀并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围绕民主的宣传已有一些时日了。戊戌维新运动中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宪思想、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民主派宣传的“主权在民”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传播了民主的观念。但是,与陈独秀比起来,他们提倡民主更多地是服务于政治制度的变革,侧重点在社会的政治构造,而不在于国民的个体状态。这样的民主宣传缺乏思想启蒙的文化意蕴,与社会一般民众的关系并不密切。陈独秀提倡民主,直接切入国民的思想,唤醒国民个体对自身权利的觉悟,具有浓厚的思想启蒙意义。从陈独秀以及《新青年》杂志的宣传分析,他们提倡的民主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的内容上。第一是主张人格独立,个性解放。陈独秀指出:每一个人各有自主之权,既无奴役他人的权力,也无以奴隶自处的义务。“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号召人们努力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①第二是主张实行民治,启迪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陈独秀在总结以往的历史实践时认为,缺少国民参与是改良和革命屡遭失败的原因。大多数国民站在旁边取“隔岸观火”的态度,改良和革命没有不失败的。因此,必须唤醒国民的觉悟,以主人翁的态度参与国家政治。这些思想宣传使“民主”的含义紧密结合社会各个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比起前人的宣传更具有文化的渗透力。

陈独秀也不是近代中国提倡科学的第一人。从19世纪60年代搞洋务运动起,科学的传播就已经开始,声光化电一类的自然科学著作、天文地理数学几何等知识流传不少。但是,在新文化运动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03页。

之前,科学的宣传始终局限在“术”的技艺范围里,这就束缚了科学在文化意蕴上的广泛影响。陈独秀提倡科学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他解释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①这就将科学提升到一种思维方法的高度加以理解,使科学的认识突破了技艺知识的范围。他说:“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陈独秀强调:士农工商医各行都要懂科学,如果不懂科学,就只能茫然于迷信邪说,办不成任何事情。^②他指出:科学有广义和狭义区分。狭义的就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象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可见,陈独秀完全是从文化意蕴上来诠释科学的含义的,他明确主张:“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③《新青年》杂志对科学宣传,除了继续大量介绍声光化电一类的自然科学知识外,还刊登很多文章介绍了演绎、归纳等逻辑推理方法,介绍假设、求证等实验理论。这样的宣传使科学超越了“术”的技艺范围,赋予“科学”以更深刻的文化意义。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7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8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512~513页。

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论战

1. 东西方文化论战掀起的原因

从1915年起一直到1927年,知识界围绕着东西方文化问题,展开了多次讨论,吸引了大批学人和文化研究者的加入,在各种刊物和报纸上发表论文数百篇,也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争论十分激烈。这场论战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有研究者指出:“这次论战的深度,远远超过了洋务与守旧、维新与洋务、革命与立宪之争。这场论战的影响至为重大,仅就文化思想的变革而言,也是很深刻的,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上,的确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①

考察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论战,有两个突出的背景必须加以注意。第一,建立不久的中华民国呈现出的新旧矛盾和冲突十分激烈,共和新制度在中国的“水土不服”和旧制度的毁而不灭,使中华民国处于“不新不旧”、“既新既旧”的尴尬现状中。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屠杀给西方近代文明抹上了令人发怵的阴影,促使当时正浸润于欧风美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对西方近代文明进行重新审视。这两个背景使刚刚从封建帝制黑暗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又走到了十字路口。

辛亥革命一举推翻封建帝制,这是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一个标志性成就。如同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学会了西技,将船舰、枪炮、机器等东西仿造出来那样,中华民国在制度构架上又将西方近代的议会制度、投票选举、三权分立、政党政治等移植过来。毫无疑问,经受了长期封建帝制折磨的中国社会对这套陌生的制度充满憧憬,大批曾为之而奋斗的革命者更是为此而兴奋不已。但

^① 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是,中华民国创建伊始就向中国社会泼了一盆冷水。新的制度运作给人留下极坏的印象。从1912年4月至1913年9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内阁3次重组,换了3个内阁总理,内阁制度就像袁世凯的掌中玩物。议员选举乌七八糟,或是以酒、色、金钱引诱利用,或是动用军队进行武力威胁。政党政治充斥着政客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时人对此感到十分的困惑:“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①,“大至政制,微至衣履,西人用之则精神焕发,利便甚溥,而一入于吾人之手,著于吾人之身,则怪象百出,局促弗安,总呈不相配称之观。”^②南橘北枳,效果完全两样。于是,憧憬落空了,失落增强了。曾经风扫残云般地卷去皇冠的辛亥革命仅仅引起中国社会短暂的亢奋,接踵而来的是令人烦恼的迷惘和困惑。传统制度的旧躯壳仍然粘附在近代国家的新形式下,变着样子重复着昔日的举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政治生活中,皇帝虽倒而帝王观念严重,约法虽立而人治现象照旧,民主虽倡而奴性思想未除,人们还是操持着祖祖辈辈袭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样式在生活。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代,“中国革命对于社会没有多大的改变,对于守旧的人没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旧人仍能超然物外,……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③这是历史悲剧的深刻描述。它表达了时人对社会转型后分不清新旧的悲恨之情。

中华民国初年出现的制度混乱,从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是新制度与旧文化之间的冲突。当时很多人为此而感到苦恼。有人在文章中写道:“政有新政旧政,学有新学旧学,道德有所谓新道德旧

① 《鲁迅全集》,第1卷,第346页。

② 《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07页。

③ 《鲁迅全集》,第3卷,第440页。

道德,甚而至于交际酬应,亦有所谓新仪式旧仪式,上自国家,下至社会,无事无物,不呈新旧二象,……新新旧旧,杂陈吾前,吾果何所适从耶?”^①1918年5月,李大钊在《新的!旧的!》一文中指出:“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同时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②鲁迅指出:“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四面八方几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这矛盾中间,互相抱怨着过活,谁也没有好处”,以致于人们“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③中华民国初年就是在这样的新旧矛盾冲突中痛苦地挣扎。

中华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还没有从新旧矛盾冲突中得到解脱,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犹如雪上添霜,更加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紧张。曾经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当作示范楷模的西方近代文明,由于战争显示的残酷和罪恶而失去了光泽。虽然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国的输入从一开始就是与侵略和掠夺联系在一起,但这次世界大战发生在资本主义的文明国家之间,规模巨大,厮杀惨烈,大量科学技术被运用于战争火拼,人们闻之便心惊肉跳。这样的场面远比西方列强发动鸦片战争更使人感到恐惧。更

① 汪淑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9月。

② 《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189~191页。

③ 《鲁迅全集》,第1卷,第360、361和353页。

为糟糕的是,中国也被卷进了战争的漩涡,成为西方列强的陪衬。撇开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问题不谈,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欲熏心、草菅人命等等贪婪和野蛮本性,所谓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等的文明标榜一下子就被血淋淋的战争所撕破。这就极大地动摇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审美情趣。深受轻功利重伦理、以和为贵、待人以仁等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显然难以承受战争所表现的罪恶。一些知识分子心目中,西方近代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天平开始出现逆向倾斜。相比之下,有的知识分子更希望在中国传统文明中找回精神的失落,对西方近代文明指责、批判的倾向陡然升温。这种思想动向与国内共和制度的实践窘境相联系,自然引发文化价值取向取舍问题的再思考。

历史让中国社会处于两难选择之中。东方的中国仿效西方建立了共和制度,但却滞于不新不旧的困境,西方的先进国家走在世界文明前列,但又置身战争泥潭。学人家的东西学不像样已经令人烦恼,现在被学习的榜样又发生了问题。东方和西方的两种困境,使中华民国初期的中国人进退不决,思想的分歧开始出现。凝结旧传统的东方文化使一部分人厌弃,也使一些人眷恋;代表新潮流的西方文化使一部分人仰慕,也使一些人生畏。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论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中国思想界的焦点。

2. 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展开

东西方文化论战的第一个回合,发生于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段时间。论战的话题集中在讨论东西两种文化的优劣。论战的双方,一方是以陈独秀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人士,因以《新青年》为阵地,一般称为“新青年派”。另一方主要代表是杜亚泉,因当时主编《东方杂志》,被称为“东方杂志派”。

陈独秀最初亮相新文化运动,一个鲜明倾向就是讨伐中国传

统文化的滞后僵硬,主张学习西方文化。他在《青年》杂志创刊词中指出:“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并表示:“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①这里,陈独秀从世界发展的现实,提出了文化选择与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系问题,强调中国要在现代世界环境下能够生存下去,必须抛弃“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等“封建制度之遗”。《新青年》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东西方文化研究的论文发表。除了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这样的比较研究外,大量的介绍西方文化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观点很鲜明,都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落后于时代,西方文化具有近代的科学特征,认为西方文化比东方文化优越。他们普遍地将东西方文化作新旧区分,认为“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如是”,强调“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②“新青年派”的这些观点和文化倾向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挑战。

杜亚泉成为“新青年派”一个主要的论敌。他以伦父的笔名,先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等文章,阐述了与陈独秀等人不同的文化观点。《东方杂志》还刊登了《中西文明之评判》等译文,赞美中国传统文明。杜亚泉反对“新青年派”抑东扬西的文化倾向,他认为,东西方文化只表明性质上的不同,不存在程度上的差异。所谓性质上的不同,指的也只是东西方社会由于历史各不相同而产生的文化观念不一样。杜亚泉在文章中虽然也承认中国固有文明存在某些不足,并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5页。

② 汪淑潜:《新旧问题》,《青年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9月。

非一味颂扬东方文化,但对西方文化的缺点却有大量的论列和批评,并强调“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①。从基本倾向分析,杜亚泉等“东方杂志派”人物对中国传统文化保持着较浓厚的欣赏,而对近代西方文化持有较多的保留和否定。他们坚持把中国固有文明中的“君道臣节名教纲常”视为万古不变的“政治原理”,肯定其对维系社会秩序的价值功能,而把西方输入的思想视为“迷乱现代人心”的祸害,主张与西方文化保持距离。

东西方文化论战第一个回合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如何评判东西方文化的优劣。围绕这个焦点,论战双方以各自的立场为基础,分别研究和阐述了东西方文化的特征。到1919年,论战转向东西方文化能否调和问题的争论。持对立观点的双方,一方的主力依旧是“新青年派”,另一方的代表人物除杜亚泉外,还有章士钊。杜亚泉在1916年起发表的文章中就提出了调和东西方文化的主张,但当时并未成为论战焦点。1919年秋,章士钊先后在上海、广州、杭州和北京等地发表演讲,宣扬“新旧调和”、“东西方文化相融”的观点,并得到杜亚泉、陈嘉异等人的附和,产生较大社会影响。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立即发表文章,力驳“调和论”,形成了论战的第二个回合。

章士钊反对将东西方文化对立起来,对于“新青年派”的主张很不以为然,认为“动曰若者腐败当吐弃,若者陈旧当扫除”,只是“一派浮薄者之恶习”,“浅薄之观察”。在他看来,社会是在新旧调和中前进的,“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凡欲前进,必先自立于根基,旧者根基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不迎新之弊,止于不进化,不善保旧之弊,则几于自杀”,“故今日之为青年者,无论政治方面,学术或道德方面,亦尽心于调和之

^① 伦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1916年10月。

道而已。”^①章士钊这种文化折中调和倾向,虽然含有某些合理因素,但其反对“新青年派”主张的立场十分清楚。因此,在主张东西方文化可以调和时,他强调的重点是“保旧”,流露的是对东方文化的依恋情结。杜亚泉指出,东西方文化存在着调和的基础,比如西方的道德思想,“与吾东洋社会之道德思想,必大有接近之观”。原则上,他不反对学习西方文化,但目的是认同东方文化,“且吾人之所取资于西洋者,不但在输入其学说,以明确吾人固有之道德观念而已。”^②尤其是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杜亚泉认为,西方文化“与吾国固有文明之倾向渐同”。他表示,不能用新旧来区分东西方文化,从现时代来看,“则不能不以主张刷新中国固有文明贡献于世界为新,而以主张革除中国固有文明同化于西洋者为旧。”^③杜亚泉与章士钊一样,在文化折中和调和倾向背后,实际表现的也是对东方文化的倚重。

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主辩手的“新青年派”,基于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巨大落差,深切地认识到两种文明之间先进和落后的明显区别。他们认定东方文化“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④他们认定“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运命,已臻奄奄垂死之期”,主张“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⑤他们将东西方文明看作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两种文化,坚决反对两种文化可以调和的观点,断言中国社会要与世界相融合,必须采用西方的近代文化。他们指出:新的道德、新的文化是根源于新的经济基础上的,章士钊

① 章行严:《新时代之青年》,《东方杂志》第16卷第13号,1919年11月。

② 伦父:《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1917年4月。

③ 伦父:《新旧思想之折中》,《东方杂志》第16卷第9号,1919年9月。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9页。

⑤ 《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06页。

提出“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固有的好”，并主张调和两者的观点根本站不住脚。当时与陈独秀、李大钊一起批驳章、杜的还有张东荪、蒋梦麟等人。蒋梦麟在文章中直率地指明：新的文化表示着“向进化方面走”，旧的文化代表着“向旧有文化安乐窝走”，东西文化不同道，是走不到一起的^①。“新青年派”在批驳“东西文化调和论”中坚持了自己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

东西文化论战的第三个回合出现在1920年。论战的焦点转向世界文化走向的讨论。这个讨论与前两个回合争论的焦点紧密相连。无论是讨论东西方文化的优劣还是东西方文化能否调和，实质问题是一个，即如何在文化选择上作出取舍。杜亚泉、章士钊等人之所以保留浓厚的东方文化情结而对西方文化持否定的主张，一个重要因素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产生的怀疑态度。这样的怀疑态度由梁启超、梁漱溟的进一步阐述，形成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又一个焦点。

梁启超于1920年从欧洲考察回国，把他耳闻目睹的事情和感想整理出版了《欧游心影录》一书。书中突出宣传的思想是，西方国家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走进了末路，西方文明也到了尽头。梁启超认为，欧洲战场上发生灭绝人性的残杀行为，是西方物质文明所致，战争的破坏性宣告了以利益追求和利己主义为特征的西方文化的破产，主张用中国文化拯救西方文明。他写道：“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的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梁启超号召大家弘扬孔孟老子的学说，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②。同一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从学理上对世界文化作了深入

① 蒋梦麟：《何谓新思想》，《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1920年1月。

② 《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429页。

的探究。梁漱溟将世界文化分成三种不同路向的文化,阐述了它们的特征,并以欧洲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来代表这三种路向。他认为,欧洲文化代表着“意欲向前”的路向,突出的特征是讲求科学方法,尚理智,主功利而略于人事。中国文化代表着“意欲自为调和持中”的路向,突出的特征是顺乎自然,不计利害,不向前不向后,追求调和、平衡、中庸,人生哲学比较发达。印度文化代表着“意欲向后”的路向,突出的特征是寻求情志的安慰,超脱生死,宗教哲学发达。梁漱溟指出:文化判断不存在优劣好坏的区分,只有适合还是不适合。任何国家的文化都在不同的路向之间转换,欧洲文化在走上“意欲向前”的路向之前,也曾经历了中世纪神学发达的文化发展阶段。根据这样的立论,梁漱溟认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文化已经很难再坚持下去,将向中国文化的路向转换。因此,他提出要复兴儒学。这个观点与梁启超相一致,具有代表性。由于梁漱溟的文化观点具有详细的学理阐述,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报刊杂志上不断发表文章,就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展开讨论,一直延续到1927年。

第三个回合争论中,反对梁启超、梁漱溟观点的主要代表是瞿秋白。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革命实践斗争已经拉开序幕。瞿秋白延续了原先“新青年派”的思绪,就东西方文化问题参与论战。与前两个回合的争论相比,瞿秋白更为突出的特点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文化问题,见解更显深刻。论战中,瞿秋白阐述自己观点的代表作是《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在这两篇文章中,瞿秋白立足于世界革命的发展趋势,结合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和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指出:“我们决不否认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复其影响于物质的基础,社会思想往往较其经济发展落后一步,所谓历史的‘堕性律’;然而最根本的动力,始终是物质的生产关系。”这是瞿秋白论述文化问题的基本立场。他坚决反对“东方杂志派”人物的观

点,认为东方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具有宗法社会特征的东方文化“是东方民族之社会进步的障碍”,维护它是徒劳的。同时他又指出:“我们也不歌颂西方文化”,“科学文明是资产阶级的产儿,然而亦就是破毁资产阶级的起点”,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先经所谓‘民主主义’,而后重返于绝端反对民主主义的帝国主义,先经科学的文明而后重返于反对科学的市侩主义”。他不同意说梁启超等人的“科学破产论”观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只是表明“资产阶级文明的破产罢了”。^① 根据这些分析,瞿秋白主张新文化的希望在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各被压迫民族的世界革命运动,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文明”的概念,指出:“社会主义的文明,以扩张科学的范围为起点,而进于艺术的人生。”^②显然,瞿秋白已经跳出了此前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论战思路,把构建中国文化的方向定位在无产阶级新文化的高度。这无疑是认识文化现代化的一个思想突破。

3. 东西方文化论战对文化现代化的意义

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历史意义在于从文化层面上寻找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救国答案。论战中,不管是《新青年》一派人物还是《东方杂志》一派人物,虽然观点冲突对立,但宗旨都是要解决究竟用什么样的文化指导中国社会前进。从讨论的焦点问题来看,对东方文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实际表明的就是对待传统的态度;对西方文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实际表明的就是对待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因此,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发生直接与文化现代化相关联。

理论界以往的研究成果里,习惯用进步与保守的分析理路来评价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的两方,认为“新青年派”人物是进步的,“东方杂志派”人物是保守的。有的学者将陈独秀等人视为“全盘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1~24页。

^②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82页。

性的反传统主义者”，有人甚至提出五四时期是中国传统“断裂”的时代的结论。这样的评说并不全面，也不完全符合历史史实。因为事实上，“新青年派”人物虽然在批判传统的东方文化时态度确实十分激烈，但并非“全盘否定”传统，而“东方杂志派”人物虽然对东方文化有较深厚的传统情结，但也并非一概地排斥西方文化。简单地对论战两方作是或非的价值判断，无助于从文化现代化的意义上认识这场东西方文化论战的历史面貌。

“新青年派”人物在文化上的价值取向十分鲜明。他们多视角地比较东西方文化的优劣，得出西方文化胜过东方文化；他们从性质上揭示东方文化代表着传统农业社会的文明，具有过时的封建性质，而西方文化代表着工业社会的文明，呈现发展上升的近代性质。他们之所以对孔子和儒学嫉恶如仇而取坚决的批判态度，之所以对西方文化倍加赞赏而取鲜明的欢迎态度，就是基于文化取向上落后与先进的价值权衡。李大钊指出：孔子的思想之所以能够支配中国人心二千多年，就是“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这样相沿下来，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静沉沉的农村生活相照映，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现出一种死寂的现象。”^①陈独秀也承认过东方文化的历史价值，他甚至还说过“儒术孔道，非无优点”，“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这样的话。但这只是将它作为已经过时了的文明所作的肯定。一旦涉及现代的文化选择，陈独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就十分坚决。反过来说，陈独秀也并非将西方文化看得十全十美，他曾在许多文章中谈到西方文化的缺陷，比如认为西方的道德不彻底，“西洋文化我们固然不能满意”，等等。但一旦涉及中国文化取舍问题时，他的秤砣又毫不迟疑地向西方文化倾斜。这样泾渭分明的态

^① 《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2页。

度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中很普遍,有的甚至比陈独秀、李大钊更偏激。如钱玄同主张“将中国的书籍一概束之高阁”^①,傅斯年主张“极端地崇外未尝不可”等等^②。出于改造中国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失望,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持有一种矫枉过正的情绪,他们憎恨传统有过之而无不及,渴望现代则义无反顾。这样的态度难免在思维方式和论点主张上产生片面性的缺陷,形式主义比较明显。但在当时的文化价值取向上,他们的进步性应予以充分肯定。正是他们以坚决的态度和鲜明的主张,开启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序幕。

“东方杂志派”阵营比较复杂,各自的背景也不同。这个阵营的代表人物中,章士钊、梁启超两人资格老,阅历深,旧学根底也较厚。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舞台上都曾风光一时,并处于思想领先之列。梁启超曾到西方国家考察,章士钊曾游学日本和英国,对西方文化有较多的接触。杜亚泉出生于浙江绍兴,清朝末年到上海开办“亚泉学馆”,创办《亚泉杂志》,为我国最早提倡科学的期刊之一,对传播西学起过一定的作用。梁漱溟靠自学成才,先是潜心研究佛教,研究论文引起学界关注,后转向研究儒学。从“东方杂志派”这些代表人物的情况看,主要是以知识文人为背景(章士钊曾任官职)。在知识结构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入的研究是共同的特点。此外,他们中虽然有的没有到国外去过,但对西学并不陌生。他们虽然摆脱不了欣赏东方文化的情结,但对西方文化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和接纳。他们对于东方文化的欣赏,不是系于传统守旧派那种艰深的城府之见和顽固的思想壁垒,而表现为审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祸福利弊后的文化

^①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

^②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96页。

复归。因此,在论战过程中,他们的思想主张与传统意义上的守旧派有明显的区别。一般而言,“东方杂志派”的人物都不再保持守旧派那副盲目排外的脸孔,也不再死守反对变革的立场,并力求寻找创新文化的出路。杜亚泉等人在文章中反复表达一个观点,即“兼蓄并收”、“取长补短”。他们指出:“两文明之结果,其不能无流弊,盖相等也”^①,“东西洋之现代生活,皆不能认为圆满的生活;即东西洋之现代文明,皆不能许为模范的文明”,^②因此,“不必排斥欧风侈谈国粹。”^③梁漱溟说得更清楚:“我对于西方文化的优点先阐明无遗,东方文化的不行之处说个淋漓痛快,然后归折到东方文化胜过西方文化之处。”^④“东方杂志派”表达的这个观点表明,他们决不是主张回归传统,用“复古”或“守旧”来评价“东方杂志派”是不恰当的。

其实,论战中“新青年派”与“东方杂志派”在不少问题上还是有共识的,比如对东西方文化的时代属性问题、对东西方文化所谓“动”与“静”的特征概括,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利弊评价问题,都有相似的表述,认识上并无多大的差别。两派最主要的分歧集中在价值取向上。从倾向上看,“新青年派”的代表人物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出路更多地系于西方文化的移植上。他们多视角地比较东西方文化的优劣,得出西方文化胜过东方文化;他们从性质上断定东方文化代表着传统农业社会的文明,具有过时的封建性质,而西方文化代表着工业社会的文明,呈现发展上升的近代性质。他们之所以对孔子和儒学疾恶如仇而取坚决的批判态度,之所以对西方文化倍加赞赏而取鲜明的欢迎态度,就是基于文化取向上落后与

① 伦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

② 伦父:《战后东西方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

③ 伦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

④ 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

先进的价值权衡。因此,尽管“新青年派”的代表人物表现出用西方文化取代东方文化的倾向,有着绝对化和片面性的不足,但从价值取向上来说,是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而“东方杂志派”的代表人物则强调以东方文化为主体,汲取西方文化的长处,融合而成一种新文化。他们力求肯定东方文化的现代适合性,断然否定西方文化的现代价值。从当时中国社会改造的需求上说,是一种落伍的倾向。因此,尽管“东方杂志派”在某些观点上不无可取之处,有的观点上,如“新旧文化不能机械地割裂”,比“新青年派”的主张更为正确,但在现代化的价值取向上则显得落后一些。总之,应该从文化现代化的角度上认识这场持续时间很长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新青年派”与“东方杂志派”之间的思想对立与政治立场无涉,不能简单地从政治判断上对两派作是与非的历史评价。

五四时期文化变革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1. 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播的主力军,文化现代化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①五四时期文化变革的深刻历史意义在于促成了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正是这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担负起推动文化现代化的时代责任。

从1915年9月新文化运动发起到1919年5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站在社会先进潮流前面的始终是知识分子。国外有的学者曾以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作为历史线索,来划分近代中国的两代新型知识分子。其实,就知识分子嬗递交替而言,他们之间代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59页。

界线并不很清楚。从年龄上看,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陈独秀、李大钊与辛亥革命一代的知识分子相差不多。陈独秀比孙中山小 13 岁,比章太炎小 10 岁,比陈天华小 4 岁,但比邹容大 1 岁。李大钊比孙中山小 23 岁,比章太炎小 20 岁,比陈天华小 14 岁,比邹容小 8 岁。他们都出生于 19 世纪中、后期,生长环境基本是相同的,经历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且陈独秀、李大钊也都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均具有十分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信仰。因此,严格地说很难将他们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划分为两代人。当然,他们之间又确实有较大的不同。认识五四时期新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必须从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变动着眼。

进入 20 世纪以后,知识分子是在中国社会不断震荡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系列的社会变动促使知识分子的思想更新。首先,1905 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断绝了知识分子传统的仕途之路,迫使读书求学的功用发生变化。其次,清末新政的施行和民国初年教育革新的推广,使新式学堂、学校大量涌现,铁路、矿务、农学、电讯、桑蚕、医学等专门学校相继设立,天文、地理、几何、物理、算学、光学等新科目,打破了经学独统的中国传统教育设置,接受自然科学知识成为较普遍的现象。此外,西学著作的翻译出版、报刊杂志的发行流传和留学生的增多,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知识分子接受教育和吸收知识的途径,从而使知识分子的自身知识结构发生变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适逢中国社会巨大政治变革的历史机缘,必然形成其自身的特色。

五四时期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规模。据约略统计,至 1919 年五四运动时,全国受过中等教育的达 10 余万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也有数万人,留学生人数从清末新政施行开始到五四运动时达到 4 万多人。当然,在偌大一个中国,这些人数即使加在一起仍然比例很小,但它构成五四时期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基础。在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中,有的是从旧教育制度中挣脱出来的,他们

先前接受过传统的封建旧式教育,以后或是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或是留学外国,直接接受了近代文明的感染和熏陶,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有的是完全在国内新式学校中培养出来的,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有的则主要是在国外留学中成长起来的,如胡适。诚然,他们之间存在许多差别,思想倾向和后来的人生道路、前途各不相同,但是相同的社会环境和时代任务,铸造了这一代新型知识分子在某些特征上的共性。

五四时期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在思想文化上表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第一,掌握了新的知识,具有崭新的观念。教育形式和内容变化,知识结构的更新,必然导致旧的价值观念的失范。确立新的价值取向,形成新的人生坐标,成为新型知识分子寻求发展的动力。第二,不囿旧说,不畏强权,藐视权威,敢于向传统挑战。新型知识分子追求探寻真理,具有“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理念”的勇气。他们不安于现状,主张改造社会,汰旧取新,力求找到新的出路。第三,眼界比较开阔,思想活跃,对新思想、新文化反应敏捷,善于接受新事物。第四,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救国救民的责任感,并且将实现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与文化的执著追求结合起来,充当唤醒国民觉悟的先锋。这些特征明显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知识分子以及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知识分子不同。也正是这些特征决定了五四时期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现代化倾向。

2. 先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转变

五四时期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伴随着一场深刻的世界观转变。中国革命在五四运动后完成了政治形态的转型,即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与此相应,文化上的转型则表现为一批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转变。世界观的转变既决定了知识分子政治立场的变化,同样也是知识分子转型的文化现象。

在五四运动之前,先进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构成是以资产阶级

思想文化作为主体。其主要内容包括:18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议会和政党等政治思想、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和进化论思想等等。这些以西方近代文明为范本的文化认同,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相一致,成为主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识社会,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世界观。尤其是19世纪末,通过严复翻译《天演论》介绍到中国的进化论思想,更是风靡一时。许多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进化论思想的影响,鲁迅等先进知识分子也以进化论的价值观分析和认识问题。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核心的世界观支配着整个先进思想界,它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和习惯相对立,显示了其进步性。但是,一方面,随着中华民国初年暴露的问题以及中国社会前途的迷茫,民主共和的理想逐渐破灭;另一方面,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传播中一些崭新的观点引起先进知识分子的兴趣,原先的世界观受到动摇,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了一次思想转变的经历。

资产阶级文化的动摇在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上有明显的反映。1917年5月,陈独秀指出:“鄙人对于我国现在情形,总觉得共和国体,有无再经一次变动,却不能无疑”,“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社会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也没有。”^①李大钊对资产阶级的代议制度持怀疑的态度,他说:“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②瞿秋白指出:“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自由、平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05页。

② 《李大钊文集》,第1卷,第159页。

等、民权的口头禅“也就为人所厌闻”^①。青年毛泽东也认定：“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②这些认识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他们对西方文化兴趣的衰退。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资产阶级文化难以救世的软弱促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转变大致可以划分为4种类型。第一种是一些具有明确和坚定信仰的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这一类型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特征是，在实现转变之前，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民主主义世界观，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原先有着执著的追求。他们的转变表现为放弃一种世界观而转向接受另外一种世界观。第二种是立足于国内探索中国社会改造道路的青年知识分子，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等人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这一类型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特征是，世界观正处于形成的过程中，原先并没有形成固定的信仰，是在接触各种新思想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思想的吸取、比较，最后走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是在国外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留学人士，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这一类型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特征是，在国外留学过程中接触马克思主义并建立起信仰，理论基础扎实，视野比较开阔。第四种是民主革命的积极实践者，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人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这一类型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特征是，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并非有明确的和坚定的民主主义世界观，但却投身于民主革命的实践并在实践中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从而形成新的世界观。4种类型的划分不是绝对的，他们之间有交叉，如陈独秀、李大钊都曾留过学，蔡

① 《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3、26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6页。

和森、周恩来、瞿秋白等人也在国内探索过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但还是可以从他们的主要特征上看到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区别。进行这样的类型区分,有助于认识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现象。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殊途同归,最后都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

从文化形态上分析,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实质内容是从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从具体内容看,表现为抽象人性观、民主观、进化论、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自由平等说,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说等所取代。毛泽东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①这里所说的“宇宙观”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这种新的世界观指导下,先进知识分子才萌发了初步的共产主义觉悟。他们学会了从经济基础的变动认识思想文化革命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学会了分析社会阶级地位和状况的科学方法,掌握了武装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从实际表现看,先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转变导致中国革命目标、方法和路径的改变。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国目标被抛弃,依靠阶级革命的方法被采用,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径被仿效。历史实践表明,中国革命之所以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面貌焕然一新,首先是因为现代世界观的树立。“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并使之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②,从而使革命的胜利有了保证。因此,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转变,具有深刻的现代意义,它是文化变革的一个重大成果。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关联,正是从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时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

先进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转变是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中的一桩大事。

3. 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想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先进知识分子对文化现代化的认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前人相比较,他们无论在认识文化的社会功能方面,还是在把握文化的发展趋势方面,都要深刻得多。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思想,既展现了中国社会发展对文化更新的客观需要,又代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对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把握。

第一,立足时代的发展审视文化的价值意义,树立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观念。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文化与社会进步的内在联系。他们指出:“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①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先进知识分子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观念便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李大钊、陈独秀在文章中突出地强调了一个重要思想:思想文化的变动是物质变动的必然结果。李大钊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就是代表作。他阐述说:“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因此,“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②。陈独秀也指出:唯物史观“重视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现象之存在,惟只承认他们都是经济的基础上面之建筑物,”他还形象地比喻文化等这些“心的现象”只是“经济的儿子”^③。以这样的立论作为基础,先进知识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428页。

② 《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0页、147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377、379页。

分子树立了以先进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的观念,他们认为,无论提倡哪一种文化,应该“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①。这个鲜明的认识提高了先进知识分子从事先进文化建设的自觉性。

第二,力求从世界的整体性来思考中国文化的重新建构,倡导汲取人类的先进文化。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在封闭状态下演化的。长时期的对外封闭导致了中国社会夜郎自大式的傲慢心态,关起门来称老大,拒绝接受任何外来先进的东西,文化始终缺乏参照系的比较而陷于毫无创造的自我循环。鸦片战争后,虽然一部分中国人倡导学习外国,但文化优越感始终束缚着社会进步的步伐。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文化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就是在世界先进文化潮流的洗礼下,强调建构中国文化的开放意识。陈独秀指出:“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②他认为,文化的选择也应该从世界的角度来考虑。“其实人类之文化是整个的,只有时间上进化迟速,没有空间上地域异同。”^③李大钊认为:“由今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我们所要求的新道德,就是适应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之道德。”^④瞿秋白认为:世界上各种文化是相通的,“中国受文化上的封锁三千多年,如今正是跨入国际舞台的时候,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56页。

②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6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第402页。

④ 《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16页。

非亟亟开豁世界观不可。”^①这些认识体现了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具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和融合世界的现代文化意识。

第三,努力剔除封建迷信的遗质,主张文化必须建立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基础上。二千余年封建历史的积淀,在中国文化传统上凝结的一个顽症就是抹杀自我。压制个性自由、埋没人格独立的极权专制,生产的是精神依赖、迷信神威、听命盲从的文化因子。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封建文化发起了猛烈的批判:“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哪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哪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②他们竭力主张把科学作为文化建构的基础。瞿秋白指出:“只有真正的道德,真正的科学是颠覆东方文化之恶性的利器。”^③李大钊强调:“启发科学的精神以索真理”,“一切事物,无论其于遗传之习惯若何神圣,不惮加以验察而寻其真,彼能自示其优良者,即直取之以施于用。”^④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先进知识分子将批判封建文化与推崇科学相联系,最早揭示出使科学精神融入文化建设的现代化发展方向。

第四,以能否满足民众的普遍需要作为文化取舍的标准,强调文化的大众性。文化是社会文明的结晶,人民群众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应当是文化的享受者。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化形成一个悖谬的过程。创造文化的人民群众长期被封建统治阶级剥夺了文化享受的权利,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不仅成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群众的工具,而且也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品。陈独秀愤慨地指出:“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

①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卷)》,第2卷,第11页。

② 《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141页。

③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第23页。

④ 《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08页。

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主张使文化摆脱统治阶级专利品的局面^①。先进知识分子倡导白话文和文学革命,出发点就是要打破统治阶级对文化的垄断。他们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我书我口”,目的就是为了使更多的民众能够读书看报。他们批判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提倡写实主义,更多地去反映社会现实问题,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初步树立了文化的大众意识,为打通文化与下层人民群众的联系作出了努力。

第五,坚持把创新与文化的建构相联系,引导文化朝新的方向拓展。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决定了它是一个创新的时代,创新时代呼唤创新的思想。先进知识分子自觉地将创新意识融入到对文化的认识上。李大钊指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他崇尚创新,认为“文明之人,务使其环境听命于我,不使其我奴隶于环境。太上创造,其次改造,其次顺应而已”。因此,他号召“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②。陈独秀称:“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③,“盖人类生活之特色,乃在创造文明耳”^④,因此,他十分明确地强调:“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方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55页。

② 《李大钊文集》,第2卷,第250、191页。

③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75页。

④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01页。

才有创造的余地。”^①这样的文化创新思想构成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探寻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4.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文化意蕴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作为新兴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组织,它的诞生,不仅影响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局面,而且也对文化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从文化现代化的视角认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组织登上历史舞台,也是以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理性力量亮相中国社会的。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中国先进文化发展进程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于五四时期,而五四时期正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变动最剧烈的时期。在此之前,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是以近代资产阶级文明为核心的西学。毛泽东说,那时的西学与旧的中国文化相比较就是新学,它“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②。这一论述肯定了西学相对于中国封建思想的先进性质。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输入的西学成为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变革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一直到20世纪初年,欧风美雨始终成为激荡中国前进发展的动力。尽管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并没有为中国社会成功地创造出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但其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性质则毋庸置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也正是在经历了资产阶级文化“败下阵来”的结局以后,才尝试去迎接一种新的替代文化。五四时期文化变革的实践表明,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发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51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6~697页。

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其实质即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消退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登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色的世界!”李大钊热情洋溢的呼喊,意味着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迈过资产阶级文化的门槛,向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文化变革氛围中诞生,正是适应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新要求。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先进性质是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相一致的。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国内大大小小的政党有数十个,国民党是其中的一个大党,其他还有什么中华革命党、进步党、社会党等等,不一而足。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这些政党无不热衷于权利之争,全然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就如陈独秀所说:“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①。这些政党无论其是否进步,也无论其是否取得过成绩,最后都一个个垮台,或者虽然存在也不能代表中国社会的进步方向。为什么呢?原因当然涉及很多方面。缺乏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思想纲领,是这些政党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必然瞻前顾后,难以制订有效的奋斗目标,因而必然缺乏明确的文化纲领。即使像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这样的政党性组织,虽然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指导,但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造成了其在文化思想上的软弱,在批判封建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不彻底特征。中国共产党的脱颖而出,就在于它以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在政党面目上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不仅表现为与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紧密相联、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息息相关,而且也表现为它是站在时代前列,引导中

^①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04页。

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不断前进的核心。就文化而言，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一方面成立出版社，印刷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著作，并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批判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另一方面又深入工厂，创办工人或平民夜校，为工人群众补习文化，传播知识。这些初步的活动，在建党初期的紧张实践中尽管不那么起眼，但却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含义。后来毛泽东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其基本内容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的这些活动中已见端倪。因此，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的内在要求相吻合，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创建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知识分子努力实践中国先进文化的结果。最先从事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这就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文化有着直接的相联。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一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都是活跃在文化战线上的积极分子。从两个主要的创建者陈独秀和李大钊，到毛泽东、李达、李汉俊、恽代英、肖楚女、瞿秋白等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都是以文化人的身份参与了建党活动，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文化底蕴。需要指出的是，只有当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事实发生以后，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有了实质性的体现。研究建党前后的历史不难发现，那时具有反封建思想的知识分子有一大批，有志于新文化的积极分子组成了一个阵营。但是，不能说所有这些人都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他们中有自觉把握前进方向的坚定者，有赶时髦的搭车人，也有心血来潮的过路客。这种复杂的情况就造成了后来新文化阵营分化的事实。而这个阵营中的坚定者，也决不是代表其个人来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无论是陈独秀、李大钊或是毛泽东等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他们的先进文化观不只是显示着他们的个人价值，更显示出时代进步的社会意义。回过头去看，一批自觉把握中

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坚定者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骨干，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单个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力量是微薄的，坚固的组织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具有引导社会的强劲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使先进的政党组织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呈现有机的统一。

从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看，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自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在中国树起以后，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就纳入了新的轨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无疑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也开始了现代化的新的里程。

第四章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 的左翼革命文化运动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左翼革命文化运动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大旗,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新文学创作和批评、开展革命文化活动,把“五四”所开创的以反帝反封建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在残酷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左翼革命文化运动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密不可分的。中共始终重视对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无论是在组织上、政治上,还是思想上,始终把握着左翼革命文化运动发展的脉搏,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并在坚持革命的宗旨下,推进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文化斗争的动向与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缘起

1.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文化斗争的态势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中国社会,经历了 1927 年的政治剧烈变动后,一直处于动荡不宁的环境中。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基地在位踞南京不远的上海。为什么能在反革命统治的中心地带形成一场革命文化的风暴?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上海不但是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而且以各种优势显示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自上海开埠以来,在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迁中,上海曾经在文化发展的各个层面占据着

全国的中心地位。上海是传播西学的中心。在 19 世纪后半叶,中国有 10 个较为著名的译书机构,其中 7 家在上海。上海是全国的出版中心。全国第一流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开明书店等大都集中在上海福州路、河南路、汉口路一带,成为全国闻名的“文化街”。上海是全国的报刊中心。20 世纪初,上海新崛起的《国民日报》、《中外日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民立报》等风行海内外。从 1899 年到 1911 年,全国共有 224 种中文刊物,除去在海外出的 61 种外,在国内出的 169 种中,上海办的达 69 种,占 41.8%。上海是全国的教育中心。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南洋公学、徐汇中学、上海中学等一批全国知名的大学、中学都汇集在上海。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还合作创办了上海大学。上海还是全国的文学创作中心、戏剧中心、绘画中心、新兴文化娱乐中心……任何一种戏剧、绘画形式、新兴文化娱乐形式,要想在国内打响,必须先在上海打响,要想推广到全国,必须先在上海站稳脚跟。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上海,尽管处在严重的政治高压之下,但并没有冲击到它的文化中心地位。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源,包括各类专业机构、出版发行条件、文化氛围以及人才集聚等等,仍继续着功能的发挥。

非但如此,上海还凭借着它“国中之国”的特殊权势分配——租界,为中国弱势力的生存提供了政治空间,成为白色恐怖中全国各地文化精英的避难地。首先,鲁迅、胡适、沈从文等五四运动时的新文化精英知识分子离开北京南下,最终都选择了上海作为落脚地。其次,一批原先投身政治斗争的革命文化工作者如郭沫若、沈雁冰、蒋光慈等,在经历了政治斗争的急剧震荡以后,从北伐前线退回上海。此外,李初梨、成仿吾、沈端先等在日本留学的文化人士也陆续归来,居留于沪滨。东北沦陷区的萧军、萧红等,四川的沙汀、艾芜等文学青年也在这一时期不约而同地流落到上海。可以说,当时中国第一流水平的文化精英都汇聚到了上海。他们

在这里展开各自的文化活动,为本来就五彩缤纷、纷繁复杂的上海文坛带来了进一步活跃的新元素,使左翼革命文化运动得以在上海树起旗帜并逐渐成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文化运动的主流。

左翼革命文化运动还是一种国际现象,20世纪30年代初左翼革命文化运动与国际左翼革命文化运动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20年代末,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张。从国际背景来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主张实际就是苏联“拉普”文学的移植。“拉普”即“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简称,它的一个基本主张就是将文学视为“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物”。日本也受苏联的影响,成立“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创造社、太阳社的成员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本留学生,也有个别是留苏归来的。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主张明显来源于留学期间受到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初左翼革命文化运动在上海的兴起,也与五四以来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但是正当革命者的热情充分燃烧起来的时候,革命却突然被流氓和强权所阉割,目睹那些曾亲密无间的战友一个个被残忍杀害,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们还来不及缓过气来,就被迫转入逃亡状态。革命陷入低潮,五四期间曾经炙手可热的人性解放的主题在这时显得文不对题、不合时势。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们怀着对豪绅买办、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和屠杀同盟者的强烈义愤,在彷徨中寻找新的武器。恰在此时,太阳社、后期创造社成员从日本携来了崭新的国际流行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那鲜明而又简单的口号、粗暴但却革命的批评,正中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心意。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到了政治环境突然改变,革命遭了挫折,阶级的分化非常明显,国民党以‘清党’之名,大戮共产党及革命群众,而死剩的青年们再入于被迫压的境遇,于是革命文学

在上海这才有了强烈的活动。”^①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们“在文学界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这个新的口号(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引者)”,“犹如在白色包围的环境中树起一杆鲜艳的红旗,振奋了人心,鼓舞了斗志,指出了前进的方向”^②。他们凭借一股革命的余热,试图继续在文化领域宣泄自己的激情。他们仍然冲冲杀杀,为了树起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提出要打倒“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学士和老爷们的文学”,并把矛头指向了鲁迅、郁达夫、叶圣陶等卓有成就的作家,挑起了1928年到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这场文学论争虽然掺杂着情绪化的急躁,但却是后来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预演。

2.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的发生

太阳社于1928年1月1日在上海成立。发起人为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杨邨人。参加太阳社的成员有林伯修(杜国庠)、洪灵菲、楼适夷、殷夫、李平心等人。创造社则从20年代初就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经历过1927年的政治变动后,它不仅没有消沉下去,反而因新生力量的加盟而得到壮大。经过成仿吾的努力,又一批留日青年启程回国投身上海的文化工作,他们中有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铁声以及王学文、沈起予等,加盟后的他们成为后期创造社的一支生力军。1928年1月,蒋光慈、钱杏邨等主持的太阳社机关刊物《太阳》月刊创刊。紧接着,由冯乃超、李初梨等创造社新成员主持的《文化批判》创刊,原创造社出版的《创造》月刊则进行了“突变”,封面设计由裸体人像改成了劳动者打铁的画面。这些刊物一亮相就旗帜鲜明地宣布:“个人主义的文艺老早过去了”,“代替他们而起的”将是“无产阶级的文艺”。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303~304页。

②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1928年2月1日,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上发表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在上海文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标志着革命文学运动揭开了序幕。成仿吾在该文中提出:“我们今后的文学运动应该为进一步的前进,前进一步,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①。这里的意思就是要超越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使文学与革命直接挂钩,要为文学注入鲜明的阶级意识,“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服务对象”^②。李初梨直截了当地指出:革命文学必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是“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文学”。^③由此,一场阶级色彩十分浓郁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在上海展开了。

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的主张立即得到太阳社的呼应。蒋光慈、钱杏邨、孟超等人在《太阳月刊》、《海风周报》、《新流月刊》等刊物上纷纷发表文章,阐述类似的主张。蒋光慈发表的《关于革命文学》一文末尾,以口号式的行文提出:“革命文学是以被压迫的群众做出发点的文学!”“革命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具有反抗一切旧势力的精神!”“革命文学是反对个人主义的文学!”“革命文学是要认识现代的生活,而指示出一条改造社会的新路径!”^④像这样赋予文学以革命使命的认识,在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中具有普遍性。他们纷纷从多方面阐述文学是上层建筑、是阶级斗争的武器的观点。李初梨一再强调“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时常故意地是宣传”,“文学,是

①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下同),第21页。

②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第21页。

③ 李初梨:《怎样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

④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第2号,1928年2月1日。

生活意志的表现。文学,有它的社会根据——阶级的背景。文学,有它的组织机能,——一个阶级的武器”。所谓无产阶级文学,就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因此,从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作家们必须“干干净净地把从来他所有的一切布尔乔亚德沃罗基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着无产阶级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同时“把他把握着的理论,与他的实践统一起来”^①。蒋光慈也旗帜鲜明地分析了文艺与经济基础和阶级背景之间的紧密联系:“一个作家,一定脱离不了社会的关系,在这一种社会关系中,他一定有他的经济的、阶级的、政治的地位——在无形中,他受这一地位的关系之支配,而养成了一种阶级的心理,也许作家完全觉悟不到这一层,也许他自以为超乎一切,不受什么物质利益的束缚,但是在社会的关系上,他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总是某一个社会集团的代表。”^②这些带有鲜明革命倾向的文学观点虽然刻上某些“左”倾的特征,表现出一定的稚嫩性,但在漆黑沉闷的政治环境下仍然焕发着坚持革命的生气,展现出咄咄逼人的战斗锋芒。

当时已到上海蛰居的鲁迅,思想上已经形成鲜明的阶级分析意识,但是他并不赞成将一切文学与阶级斗争直接划等号的简单化观点,对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也有看法。这样的看法分歧本来也无大碍,但糟糕的事情在于,创造社和太阳社在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否定了五四以来许多进步文学思想和文学家,并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标准,对包括鲁迅在内的进步作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其中最具有影响的便是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他在文中把叶圣陶描写为

① 李初梨:《怎样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

②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第2期,1928年2月。

“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笔尖只涂抹着灰色的“幻灭的悲哀”，“反映着负担没落的运命的社会”，表现出“非革命的倾向”。而鲁迅，则“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用圆熟的手法，反映着“社会变革期中落伍者的悲哀”。至于郁达夫，尽管申诉了一般青年的愁苦和贫穷，但“他对于社会的态度与上述二人没有差别。”^①钱杏邨也在《死去了的阿 Q 时代》中明确宣布：“无论鲁迅著作的量增加到任何地步，无论一部分读者对鲁迅是怎样的崇拜，无论《阿 Q 正传》中的造句是如何的俏皮刻毒，在事实上看来，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他的著作内含的思想，也不足以代表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除去在《狂人日记》里表现了一点对于礼教的怀疑，除去幸福的家庭表现了一点青年的活性，除去孤独者风波表现了一点时间背景而外，大多数是没有现代的意味！不仅没有时代思想下所产生的小说，抑且没有能代表时代的人物！”^②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对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化名流发起批判，显然不是个人之间的成见所致，实际上是对五四时代文学价值的否定。

对于创造社、太阳社明显错误或有严重缺陷的文艺观点，以及他们写下的自称为普罗文学的作品，鲁迅、郁达夫认为很难保持沉默而不去应对。尤其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体察，他对于历史、社会和文艺状况，早就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和深切的了解。况且对于革命和文艺的关系问题，他自五四以来就一直在潜心思考。鲁迅深刻地认识到创造社、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的某些观点深受“左”倾错误的影响，是“左”倾错误在文艺生活中的表现。于是鲁迅在 1928 年写下了《“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文学的阶级性》等文章，应对创造社、太阳社成员投

① 《文化批判》创刊号，1928 年 2 月 5 日。

②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 2 册，第 46、48 页。

过来的矛。他在文中尖锐指出：“中国的批评界怎样的趋势，我却不大了然，也不很注意就耳目所及……有的说要真正，有的说要斗争，有的说要超时代，有的躲在人背后说几句短短的冷话。还有，是自己摆着文艺批评家的架子，而憎恶别人的鼓吹了创作，“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这样的“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说到底，“招牌是挂了，却只是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①对于创造社、太阳社成员片面地解释文艺的宣传作用而丢弃文艺的基本特征的思想观点，鲁迅明确提出：“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②至于文学的阶级性，认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所以不相信有一切超乎阶级，文章如日月的永久的大文豪，也不相信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家。”^③在反驳的同时，鲁迅也继续阐发了他一向坚持的观点。那就是作家必须丢掉种种营造于书斋的幻想，到实际社会工作中去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样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才能根植于现实的土壤。同时，希望有切实本领的人，来翻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鲁迅对于创造社和太阳社激进青年们的莽撞确实十分不满，他热切地希望澄清文学认识上的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83、85页。

② 《鲁迅全集》，第4卷，第85页。

③ 《鲁迅全集》，第4卷，第127页。

以引导文化走上发展的正轨。其实,就坚持文学的革命方向这一根本问题而言,争论的双方并无实质性的分歧。但这场革命文学之争伤害了论战双方的感情,留下了日后难以弥合的罅隙。

3. 平息论争:左翼革命文化战线的组建

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密切关注着上海孕育着的文化运动。对于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等人之间发生的争论感到不安,并指示从有利于革命团结出发,停止争论。1929年底,在中共领导人的协调下,论战双方终于平息论争,握手言和,并联合筹备成立文化团体,以期共同投入革命文化运动的战斗之中。

1930年3月2日下午2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上海宴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出席大会的盟员约40余人。^①大会首先推举鲁迅、夏衍、钱杏邨等3人组成主席团。然后,由冯乃超报告筹备经过,郑伯奇对左联纲领作说明。接着由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致祝词。鲁迅、彭康、阳翰笙相继发表了讲话。大会推选夏衍、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7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又称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还通过了设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组织机构,创刊联盟机关杂志《世界文化》,加强与各革命团体的密切联系,参加工农教育,组织自由大同盟分会,与国际左翼文艺团体建立联系等17项提案;并成立了组织部、宣传部、编辑部,具体负责开展左联的各项工作。一个革命文化团体由此诞生,20世纪30年代初的文化革命也由于这个文化团体的诞生

^① 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第1卷第3期上发表的出席名单只有30人。据丁景唐先生考证断定,这30人当为发起人的部分名单,其中有列入名单而当天并未参加会议的,如郁达夫、蒋光慈;有一些人实际出席会议但因政治原因不便列名的,如潘漠华、童长荣等。一般认为左联发起者应为50余人,而当天到会的为40余人。

而掀起。

在左联的推动下,同年5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也秘密成立,出席成立大会的有宁敦伍、邓初民、吴黎平、钱铁如、熊得山、柳岛生、杨贤江、林伯修、朱镜我、蔡泳裳、王学文、董绍明等30余人(当时参加社联的盟员已达40多人)。不久,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简称记联)、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简称教联)也相继成立。到1933年3月后,左翼电影小组、左翼音乐小组又先后组成。为了把这些进步文化力量集结在中共的统一领导下,1930年10月,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成立,各联都隶属于文总。左翼文化各团体的建立,标志着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兴起。

左翼文化各团体成立后,各联盟员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各自的行动纲领,有组织、有策略地展开了各种富有意义的活动。他们大量译介传播马列主义的文艺思想、社会科学知识及其他各种先进思潮、理论、作品等,系统宣传和普及马列主义,给社会科学工作者带来了观察社会问题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角度。他们创办各种刊物,派遣盟员进入电影界,千方百计开展戏剧运动,开创、占领言论、电影、戏剧等各种文化阵地,利用这些舞台来发表革命文学作品,宣传革命主张,揭露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和恐怖统治。他们密切注意联系广大进步青年,组织并帮助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带领进步青年在实践活动中锻炼,有目的地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后继骨干力量。他们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论战,批驳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观点。他们还努力与国际左翼文化力量开展革命文化交流活动,如将左联五烈士的牺牲、左联后期所遭受的严重迫害等情况及时介绍到世界上去,如组织声援日本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活动等。左翼革命文化团体的这些活动在20世纪30

年代中国文坛上占据了主流地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这场左翼革命文化运动以其较大的规模和独特的时代内容,留下了它的深深烙印。

中国共产党对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

1. 中国共产党对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组织领导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革命文化运动始终处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之下。党设立了专门的文化领导机构分管左翼革命文化运动。从中央宣传部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再到各个左翼文化团体的党团,从上至下,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系统。即使在中共党组织机构和文化领导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文委”在经过短暂的隐蔽后不久就进行了重建,使党对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组织领导基本没有出现间断。

为了加强党对文化战线的领导,党中央和江苏省委采取了一系列组织措施。早在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中就规定:中央宣传部建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务是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根据此项规定,1929年10月,中央宣传部在上海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首任书记为潘汉年。此后,朱镜我、祝伯英、冯雪峰、阳翰笙都曾担任过“文委”书记。但由于国民党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和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中共党组织机构和文化领导机关几次遭到破坏。1935年2月19日,中共上海中央局机关和其他一些机关遭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中央组织部何成湘、中央宣传部朱镜我、中央秘书处张唯一、中央文委阳翰笙、田汉、林伯修、许涤新等36人同时被捕。^①这样,“文

^① 《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1919—1949)》,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80页。

委”五个成员中,只剩下周扬和夏衍幸免于难。他们决定暂时隐蔽一段时间。1935年夏,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周扬、章汉夫、钱亦石等人研究后决定重新组建“文委”临时领导机构,领导和组织群众的爱国运动,恢复和调整左翼革命文化运动。这个“文委”的主要工作时间为1935年夏至1936年2月,是临时性组织,为了与以前的“文委”相区别,称“新文委”,由周扬担任书记,其他参加工作的人员先后还有章汉夫、胡乔木、夏衍、吴敏、钱亦石、钱俊瑞、邓洁等。“新文委”的工作,周扬负责总体工作,同时兼任左联党团书记,章汉夫协助钱亦石领导“社联”及其所属团体,夏衍依旧分管电影、戏剧、音乐等领域。除了领导“文总”的工作外,“新文委”还担负着上层的联络工作,如参加“苏联之友社”的活动等等^①。中共这一完整的文化组织系统是左翼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保障。

左联、社联、美联、剧联等左翼文化团体正是在“文委”的领导下先后建立起来的。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各团体内都设立了中共党团。左联成立时就设有中共党团。历任党团书记为:潘汉年、冯乃超、阳翰笙、冯雪峰、钱杏邨、耶林、丁玲、周扬。同时,左联还是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一个支部,常驻代表为萧三。左联成立后组织规模不断扩大。除上海总部外,北平、天津、广州、南京、武汉、东京等地都设立了分盟或支部,盟员也由最初的50余人增至400余人。1932年,鉴于形势的变化及实际工作和组织上存在的缺点,左联进行了改组。秘书处仍由书记、组织、宣传3人组成,受文总和左联执委会领导,负责落实执行各项工作。下设沪东、沪西、闸北、法南(法租界和南部)4个区,各区配有区委书记,区下面再设立小组。秘书处下还设有3个委员会:创作批评委员会(创委)、大众文艺委员会(众委)和国际联络委员会(联委)。此外,左联在发展过程中还成立了一些外围团体,如文

^① 孔海珠:《左翼·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下同),第46~48页。

研会、中国诗歌会等青年文艺研究团体。

社联也设立了党团组织。第一任党团书记由朱镜我担任,党团成员有潘梓年、彭康、杜国庠和王学文,吴黎平代表中央宣传部参加社联的工作,李一氓也代表中央在社联工作。以后历任社联党团书记的有:王学文、张庆孚、沈志远、郑彰群(张启夫)、杜国庠、史存直、许涤新、马纯古、陈开泰、胡乔木等。由于社联对加盟的会员素质有明确的要求,规定“须具有相当的社会科学素养”,能够写文章、翻译和讲课^①。因此,参加社联的大多是些较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都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理论文章,出版研究著作或译著,并有不少是大学里讲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其中很多人是中共党员,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马克思主义知识。

其余各左翼文化团体也都设有党团,领导团体活动。美联成立时由于成员大多不是中共党员,开始时并没有建立中共党团,至1932年3月才成立党团,于海任书记。教联也设立党团,刘季平为第一任书记。刘被捕后,由帅昌书负责。领导成员先后有徐明清、张敬人、王洞若、郑伯克等。1933年8月,党的音乐小组成立,由萧之亮、聂耳、张曙、任光、吕骥、安娥、王为一组成。由文委委员田汉直接领导。1933年3月,夏衍、钱杏邨、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正式成立党的电影小组,夏衍任组长。1930年10月成立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负责具体领导各左翼文化联盟的活动。“文总”也设立了党团组织。1935年夏后,“文总”的党团书记由胡乔木担任。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左翼文化大军便纳入了党的组织领导之下。

2. 中国共产党对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政治领导

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革命文化运动自始至终都受到中共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和党的高层负责同志的关心。从左翼革命文化战

^① 《新思想月刊》第7号,1930年7月1日。

线的队伍组建,政策导向、行动准则的制定,到很多具体工作,包括最后根据形势解散队伍、转变方针、组织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等,党的介入都非常具体和深入。

20年代末上海聚集了各路文化精英。除了政治形势迫使的原因外,其中几批人的到来并非都是自己个人的决定而作出的选择,而是党组织的指示和安排。首先,那些从“北伐前线”回转来的文化斗士,都是奉党组织的命令来沪工作的。如1927年初在北伐军前方总政治部主持编辑《革命军日报》的潘汉年,“四一二”事变前夜回到上海,旋即组织上又决定让他回武汉总政治部。汪精卫叛变后,他随郭沫若、李一氓等赴九江,在张发奎部第四路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八一’起义前,被派回上海,为郭沫若安置家属留沪工作。”^①钱杏邨、蒋光慈、孟超、杨邨人等几位原在武汉的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据钱杏邨回忆,汪精卫叛变后,是“党叫我们分头去上海。”^②第二,郭沫若、李一氓、阳翰笙、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等人是从八一南昌起义部队中分流到上海的,据阳翰笙回忆,是当时的前委负责人周恩来指示把他们送到了上海,并指示郭沫若“在创造社中加强党的力量,多调些人去,把党的组织发展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③另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28年4月底,周恩来还“约见阳翰笙,派他和李一氓到创造社工作,充实和发展这块阵地,开展文艺战线的革命斗争。”^④第三,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等人都是从日本回国的进步青年。据冯乃超

① 《潘汉年自传》,摘自中央档案馆,转引自余信红《关于中共领导“左联”成立问题考证》,《长白学刊》1997年第3期。

② 《阿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③ 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第60~63页。

④ 《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179页。

回忆：“我们刚从日本回来不久，李立三就通过潘汉年和我们接触，并且找我们去谈话。”^①李一氓回忆：“处在革命低潮的时候，他们反而抱着饱满的革命热情，想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不久，周恩来同志接见了他们，鼓励他们为革命事业而奋斗。”^②这表明，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的冯乃超等人在大革命失败后回国参加革命的文化战线，也是与中共的影响分不开的。

在创造社内加强党的力量，把党的组织发展起来，是在中共领导下完成的。太阳社也是在党的领导下成立的。太阳社成立之前，蒋光慈和钱杏邨曾多次向瞿秋白汇报并得到了他的支持。瞿秋白还应蒋光慈邀请同意参加太阳社并“亲加指导”。太阳社成立的那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罗绮园，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均出席会议^③。太阳社的成员蒋光慈、钱杏邨、孟超、杨邨人、楼建南、刘一梦、冯宪章、殷夫、祝秀侠、洪灵菲、戴平万等 20 多人，全是共产党员。他们组成了一个支部，分为两个党小组，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党的文学组织”。可见，在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后，转移阵地到上海开辟文化战线其实是中共党组织的安排。

平息革命文学论争，重组革命文化队伍也是在中共党组织的密切指导下进行的。“在 1928 年中共六大前，周恩来已发现上海进步文化阵营出现某些裂痕，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论战。回国后从潘汉年和冯雪峰处了解到矛盾有新发展，决心解决

① 冯乃超：《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新文学史料》1986 年第 3 期。

② 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 114 页。

③ 《阿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 1 期；另见汪钩《关于太阳社》，《新文学史料》1979 年第 2 期。

这一问题。”^①1929年9月左右,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李富春找上海文化支部负责人阳翰笙谈话,指出创造社和太阳社对鲁迅的围攻是不对的,有些人对鲁迅活动的积极意义认识不足,要求党员应该站在党的立场上,争取他,团结他。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向他汇报。谈话后两天,阳翰笙见到了潘汉年,潘也传达了同样的指示。于是,潘、阳商议后,由潘汉年主持召开了一个有夏衍、冯乃超、彭康、阳翰笙、冯雪峰、钱杏邨、蒋光慈、洪灵菲、柔石、戴平万参加的党员大会,传达了李富春的指示。会上决定:创造社、太阳社所有的刊物一律停止对鲁迅的批评,即使鲁迅有反批评也不要反驳。会议还决定,派冯雪峰、夏衍、冯乃超3人去找鲁迅谈话,告诉他中共党组织要求停止这次论争,并批评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错误的做法。鲁迅见到他们很高兴,表示愿意团结起来^②。在提出停止论争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联合的文艺团体。吴亮平回忆:1929年11月左右,李立三找到吴(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传达中央意见:“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是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③

中共党组织是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舵手,紧紧把握着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航向。早在左翼革命文化运动之初,党就为各团体度身制定了发展方向和行动纲领。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潘汉年代表中共党组织作了题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讲话。讲话阐述了左联成立的两大意义:其

① 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43页。

② 阳翰笙:《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左联回忆录》(上),第62~64页。

③ 吴黎平:《长念文苑战旗红》,《左联回忆录》(上),第75页。

一,显示它将有目的、有计划地领导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运动;其二,争取广大群众走向斗争的营垒。讲话还列举了左联的四大任务:第一,要正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理论;第二,文学运动要与政治斗争任务紧密结合;第三,作品大众化应成为中心口号,作家要参加工农大众的实际斗争,创造大众化的作品;第四,开展自我批评,指出谁要是反对或惧怕自我批评,他便不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忠实勇敢的战士^①。成立大会还通过了由冯乃超起草的左联纲领。纲领指出左联今后要担负的工作:“我们的理论要指出运动之正确的方向,并使之发展。常常提出中心的问题而加以解决,加紧具体的作品批评,同时不要忘记学术的研究,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论。”^②左联成立以后,社联、剧联、美联、记联以及音乐、电影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在党的指导下制定了各自的发展和行动纲领。

此后,左翼革命文化战线在党的领导下进入蓬勃发展时期。他们大量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介绍国外先进思想和文学作品,积极开创、占领言论、电影、戏剧等各种文化阵地,与反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开展革命文化的国际交流活动,等等。除此之外,他们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每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的诞生和逝世纪念日,每逢五一、五三、五七、五卅等日子,左联、社联等团体都组织示威游行、飞行集会等活动。这种活动在头两三年频繁开展,直到1934年后,由于损失较大,才逐渐减少。他们还经常对一些政治事件作出决议、发表宣言,表示态度。例如,1930年5月,中共中

① 转引自陈修良《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

② 《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

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前,洪灵菲写了《拥护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一文。开会时,左联派胡也频、柔石为代表去参加,并致祝词。会后,他们在左联全体大会上作了汇报,大会还作了相应的决议,柔石写了通讯《一个伟大的印象》,左联机关刊物《世界文化》也发了消息。可以说,各左翼革命文化团体在前期工作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处在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左”的指导思想自然影响到左翼革命文化战线,使左翼文化各团体脱离文化斗争的任务,直接从事公开的、暴露性的政治斗争,相随而来的便是遭遇政治压迫,发展受到阻碍,力量也受到损失。尽管左翼革命文化各团体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严重的损失已经让许多盟员思想上产生怀疑,行动上有所抵制。所以,各左翼革命文化团体的工作到1934年至1935时已经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1935年,在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左翼文化各团体的工作曾出现转向的势头。这表现在1935年10月25日,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内部刊物《文报》第11期上刊载了一组左翼各联盟的“新纲领草案”和《关于发表新纲领的紧急通告》。这些新纲领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纲领草案》、《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纲领草案》、《中国新兴教育者联盟纲领草案》、《中国左翼报人联盟纲领草案》、《中国妇女运动大同盟纲领草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纲领草案》。这6个联盟拟定的新纲领草案,与之前的纲领相比,“可以看作是新的行动信号和准则”,对不少问题提出了新观点。如“文总”新纲领中明确把文化斗争与建设中国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目前的战斗任务之一是“为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而斗争”。对于中间层作家、学者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认为“在目前民族危机和革命危机日益深刻,中间层知识分子起着剧烈的动摇、分化,而正徘徊、不安、摸索的时候,革命文学家应正确地估计他们的进步的倾向,给以鼓励和赞扬,同时指出

他们的保守和偏见,使他们在严正批评之下,自愿地走向革命斗争”。这样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前“左”的倾向。这些新纲领是1935年夏“新文委”成立后,针对当时的形势,“开始工作时即考虑并讨论改变作风的问题”的表现,是左翼革命文化后期工作转向的重大标志。尽管这些新纲领还没有正式实施,左联等各联盟便解散了,但它们仍然反映了后期“‘文委’、‘文总’以及‘左联’领导的政治态度和文艺思想”,反映了“‘新文委’新常委在新的形势下坚持斗争、重整旗鼓的意味”^①。

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的解散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尽管左联等文化团体是否解散问题当时颇有争议,尽管这些团体的最后解散形同“溃散”,招致鲁迅的失望和愤慨,但它们的确是由党的文化领导机构——以周扬为首的“新文委”决定解散的。1935年夏之后,重组的“新文委”委员从《救国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出版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联名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不久,又在英文版的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通讯》上看到了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11月,周扬、夏衍收到了鲁迅转来的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给左联的信》,信中指示解散左联。“新文委”委员根据这3份文件,决定解散文总和各左翼团体,另行组建广泛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1935年底1936年初,左联解散,剧联、社联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解散。

3. 中国共产党对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

左翼革命文化团体开展文化运动的起伏与中国共产党经历的波折紧紧连在一起。综观中共党组织对整个20世纪30年代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领导,并不都是完全正确的。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李立三、王明“左”倾错误指导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① 孔海珠著:《左翼·上海》,第30~42页。

党内的“左”倾错误指导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开展。如积极组织各种飞行集会、示威游行等政治活动,将文化活动政治化;采用简单的二分法,把文化人分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和无产阶级性质的两大类,否认处于中间状态的作家、社会科学家、教育工作者的作用等,将文化人士脸谱化;把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的性质定位成政治性组织,将文化团体政党化;片面强调文化的阶级性和武器作用,认为文化是进行阶级斗争和宣传的武器和工具,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的留声机”,将文化功能简单化;生搬硬套外国的理论和做法,机械模仿,设定种种限制性的框框,把原本丰富多彩的文化工作教条化;等等。这些表现在文化战线上的“左”倾错误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危害。但是,左翼革命文化运动并不因此而减损其重大的意义,其成就是主要的。正如茅盾所说:“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1932年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比之1930、1931年是更猖獗了),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①这与左翼革命文化战线的核心领导力量是分不开的。这个核心领导力量就是由左翼文艺的领导者瞿秋白、左翼文化新军的旗手鲁迅和张闻天、冯雪峰等党的领导者以及文委、文总及各团体的常委、党团和行政书记等组成的。

瞿秋白在左翼革命文化战线的领导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尽管他并未正式加盟左联等各文化团体,但他却是公认的左联领导人之一,也是公认的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参与左联活动主要是在1931年初至1933年底。1931年1月7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瞿秋白遭到王明等人的打击迫害,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解除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也未分配给他

^① 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新文学史料》1981年3期。

其他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以自己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文化素养，自觉地投入战斗，在左翼革命文化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他的指导下，左联产生了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但瞿秋白也“花了不少心血”，并最后修改定稿^①。与左联过去的决议和会议宣言相比较，这个决议突出的转变有两点：一是强调了文化工作者加强创作的任务，二是提出了争取大多数的统一战线思想。这个新决议为左翼文艺运动的策略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茅盾曾评述说：“这个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标志着左联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②。瞿秋白对这个决议的形成功不可没。

其次，充分信赖和支持鲁迅，树立鲁迅的威信，增进了领导层的团结，提高了左联组织的凝聚力。左联主要由原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作家等几方面的人员组成。由于革命文学论争所带来的裂痕一时还难以完全清除，团结工作还存在困难。瞿秋白长期在党的领导岗位上所形成的威信和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使他最易为各派左翼作家所接受、所尊敬，因此，他是弥合裂痕的最佳人选。他和鲁迅之间的亲密交往，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促使党内的一些同志转变了对鲁迅的态度。从整个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看，自1931年瞿秋白回到文学战线到1934年离开左翼文坛，这一段时间是左联队伍最团结、成果最辉煌的阶段，瞿秋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所有其他人所不可替代的。

① 茅盾：《“左联”前期回忆录（十二）》，《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②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6～87页。

瞿秋白还从其他各个方面对左翼革命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如系统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著,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先后翻译了恩格斯给哈克纳斯、爱伦斯德的信,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象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L. U. 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以及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艺论文,编译了《现实——马克思主义理论文集》,翻译了《高尔基文集》和《高尔基创作选集》等。同时,他还就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群众、文艺与生活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原则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初步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厦的基础。他支持创办刊物,开辟文学园地,开展文学批评,尽可能给作家创作以最切实的帮助。他还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尤其是他创作的大量杂文和通俗文学作品,为繁荣左翼文学创作作出了直接的示范性的贡献。他还成功地组织了第二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组织左翼文学阵营成功地抵御和反击了各种错误思潮的围攻。冯雪峰评价说:“在瞿秋白同志和‘左联’发生关系的这个时期,他的意见和思想,实际上成为党对于‘左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所以这时候的‘左联’的活动是更有定向,同时在文学斗争上的成绩也更多些”。^①

在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鲁迅作为主将和旗手,也一直指导着左翼文化战线。尽管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一直和瞿秋白、冯雪峰等党的领导者保持着密切关系,而且鲁迅的想法都得到了瞿秋白、冯雪峰的支持。鲁迅对左翼革命文化战线的领导主要是进行思想上的指导。第一,坚持正确的文化革命方向,排除“左”倾错误的干扰。鲁迅同情和支持革命,爱憎分明,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他以笔作武器,与一切反对革命的势力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始终保持着革命的战斗风貌。但他不赞成简单地用政治

^① 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下同),第56~57页。

的方式处置文化的斗争,更反对做盲目冒动的事情,他不仅从不参加那些示威游行、飞行集会之类的活动,而且批评这种做法是“赤膊上阵”,是在作“无谓的牺牲”,主张改变这种自投罗网式的斗争方法。对党的正确主张,他自觉地在思想行动上保持一致。在“左”倾错误严重影响左翼文化运动期间,鲁迅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抵制错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第二,纠正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上的片面认识,坚持左翼文艺为工农大众和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服务的方向。鲁迅一向主张:“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①,强调“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②第三,在严峻而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带领左翼革命文化工作者冲锋陷阵。1931年2月7日,左翼文化工作者李伟森^③和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在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遭到暗害后,政治环境特别恶劣。鲁迅感情上承受着失掉了同志、青年朋友的巨大痛苦,处境上随时都有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的危险,他愤怒地写下了著名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和冯雪峰等人一起秘密编辑、出版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在国民党严密的消息封锁中向世人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大批屠杀革命青年作家的罪行。冯雪峰十分敬佩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毅力,深有感触地说:“只要有鲁迅先生存在,左联就存在。只要鲁迅先生不垮,左联就不会垮”,“左联能够战胜敌人和左联的主要成绩,也靠了鲁迅先生的在文学和思想上的辉煌的斗争以及他在这方面对我们的鼓励与领导。”^④这个评价并不言过其实,这正是鲁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241页。

② 《鲁迅全集》,第4卷,第307页。

③ 李伟森即李求实,他不是左联成员,追悼时因他与左联关系密切,与其他牺牲者放在一起。后来习惯地称“左联烈士”。

④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50页。

迅作为文化革命旗手的力量体现。

张闻天对领导左翼革命文化运动也起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11月3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30期上,发表了张闻天以“歌特”署名写的一篇题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文章。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当他发现左翼作家把持有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观点的“自由人”、“第三种人”视为“公开地向普罗文学运动进攻的敌人”的错误时,写了这篇文章。这是一篇批评关门主义的重要文章,是30年代初中共对文艺战线上的“左”倾错误所作的最为尖锐而又有说服力的批评。文章指出“左”的关门主义是左翼文艺运动的“最大障碍物”,提醒左翼文艺战线上的领导同志注意“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文学显然“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中最占优势的一种。”^①他指出:对这些中间势力要采取积极团结的态度,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便实现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从而“使我们的活动,从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的、半公开与公开的方面去”,“使中国目前的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②这篇文章的精神,由当时担任“文委”书记的冯雪峰向党内有同志传达。冯雪峰还将这篇文章略作修改后,以“科德”署名刊载于1932年1月15日出版的《世界文化》第2期上。文章后面,冯雪峰化名“ZY”写了《附记》,说明:“科德在这里关于文艺的阶级的任务,艺术的价值,以及关于托尔斯泰作品的说明,是很简单的,恐怕容易引起误解,请读者参看丹仁在《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杂志》中关于这几点的比较详细的解释吧。”^③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左翼文化工作者,尤其是左联上层领导的深刻

①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第8页。

② 《张闻天选集》,第12~13页。

③ 冯雪峰:《回忆鲁迅》,第50页。

反思。冯雪峰除了写出《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外,还写了《并非浪费的争论》等文章,周扬也写了《“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一文,一改以往论争中措辞激烈、势不两立的调子,在批判“自由人”、“第三种人”错误文艺观的同时,也反省了自身的不足,改变了对“第三种人”的态度,表示要与一般作家携手,并坦率、诚恳地检讨左翼批评家的错误,结束了与“第三种人”的论战。

除了这些中共和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努力纠正“左”倾错误、指导左翼文化战线改变“左”的做法外,不少在基层工作的盟员经历了“左”倾错误带来的惨痛后,也对“左”倾错误产生了怀疑。他们根据长期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在工作中开始自觉克服盲动主义、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尤其在1935年中共上海中央局和江苏省委被破坏后,广大盟员从客观形势出发,从读者的需要出发,摆脱“左”的束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文化宣传工作。如柳湜、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徐步、沙千里主编的《生活知识》,薛暮桥等编的《中国农村》,胡愈之、钱亦石、金仲华等编的《世界知识》等理论刊物在向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时,“他们的文章都注重实实在在地摆事实讲道理,而不采用那种盛气凌人,空喊革命口号、空洞说教的做法”。^①正是在这些党的领导者与左翼文化人的一致努力下,李立三、王明的“左”倾错误才没有在左翼革命文化运动中被完全彻底地贯彻执行,左翼文化战线才得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生存下来,并在缝隙中挣扎着发展起来,乃至中共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都被破坏后,仍然顽强地屹立在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阵地上。

^① 郑惠:《胡绳谈三十年代中期上海左翼文化工作的进步》,《党史信息报》2000年11月2日。

左翼革命文化运动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1. 马克思主义指导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航向

左翼革命文化运动时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黄金时期。在这一时期中,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仅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中国,而且得到深入研究,并开始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始被用来分析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等问题。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兴起,左翼革命文化者们在实践中普遍意识到自己理论修养不足,因而从一开始就重视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科学理论及国外先进思潮、理论、作品。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便被挤着“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即普列汉诺夫——引者注)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①鲁迅还和郁达夫一起创办了《奔流》,主要发表中外作家的著译,尤其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致力于介绍些真正的革命文艺的理论和作品。曾先后发表了鲁迅翻译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决议》、《托尔斯泰与马克思》、《苏维埃国家与艺术》等。

左翼革命文化各团体成立时,在其纲领中明确把更为广泛、更为系统地介绍马列主义的各种理论列为自己的重要工作。左联成立后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设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加强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据《新思潮月刊》二、三期合刊中的粗略统计,30年代初出版的马克思传记、马克思主义著作有46种,其他社会科学书籍有150多种。文艺方面,1930年以后左联的机关刊物几乎每一期都有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翻译、介绍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6页。

和研究。开始主要翻译苏联、日本等国作家阐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论文,后来则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著作逐步翻译出来。同时,左联还以极大的热情翻译介绍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死魂灵》、《浮士德》、《十日谈》、《忏悔录》等西方文学名著都在此时被译介到中国来。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规定社联的宗旨是:“团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光大和发挥革命的理论,以应用于实际”。社联的主要任务是:“(一)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二)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于一般。(三)严厉的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四)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五)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在目前要积极争取言论,出版,思想,集会等的自由。”^①社联确定的上述任务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就有4项。社联不仅在自己创办的各刊物上大量刊登介绍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文章,而且还组织和领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论著。如李铁声翻译的《哲学的贫困》,杨贤江翻译的《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向省吾翻译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底终结》,朱镜我翻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吴黎平翻译的《反杜林论》,等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左派幼稚病》、《列宁论组织工作》等还是第一次翻译出版。同时左翼革命文化人士还陆续编写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读物,吸引了很多接受新思

^①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81年第4期,第19页。

想的青年学生。30年代初是上海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也是中共处境最困难的时期,但却是马克思主义论著译文翻译出版最多的一个时期,因此这一时代又被时人称之为“新书业的黄金时代”。大批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为宣传和普及马列主义创造了条件,同时向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了观察社会问题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角度,从而推动了新兴社会科学的繁荣。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中国文艺、社会科学研究各个领域。左翼革命文化战线开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进行文艺批评,分析中国社会的国情,解剖社会矛盾,引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论战,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新史学、新经济学、新教育学等在中国的建立。

在文艺战线上,早在左联成立之前,左翼文化力量就同“新月派”展开了论战。左联成立后,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坚持文学无产阶级性的观点,继续对“新月派”关于人性论的文学主张进行激烈的批判。不久,国民党组织部系统又拼凑人马,发起“以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向左翼文艺公开挑战。他们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将使中国文艺“陷于必然的倾圮”,宣扬“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①,以“民族主义”的旗号对抗左翼文化人士倡导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针对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公然挑衅,鲁迅、瞿秋白、茅盾等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了坚决还击,揭露“民族主义文学”的卖国求荣、奴役人民的反动面目。

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社会科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就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进行了3次大论战。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在20年代末就见端倪,于1931年到1933年形成规模。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坚持用

^① 《前鋒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10月10日。

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历史,认为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分析、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论断适用于中国社会,中国同样经历过一个奴隶制的时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封建社会。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开始于1930年。以潘东周、王学文为核心的“新思潮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等问题,批驳了代表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动力派”宣扬的错误观点,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虽然扩大了中国的商品经济,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其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附庸,从根本上说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国目前的商品经济是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的,封建势力在中国社会中还占据严重的地位;中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并不代表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

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实际是前两次论战的延伸,本质问题还是究竟怎样来认识中国社会。当时,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已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以陈翰笙为领衔人物的“中国农村派”,在对东北、江苏无锡、河北保定等地农村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提出了对中国农村社会现状和性质的看法。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认为研究农村生产力必须结合生产关系。他们着眼于当时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从土地分配和占有、租佃关系、雇佣劳动等方面观察和研究农村经济,根据大量的数据,既肯定了农村中资本主义增长的客观事实,又阐明了封建和半封建成分还占着统治地位的实际现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薛暮桥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派”诸人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来证明中国农村中间资本主义已占优势,是表示“他们有意掩饰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做了

现存农村生产关系的理论上的保镖。”^①“中国农村派”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村的统治和剥削，是以维持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为前提的。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刺激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这确实使中国农村经济形态起了某些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农村结构起了质的变化；它只是使中国的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格外的加强，格外尖锐罢了”^②。

以上三次社会科学领域的大论战，紧紧围绕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国情，关注的是中国革命的行进方向，显示了文化对推动社会发展的价值功能。左翼革命文化人士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武器，在与论辩对手的唇枪舌战中，对涉及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原则作出了深刻的阐述。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先进文化一旦与中国国情成功地结合后，就会焕发巨大能量，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2. 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大众化特征

文化与社会日益紧密的融合是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革命文化运动超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表现之一，就在于树立起文化的大众化理念，坚持“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③左翼革命文化工作者们在党的领导下，继承五四新文学革命的精神，致力于文艺大众化，为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而努力。

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在党的领导下，左翼革命文化工作者提出了文艺大众化的口号，提出了革命文学大众化的任务，并

① 余霖(薛暮桥)：《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答》，《〈中国农村〉论文选》(上)，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第175页。

② 陶直夫：《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论文选》(上)，第13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且就文学语言、文学形式、大众化作品的内容和作家向群众学习等问题进行了反复探讨,并开展了初步实践。为了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左联专门设立一个“大众文艺委员会(众委)”,它的任务是:(1)研究大众文艺的一切实际问题;(2)创作大众文艺;(3)批评反动的大众文艺;(4)进行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及读书班说书会等实际工作。^① 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指出:“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列宁)为原则;同时也须达到现在这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文学者生活的大众化与无产阶级化”。1932年3月,左联秘书处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又规定:“首先,左联应当‘向着群众’!应当努力的实行转变——实行‘文艺大众化’这目前最紧要的任务”,使文艺大众化成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中心。

左联把实现文艺大众化放在首要地位,对文艺大众化高度重视。在左联展开活动的6年间,左翼刊物上对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几乎没有停止过。这种讨论后来还扩大到进步刊物,引发了1930年、1932年、1934年3次各有重点的集中讨论,成为文化界的热门话题。其中,第一次讨论的意义主要在于正式提出文学大众化的任务,但偏重于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即强调开展工农兵通讯员运动。第二次讨论就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文艺的艺术表现形式问题、文艺的阶级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讨论中,“在现代文学史上,正是瞿秋白,第一次明确提出: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结合,是‘无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②。第三次讨论主要

① 《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1980年4月。

② 王铁仙:《瞿秋白论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07页。

围绕大众语问题进行讨论。这三次讨论中,尽管有许多观点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如对五四文学评价过低、在如何建立大众文艺的问题上存在着重形式轻内容、重普及轻提高的现象等,但从总体来讲,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影响非常深远。左翼革命文化工作者为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对于推动革命文学为群众服务起了积极作用,也为以后大众化运动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社会科学领域,由于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使人们对理论的需求逐渐强烈和迫切起来。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成为民众的需求,时代的要求。这项任务主要由社联承担。社联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通过一些熟识学术界人士的社联会员的介绍,派遣一批会员到各学校授课。社联还在党的领导下自己创办了一些学校,如华南大学、文艺暑期补习班、现代学艺研究所、浦江中学、泉漳中学、外语学校等。许多进步青年经过短期学习,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为以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而社联也通过办学活动锻炼了自身队伍,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33年下半年以后,社联专门设立了工农教育委员会和工人读书班,努力在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科学理论的通俗化和大众化。为此,社联还曾油印了许多工农读本以及通俗的小册子,供广大群众阅读,同时,通过在工厂里办壁报、发传单等形式,向工人灌输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知识,收到良好效果。

社联还建立了外围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有组织地联系、培养进步青年,辅导他们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不仅上海的大厦大学、中国公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法政学院、法学院、劳动大学、中华艺大等高等学校的进步学生中设立了支部,而且上海中学以及中共自己创办的学校中都设立了社研支部。甚至日本人在上海办的同文书院中也有一批日本学

生加入了社研。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街道支部。外地也设立了一些支部,如东北、浙江以及日本东京等地。社研成立后,发展速度很快,规模不断扩大。1931年冬已达八九百人,有几十个支部,到“一·二八”事变后,成员已猛增至1300多人。成立初期主要由王学文、朱理治、陈孤风等人到各基层支部中辅导会员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成员猛增后,社联的杜国庠、张如心、潘梓年、刘芝明、熊得山等人应王学文的邀请,也加入到指导理论学习的行列中。在他们的指引下,学员中的许多优秀分子成长为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党的重要领导骨干。如劳动大学的许涤新、马纯古、丁冬放,法政学院的邓拓,复旦大学的陈正飞以及法租界街道支部的江隆基等。甚至同文书院的安斋库治、西里龙夫等日本留学生也在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日后为中国革命做了大量的工作。

社联还发起了新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运动。新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发展中产生了很大社会效应。这项运动是由曾任社联研究部部长的艾思奇首先倡导起来的。他主张学习哲学要结合社会生活实际。他用大众常用的语言,结合大众熟悉的历史故事,以及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例,通俗地阐明深刻的哲学道理,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广大民众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空前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范围。新哲学通俗化、大众化运动使社联一贯倡导并努力实施的“社会科学面向大众”从口号、要求变成了具体实践,使许多的进步青年掌握了科学的理论武器,提高了思想觉悟。

3.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上的光辉篇章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说:在1927年到1937年的历史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同

时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①左翼革命文化运动是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的“文化革命深入”，它以鲜明的革命宗旨，将中国的文化向现代化推进。

综观左翼革命文化团体的纲领，无不把推动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反对压迫作为自己的任务。如左联行动总纲领的两个主要点都反映了这个任务：“（一）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是求新兴阶级的解放。（二）反对一切对我们的运动的压迫。”左联的行动纲领还明确规定：“我们不能不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攻破一切反动的保守的要素，而发展被压迫的进步的要素……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②社联纲领也规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是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在目前要积极争取言论，出版，思想，集会等的自由”，“我们很诚挚的希望中国一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努力的人们，和我们一起，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来扩大和发挥这个伟大的革命的理论，来促进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③剧联的前身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也在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3月15日《戏剧周刊》第38期发表的《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宣言草案》中宣布：“对于妨害戏剧运动的一切暴力的反抗，我们亟愿以组织的力量，坚决地负起这些任务。”

左翼革命文化团体不仅在纲领中规定了推动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反对一切压迫的任务，而且在行动中也实践着这些纲领。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文学作品、戏剧艺术、新兴电影、社会科学等一切文化武器来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反对帝国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2页。

② 《拓荒者》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10日。

③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81年第4期，第19页。

义的压制,推动中国民主革命向前发展。

首先,针对国民党查封进步文化团体、查禁进步刊物、捣毁进步文化机构、逮捕和杀害左翼文化人士的暴行,中国共产党组织左翼革命文化战线进行抗议、声讨活动,并及时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营救被捕者。1930年4月29日艺术剧社遭国民党查封后,在党的领导下,艺术剧社立即发表了《艺术剧社为反抗无理被抄封逮捕告上海民众书》,上海戏剧运动联合会发表了抗议宣言,左联发表了《反对查封艺术剧社宣言》,号召左翼文化力量“团结起来坚决的反抗当局摧残一切文化运动的手段”,“一致争取集会,言论,出版,演剧的自由!”^①1931年,包括左联五烈士在内的23位中共干部被杀害的消息传来后,周恩来提笔为《群众日报》撰写了《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的社论,指出:革命战士英勇斗争的热血“必然更要燃烧着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火焰,更迅速摧毁和埋葬帝国主义、国民党及一切反动势力到死亡的进程”^②。在党的组织下,左联还刊行了《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刊登了五烈士的传略与遗著,鲁迅的重要论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冯雪峰的《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以及左联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并通过史沫特莱把专号传到国外,向全世界揭露控诉了国民党政府屠杀革命文化人士的无耻罪行。左联盟员丁玲、潘梓年、艾芜等,社联成员张耀华、刘芝明等,美联党团成员于海、李岫石、江丰及美联骨干艾青、力扬、黄山定、方海如等许多左翼文化人士被捕后,中共也立即不惜人力物力,利用各种途径进行营救。这些活动向国内外群众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残暴统治,体现了左翼文化

① 《反对查封艺术剧社宣言》,《拓荒者》第4、5期合刊,1930年5月10日。

② 周恩来:《反对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群众日报》1931年3月10日。

工作者的反抗精神,壮大了左翼革命文化运动的声势。

其次,针对蒋介石国民党采取的种种卑劣手段,中共指导左翼文化战线采取相应对策,利用各种卓有成效的斗争方式,挫败国民党的阴谋。国民党施行书报检查,左翼文化人或者把被禁的书籍、刊物换个名字、换个面目继续出版,或者创办新的刊物。如《前哨》出了一期被查禁后,第二期就改名为《文学导报》;社联的第一个刊物《新思想》被封闭后,改名为《新兴科学》再次出版;阳翰笙的3个互不关联的中篇都被禁后,就把它合为一个长篇出版。至于创办新的刊物,在各联中都是经常的事情。1931年5月瞿秋白领导左翼文化工作以后,为了改变原来左翼工作者在出版工作上孤军奋战、损失惨重、地盘狭窄的局面,他要求左翼文化工作者通过各种公开合法的方式和途径,进入一些报纸副刊,逐步地、有计划地占领一些宣传舆论阵地。《北斗》就是左联为扩大左翼文艺运动,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创办的第一个刊物。可惜第三期以后,刊物又“红”了起来,终于又遭到了查封的命运。历史悠久、影响甚大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中华书局的《新中华》等有名的保守阵地以及《新闻报》的“艺海”、《大晚报》的“剪影”、《大美晚报》的“文化街”等副刊,都被左翼作家、社会科学家等左翼文化工作者利用。同时,为了逃避国民党的检查,左翼文化人还经常变换笔名写文章,鲁迅的笔名最多,他在《自由谈》上用了50多个笔名,仅1934年上半年就换了约30个。1933年后,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界的地下工作者,已经学会了在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作战了。这种灵活的斗争策略、高超的斗争方式使左翼文化力量非但没有在森严的文网中被消灭,反而在狭缝中找到了生存、发展、壮大的空间,郁郁葱葱地成长起来。

第三,针对国民党御用文人的种种谬论,左翼革命文化人士运用言论武器,对其给予迎头痛击,深刻揭露其实质。1930年6月1日,潘公展及国民党御用文人傅彦长、朱应鹏、范争波、王平陵等人

组织了“六一社”，打着“民族主义文学”的旗号，出版《前锋周报》、《前锋周刊》，发起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针对他们拼凑起来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茅盾写了《“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对其反动观点逐一进行了批驳。鲁迅在《“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沉滓的泛起》等文中，也对民族主义文学的卖国本质作了揭露，指出，这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下的流氓政治所产生的流尸文学。瞿秋白写了《屠夫文学》、《狗样的英雄》、《青年的九月》等文，批判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反动性。因此，这场由国民党御用文人煞费苦心拼凑起来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很快便偃旗息鼓。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新生活运动要义》的讲演，为配合反革命军事“围剿”，强化法西斯专政，所谓了“新生活运动”，再次掀起尊孔读经的反动复古逆流。他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强迫人人信奉。又提出重修孔庙，并把孔丘诞辰定为“国定纪念日”。对于蒋介石的这种倒行逆施，进步文化界也立刻进行声讨。

可以说，这一切文化斗争都是围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这个的政治目标进行的。左翼革命文化战线以特有的活动方式，自觉地参加到这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中，并为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证明：左翼革命文化战线所开展的各项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第五章 抗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事业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这场在中国持续了八年之久的民族战争,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抗战文化。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激起中华民族的英勇抗击,这场全民族的抗战不仅表现为军事上的搏斗,也表现为精神上的比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切文化资源被充分调度起来,服务于抗战,成为全国人民捍卫中华民族利益,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的强大精神力量。残酷的战争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炮火的蔓延可以毁灭物质形式的任何东西,但却毁灭不了精神领域的文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有效领导,推动了文化建设的发展。

文化发展与民族战争的关系

1. 文化发展融入伟大的抗战洪流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开始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期,从而也创造了文化发展的新环境。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急剧尖锐化。救亡图存成为全国各界人民的迫切要求。文化界怀着满腔忧国忧民的情怀,走在全国抗日救亡的前列。1935年底,马相伯、沈钧儒等300余位上海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这些动向反映着中国的抗战文化正在孕育之中。

“七七”卢沟桥事变震撼全国。携手抗战,成为每个中国人的选择。文化界紧急动员起来,“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状,

造成全民族的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的胜利。”^①广大文化工作者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救国责任感。他们努力营造抗日的氛围,支持中国的军事、经济抗战。各种文化人开始“向愿意去的或能够去的各种各样的领域分散。跑向热情洋溢的民众团体,跑向炮火纷飞的战场……也跑向落后的城市或古老的乡村……”,斗志昂扬地走上抗日第一线,成立抗日团体,创作救亡作品,表演抗日剧作,举行救亡活动,进行抗日宣传。许多文化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出没弹林枪雨之中,深入到抗日最前线,用感人肺腑的作品、高亢激昂的表演慰劳前线将士,激励将士们为国杀敌。“尽了文化支持抗战的伟大任务。”^②在动员全民抗战的日子里,文化成为传递民族激情、凝聚大众力量的有效武器。文化发展很快就融入到滚滚的抗日洪流。各种文化创作,无论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舞蹈、新闻等,或揭露侵略者的暴行,或宣传抗战中的新人新事,或歌颂抗日英雄,或讨伐汉奸败类,无不以宣传抗战为主题,以期鼓动全民族的持久抗战情绪。各条战线的文化团体都以抗击日本侵略为共同目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中宣布“本会以联合全国文艺作家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中国民族自由解放,建设中国民族革命的文艺并保障作家权益为宗旨”^③。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主席张善子致辞说:“今天我全国美术界一致联合起来,其唯一的目的是在发扬美术的力量,使民族抗战的精神磅礴充实,以打倒侵略中国扰乱世

①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史料选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② 洛甫:《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解放》第103期,1940年4月10日。

③ 《文艺月刊》第9期,1938年4月1日。

界和平的日本强盗。”田汉致辞：“我们有一个最大目的，就是为民族生存而抗战。只有抗战胜利，中国民族才有生路。我们美术家应认清这一任务，通过美术的手腕，来动员广大民众抗战。”^①1937年9月3日，上海成立的孩子剧团在宣言中庄严宣告：“在抗日战争开始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能上前线去同鬼子拼，不能作大规模的事情，我们只有以我们所有的力量，团结起来，以过去所爱好的工作来为国家服务，为民族尽力。”“我们愿意永远演戏，愿意上前线去演，愿意到内地去演，也愿意到受难的同胞里面去演。”这些孩子最大的只有19岁，最小的仅9岁^②。各种文化活动自始至终都紧密结合现实，密切为抗战服务。各种“抗战宣传周”，全国各地的“献金活动”，纪念鲁迅逝世，纪念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高尔基、歌德，悼念罗曼·罗兰与阿·托尔斯泰以及纪念郭沫若50寿辰与创作25周年，纪念老舍创作20周年，纪念茅盾50寿辰与创作25周年，纪念洪深50寿辰，纪念应云卫40寿辰，纪念欧阳予倩56寿辰与创作33周年等活动，都突出了民族抗战的主题，成为一次次抗战的精神动员。

民族战争决定了抗战文化的根本任务，即通过“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抗战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整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中国共产党自抗战爆发起就充分认识到发展文化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规定了党在文化运动上的任务：第一，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反对民族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

① 文天行编：《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第81～82页。

② 文天行编：《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大事记》，第35页。

反对黑暗复古主义。第二,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主张思想自由,研究各种学术,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的文化向前发展。第三,团结文化干部,培养文化干部,爱护文化干部,尤其在根据地内更应大批的吸收知识分子,各种专家学者参加一切抗战的工作。第四,参加国民教育,发展国民教育,这是文化运动最基层的工作^①。这些文化使命的揭示和任务的认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价值功能有着深刻的把握。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科学地预见中日战争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②随着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抗战文化也相应地表现出阶段性的不同特征。抗战初期,文化工作者受到民族生存危机的强烈刺激,急于为抗战服务,写出了许多报告文学、特写、短诗,以及适宜街头演出的独幕剧或活报剧、说唱词等鼓动形式的作品。对于宣传抗战,动员群众,鼓舞抗敌斗志,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在民族斗争中发挥了文化服务于抗战的积极作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文化工作者开始注重深层次的精神鼓动,希望创作更多具有持久效力的文学作品,将爱国主义思想牢固地在文化浸润中积淀下来。因此,创作的题材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陆续出现一些综合性、历史性和艺术性更高的作品。1940年以后,随着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本侵略者调整了对华政策,国民党顽固派不时制造针对共产党和进步力量的摩擦事件,国统区出现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危机,党的文化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士遭到迫害,进步文化活动受到禁止、压制,国统区在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13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62页。

文化上一时陷入沉闷状态。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化界人士经过短暂的沉寂后,很快在国统区掀起了反独裁争民主的运动。在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时,抗战文化也进入了新一轮的高潮时期,充分发挥了文化在战争中的作用,加强了文化运动的深度和广度,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密切配合军事上的反攻,更有效地为伟大的民族战争尽快取得胜利服务。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文化战线成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又一个战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战文化所显示的力量,是中华民族抗敌御侮的一笔丰厚资源。

2. 抗战文化推动民族战争的发展

文化与社会互动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化在社会实践积累、传递,社会实践赋予文化以强大的发展动力。反过来,文化也以其自身的功能作用于实践,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产生影响。中国人民伟大的反侵略战争提供了文化发展的宽阔土壤,而服务于抗战的文化则对民族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抗战文化作为“反侵略最锋利的武器”,对日本侵略者有着无情的揭露、打击和瓦解作用。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把揭露日寇暴行作为宣传抗战的一项重要任务。日寇的狂轰滥炸、残暴屠杀、奸淫掳掠、焚烧房屋、施放化学武器、摧残中国文教事业、迫害在华外侨、残杀俘虏儿童等时常成为报道的内容。尤其是对日寇的典型暴行和重大事件,更予以连续报道。如对于日机的狂轰滥炸,据不完全统计,仅1938年《新华日报》就发表了484篇报道,1939年又有171篇,1940年有108篇,1941年有88篇。这些报道把日寇的兽性充分地展现在国人面前,对于警醒国人、动员抗战、影响国际社会、呼吁国际抗议,都有着重要作用。

第二,抗战文化以丰富生动的形式,活跃了部队生活,鼓舞着官兵斗志,激励他们奋勇杀敌,推动了抗日斗争向纵深发展,最后走向胜利。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有许多作家参加了军队的政治工作,编印和发行各种书报刊物来教育士兵及广大的群

众；或是组织了战地服务团，深入前线 and 敌人的后方；更有很多的作家用他们生动的笔，写出了中华民族生动的事业，……此外更有一些知名和不知名的作家，为了祖国而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①1939年6月18日，“文协”组织的“战地作家访问团”从重庆出发，奔赴前线各战区进行访问，成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次派出的笔部队”。^②第三厅所属的十支抗敌演剧队、四支抗敌宣传队、三支电影放映队以及孩子剧团、新安旅行团也大都派遭到各战区，为士兵演出，教育、宣传、鼓励士兵以饱满的斗志投入抗战中。1937年8月，著名作家丁玲、吴奚如等人在延安发起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他们带领团员们渡过黄河，冒着枪林弹雨到前线去巡回演出，开展广泛的抗敌宣传活动，极大地激励了前线将士们的斗志。刘白羽、卞之琳、周而复等著名作家也很快奔赴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冀中、鲁西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宣传活动。同时，各种地方剧团也翻山越岭，到前线为部队演出，许多作者还直接随军参加战斗，从火线上采写出高亢激昂、振奋人心的作品。文化工作者们想尽一切办法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安抚伤病员的情绪。他们甚至把舞台搬到了阵地前沿，将士们看完演出进阵地、换下来休整到剧场的景象经常出现。

第三，抗战文化广泛发动群众，鼓舞群众抗日斗志，对广大群众有着巨大的动员和组织作用。抗战伊始，许多文化工作者加入抗战宣传队、戏剧团体、歌咏队等，深入农村乡镇、工厂矿山，直接为农民、工人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抓壮丁》等抗战剧目，激励群众的抗敌爱国热情。他们演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

^① 《用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纪念全国文协成立一周年》，《新华日报》1939年4月9日。

^② 《作家战地访问团告别词》，《抗战文艺》第4卷第3、4期合刊，1938年6月。

《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流行于全国各地,成为激励广大群众坚持抗战的时代旋律。许多地方举行上千人参加的抗日歌曲大合唱、上百人参加演出的大型抗战话剧,常常是台上台下同仇敌忾,嘹亮歌声和愤怒的口号响彻云霄。“许多文艺家肩扛着他的巨笔,跟随着前线的将士,英勇地参加了浴血的苦斗。无数的通讯,无数的报告文学,把战士的英雄的姿影,把炮火下的战区的惨象,把无数千万受难同胞,无数千万救亡队伍的面影,深深地印入了全民大众的胸臆,鼓起了大众舍身杀敌的勇气,加强了大众最后胜利的信心”^①。“无论在前方和后方,或是在沦陷区域中,都可以看见我们的作家站在自己的岗位上,以他们的武器——笔杆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来组织民众打击和歼灭敌人”^②。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这样的文化宣传活动,时刻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熏染,投身抗战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第四,抗战文化对于行为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压制,有着顽强的抗击斗争作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频频制造摩擦,压制进步文化活动。1941年,更发动了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在这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国统区的文化界人士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坚定地拿起文化武器,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对进步文化的压制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真面目,保证抗战胜利真正成为人民的胜利。他们以戏剧阵地为突破口,以《屈原》、《棠棣之花》、《高渐离》等一批借古讽今的历史剧为炸弹,炸毁了重庆政治上的沉闷局面,打击了国民党在文化上的反动逆流。1945年初,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国民党却加强独裁专制统治,郭沫若联络了300名当时在重庆的著名诗人、作家、戏剧家等,甚至包括“很多素来不过问政治的教授、学者和艺术家”,在

① 《新华日报》1938年3月27日。

② 《新华日报》1939年4月9日。

《新华日报》上发表《文化界时局进言》，强烈要求国民党“停止特务活动”，“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释放一切政治犯及爱国青年”，以及“废除一切军事上对内相克的政策”等，唤起社会各界联合抵制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伎俩，以保证抗战的最后胜利。

第五，抗战文化直接为战争提供知识援助。八年抗战期间，广大文化工作者还致力于科学知识的宣传。许多自然科学工作者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宣传普及与战争有关的科学知识，培训为战争服务的各种科技人才，研制战争亟需的医药器械、电工器材、兵器、燃料等化工产品，以他们的文化知识服务于抗日战争的需要，解决了不少实际的困难。在大后方，内迁后的各研究院所、大专院校的理工医等系科纷纷结合战时社会实际需要，调整研究计划，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应用科学的研究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需要，各学科特别注重科学在国防军事及工业生产方面的应用研究，如化学研究重心转向硝酸、纤维、木材、汽油、酒精、煤油、橡胶等方面的研究，物理学注重研究军事技术的应用；气象学、生物学、天文学、数学、地质学、地理学等都十分重视将科学研究与现实结合。如迁到昆明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组“其工作几乎完全转向于战时需用品之制造，并有一个特殊的工厂之设立，可磨制显微镜与望远镜上之透镜。”^①著名化学家侯德榜于1941年成功研制“侯氏制碱法”，把纯碱工业的技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另一方面则是结合开发西南西北大后方各地资源，支援后方工农业建设。如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迁重庆后，适应战时军航需要，为航空委员会提供气象情报，协助训练航空防空工作人员，同时还推动西部各省的气象测报工作，培训地方气象人员，支援当地农业试验。郭沫若在《三年来的文化战》中说：“科学界的

^① 李约瑟：《战时中国西南部科学之发展》，《新中华》副刊第3卷第12期，1945年12月。

专家们在无声无息之间奠定着大后方的各种新兴产业的基础。水力的测量和利用,煤油的发现和采掘,制钢炼铁,采煤煮盐,都在采用着新式的科学方法。单是四川一地在三年之间已经有了30年的进步”。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科学技术更是和抗战大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朱德在《把科学与抗敌结合起来》一文中指出:“现在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抗战建国过程中,不论是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一切科学,一切科学家,要为抗战建国而服务、而努力,才利于战胜日本法西斯强盗”;只有发展了科学技术,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才能为抗战大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充实军队的战斗力”。因此科技人员要“确确实实把自然科学的学识,与我们祖国的土壤和资源结合起来,以科学方面的胜利来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①。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边区的科技工作者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战胜重重困难,研究成功了大量科研制品。如试制玻璃成功,发明了马兰草造纸术,大量研制中西药品,普查开发边区的地质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等。这对于解决抗战中边区的物质匮乏问题,推动工业建设、军事建设等的发展,加强抗战力量,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抗战文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

1. 中国共产党对不同区域抗战文化的领导

抗战文化的发展始终处于十分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国内各种矛盾的交织影响并制约着文化的发展,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文化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与抗战紧密结合在一起。但这样的结合不是自发形成的。文化发展需要组织,需要引导。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捍卫民族利益的先锋力量,它既是政治上支撑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又是文化上引导抗战文化

^①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6~77页。

发展的核心。

从地域情况看,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二是以武汉和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文化,包括桂林、昆明、成都等整个大后方;三是日伪占领下的沦陷区文化,包括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华中沦陷区、华南沦陷区和台湾。这三类地区的文化发展,基本上都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密切关系,但在领导方式、组织程度和工作效果上有所不同。

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在抗日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延安为中心构成的晋冀鲁豫地区成为一片抗战的热土。在这里,不仅军事上承担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任,而且文化上成为引导抗战文化的先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深知文化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毛泽东号召文艺工作者“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①,鼓励文艺工作者“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②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文化思想的领导下,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开展得最具有生机、最蓬勃。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延安文化界就组建起各类文化社团,如1937年11月14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宣告成立,选举周扬、成仿吾、柯仲平等为负责人,领导边区文化运动。紧接着,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延安美术工作者协会、中华戏剧界抗战协会边区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延安文化俱乐部等数十个文化团体纷纷成立。这些文化团体在边区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积极组织创办《文艺突击》、《大众文艺》等刊物,进行创作演出,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和文化活动,把边区的文化

① 《红色中华·红中副刊》第1期,1936年11月30日。

② 《在鲁迅艺术学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38年4月10日。

活动搞得热火朝天。1938年初延安兴起了街头诗运动,许多墙壁、岩石上都留下了精彩的诗篇。柯仲平、萧三、光未然、艾青等的朗诵诗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广为流传,抗战歌曲也在各抗日根据地传唱,一曲《黄河大合唱》,气势澎湃,催人振奋。还有许多戏剧社团,深入民众和前沿阵地,用舞台作堡垒,把街头当作营地,“用戏剧来从事宣传”,“动员广大群众来参加抗战”。为了培养干部,各抗日根据地和部队还创办了许多学校,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其中著名的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等等。在抗战前还几乎是文化沙漠的整个西北地区,由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掀起的抗战文化而得到极大的改观。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成为吸引国内文化人向往的圣地,大批知识青年克服重重困难,长途跋涉,几经辗转,奔赴延安,在矢志革命的同时,寻求自己的文化发展前程。

在国统区,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推动抗战文化建设。1940年9月中共中央就发展文化运动问题发出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他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要求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要“特别提起注意”,并努力“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①。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文化发展由于形势的变化而经历了多次中心转移,中国共产党在这些文化中心留下战斗了的足迹。

在武汉,首先,创办报刊杂志,开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团结人民、揭露敌人和争取同盟者的阵地。其次,领导成立了一大批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文化组织,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蚁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86~487页。

社、抗战教育研究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在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周恩来亲自过问，多次就机构设置、人选等问题与党内外人士交换意见，为“文协”发展指明方向，并当选为“文协”名誉理事。第三，派遣共产党员和知名进步文化人士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领导职位。周恩来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主任，并利用这一职务，派郭沫若、阳翰笙、胡愈之、田汉等党的文化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士负责第三厅的领导工作，牢牢掌握住分管抗战文化宣传工作的第三厅的领导权，开展了保卫大武汉、抗日宣传周以及献金活动等抗日文化活动。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重庆成为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又秘密成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新华月报》及理论刊物《群众》周刊也迁到重庆出版发行。同时，第三厅由武汉转移到重庆，继续领导文化工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影人剧团、上海业余剧业协会、国立剧校、中电剧团等一大批文化团体以及大批文化人都迁到了重庆。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下，重庆的抗战文化活动在抗战初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起来。但是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政策的抬头，反共浪潮不断掀起，尤其在皖南事变发生后，重庆的抗战文化受到严重遏制。第三厅所属演剧队、抗宣队的人员横遭逮捕监禁，战地文化服务队被强行取消，郭沫若和一大批文化人也被迫辞去第三厅的职务。但他们并没有退出战斗，坚持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开展合法斗争。

桂林的抗战文化运动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发动起来的。1938年11月，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成立。这个机构对内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出机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机关，成为党在桂林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心。党组织有计划地将从沦陷区撤退出来的进步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转移到

桂林。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将其所辖的三分之一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工作者迁到桂林,组成桂林行营第三科。《新华日报》广州分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国际新闻社、生活书店、新安旅行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西南分会等也在党的领导下先后迁到桂林或在桂林建立。同时,一批从事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也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纷纷从东北、华北、华中等地云集桂林。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来到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有1000多人,其中著名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科学家、教授、学者等有200多人。这些文化团体、党的文化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士会同广西地方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形成了一支抗日文化工作的骨干力量。党组织还派遣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打入桂系军阀举办的各种文化机构,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抗日文化活动。如在桂系成立的最大的文化团体广西建设研究会中,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利用该会招贤纳士之机,派遣和引荐了一批党内外专家学者入会当研究员,如胡愈之、邵荃麟、范长江、李四光、张志让、千家驹等被聘为研究员,胡愈之和千家驹还分别担任该会文化部和经济部副主任。他们在会内团结进步分子,宣传抗日、民主,使该会成为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皖南事变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销,桂林抗战文化运动遭遇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南方局又立即派遣李亚群等来到桂林,组成中共中央南方局桂林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重新组建组织,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很快从艰难中恢复和发展起来。

此外,在昆明,中共地下党利用以龙云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对云南地方实力派开展多渠道多方面的争取工作,同时把爱国知识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尤其是“民主堡垒”西南联大,形成了以爱国师生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抗日文化运动。广东的曲江、福建的永安等战时省会,也在中共的领导下,成

为抗日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在日伪占领下的沦陷区,尽管客观环境非常凶险,但是仍旧有一大批党的文化工作者坚守在岗位上,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领导,团结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文化斗争,推动沦陷区的抗日文化运动。特别是“孤岛”上海,更具有代表性。具体组织和领导“孤岛”文化斗争的是中共江苏省委下属的文化运动委员会,简称“文委”。上海沦陷后,文委根据江苏省委的指示,首先采取“周二座谈会”、“星六聚餐会”、时事读书会等形式,广泛团结了留在“孤岛”上的文化界爱国人士,创办出版机构“复社”,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其次,利用洋商招牌,创办了《译报》、《每日译报》、《译报周刊》、《上海周报》等报刊,报道战争进展、国际形势,刊登有关八路军、新四军的通讯等,成为当时上海青年心目中“最突出最光辉最坚决的抗战堡垒”^①,使处在侵略者铁蹄蹂躏之下的广大上海居民增强了抗日的信心和斗志。第三,创办《文艺》、《文艺阵地》等刊物,团结留在“孤岛”上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培养“青年文艺通讯员”,通过撰写杂文、创作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和戏剧等方式坚持抗日斗争。第四,创办《文献》月刊、“风雨书屋”等,发表中共中央文件及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言论著作,出版或发行《资本论》、“马恩丛书”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为上海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东北、华北等其他沦陷地区,抗战文化虽然比较微弱,但文化人的爱国抗争也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2. 以爱国主义旗帜和民族利益为纽带发展抗战文化

文化与民族的联结是以生存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一致为基础的。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爱国成为中华民族价值认同

^① 蒋天佐:《上海“孤岛”时期文学工作回忆片段》,《上海“孤岛”文学回忆集》(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趋于一致的核心。文化作为体现民族价值认同的载体,必然在爱国主义的弘扬中得到强大的发展驱动力。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以捍卫民族利益为核心的爱国主义旗帜,创造了抗战文化的繁荣景象。

1937年7月8日,抗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表抗战宣言,号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文化工作者团结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加入抗战的行列。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向全国文化界人士发出呼吁:“我们要求一切文化工作者认识自己在这抗战大时代中的使命,认识自己工作的复杂和繁重;我们要求全国文化界人士不拘成见,不分畛域,不论新旧,摒绝破坏分子的挑拨离间,在民族抗战的大旗下,进行大团结,进行分工合作,互相切磋,互相帮助,以求文化工作的迅速、活泼的发展,以服务于抗战。”散处四方的文艺工作者迫切感到“有集中团结,共同参加民族解放伟业的必要”。7月15日,中国剧作者协会首先在上海成立。协会立刻组织剧作家集体创作三幕剧《保卫卢沟桥》,号召进行全民抗战。紧接着,1937年12月31日,戏剧界的全国性组织——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宣布成立。协会“以团结戏剧界人士,发展戏剧艺术,推动抗敌工作为宗旨”,“第一,我们的团结是为着抗战”;“第二,只有抗敌使我们团结”;“第三……我们相信中国戏剧艺术必因和抗敌任务结合能摒弃过去的积弊,开拓新的境地”,号召全国戏剧界人士“群策群力为这些平凡要求的实现而奋斗”。不久,音乐界、电影界也都团结起来,分别于1938年1月17日和29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

精诚团结,一致抗日,很快成为文化界的主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抓住这个契机,加大促进文化工作者团结的力度。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在汉口总商

会大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有 500 多人到会参加,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文协”是一个空前的全国性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标志着全国各派作家开始以集体力量为抗战服务。“文协”的职责是“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文协”成立后,立即决定出版会刊《抗战文艺》。编辑委员会的 33 位委员包括了当时在延安、上海、香港、广州、昆明、重庆、西安、成都、长沙等地的各派作家。《抗战文艺》团结了一切爱国的、坚持抗战的文艺工作者,成为全国各派文艺工作者的一块重要战斗阵地^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事业的感召力具有广泛性。许许多多的文化人都自觉地把自己的工作与爱国相联系,以求为抗战出力。一些文化人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用特殊的方式进行民族抗争。哲学家冯友兰完成了《新理学》等 6 本“‘贞元之际’所著书”,在他心里,“贞元之际”意味着“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时期”。他后来在回忆中说:这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的感情,做一些“对抗战有利的”的事^②。

国学大师钱穆先后出版了《国史大纲》和论文集《文化与教育》,积极倡导振兴国史、复兴民族文化,他在《国史大纲》引论中说:“我民族国家的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我所谓必于我先民国史略有知者,即谓此。是则我言仍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③

还有历史学家陈垣,他虽然留在北平辅仁大学任教,但仍关怀抗战,致力于以历史唤起世道人心,完成了多种学术著作。

① 罗荪:《关于〈抗战文艺〉》,《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 2 期。

② 《怀念金岳霖先生》,《哲学研究》1986 年第 1 期。

③ 《国史大纲》(上册),台北国立编译馆 1956 年版,第 26 页。

爱国主义旗帜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文化发展中建立广泛统一战线利器。抗战文化具有全民族的普遍性。在空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不仅进步文化人斗志昂扬地投入到抗日文化运动中,国民党的一些文化人也受到感染。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初期阶段,他们中的不少人也创作了不少作品和诗歌,如《铁血歌》:“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可以救中国。还我山河誓把倭奴灭,醒我国魂誓把奇耻雪……”。罗家伦作词的一首歌曲则有:“中华男儿血,应洒在边疆上。不怕雪花涌,不怕朔风狂,我有热血来抵挡。炮衣褪下,刺刀擦亮,冲锋的号响!冲!冲过山海关、鸭绿江,雪我国耻在沈阳、平壤!……抵抗!抵抗!沙场凝碧血,尽被宝石光,照在民族生路上,灿烂辉煌!”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为该军军歌所填之词中有“……为祖国生存而奋斗,团结得好比钢一样,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祖国,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①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还尽力争取国民党政府对发展抗战文化的支持。如国民党中宣部曾对抗日读物予以经费和发行资助。当时“文协”为政治部、宣传部组织写作了多种抗日著作,得以出版。“文协”总务部的《会务报告》中提到:“访问团团员正忙着写作,预备出丛书。访问报告在赶制中,脱稿后即当呈递党政治委员会。”^②

对一些文艺组织,国民政府也给予财政补贴,如“文协”每月得到政府1500元的资助。另外政府还设有中央文艺奖助金保管委员会,用一定专门的经费帮助文艺著作的出版。对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文化设施,政府也尽力给予维持。尽管这些经费开支在政府的财政总支出中是很少的,但毕竟也为抗战文化的开展出了一份力。这些事情应该加以肯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抗战文化

① 转引自丁守和:《论抗日战争的思想文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② 《抗战文艺》第5卷第4、5期合刊,1940年1月20日。

中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的成绩,也是爱国主义精神在抗日战争时期文化发展中的体现。

3. 把抗战文化的根基植于人民群众之中

抗日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广大人民群众是抗日救亡运动的主体,离开他们根本无法取得胜利。因此,最大程度最广范围地动员群众加入抗击日本侵略的行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文化的基本方针。在文化人逐步走近群众、贴近现实的过程中,抗战文化越来越表现出浓厚的群众性。抗战文化的群众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广大的文化工作者和文化人主动深入到农村乡镇中向群众揭露日寇暴行、宣传抗战、提高群众的抗战意识。他们在“文化下乡,文化入伍”的号召下,充分运用歌咏、戏剧、绘画、新闻报导、木刻等文化形式,“活跃在敌前、敌后,以及后方的每个平常不为文化人足迹所履的角落”,教育、宣传、鼓励民众士兵抗战,增强其战斗意志^①。其中,开展宣传周活动是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一种有效方式,是群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38年4月7日至13日举行的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中,文化工作者充分利用各种文化宣传形式,每日围绕一个主题,把群众抗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了出来。如4月7日是文字宣传日,仅宣传品就编制印发了《宣传大纲》、《告全国同胞书》、《告负伤将士书》等十余种。4月8日是口头宣讲日,发动宣传队到各处宣讲,在一周内搞得热火朝天。鹿地、恒亘等十余人作了公开演讲,还有陈诚部长、周恩来等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播音讲演。歌咏日则除了歌咏队每日出发宣传外,还举行歌咏大会。美术宣传日则在一周内举办了《街头漫画展览》、《抗战连环图画展览》、《抗战漫画标语印刷品

^① 巫摩白:《抗战三年来的文化及其第四年的展望》,《抗战时代》第1卷第6、7期,1940年1月1日。

展览》等。戏剧日、电影日等也非常丰富多彩。游行日则更加受到欢迎,成千上万的群众踊跃参加,主动要求参加游行,整个武汉沸腾起来了,汇成滚滚的抗战洪流。类似的活动在重庆也开展得轰轰烈烈。边区文艺工作者更是积极投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活动中。在边区“文抗”和八路军政治部的组织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积极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西北战地服务团”、“太行山剧团”、“抗敌剧社”、“烽火剧团”等文化团体,他们深入农村和农民们打成一片,拿出自己全部的技艺演出剧目给村民们看,他们到前线和士兵们打成一片,用火热的激情唱歌给士兵们听。他们深入生活,深入边区各个抗日根据地,掀起了群众性文艺运动的高潮。

第二,努力使文化作品适合当地民众的口味,“日渐向着通俗方面努力”。广大文化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积极利用民族形式,采用当地民众喜爱的曲调,制作些歌词,利用当地土戏的格式,编排剧本,以求起到宣传动员的效果。上海《救亡日报》就通俗问题进行专门讨论,战时文艺协会把通俗化、出通俗小册子作为自己的工作要点。“文协”在成立会上把设立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请全国作家写士兵读物百种作为主要议案提出。“文协”创办了不少通俗性的刊物,如《高射炮》、《时调》、《弹花》、《抗到底》、《人人看》、《星芒周报》、《老百姓报》、《通俗文艺五日刊》、《大众读物》等。许多作家都开始创作通俗作品,老舍、赵景深、穆木天、老向等作家的作品尤为引人注目。老向在《抗战四年来的民众读物》中谈了党政机关编辑并大量印行通俗读物的情况,特别提到教育部出版的300种读物。他们还广泛运用和改造旧形式,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创造各种新艺术,更好地动员群众。如鲁迅艺术学院曾“改造了京戏秧歌舞,采用了中国的木刻画,改造了门神;在音乐上,创作了许多歌谣,新的曲调和歌剧;文学上尝试过评词大鼓之类的运用”,“抗战剧团,烽火剧团,抗大文艺工作团,对中国旧的各种新技艺术的运动,也有很多的成绩。”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还组织了一个真

正的民众剧团,不但演剧内容完全采用边区地方的传统文艺——秦腔戏之类,而且团员也大多数是老百姓。仅1939年上半年,该剧团就走遍边区各县,旅程3000余里,到处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发挥了极大的动员力量^①可以说,抗战期间,京剧、汉剧、楚剧、越剧、平剧、川剧、豫剧、秦腔、桂剧、评弹、大鼓等中国民间文化各种剧种几乎都被应用到了抗战文化宣传中,抗战时期成为有史以来文化与民族旧形式结合得最紧密的时期。

第三,在文化工作者不懈的宣传鼓动下,许多群众还自发参加到抗战文化的行列中,用自己简陋的技艺为抗战进行鼓动和宣传。边区甚至出现了“农民们普遍认为村里不闹剧团,没有文化娱乐是很丢人的事”的思想^②。雷铁鸣在《戏剧运动在陕北》中曾形象地描述了群众对戏剧运动的热烈程度,他说:“一听到说演戏或只要在街上贴一两张广告,就会使得全城都骚动了似的,女的男的,老的少的,人山人海的堆满在露天的舞台前面,伸长了头颈等待着。他们像饿狼似的渴望着,鼓舞着的。台上的戏演到紧张的时候,我们的观众的情绪也跟着高涨起来,爆裂一样地喊出洪亮的口号,附和地唱出激动的歌声”。^③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许多百姓自发成立或加入剧团或自乐班,农民自编自演的戏剧运动蓬勃发展。如1942年冀中地区农村剧团达到1700个,北岳地区也有农村剧团和秧歌队1400个。到1942年6月晋察冀边区剧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时,晋察冀边区村剧团达到了3277个,其中较活跃的有

① 艾思奇:《两年来延安的文艺运动》,《群众》第3卷第8、9期,1939年7月16日。

② 沙可夫:《华北农村戏剧运动和民间艺术改造工作》,《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献》,新华书店出版社,1950年版。

③ 《解放周刊》第1卷第8期,1937年6月28日。

500 个左右^①。新四军活动的地方,仅盐阜一个区,据 1944 年各县文教科统计,就出现农村剧团 440 个^②。他们经常在集市和庙会上演出,以其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深受当地农民的喜爱,使得当时整个抗日根据地呈现出“村村寨寨锣鼓响,人欢马叫喜洋洋”的景象。魏猛克在《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界》一文中指出:“参加了前线工作的作家也并不少的,不过大抵不是成名作家,他们还是正在学习写作的文艺青年。……这班文艺青年多半在各战区的战地服务团工作……他们在战地也组织了剧团、歌咏队等团体,向前方的士兵及民众作抗敌宣传。他们这种英勇的行为,使他们本身也变成前卫的战士了”^③。这是对文化工作者开展群众文化的充分肯定。

抗战文化的成就及其经验

1. 抗战文化结出累累硕果

“七七”事变后,中国文化事业在日寇的进攻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但是,“尽管敌寇使尽着一切的方法对于我们的文化事业蓄意摧残……可是,凭着我们文化界本身的团结和努力,已经给中国的文化运动创造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光明前途,中国的文化在走上一个飞跃进步的时代,适应着战争的需要,中国的文化运动接受了一次划时代的洗礼,它将要吸收一切进步文明的成果,开放出一枝极光辉灿烂的花朵。”^④中国抗战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取得了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 2 册,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版(下同),第 79 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 4 册,第 151 页。

③ 《抗战文艺》第 2 卷第 6 期,1938 年 10 月 15 日。

④ 《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抗战书店,1940 年初版,中国现代史料编辑委员会 1957 年 8 月翻印(下同),第 230 页。

巨大的成绩。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文化团体的数量激增,据不完全统计,到1940年底,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较大的文艺团体由五六个发展到180多个。仅冀鲁豫、冀鲁、鲁中南、胶东边区,剧社和宣传队就达到41个。就连孤悬敌后的东江纵队、海南游击队也先后建立了50多个文艺队^①。纪念鲁迅逝世、郭沫若50寿辰与创作25周年等文化活动此起彼伏;抗战剧本、国防电影、革命歌咏、漫画木刻等的创作异常活跃;小说、诗歌、杂文等文艺作品纷纷涌现;报告文学、通俗文学、朗诵诗、街头剧等深入民间。“特别应该指出的,便是抗战期中学术思想的空前发达,这具体的表现在进步的报纸杂志著作物等,如雨后春笋一样的产生;前进的科学的理论书籍,大量的被翻译和介绍;一般读者对于理论学习的要求,较之抗战刚开始时更为迫切;因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一般民众文化水准的提高;以及‘中国化’‘通俗化’‘大众化’的口号的提出和实践……的这些方面。”^②这些表现都是抗战文化结出的累累硕果。

文学方面。抗战初期,为了更好地发挥宣传鼓动作用,战地通讯、报告文学、街头剧、朗诵诗、通俗文学等小型作品大量兴起。当时不论期刊、文艺杂志,或是报纸的文艺副刊,报告文学份量最多,诗歌创作也大量产生,出现了继五四之后的第二个诗歌高潮。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创作周期较长的小说也迎来了丰收季节。首先,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萧红、骆宾基、姚雪垠、张恨水等著名作家都写出了新的长篇小说。如茅盾有《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等,巴金写了《火》、《激流三部曲》中的《春》和《秋》等,老舍则完成了《四世同堂》这部具有中国抗战史诗性质的长篇巨著以及多种通俗文艺、剧本和短篇小说等。陕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4册,第453册。

^② 《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第230页。

甘宁边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显示出新的风貌和特色。如赵树理创作的《李有才板话》被誉为“解放区的代表之作”,深刻揭示了抗战时期解放区农村的状况,在文学创作史上具有一席之地。

戏剧方面。在抗战文艺中戏剧是最活跃的,成果也最显著。抗战初期,广大戏剧工作者组成各种形式的演剧队、宣传队,纷纷走向战地和农村,宣传抗战,鼓舞抗战。基于当时的时代气氛和演出条件,活报剧、街头剧、独幕剧便应运而生。除少量的剧作家的作品外,大多数是业余创作,其产量之多,无法精确统计,少数剧本保全下来,至今见到的仍不下百余种。据统计,“孤岛”时期上海剧作者先后问世的剧作达200余部,先后出版的单行本和剧作也有六七十种,且不乏富有特色和具有特殊意义的佳作。1939年到1940年间,“孤岛”上的业余剧团共有40多个剧团参演了100多个剧目。抗战期间,重庆上演的戏剧多达250多场。郭沫若的《棠棣之花》1941年11月在渝公演,演出8场,观众达万人。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在渝演出25场,观众达2.2万人^①。在桂林,欧阳予倩写的《忠王李秀成》演出23场,观众竟达3万余人^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南剧展”,它集中了西南8省戏剧团体30多个,戏剧工作者近1000人,演出剧目近60多个,观众达10万人次,时间持续3个月^③。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更是蓬勃发展。1938年至1945年,延安演出的剧目达189个^④。文艺整风以后,

① 肖效钦、钟兴锦主编:《抗日战争文化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下同),第269~274页。

② 潘其旭著:《桂林文化城纪事》,漓江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③ 魏华龄:《欧阳予倩与桂林剧运》,《广西日报》1979年12月23日。

④ 王地子整理:《延安演出剧目》,《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341页。

延安很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其中,《兄妹开荒》成为秧歌剧的代表剧目,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新歌剧《白毛女》则成为解放区影响最大、流行最广、最受欢迎的优秀剧作。其他各根据地中,以晋察冀边区为例,在1942年的对敌攻势中,抗敌剧社、西战团、联大文工团、四分区火线剧社、冲锋剧社、铁血剧社、七月剧社等七个剧团,曾先后在游击区及敌占区演出315次,吸引观众12.5万余人,编写大小剧本188个^①。

电影方面。抗战爆发后,上海、香港、南京、武汉、太原等电影据点的电影工作者纷纷动员起来,投身于民族抗战中。上海立即组织了上海电影界救亡协会和电影编导人协会。“八一三”抗战后,大多数影人加入到上海救亡演剧队的12个队中,奔赴硝烟弥漫的战场。另有部分人参加了设在武汉的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还有部分人参加了设在南京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少数人去了香港。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后,中制、中电迁到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另外还有山西的西北电影制片厂,后因山西战事吃紧也迁到重庆。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中制有编导10余人,演员数十人加上综合技术人员和事务人员共约500人。中电有编导5人,演员20余人,技术工作者60余人,全场共百余人。西北制片厂,仅有编导2人,演员数人,全厂约50人。这些电影工作者在艰难境况下,拍出了不少高质量的片子。据统计,从1939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中制共摄制故事片17部,新闻纪录片及科教片12部;中电共摄制故事片3部,新闻片23部^②。另外,延安也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白手起家,拍摄了纪录片《延安和八路军》等。

音乐方面。抗战爆发后,各群众团体、机关、学校纷纷组织歌

① 《晋察冀文艺运动大事记》,《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

② 肖效钦、钟兴锦主编:《抗日战争文化史》,第275~276页。

咏队、合唱团,成为抗战期间全国最多的一种团体,难以计数。如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的歌咏宣传日,就有近100个歌咏队参加。有了歌咏队还要有歌曲。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在人民坚强毅志的感染下,广大音乐工作者倾注满腔激情创作抗战救亡歌曲,如《全民抗战歌》、《大刀进行曲》、《前进进行曲》、《上前线》、《打豺狼》、《游击队歌》、《游击队进行曲》、《我们都是神枪手》、《保卫祖国》、《抗战到底》、《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八路军进行曲》、《新四军军歌》、《东北抗日联合军歌》、《保卫黄河》等。在全国各地到处弥漫着抗日歌声,鼓舞全国军民的战斗。冼星海、光未然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等气壮山河的歌曲,全国上下到处都可以听到救亡歌声。

美术方面。抗战时期,影响较大的美术活动是漫画和木刻。“七七”事变后,上海漫画界首先动员起来,组织了漫画界救亡协会,并组织了漫画宣传队。撤到武汉后,漫画宣传队归属第三厅领导,赶赴内地战场用极富鼓动性和号召力的漫画,唤起民众和士兵的救国激情,直至1939年第三厅解散,三年中,这支漫画宣传队创作绘制了近千幅画,展览百余次。漫画界的另一个重大举措便是1945年3月15日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的《漫画联展》,这次展览以丰富的内容,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各种阴谋,鼓舞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产生很大影响。另外,抗战期间,由于物质条件极差,图画翻版难度大,许多报刊都喜欢采用木刻原版,致使木刻副刊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特别是1939年至1943年间,报纸木刻副刊出现了空前旺盛的景象。除了木刻副刊外,还有大量的木刻刊物出版,举办了不少全国性的木刻展览会。

出版方面。抗战爆发后,出版事业面临着许多困难,但中国的出版界仍致力于抗战书刊的出版。“孤岛”上海的出版界尽管一再遭受日寇的封杀,但仍然出版了《鲁迅全集》、《资本论》、《二十年的苏联》等多种书籍。在重庆,报纸增加至20多家种,书店等出版发

行机构发展到 400 多家。在成都,创办发行的期刊近 200 种之多。在贵阳,出版的报纸也达到 20 多种,图书出版发行机构达到 15 家。在昆明,李公朴创办的北门书屋及北门出版社影响较大,它在成立后两年多时间内就出版各种读物 30 多种。桂林的出版发行事业更为发达。据不完全统计,共有书店、出版社 179 家,印刷厂 109 家,每月印刷用纸 1.5 万多令,每月排字三至四千万。出版发行各类杂志近 200 种,报纸也从原来仅有的一家《广西日报》增加到 11 家。专著的出版更是十分可观,仅文艺专著就出版了 1000 多种,还有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出版、各种社会科学著作的出版,等等。据当时有人统计,抗战期间国统区书刊,有 80% 是在桂林出版的^①。

教育方面。由于战争的破坏,国内学校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有的被炸毁,有的向内地搬迁,有的停办。日本帝国主义还竭力推行奴化教育,使抗日战争时期的教育事业处于难以为继的境地。但是中国的教育事业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仍然顽强地坚持了下来。卢沟桥事变后,平津、宁沪杭等大中城市的大专院校迁移到西南或西北内地,并重新组合。如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到昆明,组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北师大、北平大学、天津北洋大学等迁至兰州,组成西北联大;复旦大学、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也都迁往内地。据统计,当时全国有 108 所大专学校,其中有 94 所内迁。随同学校内迁的还有许多师生和著名文化界人士。如著名教育家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陶行知,哲学家熊十力、冯友兰,经济学家马寅初、王亚南,史学家翦伯赞、顾颉刚,文学家茅盾、巴金,艺术家徐悲鸿、黄宾鸿,科学家华罗庚、李四光,等等。据统计,当时内迁的高级知识分子有十分之九,中级知识分子

^① 赵家璧:《出版界简况及出版业发达原因》,《大公报》(上海版)1947年5月18日。

有二分之一,初级知识分子有十分之三以上。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尽管非常贫困,但也办起了多所大学,如延安地区就有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艺、青训班、女子大学、马列学院、研究院等。这对于国民教育的维持,传统文化的延续,现代知识的传授,人民素质的提高,以及抗战所需的技术人才和新中国建设人才的培养,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社会科学方面。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哲学等领域都出版了大量成果。在历史学方面,许多学者通过研究整理浩如烟海的史籍,反映“有意义之史学”精神。如陈寅恪写成了《唐代政治史论稿》,钱穆出版了《国史大纲》。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成就则更为显著。如郭沫若相继完成了《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历史人物》等著作和多种著名历史剧。他的《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并被列为延安整风参考书。翦伯赞出版了《历史哲学教程》后,又迅速投入到《中国史纲》的写作中。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华岗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著作也相继问世。在延安,范文澜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张闻天主持编写了《中国革命运动史》,等等。这些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研究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或思想史的力作,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

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辩证法的法则及其运用》,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胡绳的《辩证唯物论入门》,等等。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精品。另外,许多学者或者阐述中国传统哲理,或者研究外国哲学,取得了显著成就。如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朱谦之的《周易哲学》,金岳霖的《论道》,范寿康的《教育哲学》,潘光旦的《优生学原理》,朱光潜的《诗论》,闻一多的《楚辞疏正》,冯友兰的《新理学》、《新事理》、《新世训》、《新原人》、《新原

道》、《新知言》，等等，创造了抗日战争时期学术研究的繁荣。。

自然科学方面。一些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成绩斐然。华罗庚《积累素数论》、周培源《激流论》、苏步青《曲线射影概论》、吴大猷《多元分子振动光潜与结构》、陈建功《富里级数考察》、杨钟健《许氏禄丰龙》、吴定良《人类学论文类》等论著，都曾获奖。李四光在地质学、竺可桢在气象学、姜立夫在数学、张钰哲在天文学、曾昭抡在元素有机化学、秉志在生物学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成就。另外，还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派常书鸿前往研究和护理祖国珍贵文物。延安也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进行研究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文化事业的发展除了以上列举的成就外，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文化发展的区域得到扩大。战争迫使大量的文化机关、新闻机关、图书馆、教育团体、学校以及大量的文化人迁往内地，使得全国各个地方的文化杂糅、渗透、交流、融合在一起，改变了中国文坛过去仅以北平、上海为中心的状况，形成了多个重心并存的局面。第二，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得到广泛的提高。每逢歌咏戏剧表演，民众都蜂拥去剧场，热情比参加游神会更高，而且常常被歌咏戏剧的情节所吸引，并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尽情地展露喜怒哀乐。普通民众的这些表现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文化已经渗透到百姓的生活之中，已经成为他们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时期。与此相应，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也逐渐充实和完善起来。1940年1月4日至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礼堂召开。1月4日，王明作了《文化统一战线》的报告；1月5日，张闻天作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新中华报》摘要报道了

这两个报告阐述的主要观点。毛泽东的报告本来安排在1月6日,但由于生病直到9日才作了《新民主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讲话。会后,《中国文化》这一专门研究文化问题的学术刊物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在第二期发表。1940年1月20日,《新中华报》上全文刊载《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这些报告和宣言集中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成为标志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文化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文化政策成熟的历史性文献。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性质,这些文献明确地规定它应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在当时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新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宣言”论述了文化运动在抗战中的作用、“当前”文化阴谋活动的出现和“今后”文化界急需担负起来的任务。在论述“今后全边区文化界与全国文化界共同努力的方向”时,“宣言”提出:“目前文化运动的总的任务是为着抗战建国的胜利”,为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也就是为创造广大民众所需要的新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斗争”^①。张闻天提出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和中心任务。他认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服从于抗战建国的政治目的。这是抗战建国的一种重要的斗争武器。其目的,是要在文化上、思想意识上动员全国人民为抗战建国而奋斗,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以最后巩固新中国。”因此,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中心任务,便是“怎样更能使新文化为抗战建国服务,怎样在抗战建国中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②。毛泽东关于新民

^① 《新中华报》1940年1月20日。

^② 洛甫:《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解放》第103期,1940年4月10日。

主义文化性质的概括则更为精炼：“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①。这些阐述，从性质上界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属性，以示与其他文化的区别。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点，这些文献都强调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宣言》在论述“应努力提高文化的一切部门”这一任务时指出：“这样努力从各方面来提高文化的各部门，为创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也就是为创造广大民众所需要的新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斗争。”这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点被清楚地概括出来。王明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概括最简单，也最少被人知道。他指出，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要“创造一种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民主的，基础是科学的，服务对象是大众的。”^②张闻天的概括最为详细。他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必须是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文化，要完成这个任务，它必须是：（1）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2）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3）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4）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

① 《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② 《王明同志报告文化统一战线问题》，《新中华报》1940年1月20日。

提高大众。”他强调,“上述新文化的四个要求是有机的联系着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不能割裂的新文化的整体^①。这些阐述,既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要求,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精辟地论述了中国文化革命的特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三大纲领。即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具有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的文化。他不但详细阐述了每个纲领的题中之义,还结合中国古代文明、外国进步文化以及现实需要,就如何实现每个纲领作出了具体阐述。他提出,所谓民族的,即“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具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所谓科学的,即“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阐述与张闻天、王明以及“宣言”的概括略有不同。在毛泽东的阐述中,文化的大众化涵盖了民主化的意思。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大众化不仅是文化发展体现民主的重要途径,而且也决定着文化的民主内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性质本身就体现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主属性。因此,毛泽东在概括新民主主义文化特点时没有单独将民主作为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提法相并列,但这决不意味着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民主的矛盾。事实上,毛泽东也强调过文化发展的民主问题。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给革命文艺家

^① 洛甫:《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解放》第103期,1940年4月10日。

以充分民主自由”，他还要求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①。从这些角度看，毛泽东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方面概括新民主主义文化特点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因而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结论性概括。

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1940年初夏，茅盾在延安各文艺小组会上的演说中高度评价了毛、张两文：“近年来，或者说，自抗战以来，关于文化如何服务于政治，我们抗战胜利以后将要建设怎样一个新的中国，新中国的新文化又是怎样一种面目、性质，以及近二十年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是向着怎样一个方向发展，目前以及今后任务是什么，——这一切有关中华民族文化百年大计的问题，似乎也有不少人士零零碎碎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那些意见也有不少是很好的，然而像上举两篇文章那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对过去作了精密的分析，对今后提给了精辟的透视与指针的，实在还不曾有过。所以，这两篇文章的适当其时的出现，可说是中国新文化史上一件大事”。^②但是当时，作为团结进步文化人总目标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提出后，并没有产生很大反响。因为“当时许多文化工作同志，并未深刻理解，文委亦未充分研究，使其变为实际。且强调了文化人的特点，对他们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加以当时大后方形势逆转，去前方困难，于是在延安集中了一大批文化人，脱离工作，脱离实际，加以国内政治环境的沉闷，物质条件困难的生长，某些文化人对革命认识的模糊观点，内奸破坏分子的暗中作祟，于是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③为了清算这些偏向，端正文艺工作者的思想，1942年5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2、867页。

② 茅盾：《论如何学习文学的民族形式》，《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

③ 转引自唐天然：《有关延安文艺运动的“党务广播”稿——兼及由此引起的考查》，《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2期。

月,在全党整风的同时,党中央在延安开展了文艺界的整风运动。5月2日至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三次发言,连同会后一周内的两次补充阐述,形成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时,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讲话》更系统、科学、辩证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艺思想,进一步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这些讲话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明确阐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并从多方面探讨了服务的途径,如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阐明了革命文艺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地位,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方向问题,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通过学习《讲话》,广大文艺工作者不仅看到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同时也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不仅初步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怎样为的问题;不仅在艺术上有了新的、更符合实际和时代要求的追求,而且在思想觉悟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此后,广大文艺工作者以《讲话》为指针,背起背包深入到部队、农村、工厂体验生活、熟悉生活,挖掘民间的优秀文艺宝藏,并从群众实践及其实际战斗与生活中总结经验,搜集素材,加以提炼,很快出现了一个文艺宣传繁荣与活跃的新时期。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化运动的经验总结。毛泽东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时期,如果没有中国革命两次成功两次失败的经验,他不可能写出像《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著作。同样的道理,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化运动的实践经验,也难以形成成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形成,也是抗战文化发展取得的成就,而且是更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成就。

3.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文化的主要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发展的特殊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文化,揭示着追求光明和正义的目标、联系社会和民众的原则、统一救国和革命的理念、体现反帝和反封建的内容,代表着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也在领导抗战文化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坚持统一战线思想是推动抗日文化前进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法宝。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事业,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的法宝,文化战线是抗战的一条战线,坚持统一战线是推动抗日文化前进和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法宝。在抗日文化队伍的构成上,中共中央强调:“对于文化运动的进行,应该联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资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共同去做”,“动员各阶层知识分子各部门文化人与广大青年学生加入这一运动”^①,“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②抗日文化队伍里不仅有党的文化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还有除极少数汉奸之外的一切抗日不反共的小说家、戏剧家、音乐家、美术工作者等,包括国民党文化人。在抗战宣传上,不仅报道歌颂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实,而且报道歌颂国民党正面战场及一切英勇抗战的国民党将士,如《新华日报》对1939年12月桂南会战中的昆仑关大捷、1941年1月上高战役的胜利等都进行了详细报道。在联合同盟者上,不仅注意联合中间党派人士、无党派爱国人士,如对待冯友兰、贺麟,周恩来指示:“民族大敌当前,在千千万万种矛盾中间,学术理论界也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和冯友兰、贺麟在阶级立场上,矛盾固然是尖锐的,但毕竟不是主要矛盾。当前,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48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35页。

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理论,我们斗争的锋芒应该对准陈立夫的《唯生论》”^①。更注意多方面加强对国民党民主派冯玉祥、李济深等和地方实力派如桂系白崇禧、云南龙云等的工作,争取他们对抗战文化的多方支持。这些事实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思想和政策成功运用在文化工作中的具体表现,贯彻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的思想。^②

第二,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灵活的工作方法是推动抗日文化前进和发展的有效保证。由于各党派的政治立场不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情况始终非常复杂。首先,国民党由于害怕其他势力尤其是共产党力量的增强从而削弱其统治地位,因而一直程度不同地进行着反共活动,不断制造国内纠纷和国共摩擦。又如桂系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也与国民党中央矛盾重重,时常发生利益冲突。在这种复杂的形势面前,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灵活的工作方法对于推动抗日文化前进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③在具体方法上,就是要“善于使上层工作和下层工作相配合,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党外的联系和党内的联系相配合。”^④正是由于这些正确和灵活的工作方式,使抗战文化长时期保持着统一战线的联盟特点。

第三,坚持抗战文化的民众化是抗日文化焕发蓬勃生命力的根本保证。“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五四运动以

① 侯外庐:《初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2~1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8页。

④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1页。

来,文艺一直在尝试着走向民众,与民众相结合,虽然取得很大的进步,但始终缺乏有效的途径和切实的突破口。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文化运动中不断思考探索,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实践中取得成功的经验。综观整个抗战期间,凡是文艺与民众结合得好的地方,抗战文化运动便高涨;凡是抗战文化运动高涨的地方,便是文艺与民众结合得好的地方。文艺终于实现了与民众的密切结合,民众成为抗战文艺取之不尽的生活源头,成为推动抗战文化焕发蓬勃生命力的根本保证。这一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形成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实践依据。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篇集中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强调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文化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必须接近人民群众的文化大众化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分量。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文化经验的深刻总结。

第六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旧文化的改造和新文化的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的急剧转型引发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革。文化建设在社会转型时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要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认同,必须在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清除旧思想,改造旧文艺,传播新观念,推行新文化教育。“破旧立新”成为这一时期文化领域斗争的主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对旧文化事业的改造,新文化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推行都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事业迈出了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第一步。

社会转型与文化事业的改造

1. 制度变革与社会全面转型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20世纪中国经历的第二次历史巨变。伴随这一历史巨变而来的是社会的全面转型,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新形态的构造。中国现代文化在这样的制度变革中开始了社会总体上的文化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方面的

工作都在开创,都在发展”^①。政治上,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体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的确立,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权保障,也从制度上、组织上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提供了保证。经济上,“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②。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种既体现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又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为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社会改造奠定了基础。文化教育方面,“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③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基本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表明,中国的发展已经脱离了旧社会的轨道,转向新的途程。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转型还表现在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它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④四个阶级的联合专政第一次使占中国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社会结构的变化对社会产生的震荡,对社会制度、人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关系等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社会关系也由此发生了调整。社会风气的改观是制度变革的必然结果。国民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下同),第41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69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下同),第11页。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页。

党政权腐败统治遗留的污浊社会风气,随着新的制度诞生而失却了存在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果断措施,向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开战,关闭妓院,改造妓女,打击赌、毒;向封建迷信宣战,摧毁反动会道门和愚弄人民的巫婆神权势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完成了这些艰苦的社会改造工作,从而净化了社会风气。与此同时,大力倡导新风尚,弘扬正气,以新的价值观念营造社会风气。新中国成立初期,团结互助、一心为公、积极进取、向上拼搏、艰苦奋斗等社会风尚由于共产党的大力倡导而日益成为社会的主导精神力量。

制度变革促进社会转型,为文化建设创造了全新的历史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仅要在制度变革中完成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和经济平稳过渡的任务,而且要实现文化转型的任务。文化作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必须适应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的需要。

2. 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

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次大跨度的飞跃。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的这场制度变革,依赖的是强大政治优势和革命战争的威力。虽然完成制度变革的过程中,也相应开展了一定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但基础十分薄弱。因此,经济、文化的落后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的国家后面临的客观现实。中国共产党要完成文化转型,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急剧变革的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现实,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多元并存的历史局面。一方面,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全社会宣传马列主义,以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人们的头脑,既是巩固新政权的必要措施,又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刘少奇指出:“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教育自己和全国的人民。这就是

今天在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①另一方面,新政权在政策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小私有经济和农民的个体经济存在,而且帮助和扶持它们发展,“既然承认它们的经济存在,就必须承认它们思想的存在与合法。”^②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旧的思想还在一定的时期内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封建主义思想遗毒严重地影响着广大人民群众,帝国主义长期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影响也并未从人们头脑中根除,特别是那些受“欧风美雨”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长期形成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念和思维方式必然要反映到文化上来。

文化多元是现代文明发展的趋势,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也必然要走这条道路。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不是建设性的创造,而是历史性的遗留。它表现的是不同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的对立和冲突。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既要承认这种文化多元的客观现实性,又不能维护它的合理性。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历史遗留的多元文化中,阻碍新政权建设的思想成分十分严重,沿袭这种多元文化结果必然将危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多元文化中的主次地位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由衷的敬佩,赞成走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主流文化的树立。另一方面,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群中,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缺乏了解的占大多数,不少人对新政权还有疑虑,再加上一些新政权敌对分子的恶意煽动破坏,给中国共产党树立主流文化带来许多困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中首先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

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戏曲、电影等都不同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第82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82页。

程度地表现为思想和艺术的多样性。一方面,共产党倡导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所接受,一大批歌颂新政权,赞扬取得革命胜利的共产党和新时代的工人、农民等题材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另一方面,由于很多文化工作者对马列主义不甚了解,其作品很不成熟。还有一部分从旧社会过来的文艺工作者,继续保留自由主义的创作风格,试图站在“超阶级”、“客观主义”的立场去反映现实,这些作品所宣传的内容和倾向与共产党的文艺政策相左,甚至格格不入,在群众中产生了不良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的这种现实,要求新政权适时地进行调整。

再从教育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也面临转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普及工农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和适应经济恢复与发展的要求,党和政府着手对旧教育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如接管旧政府公立和私立学校、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加强人民政府对各类学校的统一领导;改造旧教育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的办学指导思想;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帮助教育工作者确立为大众服务的新教育思想;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全面改革教学;进行院系调整,全面改革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布局等。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初步建立起新中国的教育体系,即以培养各级各类专门人才的全日制普通教育系统(由基础教育、师范教育 and 专业教育组成)和提高劳动者科学文化水平的成人业余教育系统(主要包括职工教育、农民教育、干部教育以及扫盲教育等组成)。但是,旧的教育体系、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观念尚未从根本上转变。中小学教育方面,私立学校与人民政府公办的学校同时并存,高等教育方面,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还占较大的份额,旧教育的教育理念也因袭西方教育而严重脱离实际。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的过渡性现状还不能完全适应政治、经济变革的需要。

以上情况说明,新的意识形态并不会随着新的上层建筑的建立而自然地确立起来。新政权和新的经济制度的建立,只是为新

的上层建筑的确立开辟了道路,而一些过时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意识形态的这种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思想阵地,要使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方针得到确实的贯彻,新政权除了要开展大张旗鼓的宣传和心平气和的说服工作外,更需要加强对旧文化的批评斗争。

3.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变革中的文化改造

早在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就阐明了旧文艺的改造问题。他说:“凡是在群众中有基础的旧文艺,都应当重视它的改造。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这种内容的改造而来的,对于旧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与统一。”^①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指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②1951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方针。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旧有文化事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加强了对三大国营电影制片厂(东北、北平、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使其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的电影拍摄基地。另外,对私营电影制片厂(昆仑、文华、大同等)采取了团结、帮助、改造的积极政策,引导他们向正确的道路前进。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了《白毛女》、《钢铁战士》等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影片,也生产了一些有争议的影片,如《荣誉属于谁》等,特别是电影《武训传》的公演,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种状况引起了文艺界领导的高度重视,认为“造成电影工作发展中如此严重的障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54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1页。

碍,其根本原因,是由于缺乏电影剧本”^①。为此由文协和电影局发起组织了第一届全国电影剧本创作会议,会议要求全国作家积极参加电影剧本的创作,以改变目前电影剧本严重落后的现象。并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方案:“加强思想领导,改进剧本创作的组织领导工作”,“改进关于发动和组织全国作家创作电影剧本的工作。”^②同年,政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指出:“在电影艺术创作上,一方面要反对粗制滥造的现象,另一方面又不可能有脱离实际的、不恰当的过高要求”,“在题材的选择上,应扩大范围,同时注意体裁和形式的多样性”^③。此后中国的电影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据统计,1952年主要的故事片只有《南征北战》,1953年拍摄故事片达到8部,1954年20部,1955年23部,1956年24部^④。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电影事业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戏曲是中国人民最喜爱的艺术,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贯对戏曲改革高度重视。1942年毛泽东就为延安平剧院题词“推陈出新”,鼓励他们进行戏曲改革。1949年7月中国戏曲改进会成立前夕,毛泽东又重为该会题词“推陈出新”。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改革更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普遍开展起来。1950年11月召开了全国戏剧工作会议,周恩来代表政府提出了戏曲改革的任务。他说:“要以歌颂人民反映人民的真实生活、教育人民的戏曲报答人民,要把人民的力量鼓舞得更雄伟,这就是戏曲改革的光荣任

① 社论:《作家要为创作电影剧本而努力》,《文艺报》1953年第4号,第3页。

② 记者:《加强电影剧本创作的组织领导工作》,《文艺报》1953年第4号,第5~7页。

③ 转引胡星亮、张瑞麟主编:《中国电影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 舒晓鸣主编:《中国电影艺术史教程》,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务”。这次会议检讨了各地戏剧改革的情况,并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全国戏曲改革的初步经验和教训,颁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要求“戏曲改革应以发扬人民的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凡是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劳动人民的戏曲应加以反对。”^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戏曲改革以“改戏”、“改人”、“改制”为三大任务。其中,“改人”是根本,“改戏”是目的,“改制”是保证。从1951年开始,在文化部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各地私营戏曲班、社都逐步地改造为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剧团,从而废除了原班、社中的封建隶属关系。在“改制”的同时,全国各地、各级文化机关还为艺人们举办了各种学习班,以帮助艺人提高文化修养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在“三改”工作中,“改戏”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审定和整理传统剧目;二是编创新的历史剧;三是创作现代戏。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经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各种艺术剧种大放异彩。1952年10月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的成功举办,集中展示了戏曲改革的成果,并且成为推动戏曲改革的有效手段。此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全国几十个省、市和地区先后举办了类似的活动,使戏剧改革真正形成了一股热潮。在这股热潮中,现代戏的创作在京剧领域获得突破,出现了《三座山》、《阿黑与阿诗玛》等剧目。传统剧目的整理和改编也出现了昆剧《十五贯》等优秀剧目,显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戏剧改革的最新成就。此外,经过“改人”,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如梅兰芳、程砚秋等也迎来了艺术生命的春天。

^① 《人民日报》1951年5月7日。

对旧教育的改造是更艰巨的任务。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教育改组的总方针,以及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首先,接管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各级各类学校。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在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立即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各级学校,并派遣干部到这些学校帮助工作。在接管以后,人民政府对这些学校进行了改革,如取缔学校内的反动党团组织,建立进步的革命教工组织;废除“党义”、“公民”、“军事训练”等一些课程,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课程;实行学校向工农开门、教育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取消国民党建立的训导制度,组织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等。第二,清理所有接受外国津贴学校。在中国,帝国主义通过办教会、医院、学校和慈善机构等方式,对中国进行奴化思想教育,是文化侵略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企图利用这些机构继续反动宣传活动,拒不服从中国政府的規定。为了扫除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干涉,维护中国人民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自主权,人民政府于1950年12月,颁发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决定》,决定上述机构停止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津贴,实行自办,或由政府接办,以此来肃清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侵略的影响。同时,政务院还公布了《接受外国津贴以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要求接受外国津贴以及外资经营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限期内向当地政府登记,接受审查。1951年1月,人民政府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拟定了处理和接受这些学校的原则、方法和具体政策措施。到1951年年底,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都由人民政府接受。其中接受后改为公办的有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12所院校,接受后改为自办并由政府予以津贴的有东吴大学、齐鲁大学等。此外,还接受了外国津贴的中等学校514所,初等学校1500余所,以及幼儿园、育婴堂、

孤儿院等。总之,对旧有教育制度的改革,实现了人民政府对所有学校的有效领导和管理,为确立新中国的教育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

旧中国的教育事业,不仅教育思想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影响,而且教育观念陈旧。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学校成为培养官僚买办的场所。新中成立后不久,人民政府于1949年12月召开的首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之后,又先后于1950年6月召开了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同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这一系列教育会议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的教育必须为劳动人民服务,学校必须向工人农民及其子女开门的方针。周恩来指出:“人们的文化水平普遍需要提高,而首先需要提高的是工人农民,”为此,“我们必须在教育观念上来一个改变。”^①转变教育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使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使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因为“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大多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因此,“全国的高等教育都要重视实践,都要提高理论水平。”^②贯彻新中国的教育,“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③,以满足人民群众“打一个文化翻身仗”的迫切愿望。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形式、各种类型的工农文化教育普遍地开展起来。工农教育的主要对象为农民、工人和工农干部。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开展冬学运动,1949年12月,教育部发出《关于1949年冬学运动的指示》,指出:“农村冬学运动是团结教育广大农民的有力武器之一”,冬学“这种适应广大群众需要的与实践工作密切结合着的教育方式,今

① 《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第28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页。

③ 参见《马叙伦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2月23日。

后应该在全国农村中普遍推行”^①，规定冬学的“文化教育应以识字为主”，以后逐步扩展到“以识字学文化为主，配合时事、政策教育和生产、卫生教育”。此后，农村的冬学运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仅1949年参加学习的学员在1200万以上。随着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一年一度的季节性冬学运动已经不能满足翻身农民学习文化的要求，于是各种形式的文化补习班、农民业余学校、工农速成中学等常年业余学习取代了冬学运动。人民政府先后颁布了《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1950年12月21日）、《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办法》（1951年2月10日）等文件，对扫除农村文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培养农村干部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对工人的文化教育问题。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就确立要大办工人补习教育的方针。1950年6月，政府专门发出《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指出：开展职工业余教育是提高广大工人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的最重要方法之一。职工业余教育的对象是工厂企业中的职工，内容以识字为重点，采取多种多样并能经常保持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职工业余教育取得明显的效果，据1955年的统计，当年全国参加学习的418万职工中，长扫盲的占37%，初等学习的占38.4%，初中占23.9%，高中占0.6%。职工文化教育的水平和质量明显提高。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农干部教育也开展得有声有色。1950年12月，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班的指示》，要求给予工农干部适当时间的文化教育。《指示》下达后，各级党政部门都高度重视，建立专门机构负责，使干部文化教育开始走上正轨。据统计，1951~1952年的两年间，全国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共有十几万名干部参加文化学习,有100万名干部接受了专业培训^①。工农教育的广泛展开,奠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础。

意识形态的斗争对文化建设的影响

1. 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斗争

从1951年到1955年,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先后开展了几次较大的斗争,先后进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唯心论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几次批判运动虽发端于文艺领域,但涉及到的范围却十分广泛,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转型中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史学、教育等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 关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

电影《武训传》介绍的是历史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事情。1951年初,影片上演后,得到文艺界、知识界的好评。赞誉者认为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②,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③。配合电影的上演,小说《武训传》、《千古奇丐》和《武训画册》相继出版,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武训热”。批评者认为,“《武训传》所表现的题材是根本不值得表现的一个题材,在今天,它歌颂了不应该歌颂的人物,它表扬了不必要表扬的事迹”,^④一场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在文艺界热烈展开。

文艺界关于电影《武训传》的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在

① 《中国教育大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下卷),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5页。

② 董渭清:《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光明日报》1951年2月26日。

③ 孙瑜:《论导〈武训传〉记》,《光明日报》1951年2月26日。

④ 贾霁:《不足为训的武训》,《文艺报》第4卷第1期。

观看影片后,认为电影《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它关系到如何看待中国历史,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大问题。他不同意文艺界、教育界某些人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立场,更不满一些党员,主要是一些文艺界的负责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毛泽东支持对电影《武训传》开展批判,指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及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们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①5月20日,《人民日报》发出号召:“每个看过这部电影和看过歌颂武训的论文的共产党员都不应对这样重要的思想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都应当积极起来自觉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②此后,中央和地方各文化、宣传、教育部门,各民主党派都发出通知,号召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重视并参加这次讨论。在5、6、7三个月,全国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批判高潮。这次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武训是什么样的人物?第二,《武训传》是什么样的影片?第三,歌颂武训和《武训传》反映了什么问题?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性大规模的批判斗争,它涉及到文学艺术、教育、历史、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这次批判运动因电影《武训传》而起,在批判运动中,由对武训其人的评价和《武训传》所宣传的道路等问题的探讨,逐步转移到对文艺界思想的整顿。1951年11月,中宣部提出了《关于文艺界整风学习的报告》,指出:“我们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借以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认真建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的领导。”^③11月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66、167页。

② 短评:《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人民日报》1951年5月29日。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462页。

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健全的方向发展。”^①此后,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运动扩展到全国,到1952年2、3月间达到高潮。“三反”运动开始后,文艺界的中心工作也转移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上,文艺界整风运动基本结束。对《武训传》的批判以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结束而告一个段落。

(2) 由《红楼梦》研究的争鸣到对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1951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后,有关部门整理出版了一批古典名著,新版《红楼梦》就是其中之一。红学专家俞平伯整理出版了《红楼梦研究》和发表了《红楼梦著作年代》、《红楼梦简论》等一系列文章。俞平伯上述著作的出版,满足了读者的需要,对了解和研究《红楼梦》具有积极作用。但俞平伯的一些观点也引起了争论。

1954年,李希凡、蓝翎两个青年合写了一篇批评文章,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他们写信给《文艺报》询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的观点,《文艺报》没有答复。他们又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教师,获得支持,山东大学《文史哲》1954年9月号发表了他们的文章。文章批评俞平伯否定《红楼梦》的“反封建倾向”,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江青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人民日报》编辑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不予转载。后来《文艺报》同意转载,主编冯雪峰加了“编者按”,说文章的作者“是两位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观点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521页。

提出批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①。10月，《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的另一篇文章，编者也加了“按语”。

两位小人物的勇气和批判意识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得到了他的赏识。毛泽东对《光明日报》、《文艺报》的谨慎做法极为不满，对《文艺报》的按语逐条反驳，并且给中央政治局和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态度鲜明地支持李希凡、蓝翎。他说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并且表示不能容忍“俞平伯的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②毛泽东的信迅速被传达，此后报纸上有人撰文批俞平伯。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似乎并未因三十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和它反映在思想意识上的深刻变化而有多大改变。”^③10月28日，袁水拍发表《责问文艺报的编者》一文，指责文艺界某些领导人长期以来对资产阶级唯心论表现了容忍麻痹态度，对资产阶级的权威学者表示委曲求全，而对生气勃勃的马列主义思想则摆出老爷态度。并责问道：“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④这篇文章的发表开启了全国批俞平伯斗争的阀门，从此，批俞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随着批判的深入，矛头延伸指向胡适。有批评者认为：“俞平伯以隐蔽的方式，向学术界和广大青年读者公开地贩卖胡适的实

① 《文艺报》，1953年第18期。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646页。

③ 钟洛：《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3日。

④ 《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8日。

验主义,是它在中国的学术界借尸还魂。”^①斗争的矛头之所以由批判俞平伯转向胡适,是“因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完全是继承胡适的传统。‘擒贼先擒王’,几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思想界,如果要找一个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当然是胡适。”^②在中央统一部署下,从1954年12月开始,全国各地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党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目标转向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各高等学校举行各种讨论会、座谈会、批判会,各地报刊在极短的时期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批判文章。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和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战线上的一场重大斗争。这场批判运动从积极意义上看,符合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权威地位的需要。但是,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和上纲上线的斗争方法也对后来的意识形态工作产生了消极影响。

(3)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

胡风是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其最有影响的文艺观点有:“作家的自我扩张”、“写真实”、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等。1952年全国文艺界整风,有读者写信给《人民日报》和《文艺报》,要求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1952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实质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③。7月,胡风给周恩来写信要求讨论他的文艺思想。从9月6日到12月16日,北京先后召开了4次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胡风在个别问题上做了检讨,但在根本问题上仍认为自己是正确

① 李希凡、蓝翎:《走什么样的路》,《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4日。

② 嵇文甫:《胡适唯心论观点在大学中的流毒》,《新史学通讯》1955年元月号。

③ 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

的。1953年初《文艺报》先后发表了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①。《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迅速转载,把批判胡风文艺思想斗争推向全国。

1954年3月至6月,胡风在他的朋友路翎、绿原、谢韬等的帮助下^②。写成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7月递交中央政治局。《报告》约30万字,被称为“三十万言书”。《报告》指出:“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③“五把理论刀子”本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后来被简单化为胡风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五把刀子”。此后中央组织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1955年1月,中央在中宣部《关于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上批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必须加以彻底地批判。”^④各地都分别召开作家、文艺工作者、大学教师等座谈会、讨论会。从1月至4月,中央和地方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指出“胡风在十多年来所形成的全部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是以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⑤。

① 林默涵:《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文艺报》1953年第2号。

② 这是一批与胡风持有同样文艺观点的文艺、文教工作者,这批人后来均被打成“胡风分子”。

③ “五把理论刀子”,即“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有着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决定着作品的价值”等。

④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27页。

⑤ 鲍昌:《批判胡风哲学思想上的主观唯心论》,《人民日报》1955年3月3日。

郭沫若认为胡风在“意见书”中所说的“五把刀子”，“是一个实际上反对社会主义的纲领”^①。在这之后，批判文章的调子越来越高，言辞越来越激烈。

从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到公开批判胡风的“三十万言书”，这一时期批判胡风的文章大多限于思想领域之内。但到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所谓《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后，胡风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转向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算。这批材料是根据舒芜交出的胡风在1943年到1950年间写给他的34封信的内容摘编成的^②。毛泽东为这批材料撰写了“编者按”，给胡风派定性为“反党集团”。自此之后，开始了政治声讨。5月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第三批材料，对胡风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定性：“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这样，胡风文艺思想问题正式升格为“反革命”问题，原来认为的“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也升格为“反革命集团”，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学术批判也就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2. 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斗争对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及其经验教训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领导意识形态斗争中，初步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发展科学、文艺、教育事业提出了

① 郭沫若：《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人民日报》1955年4月1日。

② 关于信件是舒芜主动交出，还是奉命交出？信的内容是舒芜自己分类摘编，还是按别人的意图分类摘编？当事人林默涵、舒芜各有说法，分别见林默涵述、黄华整理《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和舒芜答问、奚纯整理《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载《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

正确的方针,从而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第一,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转型时期党的理论教育任务是:“领导或推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包括爱国主义的宣传),领导或推广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①党一方面大力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社会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另一方面,又领导全国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清理旧思想和腐朽观念的斗争。马列主义思想为全国人民所普遍接受,社会主义观念也深入人心。这就为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反对迷信与愚昧,积极倡导科学精神。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变革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同时,非常注重把政治文化转化为公众的文化意识,以保证民众对新制度的政治认同。党结合农村的土改运动,在全社会形成了一股反封建的浪潮,荡涤了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将愚弄人民的巫婆神权和欺压人民的反动会道门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宋庆龄在东北旅行时深有感触地说:“随着这个时代的前进,生活及思想方面古旧与阻碍社会进步的习惯就受到了尖锐的打击,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旧的迷信已经失去了它对人民的控制了。”^②党大力发展科学,制定了科学工作的总方针:“就是要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这些倡导科学、反对愚昧的举措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也为以科学指导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三,提出“双百”方针,发展繁荣文艺。《共同纲领》明确指出:提倡文化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发展人民的

① 国防大学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第240页。

② 宋庆龄:《新中国向前进—东北旅行印象记》,《人民日报》1951年1月5日。

戏曲电影事业。为此,党明确规定了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文化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积极地发展适合群众需要的新的文学艺术和电影的创作,同时对民间原有的各种艺术和娱乐形式应广泛地、正确地加以发掘、利用、改革和发展。”^①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在加强对文艺工作领导的同时,认真地对文学、电影、戏曲等文艺领域进行了整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中国文艺发展方针。1951年毛泽东为中央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不仅是发展戏曲的方针,而且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改革和发展的方向。1956年,党更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②“双百”方针的提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重大成果。后来的事实证明,坚持这个方针,是繁荣文艺事业和推动文化建设的保障。

第四,营造积极进取、健康文明的文化氛围。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大力净化社会风气,向长期污染中国社会的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宣战。这项工作的完成为共产党政权赢得了极大的赞誉。同时,党还在文化领域,对反动、淫秽、荒诞的书刊图画等进行清理,因为“这些图书,散播了大量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思想和堕落无耻的生活方式,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年、少年、儿童的毒害很大”^③。此外,党还在工人、农民中创办基层文化网点,大办扫盲班、识字班,丰富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使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积极进取、健康文明的文化氛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从社会转型的要求出发,通过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来创造现代文化的建设环境,是十分必要的,客观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18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391页。

③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第232页。

上符合历史规律。但在如何正确地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方面还有值得总结的历史教训。

首先,文化建设必须处理好它与政治问题的关系。文化反映政治,但文化又不等同于政治,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混淆两者就会使文化建设偏离正确的轨道。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存在的一个明显问题是,一次次的学术讨论和思想争鸣很快就发展到政治批判。无论是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红楼梦》研究的争鸣,还是对胡适派的批判、反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斗争,都没有严格地按照学术规律、艺术规律处理。许多文化思想的分歧,应该由专家学者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去畅所欲言,充分讨论,以求得合乎实际的结论,但却过早地由权威性的党报或党的高层领导人一锤定音,并采取搞运动的方式,没有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这种做法,实际效果并不好,不仅没有真正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而且往往使学术性的问题从政治性质方面上纲,以致产生了严重的恶果。

其次,文化建设必须形成符合自身规律的评判标准。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往往以政治标准定文艺是非,把对文艺作品的不同看法、学术上的不同思想都列为现实政治的对立面,人为地设置了许多禁区。如胡风反对庸俗机械论,反对教条主义,批判胡风后,庸俗机械论开始抬头,助长了教条主义的发展。胡风主张的“写真实”、“作家的自我扩张”都成了人们不敢涉足的禁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建设之所以发生以政治批判取代学术争鸣,很大程度上与对文化评判标准缺乏正确的认识有关。

第三,文化建设不能简单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意识形态是复杂的精神现象,搞群众运动、批判斗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学术问题、思想问题必须在平等讨论和交流中达成共识。“思想斗争与其它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办法,只能用细

致的说理的办法。”^①以批判开道、以权势压制,“以力服人”是不行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展斗争大都采取了群众运动方式。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习惯了的斗争方式,取得过巨大成效。但将它移用到文化建设上来,实际效果是有害的。“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②在解决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时,“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恰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③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斗争留下的经验教训极其深刻。

第四,文化建设必须避免主观随意性。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把握文化所产生的客观效果,而不能主观随意地对某种文化现象作出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斗争主观随意性的缺陷比较严重。

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斗争中发生的某些失误是不容否定的客观事实,而且,从以后的历史实践看,这些失误对文化建设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但从文化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斗争的方向应该充分加以肯定。这些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主旨,以清除旧文化的影响为己任,符合社会转型的要求,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因为某些失误而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斗争的意义,是完全错误的。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78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0页。

文化现代化实践的印记

1. 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发展的过渡性和文化建设原则、方针的确立

先进文化的发展与变革,总是和政治经济的变迁交汇一起,整体推进,互为印证。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社会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这种过渡时期的社会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影响了新中国初期的文化发展,也规定了现代文化建设的走向,使这一时期文化的发展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即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演变。

在文化形式上,继承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特性”,并进一步深化认识。第一,吸收外来文化的视野更广阔。除了学习和借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文化外,还主张吸收西欧近代文化。毛泽东明确指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①,因此,“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②第二,文化的民族化可以转变为国际化。毛泽东指出:“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③因此,“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④新中国成立初期,倡导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是对文化民族性的认识提升,为文化的现代化注入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8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3页。

在文化的内容上,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都强调文化内容的科学性,但二者在各自的内涵上有所不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要求主要体现在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它只要求在国民文化中加强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即“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①。而在社会转型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明确的发展方向以后,文化的科学性内容必然有新的要求,这就是为了加速社会变革的完成,为了更好地引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统一人们的思想,必须突出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文化,以便为社会变革营造有利的舆论氛围和指导社会的有序转型。为了改变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多元并存的局面,牢固地树立社会主义文化的领导地位,党和政府对一切与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文化体系加以清除,通过接管和改造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及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宏扬爱国主义,树立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大力发展具有社会主义特质的人民的大众文化,因为“民族化主要是形式,但也关系到内容。要使广大工农能看得懂,听得懂,能产生共鸣,必须民族化、大众化。”^②这些原则和方针鲜明地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建设的基本特点。

在服务方向上,为了与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政治变革相适应,党和政府在文化服务的方向上也作出调整。新民主主义文化强调为新民主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主要强调的是为占人口90%以上的劳苦大众服务。而在社会形态发生根本的变革后,为社会主义服务则明确地成为文化的发展方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党的中心工作向经济建设转变,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的需要成为新的任务。为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4页。

② 《周恩来论文艺》,第171页。

会主义服务突出强调了文化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既扩大了文化的服务对象,也壮大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力量。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型中,社会主义文化观基本确立,党和政府为了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确立了文化发展的一系列原则和方针。首先,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对马列主义,尤其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思想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普及教育,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并成为一切行动的准则。此外,通过“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提高了党内外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学会了同形形色色的非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作斗争,保证文化发展沿着正确的道路健康发展。其次,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方针。“双百”方针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根本方针。1952年至1953年毛泽东多次指示对历史问题的研究要实行“百家争鸣”,促进历史科学的发展。1955年和1956年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学术问题应该自由讨论,文艺创作要百花齐放,反对教条主义,反对粗暴干涉。1956年3月,刘少奇在谈到文艺工作的方针时说: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就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比如洋的土的都可以搞嘛”,“自己好的要保持、发扬,外国好的也都要吸收。”^①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谈到社会主义的科学、文艺问题时说:“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②“双百”方针的提出,不仅反映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符合科学艺术发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9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4页。

展的客观规律,它为社会主义的文艺民主和创作自由奠定了政策基础。“双百”方针被写进了1956年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双百”方针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芒,包含着党指导文化艺术的经验总结,是繁荣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和科学的基本方针。

2. 文化现代化的启动与初步繁荣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包括文化科学工作者在内的人民群众辛勤劳动,迎来了文化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使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取得了初步繁荣的新成果。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风格各异、内容参差不齐的文艺现状,党和政府要求文艺工作者“积极民发展为人民所需要的文学艺术创作,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广大人,鼓舞群众努力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并逐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要求。”^①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指引下,新中国迎来了第一次文化发展的新高潮,电影、戏剧、曲艺百花竞放,小说、诗歌和散文争奇斗妍。

在文艺工作方面,文艺工作者改革和发展了电影事业,摄制了《钢铁战士》、《白毛女》、《南征北战》等优秀影片。戏剧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经过审查保留了一大批传统剧目,如《十五贯》、《天仙配》等优秀剧目,在改编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还新编了《将相和》、《刘巧儿》等受到人民群众喜爱的剧目。小说方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铁道游击队》、《新儿女英雄传》等,散文方面,《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一批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以反映时代变化和新人物新思想为特色的文艺作品相继出版,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教育方面,确立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总方针。在学校开设了马列主义理论课,党团组织和政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第30页。

治工作制度。大力发展中小学,扩大吸收工农子弟入学,创建工农速成中学,开展大规模的扫盲工作。从1952年起,进行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力量为重点,发展专门院校和专科学校。教育的改革,为新中国教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普及文化教育,党和政府对语言文字进行了改革。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组成。随后,在中央的领导下,文字简化工作开始启动。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其后不久,正式向社会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稿)》,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1956年1月,国务院通过并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方案公布和推行后,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至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汉字简化工作终于取得了第一个可喜的成果。与此同时,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也正式启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经过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为中国文字改革方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建设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集中的表现就是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首先,对新中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给人民带来解放,充满喜悦和感激之情。工农大众在强烈的翻身感的基础上,扬眉吐气,主人翁意识逐渐树立起来。许多知识分子在清除反动思想影响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正确的认识。人们的劳动意识也明显地增强,“剥削可耻、劳动光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时尚。其次,新型社会风气开始形成。党和政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进行了有效的清理,经过两三年的时间,基本上肃清了黑社会势力,收容和安置了大量沦落街头的游民,铲除了赌

坑、烟窟,使街头的妓女绝迹。成功的业绩,使社会风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得到了国际国内人民的普遍赞誉。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实施,彻底废除了强迫包办、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婚姻制度,实现了真正的男女平等,使广大妇女开始享有婚姻自主的权利。民主和睦、团结互助、勤劳生产的幸福家庭在城乡大地涌现。再次,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新道德、新风尚逐步成为一种时尚。人们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在思想道德方面追求高尚的理想境界和科学的人生价值观。1955年9月开始,全国135个城市先开展了“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青年报》以“反对堕落和流氓行为,向一切毒害青少年的现象坚决斗争”为题,连续发表社论,清除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和腐朽生活方式对青少年的影响。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对青年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确立有重要的意义。总之,在文化建设的积极推动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个社会安定团结,形成了革命的、健康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道德风尚;全国上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自强不息,表现出摆脱了压迫剥削和奴役的中国人民为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为建设自己的新生活而焕发出来的巨大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和历史首创精神。新中国完全是以一种新的生活、新的制度、新的形象、新的力量出现在世界的东方。”^①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文化繁荣的重要方面。新中国建立初期,科学技术几乎一片空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落后了许多年,远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迅速组建了全国性的科学研究机构,制订了一系列科学发展的方针政策,使科学发展向现代化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首先,组建了中国科学院,并明确提出了科学工作的总方

^①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4~565页。

针：“就是要发展科学的思想以肃清落后的和反动的思想，培养健全的科学人才和国家建设人才，力求学术研究与实际需要的密切配合，使科学能够真正服务于国家的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保健和人民的文化生活。”^①其次，大力发展技术教育、培养技术骨干。中央政府发出了要大力发展技术教育的指示，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在积极地准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培养技术人材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必要条件，而大量地训练与培养中级和初级技术人材尤为当务之急。”^②同时要求各类各级中等技术学校应有计划地吸收有相当文化程度的产业工人、参加革命多年的干部和农民劳动模范入学，培养他们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技术干部。第三，明确提出了“技术革命”和“向自然开战”的方针。党中央意识到：“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③毛泽东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④“向现代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科学水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1956年1月，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也讲了话，他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昧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

①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84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第139页。

③ 《周恩来文选》（下卷），第159～160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5页。

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第四,制订了科学发展的规划。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后,中央决定成立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周恩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人的领导下,组织了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制定了我国第一个长期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56年至1967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确定了一系列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重要课题,如半导体技术、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技术、无线电技术、核技术、喷气技术等。经过科技战线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初步形成了科学技术体系的基本框架,并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和产业部门的诞生和壮大。此后,我国的科学技术面貌有了根本性的改观。我国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如原子能、喷气技术、半导体、电子计算机等技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建立起来。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许多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空白薄弱的状况,得到了改变。科学技术有了比较全面的发展,并且开始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科学技术的进展和成就,为我国的繁荣富强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第七章 十年“文革”对文化现代化的破坏

“文革”不是一场真正意义的“文化大革命”，而是“革了文化的命”。这场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浩劫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全面的破坏，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就文化而言，十年“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泛滥完全打乱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正常秩序，甚至在貌似革命的“左”倾思想和实践下，使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思想流行社会。这是在现代基础上的文化倒退。“文革”的发生原因极其复杂，但既然以“文化”命名这场革命，就必然具有深刻的文化根源。从文化根源审视“文革”的发生及其错误，检讨其阻碍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原因，有助于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它的危害。

“文革”浩劫发生的文化透视

1. 平均主义价值观念的扩张：民众参与“文革”的精神驱动力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中，有这样一段说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①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指出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下同），第27页。

派”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文革”发动前夕,党内和国家机关内确实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官僚主义。虽然官僚主义现象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具有本质的区别,但它却是毛泽东形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概念的思想缘由。人民群众参与“文革”的热情,在一定程度上由这种官僚主义与平均主义价值观念的冲突所产生的张力而驱动。

官僚主义是领导阶层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它“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虽然消灭了剥削阶级,但官僚主义产生的社会基础却难以在短期内彻底清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权力的高度集中和民主集中制的非正常运行是产生官僚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权力的高度集中造成权力主体不受制约,而权力主体的非制约化则必然造成特权现象即官僚主义的产生,这是权力运作的一般规律。应该承认,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对官僚主义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打击因官僚主义而衍生的腐败现象。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新中国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的严厉处置就是史证。但是,这些措施大多以“治表”为特征,根源性的遏制力度不够。随着中国政治体制中权力的不断集中,官僚主义产生的源头长期没有铲除。在60年代中期,我国各级党政机构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官僚主义的现象,基层单位尤其严重。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指出:“最近几年,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确实有所滋长。突出的表现是:损大公、肥‘小公’,打埋伏、耍手段,……贪图个人享受、讲排场、铺张浪费、假公济私、走‘后门’、破坏制度、损人利己、多吃多占、滥用国家资财、挥霍人民血汗的现象,也滋长起来了^②”,指示要坚决开展反对官

①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418页。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第173页。

僚主义和腐败行为的斗争。

官僚主义现象从理论上说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专制观念具有契合之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官僚主义是专制观念在现代社会的显现。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专制观念和一般的专制概念在外延上具有明显的不同,它所蕴含的主要内容是以皇权为特征的个人专制,而非特权阶层的专权。中国民众可以容忍并认可皇帝的专制行为,但反对一般官吏的专权现象。所以,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官僚主义现象的产生不但没有和政治文化的专制观念产生相辅相成的互动效应,相反却出现了冲突和排斥。然而,中国官僚主义与专制观念的冲突因有某种共同的契合,还不足以表现为激烈的思想交锋和对抗,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另一面,即专制观念的对立物——平均主义则和官僚主义必然产生剧烈的碰撞和冲突。

平均主义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对生产力发展具有极大延滞作用的一种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战争的艰苦环境和自上而下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使得这种落后观念对革命事业的消极影响并不十分突出,相反,这种观念以其对平等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对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起了积极的作用。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平均主义是激起革命精神的催化剂,但它又是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阻碍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一个文化层次较低的国度里,任何一种思想观念能否迸发出强大的精神感染力,关键在于这种观念能否成为人们所追求的价值取向,以及这种观念所反映的内容是否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现实矛盾和焦点问题。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实际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基层官僚主义直接地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这对具有浓厚平均主义倾向的农民来说,官僚主义者无疑就像旧社会的地主和豪绅阶级,是他们遭受不平等和压在他们头上的新的“大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阻碍他们通向共产

主义理想境界的最为重要的“敌人”。“工人、学生及农民对党的干部怀有深深的不满情绪。”^①这种平均主义观念与官僚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成为当时广大民众心中所关注的主要焦点问题。对平均主义价值取向的追求使他们认为,只有来一个社会的巨大变革,将各级官僚主义彻底打倒,才能走进经济上没有剥削、政治上人人平等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②。所以,在毛泽东发动“文革”时,虽然他错误地把官僚主义现象作为资本主义复辟,并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概念,但是将基层的官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来定性,特别是将一些具有官僚主义倾向的干部作为运动所要打倒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广大民众的心态。当毛泽东号召和支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平均主义价值观念所蕴藏的巨大动力,终于找到了释放的“合法”渠道。广大民众在这种“宁患寡,不可患不均”思想的驱使下,积极而热情地投入了“文革”的强大洪流。

2. 个人崇拜的滋长和盛行:发动“文革”的思想凝聚力

一位外国学者认为,在中国,只有毛泽东而没有别的任何人能够将“文化大革命”之火迅即点燃,并将它维持10年之久。这个看法的实际意义是指出了“文革”发生的背后,领袖人物个人威望的非正常运用问题。检讨“文革”发动的历史教训,个人崇拜的滋长和盛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关于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起源问题,国内学术界公认的看法是1958年的成都会议。其根据是毛泽东在会议上的一段讲话:“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

^① 王景伦著:《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和邓小平的现实主义》,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页。

^② 《徐水人民公社颂》,载《人民日报》1958年9月1日。

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①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从党的历史实践来看是一个重大的认识变化。从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全党对于个人崇拜问题总体上是比较警觉的,毛泽东本人也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明确提出了禁止个人崇拜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坚持了反对个人崇拜的主张,并在中共八大上作出了“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②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巨大的成就使他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和平环境条件使他放松了对个人崇拜的警惕。当他的主张和意志在党内遇到阻力时,便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威不够所致,于是就发生了1958年成都会议上由原来反对个人崇拜到欣赏个人崇拜的思想转变。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央一线领导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分歧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认同。被崇拜者的需要和欣赏与崇拜者推波助澜的恶性循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终于将毛泽东拥上了神坛,成为至高无上的、能够号令一切的巨人。

毛泽东个人崇拜思想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与国际共运史上个人崇拜者的共同一面,也有自己独特的因素,既有人类社会一般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有中国特殊文化因素的推动。究其原因,有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卓越历史功绩的政治资源。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时势造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9页。

^② 《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7页。

就了三位伟人：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三位伟人之中，毛泽东的功绩尤为显著。在他的领导之下，创立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并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左”倾教条主义导致的严重挫折中转危为安。在他的卓越指挥下，仅用了短短三年时间，便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洗涤了中华民族百年挨打屈辱的历史，将中国领向了一个新的起点。这些巨大贡献深深地感染着每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中国人，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词实质上演变成了“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的含义，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已被人们罩上了“救世主”的光环。具有如此历史功绩的伟大巨人，只要稍稍放松对个人崇拜的警惕，就极可能导致个人崇拜的产生，而对个人崇拜认可和欣赏的行为则势必造成个人崇拜现象的泛滥和盛行。

第二，超凡魄力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集体中，虽不乏群星璀璨的领导人物，但能像毛泽东这样具有超凡魄力的人物却绝无仅有。毛泽东的超凡魄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伟大的人格，其次，卓越的才干。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杰出才干，使党的广大干部为之折服，使中国的一般民众为之倾倒。在中国人民心中，他和人民如此的亲近，而又如此的神圣；他既具有中国农民质朴务实的本色，又具有真理化身的光辉。薄一波曾有这样的回忆，他的一位老战友曾不只一次告诫他：“毛主席讲的话，如果你觉得不对，千万不要讲，你回去想想，慢慢就会知道毛主席是正确的。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脑筋里，的确形成了一个思想框框：毛主席说对，就对；说错，就错，人人都以毛主席的是非为是非。”^①在毛泽东的这种超凡魅力影响下，极易唤起中国民众将其神化的情绪。

第三，集权政体的作用。中国政治体制中权力的高度集中，对

^①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81页。

个人崇拜的产生客观上起了催化作用。集权政体之下的个人崇拜有两种现象：其一，为实现某种政治主张而进行的个人崇拜。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中共其他领导人需要通过毛泽东的个人威望来达到实现其政治主张。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分析说：“他们借助毛泽东的名字来作为国家团结的象征，利用他的语录来促进他们希望建成的非毛泽东主义的体制进程。”^①其二，为实现某种政治野心而进行个人崇拜。林彪、“四人帮”就是典型。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最高领袖的个人意志往往决定着一个人政治命运的升迁或衰落。这种权力运行的特点必然被少数野心家所利用，成为他们通过鼓吹个人崇拜达到谋取个人政治野心的捷径。1958年夏，康生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59年底，康生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标准、最后标准”^②。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他在军队系统中开始推行突出政治，提倡“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由于林彪、康生等人在党内身居要职，又披着“学得最好”、“举得最高”、党的“理论权威”等外衣，因此，他们的个人崇拜活动起到了蛊惑人心的煽动作用。

第四，领袖的自我欣赏。如果仅有崇拜者的狂热鼓噪，而没有被崇拜者的认可和欣赏，这样的个人崇拜可以产生，但不会泛滥盛行。毛泽东并不是不知道搞个人崇拜的危害。但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使他对个人崇拜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毛泽东的观念中，某种特定条件下，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可以搞个人崇拜，而且需要搞点个人崇拜。1970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总要有个人崇拜”，“过去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那个时候我

① [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和后毛泽东的中国》，第341页。

② 金春明：《六十年代“左”倾错误的十发展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①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领袖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必然被某些人所利用。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当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有错误和正确之分后，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对毛主席的信仰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对毛主席的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②柯庆施的讲话非但没有受到批评，而且不久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实际是助长个人崇拜之风。

第五，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契合。对任何一位领袖人物的崇拜，必须置于某种文化背景之下，方能显出奇特的效果。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恰恰和个人崇拜的观念有相通和契合之点。数千年封建文化的传统决定了在毛泽东从一个政党领袖到一个民族领袖的过程中，必须经过传统合法性的认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曲妇孺皆熟的陕北民歌真实地道出了几亿翻身人民的心声，体现了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传统合法性最高程度的认可。这种传统合法性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体系之一，潜藏着对圣王明君的渴求。这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浸润着封建政治文化的价值观念。但在社会结构尚未根本改观的情况下，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小农经济难以产生现代政治意识，所以，这种价值观念仍然关系到民心的向背，对获得民众传统合法性的认可，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个人崇拜所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盲从和迷信。20世纪60年代中期，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断升级，已使人们丧失了独立思考、分析和判断问题的能力，中国广大民众的思想意识已被毛泽东个人的政治观念、情感和价值取向

① 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

② 金春明：《六十年代“左”倾错误的发展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所覆盖,在他们的头脑中已形成了“毛主席的话就是真理”、“跟着毛主席就是正确方向”、“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思维模式。所以,当1966年毛泽东振臂号召发动“文革”时,人民群众中不少人虽然对“文革”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理解和对“踢开党委闹革命”等做法存在着忧虑,但在“毛泽东指示我照办”,“毛泽东挥手我前进”的思维模式支配下,毅然决然地加入了运动的行列。

3. “左”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发动“文革”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场政治运动的发动,都必须在某种理论的指导下才得以展开。“文革”也不例外。在“左”倾错误观点从产生到系统化、理论化并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中,有两次会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一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又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并把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直接引伸到党内,认为党内斗争就是阶级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从而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错误论点埋下了种子。二是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断言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所谓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的“基本路线”。这一“基本路线”集中概括了1957年以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错误理论,使“左”倾错误理论逐步向系统化、完备化发展。

随着“左”倾错误理论的形成,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左右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包括思想领域的各个层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在“文革”发动时逐渐系统化,后来被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主要观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

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些观点集中在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这个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表明,阶级斗争扩大化达到了极端的程度。第一,阶级斗争无所不在,反革命的阶级敌人无处不有。第二,共产党的领导权已经岌岌可危。第三,党中央内部也存在着阶级斗争。第四,情况已经严重到必须采取激烈的政治大革命来解决问题。按照这样一套理论开展的“文化大革命”,其偏离正确轨道的程度也可想而知。

4. 从众心理的作用:“文革”发生的行为环境

所谓从众心理,一般是指人们盲目地追随多数人行动的心理状态。从本质上分析,从众心理所反映的是一种思想的贫困。在社会实践中,如果只能按一种模式、一种观念进行思考,它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思想的绝对化、单一化和贫困化。由于思想的贫困,当面对无法抗拒的社会思潮和社会力量时,当背道而驰便有可能给自己带来不测或受到损失时,人们便自然地将多数人认可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选择的重要依据。因为,在缺乏独立的理性思考的情况下,多数人的选择似乎更具安全感。应该承认,历史的发展方向是多数人的意志和选择的结果,但是,在历史发展的某一具体阶段,在社会运行机制因多种原因而遭到破坏时,多数人的选择并

非都一定正确。法国思想家卢梭说：“人民是会犯错误的。”^①他提出了“众意”和“公意”的概念。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而公意反映的则是真正的共同利益和要求。所以，当多数人的选择如果建立在众多个人意志相加的基础之上时，这种从众选择往往是缺乏理性的盲从。只有在对事物发展规律和人民根本利益理性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所作出的选择，才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正确选择。

导致从众的思想贫困来源于对知识的轻视。在一个文盲占较高比重的国度里，对知识的尊重和普及是促使国民从愚昧、盲从转向理性、科学思维的最为重要的手段。然而，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到“文革”发动前的长达9年中，党对知识分子和知识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使全国知识分子的身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创伤。之后连绵不断的“文化批判”运动，使广大的知识分子普遍处于心有余悸的谨慎甚至惶恐之中。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②。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定性和认识，必然在社会上形成对知识分子的偏见，由此又延伸为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在知识传播者不能正常发挥传播作用的环境下，国民因知识的缺少而导致的思想贫难以有根本的改观。

思想的贫困在社会生活中必然呈现出无知和愚昧，无知、愚昧与个人崇拜的结合则又必然表现出对被崇拜者的盲从，而盲从的行为对部分人来说又将引发从众现象的产生。20世纪60年代中期狂热的个人崇拜，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了由毛泽东决定什么，就

① 转引自杜蒲：《关于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下同），第185页。

② 毛泽东在邯郸四清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3月28日。

宣传什么、维护什么和批判什么的宣传运行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个人成了决定国家政治、文化的内容、取向和范围的主体。当他振臂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时，大部分人在其“最高指示”的鼓舞下，以“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高昂气势把昔日各级“高高在上”的领导人打翻在地时，从众心理的安全作用则推动另一部分人也加入了内乱的狂潮。

“文革”在文化问题上的思想扭曲

1. 对文化领域现状的错误判断

“文革”实际是从文化战线开始的。当时对文化领域的现状下的结论就是所谓“黑线统治”。这一结论认定，新中国成立后文化艺术界始终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思想的结合。“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代表论点，这些论点，是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背道而驰的。电影界里提出的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和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①。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状况，是因为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虽然消灭了剥削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但是在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

^① 《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教学参考资料（1962—1966）》，杭州大学中共党史教研室编。

思想意识依然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①因此,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被篡夺了的领导权。

从上述判断可以清楚地看出,引起毛泽东深深不安的是他所认为的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占有优势地位及其严重影响。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十分严重,认为它深深植根于长期存在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抗之中,现行的社会分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文化事业体制虽然消失了对抗的根源,但并没有能够弥合这两种社会劳动之间的差别,甚至还继续维持着一个高居于体力劳动者之上的享有优越的精神文化权利的阶层。在毛泽东看来,这正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导致修正主义和新的阶级对抗的基本原因。因此,政治思想领域内的革命不单纯是观念上的革命,它还包括精神文化生产的方式及其占有形式的变革。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事业领域内的一统天下,“少数人”对精神文化生产的垄断,是修正主义产生的重要社会原因。

知识分子是文化资源的重要拥有者和精神文化产品的直接创造者。1957年后,知识分子因其所处特殊的社会地位而成为各种矛盾的聚焦点之一。围绕知识分子问题,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知识分子改造的途径、知识产品归谁占有等4个方面认识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第一,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

^①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

“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一年后,毛泽东就改变了这个结论,1957年3月,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①1967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又提出:“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因为解放17年来,文化教育被修正主义把持了”。^②

第二,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从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这一结论出发,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也必然作出错误的估计。一般而言,知识分子承担着发展科学文化的特殊任务,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社会力量之一。知识分子劳动的社会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却把知识分子排斥在工人阶级之外,认为他们是非生产者。他们“附在公有制这个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③从贬低知识分子劳动的社会意义到把知识分子视为由工农养活的观点,否认了精神劳动是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途径。既然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并且是导致修正主义的根源,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就势在必行。在改造的途径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政策和方法,一方面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另一方面又充分信任、积极大胆地使用他们。但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改造的途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至文革时,改造的方式由温和到激烈、由复杂到简单,改造的途径也渐由“思想改造为主”转为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3页。

② 毛泽东接见卡博·巴卢库时的讲话,1967年2月3日。

③ 杜蒲著:《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第153页。

“体力劳动改造为主”，期望通过简单的改变知识分子的社会劳动方式以达到“改造世界观”的目的。这种改造方式的逻辑前提是：知识分子易于“变修”的根本原因是他们的社会劳动方式。因此，所谓“改造”就是改变劳动方式，参加纯粹的体力劳动。

第四，关于知识产品的归属问题。毛泽东认为，在知识分子中，世界观的问题常常表现在对知识的看法上，究竟知识是公有，还是私有？有些人把知识看作自己的财产，待价而沽，没有高价就不出卖。精神文化产品与物质产品一样，属于社会所有，而这一点尚未完全实现。就毛泽东将精神文化产品属于社会所有而言，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将未能完全实现知识公有的原因归结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问题，则是错误的，既没有理论的依据，也没有现实的根据。

2. 文化资源占有形式的再分配及社会正常运行机制的错位

“文化革命”本来是一个有着确定含义的概念。列宁生前曾提出过苏联文化革命的理论，其基本思想是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通过文化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从根本上克服文化落后的状况，并培养出一大批具有管理国家能力的社会主义新人。列宁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①显然，列宁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是具有指导性的。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以后，党曾不失时机地号召进行这种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并采取许多措施，加强文化教育，文化落后的状况得到初步的改善。

然而，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理论的逐步发展，文化革命逐渐失去了它本来的含义，变成了政治革命的工具，而当这种政治“革命”本身就不成立时，它对文化的破坏后果也就越加严重。“文革”最为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在极左思潮的作用下，“文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774页。

化革命”变成了一场对文化资源占有形式的“革命”，它不是通过迅速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充分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上的需要，而是着眼于本身就十分贫乏的文化资源与文化产品的重新调整与分配。主要是通过剥夺一部分社会成员的文化生产和占有的权利，给另外一部分社会成员以优惠的文化权利，以期达到所谓“反修防修”，实现劳动者对上层建筑的管理权，完成在文化领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最终达到公平原则等目的。然而，这种对现有文化资源近乎平均主义的分配，只能导致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急剧下降。它非但没有提高一般民众的普遍文化程度，反而把文化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人为地、强制性地降低到低文化层次的水平。

另一方面，这种文化资源的转移或是分配，并非是在不同的甚至是敌对的阶级之间进行的，而是在由社会分工所决定的社会不同职业之间进行的，其典型表现就是把眼光盯在那些被认为最可能产生“修正主义”或“资产阶级”的社会职业领域，将从事这些职业的社会成员，例如知识分子和管理阶层成员，视为这场“革命”的主要对象，从而部分地或在某种特定局势下全部地剥夺他们从事文化与管理工作的权利或条件。但是，由于社会不可能不存在分工，也不可能取消作为社会有机构成的文化与管理事业，因此，既是出于必然，也是出于某种主观理想，那些被视为革命阶级和革命动力的社会成员便被用来充当了一种新的社会角色，用以填补因政治动荡而造成的某些社会分工的“半真空状态”，以勉强维持社会发展的起码平衡状态。显然，这种现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理论的产物，它的产生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因而其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文革”中，社会上存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运动潮流，一股是从上到下，即管理阶层、知识阶层以及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的潮流；另一股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体力劳动者进驻上层建筑各

领域行使或参与直接管理权利的潮流。

在一般情况下,干部、知识分子定期或不定期地经常到基层、农村工厂中深入实际生活,对于更深刻地了解现实,克服自身由于分工所造成的某些不足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事情。同时,国家机关、文化部门以各种形式吸收工农群众参与管理,或给他们从事各项文化活动提供更好的服务条件,也更有利于发挥工农群众的主人翁精神,这是中共长期以来提倡和实行的做法。但是,“文革”中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大规模上山下乡的性质则不同。因为其前提是把这两个阶层当作产生修正主义的主要来源对待的。因此,无论是它的具体做法和社会效果都具有了不同的含义。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介绍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文章,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劳动,揭开了这一大规模潮流的序幕。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和文化各界闻风而动,派员到偏远农村选址。随后,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离城赴乡。一时间,人走楼空。中央和国家机关除留少量坚持日常工作的人员,其他人都奔赴干校,而文化界走得最为彻底。以全国文联为例,有近上万人云集干校,几乎所有的在京当代中国知名作家、诗人以及其他文化工作者、作协和文化部的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都到了干校,诺大一座文联大楼除几个专案组成员外,只剩下几个被立案审查的对象。

与此同时,另一股潮流也开始萌动。先是为解决大学中的内乱而大规模地派驻工宣队与军宣队,随后所有的大中小学都进驻了工(农)宣传队。这种最初出于权宜之计的方式不久被作为方向性的经验而推广,卫生、文化界在可能的范围内也都接纳了这样的宣传队。接踵而至的是一系列更为“深刻”的变革,“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教育界工农兵上管改大学;卫生界强调培养“赤脚医生”;科技界要侧重从工人中直接培养选拔科技人员;理论界文史哲走向田间地头,建立工农兵理论队伍。而干部的选拔则毫不顾及知

识与能力,只要在运动中表现出色并得到赏识,就有可能越级提拔,从一名普通百姓一下子变成握掌大权的大官。孤立地看,这些“新生事物”中并非全无可取之处,但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作为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出现,更多的是消极意义。

这种双向潮流的大规模迁徙,打破了整个社会平衡发展的运行机制,后果十分严重。对于这两种潮流的社会主体来说,他们放弃或基本放弃了原有的社会职能而去从事自己所不熟悉的劳动方式,这本身就是绝大的浪费。更重要的,它不仅从总体上降低了我国各项基础文化事业的水平(即使不提“文革”初的“停课闹革命”,工宣队后来抓“教育革命”的方式及其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且,由于文化科技人才的下放等原因,除了受冲击较少的国防科技外,各项科学研究和文化艺术产品的创造活动在一个时期内几乎无法正常进行,进一步拉大了我国与世界文化科技水平的差距。

3. 知识创造主体的无知及知识功能的反动论

一场文化革命却造成了一种社会性的对文化知识的轻视,这大概最能说明这场文化革命的实质。十年“文革”对文化的摧残表现在很多方面,尤其是鄙视知识分子和知识上的非理性程度,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文革”中对知识的鄙视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首先,对知识分子的偏见导致对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的偏见。毛泽东曾认为:知识分子最无知识。他对知识分子“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的现象极其不满。指出这个现象本身并无错误,知识分子确实存在“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的问题。但由此得出“知识无用”等偏激的结论则无疑走了极端。“文革”中,在许多人的眼里,知识分子不但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而且学问也是假的。“文革”中出现的“考教授”现象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此外,对知识分子的劳动也完全予以否定。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与那些被视为专政对象的阶级和阶层相提并论,

大批的知识分子被揪斗、被抄家、被监管,大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农村接受改造,他们住的地方被称为“牛棚”。知识分子的学问知识被看得一钱不值。

其次,形而上学地理解知识的产生途径,把直接的生产劳动作为知识的唯一来源。“文革”对过去教育制度的全面否定,对已有的科学知识的轻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这种思想方法所致。一篇文章这样写道:“高考的试题都是资产阶级权威所极力提倡的纯业务的东西,引导学生钻难题,背条条。政治考试考的都是脱离实际的”,在学校中,“什么教学大纲、教科书,都是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从学校到学校。物理课上电路图画得烂熟,却连安盏电灯都不会”^①,类似的观点为人们普遍接受。于是,似乎只有完全摆脱课堂和书本知识,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而那些基础研究、理论知识,则往往因为不能解决直接的生产技术问题而被视为“空谈”。“文革”中的教育革命、文化革命正是按着这种认识方向进行的。

第三,鄙视知识的价值,错误地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大老粗”在这场所谓的文化革命中成了十分令人“自豪”的字眼。而“不学数理化,照样干革命”一类的豪言壮语更是颇有市场。最能够说明“没有文化照样干革命”的例子,莫过于“四人帮”一伙对自然科学理论的讨伐。在数学方面,他们把“公理化体系”宣布为糟粕予以否定;把宇宙学等同于哲学上的“宇宙有限论”加以批判;把化学界 20 世纪以来分子结构的多种理论都贴上“资产阶级的理论”的标签而予以摒弃。荒唐的事情还有 1970 年在上海出笼的一篇《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文章,文中宣布:“爱因斯坦通过相对论原理和光速不变的原理,把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杂揉在一起”,“相对论的要害是相对主义,它鼓吹真理只是相对的、主观的,根本否

^① 《升学考试的二十大罪状》,《人民日报》1966 年 6 月 19 日。

认绝对真理和客观真理,否认真理的阶级性”,用以维护资本主义的“极乐世界”^①。这是用极端的无知对现代文明与科学的亵渎。

4. 唯我独尊的文化专制主义与愚民政策的复活

“文革”对文化事业全面破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死灰复燃。在“四人帮”的独断下,文化艺术界成了他们的“一统天下”。在队伍上,他们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组织路线,对文艺界的人士进行各种残酷的迫害。在文化创作上,把革命样板戏作为唯一的模式,把“三突出”作为唯一的原则。江青居然说:“无产阶级自巴黎公社以来都没有解决自己的文艺方向的问题,自从六四年我们搞了革命样板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②这种恬不知耻的狂妄显露的是“四人帮”企图独霸文化领域的野心。

在文化专制主义下,党的“双百”方针受到了粗暴的践踏。“四人帮”将毛泽东针对文艺工作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改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在这种文化建设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出现了百花凋零和“革命斗争”文化狂飚突进的现象。

首先,在诗歌创作中,由于对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严重失实的主观判断,对斗争内容、生活道路和革命者思想性格的核心的理解,也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一些渲染、强调阶级斗争的诗歌作品,由于大多是一种观念的阐释,诗中的生活色彩和真切感已非常淡薄,包括在当时具有较大影响的《重返杨柳村》、《擂台》等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显示了此种现象。在艺术上,由于对诗歌创作片面地强调要成为时代号角,对时代精神又出现狭隘的、不正确的理解,因

^① 参见《“四人帮”如何利用相对论问题大做文章的》一文,《光明日报》1978年1月28日。

^② 江青1976年1月26日对中国艺术团的讲话。

而诗的构思套路化、形象雷同化不可避免。缺乏深厚的现实根基,某些“豪情”便显得空泛。诗人对复杂生活,包括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把握缺乏独立性,艺术上丰富多彩的多样性和独特风格便也受到严重的抑制。

其次,在戏曲创作上,极“左”思潮的干扰最明显。戏曲界是林彪、“四人帮”严密控制的领域。早在1964年江青就插手京剧改革,先是窃取、篡夺改革的成果,捞取政治资本,继而把他们篡改过的剧目《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龙江颂》、《奇袭白虎团》、《杜鹃山》、《海港》、《磐石湾》封为“样板戏”。在“文革”开始的几年里,戏曲舞台上只有所谓“样板戏”一花独放。他们炮制所谓“样板戏”的经验,作为扼杀社会主义戏剧创作的棍子。用“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等理论取代从生活出发这一现实主义的根本原则;用“三突出”一类模式来取代典型化的现实主义方法,割断了戏剧同生活的联系,割断了戏剧同人民、同革命的联系。同时,江青以内行自居,散布了不少谬论,胡说“话剧已经死了”,“传统的京剧就是歌剧”,“越剧是靡靡之音”,等等,把话剧、新歌剧和一些地方戏曲长期打入冷宫。

1973年以后,“四人帮”为了进一步利用戏剧作为他们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具,又频繁地举行了全国性的戏剧调演活动。调演中划框框,定调子,导致当时产生的大部分剧目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帮派气息。如话剧《站船台》以反映造船工业“大打翻身仗”为题材,歪曲了工业建设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鼓吹不尊重客观规律的蛮干,为“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唱赞歌。话剧《宣战》把实践知识和书本知识对立起来,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教育事业的伟大成绩,歪曲党的教育方针、路线和政策。话剧《风华正茂》颠倒了教育领域的路线是非,歌颂张铁生式的“革命闯将”。这些内容荒谬的剧作,窒息了戏曲创作的生机,使舞台上的单调、萧条景象前所未有。

再次,小说创作上,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指导下,小说创作的主题围绕城市、农村所谓“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而展开。将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简单地浓缩为单调的充满战斗和革命的政治斗争行为。如《艳阳天》就是典型。这是一部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作者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出发,对东山坞大队的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夸大描述,将整个的农村社会生活史写成了阶级斗争史,扼杀了新中国农民对个性成长的追求和对家庭美好生活的向往。此类作品如《金光大道》、《红雨》、《决裂》、《风雷》、《欧阳海之歌》等也都在主题的选择和挖掘上表现了雷同的倾向,在内容上充满空洞的政治口号和对概念教条式的阐释,在艺术上单调死板、千篇一律,小说成了政治读物,凡是不反映阶级斗争题材和内容的小说,都被一棍子打死。

文化专制主义必然伴随着愚民政策。“文革”对文化的“革命”,使得我国原本就落后的文化状况更为落后,一代青少年几乎未受到任何文化教育,大批知识分子失去了从事精神文化创造活动的条件和机会。社会的文盲人数有增无减,整个民族文化素质普遍下降。这对于“四人帮”来说似乎还不够,在他们荒谬地把贫穷视为社会主义的光荣的同时,更把全面的愚民政策作为巩固所谓“革命秩序”的基本手段。张春桥就声称:“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也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①文化专制与愚民,正是他们所称的在文化领域内全面专政的基本内涵。林彪、“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敌视、排斥和打击,目的就是为实行愚民政策扫清障碍。

综上所述,文化层面上的所谓“革命”构成了“文革”理论与实

^① 张春桥在1975年11月8日的一次谈话。

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化领域内现状的错误判断构成进行这种革命的理论基础。而这种意义上的“文化革命”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文化革命纲领,给极左思潮对文化事业的破坏性行为提供了合法的根据,最后导向了文化专制主义。

文化现代化受阻的原因

1. 政治体制与政治信念的互动:政治文化中的“集权观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确立,逐渐形成了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之后,随着中国政治体制纵向和横向的集权演变,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政治体制的变革全面地影响政治文化中的认知系统,迫使其“对政治体制中的新结构,以及新型的输入和输出的功能关系进行重新认识”^①。同时,由于政治体制变革涉及到政治格局的重新分布,从而在社会各个群体的心理中产生相应的情感反应。每次因政治体制的调整而产生的权力集中,都程度不同地被社会的各个阶层所认知。而这种对权力集中的政治认知,又奠定了接踵而至的以权力集中为主的政治体制变革的思想基础。

长期的政治体制变革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循环,使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中国政治文化中,“集权”观念不仅为大多数中国民众所接受,而且深深地内化为一种强大的情感倾向,认为这种向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集权,特别是向毛泽东的集权,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应该的。从1957年开始的每一次政治体制的变革,由于权力的集中,必然影响民主由上而下的普及和发扬,这与人们期望民主迅速而及时地扩大本是背道而驰的。按照现代政治学理论,权力的

^① 王卓君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下同),第252页。

集中“必然产生较为剧烈的反向效应”^①，即对政治体制向集权的进一步变革产生阻碍力。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度里，非但没有内化为阻力，相反却凝聚成了政治体制继续向“集权”调整的助动力。究其原因，除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民众内心深处的崇高形象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则来源于新旧政治体制的对比中民主开放度的作用。由于民众对政治输出和政府行为的期望，常常以过去多年接受的政治社会化的理念为基础，往往带有传统的色彩。所以，尽管中国政治体制不断向“集权”方向演进，但对遭受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民众而言，这种社会主义的集权政体就其民主性而言，和封建主义的政体相比实有天渊之别。在他们看来，只要能使社会主义政体得以巩固和发展，任何形式的集权都是必要的。这样一种政治认知的心态，客观上为文化的“集权”观念提供了基础。

2. 文化的历史继承性：认知层面的专制基因

现代政治理论认为，政治文化虽然是在对政治生活的反映中形成的，但“后者的变化肯定比前者要快得多，由此得出政治文化的创造肯定不是当下的。”^②它表明政治文化并不是现行政治实践的立即产物，它是多少年来在民族政治发展和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一种普遍的政治心理导向。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只是在相应的层面上改变了它的相应内容，不可能一下子将其彻底变更。中国两千多年来形成的封建专制的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最落后和腐朽的糟粕，它不仅以强大的历史惯性而残存延续，而且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仍然能够辐射出强烈的穿透力，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很大制约作用，并在

① 王卓君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第251页。

② S. Welch: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Culture*,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93, P31。

中国政治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迈进过程中始终显示出逆向的动力功能。

首先,对外来先进文化的排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最先进的外来文化,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敌人就是传统文化。所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和阐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这种局限性表现为:其一,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那些受中国封建思想影响,在封闭状态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思维框架、分析水平都不免受到封建传统文化的制约。如陈独秀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的“家长制”现象就具有明显的专制基因。其二,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国土和时空下诞生的,所以,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被广泛接受,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是必要的。但中国化不等于传统化,更不能封建化。完全以中国的文化去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则不仅“使得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它所赖以生长和阐释的重要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及其应有的理论思维高度”^①,而且也容易使马克思主义遭到曲解。可以说,陈伯达、张春桥之所以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而较长时间欺骗社会和蒙蔽群众,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传统文化基因的潜在功能。

其次,对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的严重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奠定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基石。但传统文化中专制思想的影响和作用,却使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实践时常出现封建专制现象的回潮。最高领袖可以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抛在一边,领袖人物的终身制,并个人指定接班人的行为,对领袖山呼“万岁”,面对领袖像做“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领袖的“最高指示”比法律更具约束力,如此等等,“文

^① 李述一等著:《文化的冲突与抉择》,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0页。

革”中的这些现象,都留下了封建专制文化传统的影子。当然,封建君主的专制同党的领袖人物的独断专行不可同日而语,党的领袖的错误也同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具有本质的区别。但上述事实表明,封建专制的基因深深地影响着领袖人物、广大干部和普通民众的政治态度、“信念”、情感和价值取向。究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文化的惯性作用。中国由数千年来形成的封建专制政治文化,深深地浸人民族的深层意识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新的社会制度中虽然已经失掉其存在的根基,但却仍保留着一定的影响,并形成巨大的历史惯性和自我维护的内在机制。当封建专制政治文化赖以存在的封建私有制经济基础和维护这种政治文化的封建政治制度被推翻之后,封建专制政治文化并没有随之烟消云散,它仍然具有潜在的影响力和条件适宜时重新膨胀的功能。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可以很快地被铲除,但中国各民族却不能立即以全新的精神面貌跨入一个新的时代。

第二,政治意识的相通性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政治存在决定政治意识,政治意识是对政治存在的主观映象。我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意识。尽管此种政治意识和封建专制政治文化有着本质区别,但在特定条件下,两者在部分领域可以沟通。如在政治形式上,领袖人物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现象,与君主大权独揽有相似之处。所以,就中国的政治体制而言,其权力的高度集中特别是发展到领袖的高度集权现象,构成了封建专制政治文化仍能兴风作浪的客观基础。

第三,思想清算的软弱性原因。中国是由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政权的更替并不意味着封建专制文化能及时地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生同步

变更,政治文化发展滞后性的规律决定了它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必然仍深深地根植于广大民众的观念之中。但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①的状况缺乏足够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提出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侵蚀,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反对资本主义的民主、平等、博爱等观念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这种理论上的误解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在弘扬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过程中,放松了对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中最强大、最顽固的对象——封建专制政治文化的批判,长期以来,将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了中国政治文化发展中比较弱小而次要的敌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从而使封建专制政治文化未能得到全面的清理,在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中依然保留着强大的影响力。

3. 自然经济的深层制约:文化现代化受阻的经济根源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社会的政治与经济面貌。几亿小生产者被纳入了社会的集体生活中,几千年来的小私有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便被废弃,代之的是农民和其他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农民的身份也从土地私有者转变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而现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被接纳到工人或社会的其他行业之中。因此,“小生产者”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的概念。

但是,几千年的观念传统却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便失去影响。更重要的是,虽然改变了所有制关系和劳动组织形式,但至少在“文革”以前,我国还尚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生产中、尤其是农业生产中以手工劳动为主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农民虽然被集聚在集体化组织之中,因而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增强,并能够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兴建大型的农业基本设施,例如水利工程,但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的方式依然沿袭着过去形成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投入大量人力为主的方式。由于他们在心理上难以立即适应从小土地私有者到集体农民的转变,加上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的弊端,因此在一个时期内,他们对社会生产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相反,“大锅饭”的体制却不断刺激起他们历史形成的平均主义观念意识。

小生产的意识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农民阶级中。在我国,城市工人阶级与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断飞跃发展的工业生产所新增的劳动力大部分来自农民,因而,小生产的意识在工人队伍中也颇有影响。大批农民补充进工人行列和其他全民所有制单位的情况从下列数字中便可得到反映。1949年,我国共有社会劳动者18082万人,其中农业劳动者为16549万人,占总数的91.5%,而包括工人在内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单位的劳动者仅为494万人,占总数的2.7%,但到了1965年,即“文革”的前一年,社会劳动者的总数为28670万人,其中农业劳动者为23534万人,占总数的82.1%,而全民所有制的职工为3738万人,占总数的17.3%。就是说,1965年全民所有制的劳动者比重比1949年净增近14%,人数增加了3200万,而农业劳动者的比重在此期间却下降了近10%。1965年的职工人数相当于1949年的7倍多。很显然,从农业劳动者占有社会劳动者总数比重的下降到全民所有制劳动者比重的大幅度增加,反映了农村劳动者向工人和其他社会劳动部门转移的基本趋势。劳动者的这种转移,同时也伴随着不同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成员结构的一个必然现象是整个民族的文化程度十分低下。这种文化素质又是小生产意识十分盛行的一个基本原因。以1964年为例,全国共有人口69000万人左右,其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有288万人,占国民总数的0.4%。而小学程度的人数有近2亿人,文盲和半文盲人数有26340万人,

二者相加占国民总数的近 67%。文化状况的结构同样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队伍结构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党虽然注意从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队伍中吸收党员,但从总体上来看,党员队伍依然是农民或出身于农民的成员居多^①。小农经济的社会经济结构对文化现代化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它不仅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现代化基难以生长,而且也制约着党的思想水平的提高。

4. 政治运动的频繁和强化:文化中的“革命斗争哲学”

“革命”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曾是一个充满号召力的概念,它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又迅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

革命以其特有的“魔力”创造了社会发展的奇迹,这些奇迹又极大地激发了亿万人民的革命热情。面对共和国“一穷二白”的状态,曾用革命手段成功地消灭了剥削制度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广大民众,又同样希冀用超常规的变革方式迅速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在此种热情的支配下,革命从一种特定的政治方式转为化解社会各个矛盾的普遍方式具有了必然性。因此,除在经济领域进行所有制革命外,又有了生产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和思想革命等。持续不断的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极大地调动了民众对政治运动参与的积极性。一位外国经济学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写的文章中分析说:“中国的革命仍处于英雄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革命像福音那样受到欢迎,如同一种伟大的新宗教处于第一代时的情况那样。”^②

^① 直到 1985 年,党员队伍中的小学和文盲程度的成员还占到党员总数的 52% 以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党员占总数的 80% 以上。参见 1985 年 3 月 15 日《人民日报》。

^② [英] 琼·鲁宾逊:《展望中国》,载英国《新科学家》1964 年版。

在革命热情的激励下,频繁不断的政治运动构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极为引人注目的社会活动方式。据不完全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发动前夕,各种全党全国性质大小的政治运动不下50余次^①。既有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内的政治运动,如整风运动和反右派运动等,也包括错误地运用政治运动来解决经济和学术领域内的问题,如“大跃进”和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等。毫无疑问,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有些是正确的和完全必要的,有些则是错误的。但无论正确的或错误的政治运动,频繁发生和大规模地开展,客观上产生了两种效果:一是社会在多次的政治运动中经常处于程度不同的震荡之中,失去了文化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环境和社会条件。二是群众在政治运动中对革命和阶级斗争产生了普遍的认同感,萌生了革命和斗争是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使现代的民主政治观念和文化未能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当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再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还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时^②,一般民众对当时“革命”所指的具体对象不甚明确,但是他们仍欣然地接受了这一理论。因为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革命即意味着前进,斗争即意味着发展,革命和斗争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和将中国带入美好明天的重要动力源泉。这种认识在实践中所导致的结果是,“革命和斗争”始终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的主题,一切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关的文化思想未能

① 万福义:《政治运动方式浅析》,载《理论动态》第841期。

②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融进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5. 国际共运的遗产：政治文化中的极左思潮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极左思潮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意识曾长期占有一席之地。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到列宁时代的“左派幼稚病”，无不展示了极左思潮的顽强生存力和自我扩张力。在无产阶级没有夺取政权的革命和战争年代，极左思潮往往表现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不断革命的激进主义”和“以群众运动崇拜为基础的红色恐怖主义”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度里，极左思潮呈现为一个以极端化阶级斗争理论为核心的辐射型网络结构。所谓“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具有三种含义：第一，该理论把全社会生活的内容和形式都归结为阶级斗争，将阶级斗争视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直接动力。第二，将社会的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富裕、多样化等同于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把发展生产力放在从属于阶级斗争的地位。第三，斗争的非理性化，只要所谓斗争需要，何种手段均可利用。如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无处不在的阶级斗争观念的扩张和盛行。

就极左思潮产生的直接社会原因而言，它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急躁性的表现。列宁曾深刻地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在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作长期斗争中成长、成熟和得到锻炼的。这种革命性有些像无政府主义。或者说，有些地方照搬无政府主义；它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背离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完全认定，并且欧洲历次革命和革命运动的经验也充分证实：小私有者，即小业主（这一社会类型的人在欧洲许多国家中都十分普遍地大量存在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受到压迫，生活往往异常急剧地恶化，以致遭到破产，所以容易转

向极端的革命性,却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①毛泽东也指出:“左”倾的社会原因“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的东西死也不放。”^②毛泽东在指出产生“左”倾错误的一般原因的同时,也说明了其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基本社会根源,即“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

极左思潮和“左”倾理论是既有重大区别又密切联系的两个概念。“左”倾理论是在脱离客观实际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超越主客观条件的理论体系。虽然是错误的理论,但其错误主要是主客观条件的判断失误而造成的,其感情化成分较少。极左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本质也是“社会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关系以思想观念、情绪等形式在社会成员中的反映。”^③但它是对现实的直觉和经验体会,其理性思维较少,情感化成分较多。虽然“左”倾理论与极左思潮具有明显的区别,但其联系亦是十分的明显。首先,“左”倾理论是极左思潮的基本出发点,并构成极左思潮的理论内核。极左思潮的观念形态和政治行为均以“左”倾理论为公开旗帜而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极左思潮与“左”倾理论的社会作用具有一致性。其次,“左”倾理论是诱发极左思潮的条件。任何极左思潮现象的产生,都与“左”倾理论的指导相关,“左”倾错误理论的出现,是诱发极左思潮泛滥和盛行的重要因素。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共产国际的“左”倾错误曾经严重地影响过中国的革命,并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极左思潮。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42~1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2页。

③ 杜蒲著:《关于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第9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内曾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理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党内高度的理论自省和延安整风运动,纠正了这些“左”倾错误,保证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正确发展和中国革命的成功。在新中国创建的几年中,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指导思想,成功地化解了一道道政治、经济难题,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但任何错误的理论都有一定的历史惯性,它并不能随着产生它的社会条件的消失立即消失,在适当的气候下,它往往又以其它形式表现出来。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和对中国经济基本情况及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的情况下,面对贫穷落后的现状,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心态再度出现,加上在胜利面前所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以及夸大主观意志等因素的交织作用,“左”倾理论再度出现。只是内容和形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的“左”倾理论在政治文化领域集中表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的极左思潮,除了以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为其核心外,作为构成要素的观念形态主要有:无政府主义;封建的宗法观念和专制意识;小生产的平均主义思想;文化虚无主义;暴力崇拜观念等。这些观念形态已远非历史原生形式,它与极端化的阶级斗争理论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机械合成关系,而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构成了一种新的思潮体系。这种思潮体系包容了强烈的“激进性”和“保守性”。其极端化的“革命”理论使其带有强劲的激进特征。这种极左思潮也往往与中国最为落后的封建观念相结合,使其又具有极大的野蛮性和破坏性。“革命”与破坏、保守与激进,这些似乎难以相容的两极对子却在极左思潮中融为一体。因此,极左思潮不仅闪烁着激进、超前和冲动的特征,同时也潜伏着保守、落后和野蛮的特点。十年“文革”以极端的形式,同

时呈现了这两重性的特征，在激进、超前和冲动的“革命”宣泄中，表露了保守、落后和野蛮的一面，留下的教训是沉痛的。它以一次失败的实践案例，为中国文化现代化上了一课。

第八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与文化现代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揭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序幕。改革开放呼唤文化现代化。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从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入手,关注和引导文化建设。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赋予文化建设以鲜明的时代内容和现代化气息。建设先进文化 with 实现文化现代化在理论内涵和历史逻辑上具有一致性。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进一步突出了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文化现代化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艰巨的时代任务。

改革开放的实践与现代化进程的重新启动

1.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现代化进程的重新启动

十年“文革”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破坏是全面性的。政治上的是非颠倒、经济上的严重困境和文化上的贫瘠混乱,使经济文化本来就比较落后的中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现代化进程由于“文革”的挫折而受阻和中断。1976年10月,中国终于结束了经历十年梦魇般的动乱,重新回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但是,要在短期内消除“文革”造成的危害是不容易的。在经过两年左右时间的徘徊局面之后,中国迎来了现代化建设的春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现代

化建设新的历史篇章。这次会议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国与“文革”时代的决裂。“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变化”^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转折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以鲜明的创新精神和巨大的创造力,引导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道路。

从形式上看,中共于20世纪60年代初明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得到恢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这次全会前后的一系列讲话,激荡起中国人民对久已淡忘了的现代化目标的追求。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回答外国朋友的提问时说:“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实际上没有真正地做起来。”^②他提出中共中央在20世纪80年代要做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和经济建设等3件大事,并强调“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③他设计了著名的“三步走”战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设定了进展的步骤和有序的时间进度,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使现代化建设以一种全新的格局下重新启动。

从内容上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启动的中国社会转型,全面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第一,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0页。

村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向农村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表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全面、系统的改革阶段。此后，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1985年开始全面展开。经济体制的改革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第二，创办经济特区、扩大对外开放。1979年7月，中国政府根据广东、福建两省靠近香港、澳门和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决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施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1980年中央正式作出了设置深圳、汕头、珠海、厦门4个经济特区，以吸收外资，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1984年4月，开放了天津、上海、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从而，使我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第三，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民主建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邓小平意识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①。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传统政治体制中的权力过分集中现象，这个任务涉及对文化传统的认识。邓小平围绕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突出地强调了反对和肃清封建主义遗毒的问题。1987年中共十三大在总结以往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规划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独立而紧迫的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第四，大力推进科学、教育的改革。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确立适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教育计划和体制”。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科学地评价了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明确指出：“没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页。

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①，将教育、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1983年10月，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②，进一步提出了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中共中央在1985年3月作出了《关于科学体制改革的决定》，同年5月又作出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教育改革是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目标。这是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的重大发展战略。

与国外的感受相比，中国人民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性转折的意义认识肯定更加真切和深刻。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有两次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次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翻天覆地，一次是从封闭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建设到改革开放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翻天覆地^③。两次翻天覆地性质不同，面临的情况也不同，但它们都以推动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向现代化迈进的历史步骤。第一次翻天覆地是摆脱帝国主义外部侵略的成果，第二次翻天覆地是摆脱了自我迷失内部因素的成果。第一次翻天覆地为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铺垫了独立自主的基础，第二次翻天覆地让中华民族找到了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从第一次翻天覆地到第二次翻天覆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虽然取得了旧中国难以达到的成效，但局限性很大，又出现过较严重的失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获得了新生，社会主义中国由此在翻天覆地的社会巨变中开拓着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①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4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页。

③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谈到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时，就用了“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的说法。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3页。

2. 改革开放之初的文化发展及其主要特点

1976年至1978年,是一个新旧交替时期,是从思想僵化走向思想解放的时期,是破除个人崇拜、打破文化专断、恢复和发扬文艺民主和艺术民主的时期,也是文艺走出历史迷误的黑暗胡同、阔步迈向光辉大道的时期。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和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都在文化领域留下了印记。

首先是文艺创作的复苏与繁荣。1978年5月,中国文学工作者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宣布恢复活动。同年6月,《文艺报》复刊,这对推动文艺的全面复苏,起了积极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文化事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大会所作的祝词,成为新时期文艺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后,1980年初中央负责同志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8月邓小平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都为端正文艺的方向、促进文艺进步起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的指引和第四次文代会的推动,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出现了蒸蒸日上、百花竞放的局面。仅就文学来说,各种题材、体裁、样式的作品出现新的繁荣。小说、话剧引起读者、观众的强烈反响,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科学文艺等均出现繁荣势头,并连连产生轰动社会的效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其次是文艺理论批评的变化和拓展。相对于文艺创作来说,文艺理论拨乱反正的任务更加艰巨,道路也更曲折。由于长期“左”倾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形成的思想僵化,加上林彪、江青等推行的极左文艺路线和散布的种种文艺谬论的流毒,迫使劫后复苏的文艺理论批评不仅要科学地解释作品,帮助读者正确地鉴赏文学艺术,还要担负正确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重新认识和评价一系列长期被颠倒的历史事实和理论是非的任务。其一,通过批判极左文艺思潮,把颠倒了文艺史实和理论是非重新颠倒过来。这

这个过程是从集中清算“文艺黑线论”开始的,其目的是为了端正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1979年2月,《文艺报》发表《文艺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对所谓“黑八论”的理论观点,一一予以澄清。此后,理论界纷纷发表文章,对有关文艺问题展开实事求是的讨论。推倒“黑八论”,其意义不只是有利于历史旧案的平反昭雪和推动新时期文艺的繁荣和发展,而且从理论观念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地位。其二,文艺理论战线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曲折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就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文艺批评的现状等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教育、科技战线的拨乱反正,是文化事业发展的基础。教育、科技战线是“文革”中破坏最严重的领域之一。特别是1971年8月由“四人帮”炮制的《全国工作会议纪要》,否定了解放后直至“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成就,提出了“两个估计”：“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基本被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在教育战线工作的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两个估计”如同紧箍咒把教育战线知识分子禁锢起来,使广大知识分子抬不起头来。“文革”结束后,教育战线的首要任务是拨乱反正。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①。邓小平复出后,自告奋勇要求分管科学和教育。1977年8月,他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会议。在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对于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他明确肯定:“主导方面是红线”,“应该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页。

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①并且指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②这些振耳发聩的论断,有力地批驳了“两个估计”,开启了科学、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教育、科学领域加快了拨乱反正的力度。1979年3月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关于撤消《全国工作会议》的报告,彻底推翻了“两个估计”,解放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终于可以心情舒畅地为现代化建设作贡献,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随着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停招多年的大学,正式公开向社会招生,选拔优秀人才。至此,我国教育战线走出了徘徊的局面,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快车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的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以政治思考为中心的文艺思潮加速了新时期文化的发展。

以政治思考为中心的文艺思潮的出现,与新中国成立后17年间文化发展中所形成的某种思维定势有直接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简单地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判断为支配与被支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有意无意地忽略文艺自身的个性和内在规律。这种思维定势成为人们在刚刚复苏的政治气候和生活环境中重新审视文艺问题时基本态度。这一时期,文学领域中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大体上反映出这种文学思潮的内涵和特点。

伤痕文学主要以十年“文革”政治动乱为思考、描写和反映对象,重在表现极左路线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造成的巨大灾难,给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50页。

人民群众身心带来的严重的外伤和内伤。其代表作有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等,这些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也影响了新时期文化领域的走向。伤痕文学在新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参与了拨乱反正的政治斗争,在社会发生重大转型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比较起来,反思文学更能显示自己政治的敏锐与成熟。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使人们解放了思想,放下了包袱,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文革”十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乃至对新中国成立前的我国社会历史生活进行科学的回顾与反思,借以总结经验,充分认识极左路线所造成的严重灾难,强调在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等重大问题。反思文学的代表作有王蒙的《蝴蝶》、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改革文学从政治角度出发,关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生活,既注重表现当时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同时强调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深刻反映社会生活,努力塑造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形象,从政治方面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对新时期改革开放的进程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代表作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陆文夫的《围墙》等,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改革开放生活作了深入的反映和表现。

其二,以文化开拓为目标的文艺思潮推动了新时期文化发展走向深入。

以文化开拓为目标的文艺思潮的出现与新时期的社会生活发展进程有密切关联。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人们逐步发现影响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民群众的文化观念、道德水准和心理素质等,说到底就是文化问题。以文化开拓为目标的文艺思潮正是适应了改革开放走向深入阶段的需求应运而生,它符合社会生活从政治到文化的演进过程,也符合人们思维活动从物质文化层面到心理文化层面的逻辑规律。这一时期活跃在文化舞台的以寻根小说、文化小说、民俗小说、各类新潮小说

等艺术形式为主。

寻根小说最能体现文化开拓的意味。寻根小说一方面试图揭示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借以匡正现实生活之不足;另一方面它也揭示传统文化落后、保守的特点,以及与现代文明生活不协调的一面。寻根小说着重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关系,促使人们正确认识和全面评价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生活,尤其是在新时期改革开放中的作用与地位,进而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关问题。文化小说是改革深化的产物,它侧重表现改革开放生活中文化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对人们思想性格、文化心理的影响,侧重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等。以文化开拓为目标的文艺思潮对新时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从“政治思考”到“文化思考”到“文化开拓”,这标志着以思维模式的转变为核心的新时期文化发展在悄悄地进行自我变革和演进,它推动着新时期文化发展全面走向深化。

其三,以艺术表现形式突破为特征的文艺思潮推进新时期文化的全面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等口号的影响下,文艺工作者们对作品的思想内容非常看重,而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与革新注重不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解放思想,敢于思考问题,也敢于对艺术表现形式进行新的探索。这一时期,以各类新潮小说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以朦胧诗和后现代诗为代表的诗歌创作和以象征主义、表现主义为代表的戏剧创作表现格外引人注目。新时期,文艺工作者在坚持中国民族艺术表现手法的同时,在与西方文化交流中,大胆采纳西方各种文艺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手法,借鉴其先进经验,进行艺术表现形式的革新和创造,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如意识流小说、朦胧诗和戏剧电影化等艺术表现形式,反映了这一时期文艺发展的新动向。艺术表现形式的突破也带来了新时期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3. 改革开放的实践呼唤文化的现代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生活的变化产生着新的文化需求。改革开放呼唤文化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反映到文化变革有一个过程。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文化互动关系的原理,文化变革在时间顺序上总是相对滞后一些。作为观念形态的反映,只有当经济的变化达到一定的程度,文化才作出与之相适应的变化。因此,当改革开放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后,出现文化滞后的现象是正常的。

文化表现为一种惯性的力量,稳固性较强。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时,新体制的实现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纯技术性的运作,但它与传统观念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却不能靠一纸命令和政策调整来解决。这种矛盾是实际存在的,并时时刻刻在经济和政治的改革中体现,并随着改革的深化而日益尖锐。人们的思想逐渐形成一个共识:中国的改革更重要的还是文化心理、价值观念的变革。改革需要新观念,现代化需要新的价值观,只有这样,社会才会进步、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开放的实践与固有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的矛盾冲突表现在多方面。首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当时称为“下海现象”,人们开始重视物质利益、经济效益。而中国文化传统历来是重义轻利,以“安贫乐道”为尚,奉行“君子言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则,将义与利截然对立。这一文化传统在计划经济时期又与片面和曲解了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相结合,抑制了人们正当的物质利益要求,物质利益、商品、货币一概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批判,追求富裕甚至成为罪恶。这样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显然成为改革开放的阻力。其次,改革开放要求人们解放思想,突破传统的束缚,充分发挥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精神。但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习惯于党的统一领导和行政机关集中指挥的行为方式,并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的固定思维方式思考和判断问题,与改革开放所要求的突破框框,创新实践的宗旨相悖。其三,改革开放促使相对静态的社会生活向动态的社会生活发展,社会的流动性加强,社会人员的职业选择方向增多,阶级阶层的固定归属界限被打破,这些新情况必然造成生活的多样化以及思想的复杂化。人们开始用新的态度和价值理念来适应动态的社会生活。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那种追求纯而又纯的理想化价值观念,与动态的社会生活明显不相协调。其四,体制上的改革变化了原先的经济结构,除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外,多种成分的所有制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生产的重要途径,大批劳动者进入私有制企业工作。这就使生产者的角色关系、服务客体、分配样式和价值认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原社会主义公有制一统天下格局下的心理状态完全不同。其五,人们开始更注重关心自身的生活质量,无论是对物质生活的渴望,还是对美好爱情婚姻的追求,都表现出极高的热情。人们开始向往高档生活消费品的享受,开始向传统的婚姻观挑战。总之,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变化对原有的文化理念和传统心理都意味着突破。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不同程度地背负所谓“离经叛道”的巨大心理压力和舆论压力。文化变革滞后,往往使固定价值理念的社会约束力微弱,传统的价值规范一般不起作用,由此导致的结果就容易发生一定程度的混乱。合乎改革要求的行为,常常因其摆脱了社会的约束,而遭受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有人把改革中新事物的处境形象地比喻为“带着镣铐跳舞”,于此可见一斑。因此,改革要深入,文化滞后现象就必须尽快根除。带着沉重的脚镣,很难跳出优美的舞步。

其实,说文化滞后并不等于文化发展没有变化。文化变革对经济变革的反映过程是慢慢显示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也提供了文化变革的主客观条件。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变动创造了

文化变革的主观条件,那么,大批中国学生留学海外,文化国际交流的增多,则构成文化变革的客观条件。改革开放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曾经被动锁闭的国门向世界敞开。国外的思想文化通过大量的翻译书籍、杂志和其他传媒渠道,传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曾经很有影响的“萨特热”就是典型的文化现象。西方关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知识被广泛介绍,韦伯、马洛斯、哈贝马斯、亨廷顿等西方著名思想家的名字和理论逐渐为国人所熟悉。外国电影、电视剧、小说、音乐、戏剧等文艺作品也出现在中国的文化舞台上。流行歌曲、摇滚音乐、日本动漫画、韩剧等在中国文化界掀起一股股浪潮。这些现象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它开阔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路,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传播了许多现代文化的信息。当然也有消极的一面。思想的闸门一下子被打开,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历史反省过程中,少数人偏激的情绪表现出对外国文化的盲目推崇,不分良莠和不加批判地加以宣传,对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及时纠正了错误的倾向,强调必须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科学地吸取外国思想文化。这对保证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大举措。改革的目的是努力使各项制度最大限度地去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放的目的是使生产力冲破各种阻碍它发展的壁垒。用邓小平的话说,改革就是对内搞活,开放就是对外搞活。搞活的目的就是用现代化的方式发展生产力,将现代化的手段、管理经验、运行机制运用在经济建设中。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实质就是使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现代化接轨。

与世界现代化接轨决不是简单的经济行为,改革开放引起的现代化连锁反应是全方位的。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和结合,出现了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双向运动。文化已经不是单纯的文

化,文化进入了社会生产领域,出现了专门从事文化生产、文化经营的产业——文化产业。文化与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的互动和结合,使文化的载体、文化制作与传播形式更加现代化、多样化和快捷化。使文化的表现力、感召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突出。在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在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达到 60%~80%,大约 3/4 的经济发展都是靠科学技术实现。科技、文化的现代化,将不断延伸改革开放的深刻内涵,拓展改革开放的丰富内容。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with 邓小平的文化思想

1.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with 文化现代化的价值理念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最早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是 1979 年 9 月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1979 年 10 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大会的祝辞中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①在 1980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08 页。

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①这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含义、内容所作的全面阐述,实际上已经把精神文明建设概括为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两个基本方面。

1981年6月,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把精神文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条基本结论之一,并首次以中共中央全会决议的形式,把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正式确定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之一。同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民。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在全社会形成文明的、健康的、科学的生活方式,振奋起积极的、向上的、进取的精神状态,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1986年9月26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要求;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保证之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

建设,促进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改革开放的深入,使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深化。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新论述。1989年10月,江泽民提出“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1992年初,邓小平在巡视南方的谈话中强调,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该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发展了这一思想,并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并列,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大目标。1995年9月,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必须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①

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要以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以提高农民素质、奔小康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目标,开展创建文明村镇活动;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宗旨,开展创文明行业活动。要大力宣传现代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人物,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先进、学习先进的风气。各项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都要务求

^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80页。

实效,坚决反对形式主义^①。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又从跨世纪发展目标和纲领的战略高度,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写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这反映了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为坚持和实践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21世纪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所作的深刻思考。

2001年,江泽民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明确提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②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必须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并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使广大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途上,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些关于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是推动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指导方针。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个大规模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群众性活动,逐步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的同时,中共中央决定

①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第2044页。

②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下同),第158页。

成立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并提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成立相应的机构,加强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蓬勃开展,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道德实践已成为改善社会风气、提高人民素质的一个重要动力。1981年,全国总工会等9个单位联合倡议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成为新时期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的开篇。此后,工青妇等群众性团体又先后推出了青年志愿者行动、希望工程、“巾帼建功”、“办实事、送温暖”、“一帮一、手拉手”等各具特色的群众性创建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精神文明建设。中华大地上,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社区的活动、五好家庭以及百城万店无假货、光彩事业等活动,犹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在全社会得到普遍认同,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的变化,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精神文明建设巨大成就。1996年底以来,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牢固树立服务农业、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思想,着眼提高农民思想文化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把“三下乡”摆上重要日程,积极采取措施,动员各方力量,深入农村基层,为农民提供文化、科技、卫生方面的服务,办了大量实事好事,取得多方面的显著成效,受到农村干部群众和社会各界广泛好评。文化下乡活动重视发挥文化的社会教育功能,加大群众文化工作力度,引导群众文化消费,用健康有益和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科技下乡活动注重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加大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普及力度,帮助和引导人们划清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的界限,增强农民识别和抵制唯心主义、封建迷信及各种伪科学的能力,提高农民科技致富本领,努力在农村形成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风尚;卫生下乡活动开展普及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卫生、科学健身和自然科学知

识工作,加大巡回医疗和卫生宣传力度,加强农村基层卫生所(室)建设,积极发展合作医疗事业,提高农民自我保健和科学养生能力。

与此同时,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教育科学事业。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实施 211 工程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教育事业对国家的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制定和实施 863 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科学技术取得巨大发展和进步,自然科学基础研究领域、高科技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有些项目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跻身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文化艺术努力贯彻“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文艺创作欣欣向荣,荧屏、银幕、舞台百花齐放,争奇斗妍;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对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中央组织实施了旨在弘扬主旋律,发展多样性,推动精神产品生产繁荣的带有导向性的“五个一工程”(即一部好的图书、一部好的戏剧作品、一部优秀影片、一部优秀电视剧、一篇或几篇有创见、有说服力的好文章),设立电影、电视和文学作品的各种奖励,涌现出一大批弘扬时代精神、艺术上乘、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进入 90 年代以后,在“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方针指导之下,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得到巨大发展。从 1996 年开始,中央十部委联合组织的“文化科技三下乡”活动,促进了农村文化建设。1997 年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组织下,在全国开展了“讲文明、树新风”活动,集中解决环境卫生、交通秩序、文明言行、行业服务四个方面的问题,受到群众普遍欢迎。1999 年 1 月启动了《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并开始实施跨世纪教育改革,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2. 邓小平的文化思想与文化现代化

邓小平在新时期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

重新设计。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范畴。这一新范畴,孕育着中国现代化的崭新理念、崭新模式和崭新思路。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明确的远大目标。在完成革命向建设的转型以后,这个目标也开始清晰起来,并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一个部署。20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的口号。这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曾经激起中国人民巨大的建设热情。邓小平在70年代末的讲话中,又重提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作为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邓小平在实现现代化问题上,无疑延续着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遗愿。新时期初期,邓小平阐述“中国式的现代化”问题,除了突出国情条件的因素外,基本意思尚未超越原先的思路,“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四个现代化”是在一个意思上同时使用的基本提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新局面的开拓和发展,邓小平对现代化的思考也日益成熟。从80年代初期起,邓小平的讲话以及党中央的文件中,一般不再使用“四个现代化”这个概念,而更多地用“社会主义现代化”代替。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在引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全面变化的同时,也提供了加深认识现代化的客观条件。尤其是在广泛的对外交流中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感受,更是提升了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认识层次。显然,现代化不只体现在某一个具体的领域,现代化也不能拆开来孤独地进行。现代化是一个系统链,是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因此,它必须是一种全盘性的战略行为。这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社会对现代化认识获得的重大进步,也是邓小平在构画和设计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

邓小平理论成熟为一个思想系统,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的实践而展开的。这一理论内容极其丰富,体现了思想解放、主题鲜明、观点创新、结构完整、逻辑严密、方法辩证以及语言朴实而具有穿透力等多方面的特征。从现代化的视角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当代价值,必须充分重视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思维中的整体价值观。邓小平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价值观的核心理念就是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邓小平始终强调,抓经济建设要“一心一意”,要“扭住不放”。但经济建设不能单科独径地开展,发展生产力必须与生产关系相配套,经济基础必须有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作支撑。邓小平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两手战略,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要推进民主建设又要加强法制建设,教育、科技、文化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正确处理和解决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关系等思想,都是邓小平的社会协调发展思想的体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起步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发动,而它的结果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认识。

加强文化建设是邓小平关于社会协调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包含丰富的文化思想。邓小平的文化思想继承、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思想,它的创新之处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思考,赋予文化现代化建设的新内容,从而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文化现代化的认识带进一个新境界。

第一,把文化、教育、科学视为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智力因素和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标志。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在他看来,科技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度

发展。”^①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②发展科学技术,必须重视教育,“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③邓小平主张:在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④这里,邓小平把科学技术和教育突出地加以强调,着眼的就是文化建设问题。文化建设是个大概念,是个大战略。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是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环境的改善。所以邓小平说:“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⑤在邓小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人们对科技和教育发挥的巨大能量认识愈益深刻,中国社会整体的文化素养明显提高。这不仅表现在国民接受教育面的扩大、学历层次的提高、科技人员的增长等数字的增量上,更重要的是全社会树立了重视科学和教育、尊重知识和人才的观念,从而赋予文化现代化以最具实质意义的活力。可以说,邓小平关于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的文化思想为我国在 21 世纪追赶发达国家安上了翅膀。

第二,强调文化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这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中文化现代化的灵魂。邓小平在讲现代化问题时有一个鲜明的原则,即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来讲现代化。他一再讲,我们讲的现代化,前面有个限制词,就是社会主义,而且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话看似简单,但却蕴含着深刻的意思。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现代化曾经被等同于资本主义化或者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8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87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50 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75 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75~276 页。

西方化,似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根本不沾边。这样的片面认识有其客观的原因。一是由于资本主义首先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历史,西方文明率先成为现代化的样板。二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缺乏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范例。但是,这样的认识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只是制度上的区别,而现代化却是社会演进的一种状态。制度区别与社会状态不能混淆在一起。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从理论上澄清了这个问题。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一种状态,现代化当然具有共性,也有普遍的规律。但实现现代化则有不同的样式。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现代化的样式。因此,文化建设需要有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思想灵魂,它就是马克思主义。这就从指导思想上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现代化样式上的重大区别,是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三,立足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揭示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邓小平文化思想极为关注文化的主体——人。他多次强调,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就是教育人的问题。因为,经济发展要求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要求提高人的文化素质,精神文明建设更要求提高人的文化素质。邓小平极为重视文化建设,其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人和人的文化素质。1977年邓小平复出不久,就倡导在党内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他指出:“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①“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理想、道德、文化、纪律,集中到一点就是有文化。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应该是人的现代化,说到底人的文化现代化。人的文化素质高低,首先体现在理想信念上。共同的理想信念才是把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精神动力。“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页。

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所以我说,人的因素重要……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①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又一次从人才的重要性强调了他的关注点,他说:“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②这些思想抓住了现代化的根本,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落脚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四,主张打破封闭的狭隘偏见,大胆解放思想,博采世界一切先进文化。邓小平曾就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三个面向”的重要指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指示对文化建设同样适用。“三个面向”无疑为当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确立了前进的航向。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文化曾经领先世界,享誉全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建设也不乏站得住脚的成就,但始终表现出内生系统强势,外取系统弱化的发展缺陷。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所致,但主观上的认知障碍是主要的。历史上的盲目排外来自于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优越感,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文化封闭则来自于“姓社姓资”的僵化思维定势。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为文化建设展示了崭新的价值理念:中国文化不能只在内生系统中自我发展,必须开辟外取系统。不从外国汲取先进的东西,中国文化就无法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封闭不是社会主义,关起门来建设不成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一直在重复的话。他指出:“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90~19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8页。

术”^①，“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主张要把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作为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

第五，端正文化发展的方向，努力克服和纠正各种消极因素和错误倾向。文化建设的影响面极其广阔，直接连接人民的精神生活。文化建设有这样的特点：方向和方法正确就会产生积极的正面效应，否则，消极的负面效应将对社会产生严重危害。邓小平高度重视文化领域的发展动态，警觉各种不良的苗子出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发现“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他很焦急。指出：这种现象“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强调：必须避免不加分析、不加鉴别、一窝蜂的盲目倾向。邓小平还对文化战线出现的“一切向钱看”、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给予严厉批评：“‘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②这里，邓小平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的本质是文化建设者，而不是文化商人。他提出，文化建设要突出社会效益，“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③这些观点是保障文化健康发展的有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

力思想武器。

第六,坚持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发扬文化民主,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树立高度的责任感。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这是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方向。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是文化建设必须遵循的方针。“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是统一的。邓小平的文化思想中,包含了发扬民主的内容。他号召:“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①邓小平认为,这样才有利于调动一切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创造文化建设的良好环境。他要求文化工作者要树立高度的责任感,“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益,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②这些精辟的阐述给予文化工作者以巨大的鼓舞。

第七,尊重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鼓励文化创新。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任何事物,违背客观规律,都将受到惩罚。文化建设也是如此。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实践中,违背客观规律搞文化建设的历史教训十分深刻。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指出:党要领导文化建设,但不能包办,“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21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212页。

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是走向事物的反面”。他特别强调:“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①,他引用列宁的话说:要让文化工作者“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的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②邓小平坚决反对用条条框框去束缚文化发展,强调“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③这是邓小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在文化思想上的体现。

第八,文化建设必须以满足人民的需要为前提。一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也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邓小平的文化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民性的特征。邓小平指出:“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④文化建设之所以是一个崇高的事业,文艺工作者之所以有广阔的发展天地,就在于它的人民性。邓小平从三个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其一,“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其二,人民的精神需要是十分丰富的,“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9页。

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文化建设必须去体现和满足这样的多样性。其三,“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文艺工作者要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首先要纯洁自己的灵魂,文艺工作者“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文艺离开人民就失去了艺术的生命,“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①文化工作者只有贴近生活、深入人民,才能够获得广阔的发展天地。

邓小平的文化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新时期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邓小平文化思想的飞跃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而邓小平立足于当代世界和中国国情的创新思维则形成了其文化思想向现代化迈进的主观条件。邓小平的文化思想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上的意义在于实现了当代中国文化范式的根本转变。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创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中,曾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范式。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范式是以阶级斗争作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毛泽东提出的文化范式是完全正确的。我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文化范式也应随之转变,以适应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要求。根据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科学论断,文化范式转变的具体内容,应该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可惜,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在指导思想上开始出现的“左”的错误,不但使经济建设遭到严重挫折,同时也在客观上继续坚持并强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范式,使文化建设遭受严重的破坏。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振兴和文化复兴协调发展的战略,拨正了文化建设的航向。邓小平的文化思想以切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丰富内容、创新观点和战略远见,奠定了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范式,从而树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1页。

立起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一座丰碑。

3. 新时期文化现代化的华彩乐章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支持下,宣传、文化、教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和广大文化工作者共同努力,坚持精神文明建设重在建设的方针,围绕“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四项任务,按照“多出精品,多出人才”的要求,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高扬主旋律,热情讴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时回答现实中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优秀文艺作品。同时,戏曲、曲艺、影视等领域佳作连台,群众性精神文化活动从形式到内容日益多样化,社会整体文明程度不断提升,谱写了文化现代化的华彩乐章。

第一,反映沸腾的现实生活,宏扬主旋律。

新时期各种文艺活动百花竞放,小说、诗歌、电影、电视、戏剧、小品、相声等各种类型的文艺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各种体裁文艺作品的题材选择丰富、多样,几乎涵盖了时代生活的所有重要方面。以电视剧为例,既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上乘之作《毛泽东》、《邓小平》、《秋收起义》、《大决战》等,又有从普通人生活中挖掘出的英雄题材《一个医生的故事》、《遥远的驿站》;既有正面表现改革开放,讴歌新时期沸腾生活的《情满珠江》、《大潮汐》、《忠诚》等,又有从文化冲突、价值观冲突的角度折射中国改革开放艰难历程的《乔厂长上任记》、《大雪小雪又一年》、《北京人在纽约》;既有展示几代农民在古老的土地上痛苦地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神禾塬》、《农民的儿子》、《凤凰琴》等,又有当代知识分子的献身之歌《天缘》、《儒商》等力作。文艺工作者们以其对生活的敏锐与热情,以其强烈的使命感和深刻的历史感,不仅对正在经历大变革的当代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映,而且将艺术的视角准确地切入了当代观众最殷切关注的敏感部位。从文艺作品题材领域来看,既有反

映中国革命的历史题材,如《上海大风暴》、《井冈山》、《重庆谈判》等,再现中国共产党及老一代革命家光辉形象与不朽业绩的扛鼎之作,又有反映农村题材的《沟里人》、《乡里故事》等展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们为了美好的生活不断奋斗的新一代农民形象;教育题材的有《凤凰琴》、《走出黄土地》、《一个也不能少》等以贫困地区教师为主人翁的作品,表现在改革开放大潮下一批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教师形象。军事题材方面,有《潮起潮落》、《和平年代》、《DA师》等描写新时代军人风采的佳作,同时,还有表现英雄、先进人物的《英雄无悔》、《西部警察》、歌颂新时期党的好干部、人民公仆的《孔繁生》等等。这些文艺作品在反映沸腾的现实生活的同时,把握时代的脉搏,大力弘扬主旋律,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

第二,尊重艺术规律,提高文艺的整体素质。

新时期的文艺作品,不仅在选题方面关注现实,而且对题材的内涵进行了深入而独到的挖掘,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提高文艺的整体质量。文艺工作者们不再停留于对生活作浮光掠影式的再现,而是力求从多种剧烈而深刻的冲突中,在情感层次、心理层次、文化冲突、价值观冲突的层次,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人文背景上,表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艰难曲折和历史必然性。如电视剧《情满珠江》,在广阔的时空交错中,将主人翁命运的沉浮、情感的纠葛赋予了深邃的历史和时代内涵。通过一群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呼唤一种崭新的时代精神,即在市场经济的洪波巨澜中,只有靠与之相适应的一整套新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导引,才可能保证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在处理革命题材时,创作者们不再满足于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照相式的实录,而是努力寻找与当代生活、当代人情感渴求的契合点,即在尊重历史的同时,又不拘泥于历史,展示了创作者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大胆的创新意识。

无论是革命历史中大波大澜,还是现实社会中细雨微风,文艺

工作者们都力图从中表达出历史进步的最新要求和迫切愿望。创作者们越来越自觉地在提高作品的艺术性、观赏性上下工夫,力求创作出思想性与艺术性、观赏性完美统一的上乘之作。从新时期的文艺作品看,电影、电视、戏剧、曲艺、歌曲等的思想艺术质量,整体上都较以往有明显的提高。如电影《邓小平》的思想艺术质量为社会各界公认,赢得巨大社会效益;《大转折》、《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京剧《狸猫换太子》在京剧创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赢得观众的喜爱;新编历史剧《贬官记》思想艺术质量上乘,堪称戏曲精品;豫剧《丑嫂》、话剧《地质师》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平,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歌曲《春天的故事》、《青藏高原》、《走进新时代》等文辞优美、旋律动听,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成为大众喜爱的经典歌曲。改革开放以来,各类文艺作品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质量在稳步上升。

第三,进行艰苦的艺术探索,实现表现形式的多样化。

新时期的文艺作品,在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艺术把握中,不断探索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为当代中国文艺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在表现形式和风格的多样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如在正面表现改革开放的作品中,注意在情节构思和结构安排上锐意创新,对重大历史题材进行通俗化的艺术处理,并以新的视角切入生活,对生活进行艺术化还原,提高作品的文化品位。新时期的文艺在艺术创新中,实现了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文学、电影、电视、戏剧、小品、相声等艺术形式争奇斗妍。以戏剧为例:既有恢弘大气的正剧,也有轻松幽默的喜剧,还有震撼人心的悲剧。同时各种剧种也大放异彩,京剧、话剧等全国性剧种好戏连台,豫剧、越剧、河北梆子、粤剧、闽剧、秦腔等地方性剧种也日渐火爆。从文艺表现的内容看,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地方特色是构成多样性的重要因子。以歌曲为例,如湖北的《三峡,我的家乡》、贵州的《高原我的

家》、四川的《熊猫的摇篮》、陕西的《黄河震鼓》、内蒙古的《鹰之歌》、北京的《冰糖葫芦》等,无不展示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多样化的音乐风格。从题材形式上看也呈现鲜明的多样性景观,新时代的农民、改革开放时期的知识分子、偏远山区的教师、社会底层的城市市民、保卫国家安全的军人、维护社会安定的公安干警、一心为民的人民公仆等,都进入了艺术工作者的视野,成为他们表现现实生活的题材。此外,反映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作品等进一步丰富了艺术表现题材。

第四,理论结合实践,关注现实。

在理论研究方面,坚持理论指导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研究并回答现实问题,成为文化氛围改善的突出体现。文化发展离不开理论研究,理论的贫乏必然造成文化的枯竭。理论研究对文化发展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促进人们思维方式的日益成熟和完善,为社会生活提供普遍认同的价值判断。其二,促进理论对社会文化生活的渗透,丰富文化发展的资源。泛指的理论研究包括社会科学、文史哲等各个领域。改革开放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理论研究空前活跃起来。理论工作者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结合社会的政治生活,阐述党的方针政策,研究新时期党的建设、改革开放大潮下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等重大问题。新时期的理论研究,特别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注重理论的应用和理论宣传的创新,注重对策性研究,力求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服务。理论工作者辛勤劳动的积极成果,取得了公认的社会效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文化现代化的新导向

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现代化的要求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江泽民指出：“我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的。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和十五大提出的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①可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重大而现实问题的思考，它的提出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重大理论成果。

2000年，江泽民在广东视察时，正式提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首次表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引起党内外的重视，理论界开展了热烈的研究。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在国内外都引起强烈反响。2002年中共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写进党章，成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至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从最初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寓意深刻、思想全面的理论体系；从指导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纲领，发展成为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32页。

不仅指导党的工作,而且指导整个国家工作、指导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体系。

“三个代表”是密切相关、辩证统一的整体,它从党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的全面整合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本质要求。做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也就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①这从根本上揭示了党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体现了党的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是因为“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②党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③只有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水平,才能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做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规定。“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53页。

②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58页。

③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58页。

文化利益。”^①中国共产党是否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最高检验标准,就看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总之,“三个代表”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每个“代表”都有明确的要求,但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江泽民对“三个代表”之间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论述,指出:“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条件。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②这一论述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物质与精神、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多重关系上,也从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创造主体的关系上,揭示了“三个代表”之间的内在统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仅在本国的党内外产生强烈反响,而且也在国际上引起高度重视。这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今后建设的一个崭新的指向,不仅中国人民而且整个世界都将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落实来观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和方针。二是因为它是应对世界现代化发展潮流的建设性纲领,显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将如何构建现代化模式的基本走向。很显然,21世纪展开的是新的历史画卷,世界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以及可能会遇到的障碍,比人们现在能够预想到的要多得多,大得多。但是,不管前进的过程中会碰到什么样的阻力,有一点是确定的,即只有打牢基础,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才能在新的世纪里应对任何挑战而不败,站立时代前列而不惧。要做到这一点,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里执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60~161页。

②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63页。

政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坚定不移并切实有效地实现社会的现代化。

从现代化的角度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意义,必须重视其中蕴含的中国共产党的功能转换。现代政党理论表明,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和政治现象,政党的功能是多重的,其中有普遍的共同性的功能,也有特殊的个性的功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至今,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革命型的政党和建设型的执政党。两个角色的共同之处在于动员和集聚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努力。无论是革命型的政党还是建设型的执政党都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动员和集聚功能。这其实也是任何政党都能够达到的目标,只不过各个政党由于阶级立场、思想理论和行为作风的差别,实现的程度、动员和集聚的范围不同而已。两个角色的不同之处在于革命型的政党以破坏旧的世界秩序为主,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以暴力革命为基本选择,而建设型的执政党则以完善新的世界秩序为主,适用的手段和方式只有以和平发展为途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共产党事实上的角色转换并没有形成功能转换的认识,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仍然没有从革命型政党的角色中走出来。片面地强调“斗争哲学”、滥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主观地夸大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以致“文革”中发生打倒一切的破坏性举动,都说明了对执政党建设性功能的扭曲。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任务的认识变化,也为真正从革命型的政党向建设型的执政党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先作为党的建设纲领提出来,是对“文革”时期提出的“五十字建党纲领”^①的抛弃。

^① 即“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表述出自毛泽东1967年的一个批示,1969年中共九大的党章中将它写入总纲成为党的建设的纲领。

这个“五十字建党纲领”突出以阶级斗争为核心,将党的建设定位在“与阶级敌人战斗”的层面上,完全是一个革命型政党的建设摹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向中国共产党揭示了崭新的建设层面,从生产力发展、文化建设和人民利益三个方面规定党的建设任务,从而使执政党的建设性功能得到体现。江泽民多次提出要深刻中国共产党的两大转变问题,要害问题就是要从政党功能上确立执政党的建设性意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党内外的反响说明,人们正是从执政党功能的崭新定位上认识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

中国共产党是在现代化潮流汹涌澎湃的世界环境下执政,是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国内变动环境中执政,任务十分艰巨而具有挑战性。显然,就中国而言,现代化是一种压力,又是一个目标。目标要在压力下实现,压力也只有在实现目标后才能排除。压力和目标共同形成现代化的动力,中国共产党只有将现代化的动力充分在实践中运转起来,才能使压力转化为动力,才能使目标成为现实。江泽民在许多讲话中,反复从世界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时代环境强调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广大理论工作者也结合当代世界的形势进行了阐述。当今时代和世界的主要特征是: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电子信息为核心的科学技术革命浪潮迅猛发展。由此而形成的现代化压力具有更为深刻的挑战意义。20世纪中期掀起过一次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浪潮,当时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下,没有作出正确的应对,付出的代价是大大拉开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新一轮的世界现代化浪潮下,中国的劣势是明摆着的事实。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两重性。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弱势,如果没

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①从一定意义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现代化压力下的产物,是回应新一轮世界现代化潮流而在中国共产党建设上的重大调整。江泽民指出:“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②这个论述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

2.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文化现代化的逻辑关联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将党的前途命运与文化建设联系起来,这标志着党的文化使命感的增强,也标志着党的执政思想的成熟。文化意识是一种超越一时一地具体经济政治问题的远虑,它与长治久安、造福万代的执政理念连在一起,与延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历史感和创新文化的现实责任心连在一起,与谋求人类完善和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连在一起。人类文明越发展,文化的地位和作用就越突显。在当今世界,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也成为构成国际竞争和冲突的重要因素。一个国家和民族强大与否,既取决于经济实力,也取决于文化实力;同样,一个政党能否牢牢掌握政权,既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政治、经济资源,也取决于它所掌握的文化资源,取决于它是否掌握先进文化发展的主导权。

先进文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灵魂。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合规律性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合目的性的过程,是人类有意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28页。

^②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79页。

识、有目的地进行不断的选择和创造的过程。当然,这种选择和创造并不是某个人主观意志的结果,首先要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会受到某种系统的规范和支撑。这种系统就是文化。自从人类和人类社会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所谓先进文化,就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体现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最根本利益,反映时代发展潮流的文化。一旦某种先进文化逐渐形成,它就会作为人类社会合目的性的一种潜在力量,通过知识体系、价值观念、思想信仰和行为规范,通过评价、言论、交往等方式,教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成员,规范人们的行为,保持社会的认同,制约社会发展的特色和方向,从而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灵魂。先进文化所体现的主要是关于现实社会“应如何”的价值观念,因此,先进文化必然会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这是因为,人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行为。只有当某种行为被认为具有合理性时,人们才会理直气壮、义无反顾地践行。先进文化正是人们行为合理性的根据所在。在先进文化体系中,一切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新思想、新观念、新道德、新习惯、新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将为人们所接受、所认同、所践行,一切落后的、腐朽的旧观念、旧思想、旧习惯和旧行为方式,都会在先进文化的冲击下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因此,先进文化本质上是人民改变现实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每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在它诞生之前,事实上就已经由支撑它的先进文化规定了方向。

先进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作用。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形态的更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新的社会形态总能在多次挫折和反复之后浴火重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先进文化的内在支撑。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遇到曲折、反复时,先进文化就会给人们以信念的支撑,成为人们继续追求新

的社会生活的动力,新的社会理想因此也就能够在先进文化的导引下最终转化为现实的社会形态。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之所以能够在游牧民族的历次狼烟中不断重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在封建贵族复辟的硝烟中确立自身的历史地位,就说明了这一点。当前,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推动着人类历史踏进新世纪的门槛,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何去何从,又一次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任何一个政党,如果不能顺应先进文化的发展潮流,主导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那么,它最终都难逃被历史淘汰的命运。中国共产党只有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才有可能抢占未来社会的制高点,才能凝聚民族力量和宏扬民族精神,才能在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中赢得战略主动,才能进一步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现代化的本质规定。这一概括,超越了百年来文化论争中各种形而上学的机械思维方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定位上指明了文化现代化的方向。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个定位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探索经验的积累和共同智慧的结晶。它在宏观上回答了如何科学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如何使中国文化建设能够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如何使文化建设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步调一致等等重大问题。对于文化而言,“先进”是一个状态的界定,是与“落后”相对的。这里说的“先进文化”,突出的显然是它在世界文化整体中的位置规定,只有占据领先地位才称得上是先进的。它不直接反映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的地域概念,也不直接反映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阶级属性。因此,“先进文化”在文化现代化意义上更具概括性,也在普遍意义上更具通用性。但是,文化总是具体地体现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地

理区域范围,文化建设也总是有相应的指导思想和发展路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想目标决定了其现代化建设的行进路径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因此,“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离不开“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两个限定的前提。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内涵的一致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这个概括,体现了文化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方面必须向资本主义学习现代文化,必须参与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现代进程;另一方面,又必须对占据着力量优势的当代资本主义保持一种疏离与分别、抵抗与斗争,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忘记、不能丢掉社会主义立场。文化是一切制度与行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所认同的现代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是代表人类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根基所在。不断坚定人们对社会主义文化先进性的信念,始终使社会主义文化与时俱进、与世俱进,使党牢牢掌握中国先进文化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无疑是新时期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的重大时代课题。江泽民指出要充分重视文化的竞争问题,他说:“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宏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①必须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由于先行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文化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在文化竞争中目前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中国共产党主张学习现代文化,吸取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只是基于文化是人类文明共同财富这样一个普遍意义的立论,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的落后。一

^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391页。

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某些方面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以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文化更先进的文化。它克服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缺陷,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吸收了符合现代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新文化因子,以实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一致为目标,是代表人类文化前进方向的先进文化。根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社会主义应该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但现实的社会主义却是在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首先实现。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这些国家实现,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夺取政权之前的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在事实上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当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取得成功后,不仅使该国摆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束缚,走上了独立与发展之路,而且蕴含在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之中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又给予这些国家人民以尊严、自信心和自豪感。这是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也是这些国家和民族文化前进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观念。

一般来说,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它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是能够自觉代表社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而取得政权之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问题就容易被忽视,有时还会发生把保持现实的文化形态同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等同起来的问题。现实的文化形态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存在着矛盾的,实现两者的统一,不仅需要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胸怀、勇气和敏锐性,而且要能够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显然,能否正确处理文化建设中的保守与创新的矛盾,能否实现现实文化形态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有机统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能否巩固和稳定的关键所在。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把建

设现实文化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相统一。但是,能够统一并不等于事实上就是统一的。如果不能自觉地按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进行文化建设,甚至以错误的理论、路线和政策作为评判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时,这种文化建设就有可能离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越来越远,党所掌握的引领文化前进方向的主导权就可能丧失。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现实文化建设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这对关系。

3.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与文化现代化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重视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作用,使文化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中作出积极的贡献,从而真正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终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文化的发展直接影响制约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创新就成为建设先进文化的重中之重。中共十六大报告在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明确指出,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把建立文化创新体系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意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现代化认识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牢牢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大力推进文化观念的创新。“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

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①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在指导方针上,必须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宏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实际工作中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在文化内容上,必须以科学精神为特质,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在文化形式上,必须坚持面向大众的原则,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路线,充分利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网络手段等多种形式,实现对先进文化的宣传,真正使先进文化的理念成为广大群众认同的主流观点。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必须进行观念的创新。要特别注重把对文化的理解从长期以来狭隘和片面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要充分认识文化在物质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中所产生的能动作用,要充分发挥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发展教育科学事业、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②这一认识是形成科教兴国战略的思想基础。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造就高素质的劳动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与实现文化现代化密切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社会不可缺少的必备要素,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从我国先进文化建设来看,只有突出和强调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积极普及科学知识、提高科学素养、弘扬科学精神,才能培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第38页。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第40页。

科学素质和科学意识,反对形形色色的非科学和伪科学的东西,充分发挥科学在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先进文化的建设中,科学不仅包含自然科学,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江泽民指出:“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这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给人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教兴国“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①。因此,大力发展教育和科学是先进文化存在的根本保证,也是推动社会整体进步的基础。

第三,发展先进文化,大力推进文化产业的创新。先进文化建设,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进程中表现为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②就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看,在党和国家的引导和支持下,各种公益事业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发展,一些重要的文化遗产和艺术形式展现出新的生命活力,中华文化所包含的许多艺术形式,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瑰宝,重新焕发出自己独特的魅力。但从我国的实际发展来看,文化产业的进程才刚刚开始,与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状况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因此,发展文化产业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任务。文化产业的创新,首先要充分认识到文化除了具有“事业”的意义外,还具有“产业”的属性。认识到文化具有的“产业属性”,就要改变过去单一的发展模式,在保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前提下,努力实现其经济效益,通过经济效益的不断实现和不断扩大,增强文化的发展实力。其次,要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对文

^① 《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

^②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第41页。

化资源进行整合,在遵循文化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按照市场规律来重构,逐步形成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品牌”,通过发挥品牌的优势来参与竞争。发展文化产业,并不等于文化的产业化,而是要充分重视文化当中具有“产业”可能性的内容,通过产业创新,来参与国际文化的交流、竞争,不断增强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第四,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大力推进文化体制的创新。文化的发展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因此,如何“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①,建立既能保证意识形态安全,又能促进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壮大文化产业规模的社会运行体制,是十分迫切的任务。体制创新必须改变现有的行政管理模式,把深化改革同调整结构和促进发展结合起来。深化改革,就是要改革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体制;调整结构,从经济发展的全局来说,就是要重视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增强、提高文化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份额。从文化产业自身的发展来说,就是要努力寻求产业发展的亮点,对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和市场竞争力产业通过制订政策,予以支持。通过深化改革和调整结构,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进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体制创新还必须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长期以来,政府办文化,国家包文化的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要求。因此,在政府管理、指导的前提下,如何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二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目前发展文化产业的关键所在。政府对文化的管理,在什么程度上什么范围内依靠行政手段,什么情况下依靠法律手段,什么情况下依靠市场调节,是急需解决的问题。积极健康的管理模式,应该是规范和强化政府的政策管理和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第41页。

行政管理。对政府的管理权限进行规范,对政府应该管的要强化;同时,更多的是政府依靠法律和市场来实现管理,让文化企事业单位有自己灵活的发展途径,从市场中寻求发展,通过市场来实现资源的配置、资本的投入和人才的聚集,进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体制创新还必须加强文化法制建设,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市场,促进竞争,保护意识形态的安全,按照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突出的是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是科学发展观的体现。科学发展观是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体现了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对现代化认识的进一步加深。“小康社会”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概念,用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到20世纪末,小康社会按照邓小平设计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中国人民初步尝到了现代化的甜头。但要进一步完成现代化,需要更加科学地规划社会发展的道路。经济的发展要保持持续发展的后劲,政治、文化要与经济取得同步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要得到全面的体现,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的需求要得到更大的满足,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作为思想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是最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一个中间步骤。按照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的设计,21世纪中叶,中国有希望达到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这个时候,以中国实际情况来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这个目标并不遥远,但任务是很艰巨的。

历史地看,现代化发展的先天不足和发育不良使中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游离于世界先进潮流之外,外部压制的客观因素和内部失误的主观因素导致中国长期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僵滞、曲折的困惑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现代化的优势十分明显,制度、资

源、人才、民心等方面都具有前人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外部条件上不仅有独立的主权作为国家的保障,而且已经成为世界上有较重量级的国家,不仅摆脱了遭侵略、受压制的被动,而且获得了参与和融入世界的主动。因此,现代化的先天不足需要有后天的爆发力来弥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腾飞的事实已经证明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能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过程,将进一步展示中国除了经济建设的能力外,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建设方面同样具有巨大能力。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后天爆发力,需要文化现代化来启动,文化现代化是积聚和焕发后天爆发力的根基。同时,社会主义的中国也只有文化现代化方面闯出一条成功的道路,才能使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增添新的范例。

结束语：艰难的跋涉和庄严的使命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经久不息。它浩似大海，荡如长江，具有精粹的内容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劫难而不衰，而且不断繁衍、发展、壮大，这与中国文化催生的民族精神不无关系。近代中国充满坎坷和磨难的历史，经历了说不尽的心酸，也享受了道不完的欣喜。中华民族承受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耻辱，也迎来了人类发展中少有的进步。在从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途程上，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的道路和今后将承担的任务，都向中国人民传送着一个信息：它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在中国，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任何其他政治组织或政治力量，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担当起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中国现代化任务的庄严使命。

文化现代化是一个艰难跋涉的历史过程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趋势和历史主题。近代中国在富国强民的追求和现代化模式的抉择上，历经沧桑，颇多周折。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最初面对世界现代化冲击时的窘境，也永远不会忘记国家落后于世界现代化潮流所造成的败落。抗争、探索、失败、胜利、曲折、成功、崛起、腾飞，交织成一幅壮观的历史画面，显现了中国人坎坷的心路历程。

人类社会向现代化演进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就这个意思上说，现代化对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提供的是一样的机遇。但人类历史不可能划一地齐头并进，用同一种步调发展。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域，由于历史文化、国情

民俗、地理环境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也会在发展水平和程度上出现差异。至于西方国家率先踏入现代化的进程，并不是历史的偏袒，有必然性的因素使然。同样，在古代文明中始终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华民族被现代化进程抛在后面，也不是历史的恶意，偶然性说明不了问题。但是，正是这样的历史反差和错落，造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无数困难和沉重压力。

历史虽然是公正的，但中华民族遭遇的历史却是不公正的。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军事的暴力征服迫使中国面对世界时，中华民族根本无法享受发展现代化的正常待遇。固然，从主观条件说，中国的历史包袱和实际的国情对推动现代化建设很不利，很多障碍来自于中国社会自身。但另一方面，西方列强政治压迫造成的主权旁落，经济掠夺导致的资源流失，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民族歧视，又使中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从容地进行现代化的建设。解除这两方面的困扰因素，对于实现中国现代化同样重要，不可强调一方面而忽略另一方面。

近代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时间比西方国家晚了 200 多年。这个差距使中国在卷入世界现代化潮流之初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传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难以通过时间来反映差距的。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一天要超过封建时代的几年甚至几十年。1847 年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这样来算的话，鸦片战争时候的中国与当时西方国家就不是 200 年的差距问题了。这个差距的一个显形结果就是号称“天朝帝国”的清政府不得不接受丧权辱国的羞愧，面对西方列强而屈膝称臣。半殖民地的附庸状态使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始终摆脱不了帝国主义的控制。此外，中国辽阔的疆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7 页。

长期被尘封在农业社会结构的自然状态之中,现代生产力的原始资本积累,不仅没有西方国家掠夺殖民地资源的途径,而且也不可能从国内的农业社会结构中汲取。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不得不在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中起步,在外国资本的压迫下生长。同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一方面使中国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保存着深厚影响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又使间接统治中国的各帝国主义有意识地容忍、默认和保护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的权威地位。这就使近代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严重受到来自传统文化的巨大阻力。这些因素构成文化现代化进程发展的恶劣生态环境,使文化现代化每迈进一步,都需要付出极其艰难的努力。

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将中华民族视为“文明未开化”的“野蛮”民族对待的。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在他们眼里,无非是已经习以为常的殖民事业的继续。号称先进文明的民族以不文明的野蛮行为对待另一个民族,无疑是道义上的强盗。出于殖民利益的需要,帝国主义在打败中国封建主义传统文明的同时,并不希望将中国带进与他们同伍的先进文明行列。从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看,必须承认,许多先进的思想理念和文化产品从西方输入中国,为近代中国加入了催生文化现代化的激素。但是,另一方面,各帝国主义又竭力支持近代政权形式下的专制统治,阻止任何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他们从经济上、政治上扶植不同时期中国国家政权中的封建势力,在各次社会变革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们遏制民主意识在中国的增长,为新文化的发展设置种种关卡。因此,从总体上说,帝国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反对者。毛泽东曾经指出:帝国主义决不允许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是千真万确的。看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涉及到对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的作用认识和评价问题。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文化现代化不仅内部阻力重重,而且也严重地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外部压迫。

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既经受着内外部的阻力，而且也面临着几次发展模式的转换。当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失范和落伍时，首先选择的取代模式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样本，近代西方文化成为中国人憧憬的理想形态。但是，文化的转型是很难通过取代模式来实现的。尽管一些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取代模式来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结果是失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根本不可能成为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模式。中国共产党树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后，文化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转入又一次的转换。社会主义的方向被融入文化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之中。这次模式转换表现的是文化创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因，对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进行批判性地继承，形成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特征的民族形式，同样也不是取代模式。这样两次重大的模式转换，不管成效如何，艰辛的摸索必然付出很大的代价。对一种新的模式，需要有思想认识和实践探索的过程，期间会承受或多或少的风险，也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曲折。事实上，无论是第一次模式转换中形成的资本主义样本，还是第二次模式转换中选择的社会主义方向，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深刻表明了文化现代化的艰难。

文化现代化是一个艰难跋涉的历史过程。从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启动，到真正实现文化现代化，将伴随中华民族漫长的奋斗和艰辛的努力。这个艰难跋涉的历史过程，也是中华民族重新磨炼的过程。历史曾经给予中华民族领先世界文明的荣耀，历史也将提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机遇。文化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的中国只有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才能重新将中华民族带进世界文明的前列。

中国文化现代化历史的现实启示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现代化所走过的历程，给中华民族留

下的启示是深刻的。历史是一笔财富,聪明的民族总是能够从中汲取到现实的智慧。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虽然还远没有终结,但它所提供的启示值得认真琢磨。

启示之一:必须高度重视对阻碍文化现代化因素的研究。阻碍文化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当然是多方面的,经济基础薄弱、政治体制滞后、教育状况欠佳、社会生活不成熟,都可能构成文化现代化发展的瓶颈。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具有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对经济、政治的反作用,在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演进中有很多表现,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封建传统文化对生产力和政治演变的影响。经验告诉我们,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是阻碍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但长期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程度地忽略和轻视了这个问题。民主革命时期,反封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但反封建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着重解决的是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封建阶级统治,而不是思想文化层面上的反封建。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斗争压倒了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批判。在几次重大的制度变动中,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受到的冲击十分有限。历次文化运动虽然也对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发起过冲击,但相对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积淀的几千年历史来说,根本不解决问题。文化现代化必须跨过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这个槛。因此,深入仔细地研究封建主义文化的各种思想基因,分辨清楚它与现代化的冲突所在,将是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启示之二:必须树立实现文化现代化的信心。评价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既不能妄自菲薄,又不能盲目乐观。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任何自卑和自大都是错误的。首先应该看到,从19世纪中叶到今天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华民族取得了足以自豪的成就,中国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道路上,无论

是生产力水平还是社会文明程度,都已经有了快速的、大幅度的提高。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在逐渐缩小。尤其是20世纪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确定以来,经济腾飞和民族振兴的事实有目共睹。我们毫无理由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景持怀疑的态度。当然,还应该看到,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仍然存在较大的距离。这也是事实。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有过一个估计。他认为,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总体上要落后30年,在高科技领域可能要落后30年至50年。因此,我们也毫无理由高枕无忧,松懈意志,丢失发展的时机。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评价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重要的是要树立信心。中华民族既然有能力创造灿烂于世界古代文明史的传统文化,也必然有能力再造辉煌于世界现代文明史的现代文化。

启示之三:必须端正文化现代化的方向。近代中国的多次文化论争总是迷惑于正确方向的缺失。不管是主张“复兴儒学”,偏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派,还是主张“取法西学”,偏倚西方近代文化的一派,相争之中,情感的因素要重于理智的因素。主张“取法西学”的一派人物虽然明确地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但也只是出于直观的感觉,不免带有主观片面性。实践表明,近代中国的文化论争如果不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联系起来的话,争来争去,结果只能始终停留在或者厚此薄彼,或者厚彼薄此的循环之中。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方向是由中国共产党指明的。这个方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既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也不是以西方文化为榜样,而是对这两种文化通过扬弃实现的创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是文化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统一,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文化现代化才有实现的保障。

启示之四:必须正确处理好文化现代化与经济、政治现代化的

辩证关系。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原理说得很清楚。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也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从中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即随着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发生和发展,文化现代化成为必然的要求。但是,在认识上却始终存在两方面的误区。其一,片面理解文化反映经济、政治的被动特征,忽视文化对经济和政治反作用的主动特征,因而,文化长期只是处在陪衬的“配角”位置上,对积极进行文化建设以推动经济建设缺乏足够的重视。其二,片面理解经济对文化决定作用,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文化也会跟着发展。这种文化现代化的“自然发展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当今世界的现代化潮流涌动中,文化现代化已经被提高到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经济现代化需要文化现代化来推动和保障。

启示之五:必须正确对待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文化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包含着两个层面。一是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二是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文化的普遍性指的是它作为精神产品所体现的抽象属性。比如,文化可供人类共同享受,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文化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反映,客观存在是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等等。文化的特殊性指的是它作为现实形态所体现的具体属性。每一种文化都有特定的规定性,比如,形成的地域环境、采取的民族形式、影响的族群对象、局限的历史范围等等。现代化的普遍性指的是它作为社会演进状态所具有的共同规律,不分国家、民族、区域,这种共同规律必然要发生。现代化的特殊性指的是它作为一个具体过程的发生情形,有不同的运行模式、不同的历史顺序、不同的组成结构等等。文化和现代化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反映普遍性。文化表现为现代化的过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对这一辩证关系缺乏科学的把握。强调发扬国

粹，弘扬东方文化的代表人物往往更多地注意了特殊性的方面，而强调用西学取代儒学的主张则更多地注意了普遍性的方面。社会主义建设中很长时期也没有正确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忽视了文化和现代化的普遍性，对西方文化一概采取防堵、批判和抵制的态度，造成严重的文化封闭。正确地认识文化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应该将坚持本国文化建设的实际与吸取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形成既反映文化的抽象属性和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又具有文化的中国样式和现代化的中国模式这样一种文化现代化建设格局。

启示之六：必须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文化的精神产品属性决定了知识分子在文化现代化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实践是文化的源泉，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主体等观点，与强调知识分子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并不矛盾。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总是源于生活，知识分子也是人民群众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推动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作用十分显著。从19世纪末维新改良运动中康梁一派的知识分子，到20世纪初辛亥革命风潮中的大批留学生，到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战斗在文化战线上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以及像鲁迅等其他进步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的时期，以他们的先进思想不断地为文化的革新添加了现代的内容。但是，在认识知识分子作用的问题上，也出现过较大的偏见和失误。“左”倾思想的指导曾经在相当长时间里，把知识分子作为改造的对象而置于革命的边缘化地位，严重的时候便出现排挤、打击甚至迫害的情况，十年“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教训是深刻的。文化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知识扩张的过程，没有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的贡献，就没有文化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现代化的程度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数量、质量成正比关系。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知识人民化和人民知识化的过程，知识如果不人

民化,人民如果不知识化,文化现代化就难以实现。

21 世纪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艰巨任务

21 世纪的历史画卷刚刚展开了扉页,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的重大变化,科技革命的凶猛浪潮,已经预示着新的一个世纪将在不平常的岁月中激荡,现在还无法预料和难以想象的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致力于经济的发展,提高国民的素质,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升民族参与世界激烈竞争的能力。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要使自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掉队和落伍。

当前,我国正进行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全面改革的纵深发展与社会整体结构的变迁,引发着思想意识与文化精神的深刻变革,中国文化发展正处在一个深刻的变动与重建的时期。在当代文化理念的诸多样式中,主流文化的精神形态和现实样式仍处在重建过程之中。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它不仅是一个庄严的历史使命,而且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责任;不仅需要宏观的构想,而且需要微观的细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把领导文化现代化建设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重视。在推进文化现代化过程中,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

第一,繁荣文化与弘扬主旋律的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方针。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因而,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这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构成,除了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文化外,还必然存在非社会主义的文化。既然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那就可以在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下发

挥其积极作用。它们对整个文化生态的平衡作用，是应当而且必须加以肯定的。正确和积极的态度是，努力化解和减弱非社会主义文化的消极作用与影响，充分发挥主流文化的主导和领导作用，克服文化发展中的不良倾向，逐步形成以主流文化为主导、多种文化形态并存的和谐共兴的局面。这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现实途径和要求。繁荣文化是丰富社会生活，满足人们多方面、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既要努力使主旋律有机地融入和体现在各种样态的文化形式中，又要避免简单化的做法，坚决防止使主旋律束缚繁荣文化的偏向。

第二，精神示范与利益驱动的关系。文化是民族全体成员达成共识和认同的依据，是维系民族精神的纽带和凝聚民族力量的工具，因此成为民族存在的精神依托和力量支柱。文化具有精神示范的功能。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包含有专制、迷信的思想糟粕，也包含着爱国、亲和、互助、尊长爱幼等思想精华，它为支撑民族的强大起过重要作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精神示范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既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构成连续的历史链条，又具有现代化文化的时代色彩。文化现代化必须始终突出精神示范的意义。但是，文化需要通过产品的方式传播和影响社会，在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模式的条件下，文化的利益驱动成为合乎规律的正常现象。没有市场的文化难以使精神示范最大限度地显示效果，市场的扩大必然带来文化的利益增长。文化产品从制作到传播的整个过程，都需要人力和资本的投入，承认文化的利益驱动是必须面对的现实。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该注重精神示范与利益驱动的统一。但有的情况下，两者可能出现矛盾，只讲利益驱动将有害文化的健康发展，但只强调精神示范，否认利益驱动也有失偏颇。正确的态度是努力争取两者的统一。在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利益驱动必须让位于精神示范。邓小平强调文化建设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

这是处理两者关系的指导思想,必须坚定地贯彻落实。

第三,多元需求与规范运作的关系。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区别之一就是社会生活的多元与单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使传统社会的生活需求简单而单一,现代工业的发展使社会的分工细化为不同的层次,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生活领域,精神的需求呈现复杂而多样化。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形成社会生活多样化的局面,并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形成更加丰富的生活多样化。这是文化现代化的必然规律。但是,多样化不是自发化,多元的文化需求不能散乱无序地加以满足。任何文化产品必须对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负责,随心所欲的文化理念、文化产品决不是社会生活多元需求的体现。对社会生活的多元需求必须加以引导,有效的途径就是规范运作,通过规范运作来抑制多元需求中的不良倾向。规范运作的前提就是建立完善的文化制度,牢固树立文化产品制作和传播整个过程的法律意识,使文化的多元需求在健康有序的规范运作中得到实现和满足。在处理这对关系时,既不能主观地遏制文化的多元需求,又不能让它处于自流自发的状态。如何处理好这对关系,需要极高的领导艺术。

第四,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规律的关系。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①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它必然要渗透和体现在文化发展中。对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来说,意识形态搞多元化将是危险的事情,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但意识形态不能取代文化本身。文化发展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用意识形态的规律来套文化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

的规律,不仅不利于文化发展,而且也会给意识形态带来伤害。文化现代化建设中,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与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并不矛盾。在文化领域创造团结、民主的气氛和环境,在文化建设中支持和鼓励勤于探索、锐意创新的精神和实践,提倡在学术上不同观点和学派自由讨论,提倡在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自由发展,从内容到形式实现多样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建设思想所包含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必须从过去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经验,在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规律的关系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科学的态度,实行正确的方针。

第五,民族遗产与外国文化的关系。当代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文化生态的重组共同构成和促进了文化创新和文化继承的互动。国际局势正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包括文化因素)竞争日趋激烈,世界范围内的文化激荡也更为激烈。同时,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警惕。就国内文化现状而言,我们面对的文化传统,已经超出了封建主义文化的狭义范围,它包括中国古代文化、中国近代文化、新中国成立后的传统社会主义文化,我们所参照的对象依然有国际背景下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文化,还有其他民族文化。既然我们面临割舍不断的民族传统文化、挡不住的外来文化和不容回避的文化霸权与文化渗透,就必须对巨大的民族遗产和丰富的外国文化形成科学的态度。怎样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一直是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反复讨论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此都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原则,但也有过没有处理好这两者关系的教训。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在文化现代化过程中,都会面对这两者的关系,而能否科学地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都将对文化现代化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六,文化建设中的“硬件”与“软件”的关系。文化虽然是精神产品,但也同样需要借助具体的工具来实现。文化产品的实现

需要两大类工具。一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人，一类是传播文化的载体——物。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人是有意识的主动者，与文化的关系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将意识体现在文化之中。物是通过人制造出来的实体，与文化的关系是通过有形的物质形态将文化展现在人的生活之中。可以说，人是文化建设中的“软件”，物是文化建设中“硬件”。近代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表明，“硬件”的现代化比较容易。比如，从近代中国引进外国电报、电话、电影、小说等文化传播的形式，到当代中国手机通讯、计算机网络等高科技传媒的迅猛发展，“硬件”现代化的实现过程并不长，所费的周折也不大，但是，“软件”的现代化却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文化现代化过程中，这一“硬件”与“软件”的矛盾将成为突出的问题凸显起来。因为人不仅是文化的创造者，而且又是文化的享受者，生产和消费的同一主体决定了人的现代化程度高低制约着文化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高低。“软件”没有现代化，“硬件”再怎么现代化，也无济于文化现代化。因此，中国共产党将实现人的现代化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要位置上，对于实现文化现代化至关重要。在文化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切实改变“软件”现代化落后于“硬件”现代化的现状，在加速人的现代化中实现文化的现代化。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延伸、扩大范围的社会演进过程。这不仅表现为卷入现代化潮流的国家数量扩大，也表现在对现代化的认识深度向前推进。现实表明，已有的认识还不足以对人类提供应对现代化的一切方案。即使是搞了几百年现代化建设的西方国家，也同样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何况历经现代化坎坷的中国。就文化现代化而言，中国的优势和劣势都有鲜明的特色。如何充分发挥优势的效应，如何摆脱劣势的制约，还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继续摸索规律性的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实现文化现代化。

后 记

《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分课题。

研究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现代化是一个新的课题。一方面,关于文化现代化问题已经在当今现代化理论研究中凸显出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将关注点放到文化现代化的相关研究上。另一方面,自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后,关于文化建设的研究形成热潮。大量的著作论文相继问世,成果斐然。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本课题研究中吸取了近年来众多的学术研究成果,对学者们的帮助难以一一致谢。本课题研究的特点在于尝试着就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做一个系统的梳理,研究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文化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就我们所收集的资料看,目前有关这项研究的著作还是个空白。在完成本课题的研究中,我们深深感到,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推动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留下的足迹,很值得深入地研究。这既有助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有一个立体的历史认识,又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现实使命的认识。本书形成的研究思路和提出的一些看法,只是尝试性的,难免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希望本课题的研究能抛砖引玉,对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些许帮助,或者起点推动作用。

本书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由齐卫平拟定写作大纲、统稿、定稿。各章写作分工如下,绪论:齐卫平;第一章:陈勇;第二章:都培

炎;第三章:齐卫平;第四章:杨成敏;第五章:张玉菡;第六章:黎见春;第七章:张明军;第八章:黎见春;结束语:齐卫平。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大力支持,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王晓莺、李秀琴为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特别要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高伟为本书的出版进行精心策划和具体指导。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著者学识所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各位专家、读者批评指教。

齐卫平

2005年8月

责任编辑：王晓莺 李秀琴
装帧设计：葛怀亚

ISBN 7-227-03137-3



9 787227 031376 >

ISBN7-227-03137-3

定价(六册)：180元